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国民党起义将军

传奇

吴辅佐 赵亚娟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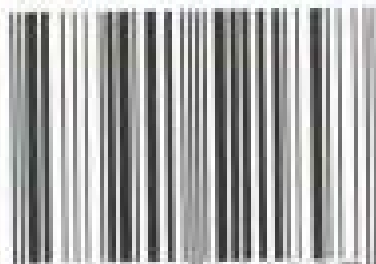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魏 明 □ 封面设计 张宪峰



ISBN 7-80152-189-7



9 787801 521897 >

ISBN7-80152-189-7/1·000

定价：20.00 元

●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吴锡任 赵亚翔 / 编著

黄河出版社

2002年·济南

责任编辑 程 鹏 封面设计 张宪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吴辅佐,赵亚娟编著. - 济南:
黄河出版社,2002.5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ISBN 7-80152-189-7

I.国... II.①吴...②赵...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607 号

书名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著者 吴辅佐 赵亚娟
出版 黄河出版社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印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7-80152-189-7/I·090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本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之一部。

翻开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 1955 年授衔的 1000 多位将军中，有 159 人曾是原国民党军队的统率者。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由于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许多人曾经在反革命与革命、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做出过痛苦的选择。历史已经证明，选择前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成为了千古罪人，选择后者投身革命大潮之中的人成为人民功臣。当革命洪流锐不可挡、人民的胜利指日可待之时，许多仁人志士志在爱国和平，有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的幡然醒悟，投身革命；有的调转枪口，重新立功；有的临战易帜，高举义旗，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拥戴，受到党和政府的宽容和重用。从而为毛泽东、共产党的宏才大略、英明伟大写下了辉煌的注脚，为人民的和平解放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为起义将军们的历史描绘了光明前程。

本书浓墨重彩，气势恢宏。以传奇的形式，既对起义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将领们的非凡经历、艰苦磨难进行了精彩纷呈的展示，又对他们的多彩生活、人生变故进行了绘声绘色地描述。一串串故事，令人深思；一段段佳话，掩卷难忘。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也讴歌了陈明仁、董其武等起义将军的戎军之旅、爱国之情、仁厚之心、和平之志。

军旅作家吴辅佐、赵亚娟经过大量资料收集和文学创作，历时一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由于资料的原因和各方面的局限，本书只选取了七位代表性人物，其他起义将军的传奇故事，将随后陆续奉献给读者。本书融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于一体，描绘了一幅幅耐人寻味的历史画卷，写下了一段段爱国爱军的感人佳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之年，奉献这本书，意在告慰那些长眠于斯的前辈们，也教育那些生长于斯的后人们。

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革命前辈的指教，参照了许多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还参阅、摘录、引用了一些党史、军史资料，并选用了有关照片。由于材料繁多，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向革命前辈、文学同仁表示诚挚的谢意，并竭诚期待所用材料的原作者指正。该丛书的编写、出版，还得到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黄河出版社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编委会

主编：程 鹏 吴辅佐

编委：徐晓明 梁筑国 韩靖顺

王永红 韩九位 赵亚翰

徐学能 韩晓琴





目 录

★ 忠勇上将陈明仁 (1)

1. 初露锋芒,中尉连长陈明仁一举成名
2. 抗击日寇逞英豪,忠勇将军名不虚传
3. 陈明仁为湘梓和平,决计“起义”,誓死不“投降”
4. 朱总司令亲自下厨炒川菜,陈明仁感激涕零
5. 毛泽东说:“还让你带兵,当21兵团司令员,怎么样?”
6. 前妻作媒,陈明仁将军的生死之恋

★ 轰天炮神孔从洲 (71)

1. 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他的爱将孔从洲三次深夜密谈
2. 毛泽东的儿女亲家



3. 继承传统终回归, 又扛三十八军大旗
4. 西北农村娃, 结缘炮兵成行家
5. 刘伯承挥师渡江, 孔从洲使炮如神
6. 办炮校, 老亲家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给毛泽东写信

★ 海战将星邓兆祥 (135)

1. 黄埔小海军邓兆祥, 驾回了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
2. 建设中国海军的崇高理想,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破灭了
3. 伴随着“重庆”号的最后航程, 邓兆祥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4. 侄子策反, 邓兆祥大义灭亲

★ 英雄之后林遵 (205)

1. 长江千里布防, 海军司令无可奈何
2. 地下党加紧策反, 林司令隐忍待时机
3. 桂永清心怀鬼胎, 林遵“瞒天过海”



4. 林将军笹斗山起义,毛泽东双清别墅写诗
5. 刘伯承司令员会见林遵将军的地点竟是南京蒋总统的议事大厅
6. 林遵将军原来是林则徐的侄孙,毛泽东说:“民族英雄人人敬仰呐!”

★ 飞天将军刘善本 (255)

1. 蒋介石四次给刘善本“上课”,刘善本四次反叛蒋介石
2. 刘善本导演的一场空中“闹剧”一直闹到了延安
3. 接济刘善本妻子的原来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中豪杰——施剑翘;帮助刘善本妻子的竟然是国民党四十七军情报处长——郑钧汉
4. 蒋介石要刘善本为他开“美龄号”专机,毛泽东要刘善本为新中国创建人民空军
5. 伴随着人民空军成长的进行曲,刘善本五次光荣飞越天安门

★ 守疆儒将陶峙岳 (323)

1. 陶峙岳“礼送”群凶出境,免新疆战火之灾



2. 护送共产党人回延安,和新疆结下不解之缘

3. 远古荒原变绿洲,戈壁沙滩变城池

★ 双料上将董其武 (367)

1. 抗战立奇功,“抗日民族英雄”名不虚传

2. 晋见毛泽东,董其武诚惶诚恐

3. 六位元帅视察六十七军,董其武受宠若惊

4. 对手与战友,董其武与杨成武不打不成交

5. 比翼双飞 60 载,董其武与爱妻姚勤修情深意笃

6. 83 岁入党,“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

忠勇上将陈明仁



1. 初露锋芒,中尉连长陈明仁一举成名
2. 抗击日寇逞英豪,忠勇将军名不虚传
3. 陈明仁为湘梓和平,决计“起义”,誓死不“投降”
4. 朱总司令亲自下厨炒川菜,陈明仁感激涕零
5. 毛泽东说:“还让你带兵,当 21 兵团司令员,怎么样?”
6. 前妻作媒,陈明仁将军的生死之恋



陈 明 仁

(1903 ~ 1974 年)

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先后入广州市军政部讲武学校和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十师五十六团团长,陆军第八十师少将副师长、中将师长,陆军第二师中将参谋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国民党军政部中将处长,陆军预备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七十一军中将副军长、军长,东北第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猛善战。

城坚将勇，攻城更难。

黄埔一军一师师长何应钦，受命担任攻打惠州的前线指挥官。富有作战经验和军事谋略的何应钦，在军事会议上敞开心扉，力陈己见：惠州易守难攻，守将善战，急于攻城，弊多利少。应以少量兵力，围而不攻。主力大军，直取河婆、潮州，寻歼陈炯明主力林虎、李易标等部。

蒋介石此时权柄在手，兵多将广，气壮如牛，军务之事，一手遮天。

尽管如此，当爱将何应钦阐明意见、说出看法时，蒋介石也有些犹豫不决。

黄埔官兵听说攻打惠州的消息后，全军上下，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周恩来率总政治部，一路张贴标语，战前动员热潮迭起。

一时间，蒋介石骑虎难下，只得宣布：“打惠州！”

此时的陈明仁只不过是中尉排长，因身体有病，被安排回后方休息。但陈明仁生性倔犟，大好的时机岂能错过，于是，强烈要求参加战斗。八团党代表张际春批准了他的要求并给他了一匹马骑，以减轻陈明仁的行军之苦。

10月12日，黄昏时分。

蒋介石率部驻惠州郊外。因心系军务，匆忙进餐。忽然，“嘣”的一声，蒋介石咬到一粒沙子，把牙磕得酸痛。他忿然命令：“明天早上，攻打惠州城！”

惠州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陈明仁所在的黄埔第一军第二师四团，担任主攻任务，五团协助攻城，第三师担任侧翼掩护，第一师为总预备队。



总攻时间定于13日上午9时30分。

苏联顾问见蒋介石次日急于攻城,急忙上前劝阻:“总指挥,现在后方的炮兵未赶到,不能攻城!没有炮兵配合摧毁敌城墙和压制敌火力,攻城难以奏效。我们应等一段时间,大炮一到,马上进攻。”

蒋介石冷冷一笑:“惠州守敌,打仗不行。我军将士,士气正旺,打惠州没问题。”

“总指挥,万万不可轻敌。后方的炮兵或一天或两天就到,怎么不能等一等?”苏联顾问无可奈何地说。

“等?兵贵神速,应速攻城。”蒋介石固执己见,决心已定。

翌日,9时30分。

黄埔军第一军第二师四团的将士们,跟着敢死队,在急骤的冲锋号声中,向惠州城猛烈进攻。

霎时间,空中响起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喊杀声。原野上汇成的铁流,在滚滚硝烟中,向城垣飞涌而去。

当后方的大炮未到时,第一军野炮营的山炮,向守敌发出了怒吼,炮弹呼啸着划过长空,落在敌阵,炸起飞扬的焦土,闪烁着片片火光。

时任野炮营营长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学员陈诚,指挥着炮兵在惠州城外的飞鹅岭上,向守敌猛烈开火。只是这些小口径火炮用得不太顺手了。

蒋介石和周恩来站在飞鹅岭上,指挥着这场战斗。

此时的蒋介石,期望这场战斗能在激烈的攻击中迅速获胜,打一个干净、利落、漂亮的进攻战。如果能漂亮地解决战斗,那么,他将在南方政界大出风头,荣耀万分。



当蒋介石正在憧憬美好的未来时,眼前黄埔军激战惠州的情景,却令他又惊又惧。

在黄埔军发起凌厉的攻势中,惠州城墙上骤然响起了一片枪声,墙上织起密集的火力网。冲向城墙的黄埔军将士在杨坤如部猛烈的枪声中,一批又一批倒在了血泊中。

杨坤如的部队中,多是老兵,训练有素,枪法很准。第一次东征时,杨坤如避开锋芒,望风而逃,保存了实力。现在,陈炯明命令他死守惠州,他严执军令,对守城官兵下了死命令:与城垣共存亡!

战斗打响后,陈明仁在二连挑选出了 20 名精壮的士兵,加入四团的奋勇队,向惠州城进攻。

由于蒋介石指挥失当,加上黄埔军着装的疏忽——攻城黄埔军的军官和士兵分别穿着不同颜色的军装,这就给守敌以可乘之机。杨坤如令一些神枪手对身穿草绿军装的军官们,进行猛烈射击。攻城部队伤亡极其惨重,冲锋队伍严重受挫,无法前进一步。

第一次冲锋,仅仅持续了 15 分钟,四团就牺牲了 348 人。第一线的官兵几乎全部阵亡。

面对部队惨烈的伤亡,蒋介石下令:暂停进攻!

黄埔四团的官兵迅速撤退下来,原地待命。

正当蒋介石面对惠州城手足无措、望城兴叹时,突然听到传令兵报告:后方的日本造“有坂”式野炮运到,待命攻城!

蒋介石一阵惊喜,急令部队火速架设大炮,准备攻城。

口径较大的“有坂”式野炮,炮弹的射速、穿透力、轰炸威力,在当时各类大炮中当属一流。

黄埔军校炮兵学员队,受命后雷厉风行,迅速选择下角塔高地,架起大炮,将炮口一齐对准了惠州城。



“有坂”野炮的出现,使步兵顿时斗志大增。黄埔一军二师决定成立敢死队,由二连组成的敢死队率先爬城。

陈明仁随团长刘尧宸写下遗书,交待后事,志在破釜沉舟,决一死战。

上午10时,“有坂”炮抬起“头颅”,吐出怒火硝烟,对着惠州城猛轰。

顿时,惠州城墙上火光闪烁,硝烟弥漫,砖石横飞。“有坂”野炮尽情的狂吼,黄埔炮兵大出风头。炮弹的巨大爆炸力,令前线官兵为之振奋。

黄埔炮兵队在振奋之中,得意地放平炮管,干脆直接瞄准目标,猛烈轰击城垣。炮手们以良好的技术,在第一轮7发炮弹的发射中,便全部准确地击中西面的第二座城门,城门被炮弹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狂吼的大炮,又破坏了北城城门、城墙和掩体。刹那间,敌阵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烟尘滚滚、血肉横飞。

守敌杨坤如部的山炮也开始从惠州城向黄埔炮兵队阵地发射还击。谁知刚发出三发炮弹,便被训练有素的黄埔炮兵队发现了目标。“有坂”炮立即集中火力,猛烈压制过去,一阵炮声过后,惠州城内的小山炮便成了“哑巴”。

黄埔炮兵对惠州城发起准确而猛烈的攻击,使惠州城外的黄埔军欢呼雀跃。

当呼啸的炮弹从空中掠过落于敌阵,炸起一片片火海时,全军将士跺脚击掌、齐声大喊:“杀——”

将士们情绪亢奋,心潮翻滚。

黄埔将领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钦,众苏联顾问也随大军齐声



其实,最高指挥官蒋介石没有明令四团应进入哪个阵地,等待进攻。指挥官的疏忽大意,立即化成了部队以鲜血铸成的惨烈代价,令人痛心疾首,扼腕惊叹。

四团的攻城部队,在一营营长蔡忠笏和敢死队长陈明仁的率领下,冒着枪林弹雨,旋风般地向守敌城墙攻去。

他们接近城墙,约需 15 分钟。守敌利用这一空隙迅速进入城墙阵地,搬出沙袋,修复掩体。组织火力,阻挡攻城。他们又重新举枪对准身着草绿色军装的黄埔军官进行射击。

就这样,黄埔军所取得的有利战局,因指挥失利而丢失。

四团的敢死队冲在最前面,在守敌射出的密集弹雨下,纷纷倒下,壮烈牺牲。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敢死队接近了河湾上的石桥,一营长蔡忠笏挺立在石桥上,挥动手枪组织敢死队向前进攻。

陈明仁以良好的军事素质,勇猛灵活地时而跃起奔跑,时而匍匐前进,当其他官兵纷纷倒下时,他却毫发未损。

蔡忠笏草绿色的军官服和注目的站姿,立即引来了密集的子弹,顷刻之间,便倒在血泊之中。副营长谭鹿鸣立即代替他的职位,指挥部队向前突袭。一分钟后,谭鹿鸣也中弹身亡。

陈明仁带领敢死队奋勇向前,冲过了原应是他们出发阵地的河湾地段。

此时,离城墙仅有五六十米远了。可是,冲过来的敢死队员没有带云梯,在开阔地里,面对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密集子弹,无法构筑掩体,只好伏在几个小土包后,避敌弹雨。

面对此情此景,团长刘尧宸双眼喷火、焦急万分。他急令二营长杜冷率 100 多名官兵组成敢死队,携两架云梯,冲向守敌城墙



根。在敌密集的火力的下，队员们纷纷倒了下去，接近城墙时，伤亡已经过半。但敢死队员们置生死于不顾，冒着弹雨继续往前冲，终于把云梯架上了城墙！

“哒哒哒……”敌人的机枪对着攀上城墙的黄埔官兵拼命扫射，黄埔军在墙边不断倒下。随即，狡猾的守敌又向墙外的云梯投掷出无数火把，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云梯顷刻间化为灰烬，冲到墙下的官兵在浓烟中全部牺牲。

刘尧宸大怒！他拔出手枪，率领预备队、警卫排和前两次进攻所剩残部，向守敌冲击。

陈明仁带领的敢死队此时正被困在城墙附近的土包后面，机敏的陈明仁趁机急令几名灵巧的士兵，随自己迅速往返石桥，搬来八架竹梯。

恰在此时，刘尧宸率部冲来，见陈明仁准备了梯子，心头一亮：“好样的！干得漂亮。”

刘尧宸和陈明仁兵汇一处，率队攻城。他们命令士兵架上梯子，刘团长挥枪向城墙上的守敌射击，抢先登梯。

突然，墙上射来一梭机枪子弹，击中刘尧宸的头部，顿时脑浆喷出、热血飞溅，刘尧宸当即阵亡。

陈明仁箭步冲上，抱住刘团长，悲痛万分大声哭喊：“团长，我要为你报仇雪恨！”

他挥动手枪，怒喊：“跟我来！”便带领士兵架梯攀城。

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部队仍无法登城。

刘团长牺牲后，由周庚雉负责指挥全团。这时，全团仅剩 300 余人，何应钦命令四团撤出战斗，攻城任务由第七、第八团接替。

“不，我们不下去！”四团的队伍里发出狼一般的嗥叫：“我们要



为团长报仇！”

何应钦闻声望去，见是二连连长陈明仁。

陈明仁双眼血红，怒目圆瞪，透着杀气。他紧握双拳，挺直身躯，气势逼人地走向何应钦。

何应钦见高壮威武的陈明仁向他走来，心中不禁暗暗发毛：这位曾在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大闹天宫”的壮汉，说不定会干出愣头蠢事。

身着焦黑破烂、千疮百孔军装的陈明仁，在何应钦面前把脚跟一靠，举手敬礼，两人四目相对，默默无言。

四团 300 多余官兵聚集肃立在陈明仁身边，在这悲壮的气氛中，何应钦热泪盈眶，举手还礼：“我命令，第四团一、二营剩余部队，由陈明仁代理指挥，准备下次攻城。”

“是！”陈明仁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集合队伍。

何应钦心中油然升起对这位被刘尧宸精心栽培的小伙子的钦佩之情。他匆匆赶到飞鹅岭，向蒋介石报告：陈明仁代表黄埔四团要求坚持攻城，连续作战。

蒋介石连声称赞，并从预备团中抽调一个营，归陈明仁指挥。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萧瑟的秋风，拂起阵阵血腥的烟尘，阵地上时而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久攻未克的惠州城，成为压在黄埔军指挥官心中一块沉甸甸的巨石。

黄埔四团副团长周庚雉接到何应钦的命令：夜晚攻城，违者绳之军法！

军令如山，战事紧急。

副团长周庚雉心忧如焚，风急火燎地找到陈明仁，令他组织部



队,准备攻城。

陈明仁沉思片刻,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纸,挥毫疾书:“何师长:敌逸我疲,未可轻敌。敌今日惊厥,必提心慎防,夜不敢寐。待翌日攻城,我军睡足,则我逸敌疲。那时,我军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写好后,递给传令兵:“赶快交给何师长。”

传令兵接过信函,策马扬鞭而去。

周庚雉疑惑地看了看陈明仁,陈明仁一笑:“副团长,我敢打赌,明日攻城。”

师长何应钦看过陈明仁的信函,心中暗暗吃惊:“言之有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生可畏。这陈明仁有勇有谋,刘尧宸明察秋毫识得良才。”

于是,何应钦命令:陈明仁率四团的一、二营,于明日拂晓进攻惠州城!

陈明仁受命后,抖擞精神地召集队伍,让多数人员休息待命,少数精壮士兵,则由他带领备好云梯,悄悄往城下送去。

翌日,何应钦令四团三营长惠东升任代理团长,并把三营从西门调来,增强攻城能力。同时,把攻城时间改在下午1时。

代理团长惠东命令陈明仁率一、二营剩下的150人,编成七个小队,每队携一架云梯,待命攻城。

下午1时整,飞鹅岭上的指挥部里,发出了攻城的战斗命令。

三发红色信号弹射向空中,黄埔炮兵队的大炮忽然发出怒吼,大地顿时抖动起来。

冲锋的时刻来临了!陈明仁和陈赓率领四团敢死队像强弩飞鸣,直扑城墙。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在北门,陈明仁腰插手枪,一手举旗,一手携着捆在一起的四枚手榴弹,他令两名虎背熊腰的士兵竖起云梯,用身体扶牢,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奋力攀跃,登上墙头,把捆紧的四枚手榴弹往墙上守敌一扔,随着一声巨响,守敌血肉横飞。

在浓烈的硝烟中,陈明仁拔出手枪对着四面城墙上的守敌“砰砰”急射。接着又掏出手榴弹向墙头左右各扔一枚,手榴弹轰轰炸响,吓得守敌魂飞魄散。陈明仁大吼一声:“冲啊!杀呀!”敌人猝不及防,纷纷溃逃。紧跟陈明仁的士兵们也纷纷攀上墙头,后续部队蜂拥而上……

几分钟后,西门的蒋先云也攀上城墙,西门终于被打开了,黄埔军像奔腾的潮流涌向惠州城。

陈明仁率队乘胜追击,一直将黄埔军旗插上了城楼最高处,猎猎战旗在硝烟中高高飘扬。

此刻,陈诚指挥黄埔军炮兵营,摧毁了城门的几处火力点,杨坤如也被猛烈的炮火炸伤,急急如漏网之鱼,令士兵打开东门,仓皇逃窜。

陈明仁率部登上墙头时,飞鹅岭上的蒋介石、周恩来等指挥官,已从望远镜中看见了陈明仁把军旗插在城楼,敌军在黄埔军的打击下纷纷逃窜的情景。

蒋介石情不自禁地问:“手举军旗、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是谁?”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教官,原讲武学校教育长李明灏响亮地回答:“您的学生陈明仁!”

“嗯,好啊,他不愧为黄埔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不禁脱口赞赏。

下午5时45分,惠州城全部被黄埔军占领。

蒋介石肃穆地跨进惠州城。瑟瑟的秋风卷起战后的余烬,空



中飘拂着血腥和硝烟味，整座惠州城一片战火劫难后的焦土、血迹、尸体。

蒋介石缄默无言，迎风伫立，他的黑色大氅在风中飘起，发出呼啦啦的响声。

在这场悲壮惨烈的战斗中，整个黄埔四团仅剩 300 多人，而牺牲的将士中，许多人是他的学生，仅黄埔二期学员，就死伤 300 多人。

10月15日黄昏，蒋介石令黄埔官兵在惠州城下集合庆功。他请陈明仁站在城墙上，蒋介石亲自带头高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

然后，令全军立正，号兵吹起军号，重复三遍，向陈明仁致敬！嘹亮的军号声划破苍穹，激励着黄埔勇士。

刚毅的陈明仁伫立城墙，他心潮起伏，热血涌动，双眼流出了激动的泪花。

蒋介石对东征军在两天内攻破自宋代以来从未攻克的“南方第一坚城”——

惠州，异常兴奋。他颁布《奖励有功战士令》，赞扬陈明仁奋勇攻城、杀敌立功。

当即任命原黄埔四团一营二连中尉连长陈明仁，为黄埔四团第三营中校营长。

英姿勃发、年轻潇洒的陈明仁，踌躇满志地跨进了昔日黄埔同窗的前列，那时，日后成为他上司的宋希濂、黄杰等人仅是黄埔军所属各团的连长，杜聿明只是少尉排长。

惠州战役结束后，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兴奋不已、喜不自禁，特邀陈明仁赴宴。



日起作攻夺昆仑关的战役部署,率部陆续向指定地区挺进,准备阻击敌人北进。

17日,在昆仑关附近地区,第五军与日军遭遇并开火,揭开了昆仑关战役的序幕。

第五军是一个拥有最新机械化装备的部队,由战车部队、重炮部队、山野炮部队、快速搜索部队、装甲汽车部队等组成,有新式有线电、无线电空地通信装备,还有数百辆汽车、摩托车。该军共辖三个师,即荣誉师(师长郑洞国)、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和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另外还有军部直属各部队。

第五军本来打算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夺回南宁,不料经过几昼夜激战,进进退退,没有大的作为,昆仑关仍在日军手中。日军以所占据的昆仑关右面的一座高峰为主阵地,构筑了坚固工事,明碉暗堡纵横遍布,火力配置齐备,防守十分严密。

在主阵地前沿两侧,左翼的“441”高地与中汉村,右翼的廖家村与湾塘,分别建有侧面辅助阵地,两阵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持。

作战时,日寇有飞机助战,狂轰滥炸,第五军伤亡惨重,只好转攻为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在此关键时刻,统帅部急电陆军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率部驰援昆仑关。

此时,陈明仁正率部在鄂南枝江、松滋、公安一带沿江驻防,防止日寇由武汉溯长江而上,西犯宜昌或南犯常德。

陈明仁布防于200余华里的江防线上,一面构筑工事,向武汉方向警戒;一面加紧训练,准备迎战日军。接到驰援的命令后,陈明仁心急如火,连夜令所属各团组织敢死队,由各连挑选精锐官兵一个排,每四个排(称分队)组成一个敢死队。



8月7日,陈明仁在枝江召开各团敢死队官兵誓师大会。会上,陈明仁慷慨激昂,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我中华,欲使国民做亡国奴的祸心,激励众官兵发扬革命军人的爱国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最后,他举臂一挥,斩钉截铁地说:“每个官兵都要在战斗中杀敌立功,日寇不除,何以还家!”

敢死队官兵更是群情激奋,个个斗志昂扬,一致表示:坚决服从指挥,为抗日救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8月9日,陈明仁命令第四、第五、第六步兵团,以团为单位,强行军到衡阳转乘火车至郴州。陈明仁亲率师部及敢死队官兵从枝江出发,强行军至禄口,然后转乘火车至柳州。

各部队日夜兼程,一昼夜行军160华里,七天七夜行程千余里,分别到达禄口和衡阳乘火车,急驶柳州,在柳州下车后,又急行军向宾阳思龙进发。

战斗之前,陈明仁对军队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号召全师官兵在抗击民族敌人日寇的战场上,要勇猛当先,果敢冲杀,有功者奖,畏缩者罚,逃跑者以军纪论处。

他按照国民党桂林行营的指示和所得知的昆仑关的战报,在行军途中,即同有关作战人员对着地形图研究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从昆仑关左右翼增援陆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首先攻打昆仑关324高地,以取得有利的制高点和立足点。

当预备第二师向宾阳思龙开进时,陈明仁利用空隙时间,召集各步兵团长、炮兵和工兵营长以上及有关作战人员,在前沿阵地上对敌情、地形进行反复周密的侦察和判断。通过观察,发现在324高地及其左侧一带高地,约有敌军一个联队,其防卫重点似在324高地主峰。该阵地障碍物只有一层屋顶形铁丝网,这是敌人凭借



324高地地形险峻而加强设置的；敌人火力点的布置虽然十分隐蔽，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仍有利于我方对火力的压制和突击。

经过详细研究，一贯不苟言笑的陈明仁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两口，吐出烟雾，然后用锐利的目光环视一下全场，胸有成竹地说：“324高地山高坡陡，工事建筑坚固，火力封锁严密，正面强攻，势必难以奏效；但不拔除这个据点，就不利于全线反击。因此，我们必须将攻击的重点指向324高地！”

接着，陈明仁下达命令：本师决定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击，重点指向324高地，由两翼包围歼敌；第四团团团长洪行率部由左翼首先投入战斗，进行佯攻，将敌兵力火力吸引到左翼，保障主攻方向得胜后，向敌纵深攻击前进；第五团团团长戴坚率部主攻324高地，选骁勇善战的官兵组成敢死队，由工兵支援，实行主要突击；第六团为师预备队，暂在师部附近待命……

陈明仁的命令坚决果断，切合实际；大家决心奋力强攻，与敌决一死战。

陈明仁还亲自检阅了敢死队，对这些士气高昂的官兵，他只讲了一句话：“看到你们这样威武雄壮的队伍，我相信一定能打胜仗！”敢死队的官兵深受鼓舞，齐声回答：“听从指挥，坚决消灭日本鬼子！服从命令，誓死杀敌立功！”

一切准备就绪，预备第二师敢死队向昆仑关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第五团敢死队担任正面攻击，第四团敢死队担任左翼攻击，第六团敢死队担任右翼攻击。

陈明仁命令：进攻战斗均在夜间进行，白天只派少数官兵潜行侦察敌情，一旦夜幕降临及拂晓之前，我军即出动攻击，此为“盯黑



不打白”。

日军知道预备第二师增援部队采取夜袭战法,他们便在晚间龟缩在碉堡内防守,我敢死队官兵冒死攻坚,一连三晚不断地向敌碉堡猛烈攻击,摧毁敌堡多处,大部敌人被迫退到第二线,但仍有少数顽敌坚守不退,从堡内枪眼向外扫射,敢死队官兵伤亡甚多。

在一连三晚的战斗中,陈明仁亲临前线指挥,敢死队终于攻占了敌阵地。日军不甘失守,增援反扑,预备第二师官兵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敌人冲上来,我官兵即出阵地与之肉搏,双方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和战刀,兵对兵、将对将地厮杀在一起。

日军短小精悍,尤善拼搏,闪转腾挪,机敏灵活;敢死队官兵身强体壮,威武剽悍,训练有素,出手强劲,毫不示弱。一时间,只见刀枪交错,杀声震天,血流遍地。

在陈明仁的直接指挥下,预备第二师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一日拂晓,桂南天空雾气蒙蒙,晨星依稀可辨,炮兵隆隆的炮声首先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担任佯攻的第四团的枪声也跟着噼噼啪啪地一阵紧似一阵。

敌人见中国军队首攻左翼,急忙将兵力向左翼转移,妄图阻止第四团进攻。此时,担任主攻的第五团与工兵,在戴坚团长的带领下,早已趁夜黑接近敌人,将敌铁丝网剪开几十米的缺口。敢死队借着炮火和各种火力掩护,将炸药和柴禾压入敌人堡垒,炸毁的敌堡火光冲天,我官兵强攻入敌阵,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格斗。

这些敢死队员都是由营、连精选出来的身材高大、骁勇敢打的强兵悍将,他们斗志昂扬,奋勇拼杀,直杀得日本鬼子尸陈山头,嚎叫逃窜。



日军虽几次组织反扑,并以强大炮火轰击我前方指挥哨所,待我第二梯队投入战斗后,终于被歼,324高地遂为预备第二师占领。

这是昆仑关战斗中中国军队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制高点。

在此期间,昆仑关后路五塘、六塘的敌军,曾两次共派出一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前来增援,预备第二师与其他兄弟部队全力抵抗,致使敌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原地。日军陆上增援失败,又动用飞机空投下三四百名精锐士兵投入了战斗。

经过连续几天战斗,日军虽在我强大炮火打击下遭到惨败,但仍凭借地道暗堡工事,利用山头死角,进行顽强阻击,特别是从地下工事射出的机枪火力,使我冲锋部队的进攻连连受阻。

陈明仁师长立即命令改变打法,指示各团、营精选身强力壮、作战勇敢的官兵,组成小股突击队、敢死队,与友军密切配合,同敌人进行逐地、逐点的争夺。

在拼搏过程中,有时为了夺占一个山头据点,双方几上几下,几进几退,伤亡累累;有时在一个地道工事内,聚集着负隅顽抗的几十个日军,敢死队员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把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投掷下去,将其全部炸毙烧死;有时当敌军作垂死挣扎进行反扑时,勇士们即亮出刺刀与之白刃肉搏。

陈明仁通观战役全局,对每一战斗进程都能体察入微,及时指挥。

在一次战斗中,第五团团部被日寇包围,形势十分危急。团长戴坚将重要公文等烧毁,准备与阵地共存亡。此时,陈明仁突然出现在阵地上,命令五团二营四连连长彭德率全连官兵投入战斗,以



解团部之围。

彭德立即组织全连九挺轻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薄弱之处发动了猛烈进攻。同时,另组织一个排的兵力上好刺刀,在步兵掩护下,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战。彭德负伤,但仍指挥士兵继续与敌人白刃格斗。全连付出伤亡过半的代价,终于解了团部之围。

陈明仁当即嘉奖彭德,提升他为二营营长,并对他说:“你是有功之臣,部队就是需要你这样有勇有谋的人带兵打仗,你可随师野战医院治伤,不必转到后方医院去。”

彭德见师长对他如此关心、鼓励,作战更是英勇无畏,身先士卒,屡建战功。

陈明仁率部队夺取 324 高地后,继续指挥第四团向九塘进攻。第五团则由 324 高地尾追敌人,向前推进。由于地形复杂,情况不明,第五团主力进入一无名山谷时,受到日军的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

团长戴坚沉着勇敢,毫不畏惧,立即组织反击。陈明仁也当机立断,立即命令师预备队第六团一个营进攻敌之侧翼。

敌人腹背遭围,只得向九塘退却,第五团主力继续向九塘追击。第四团切断了九塘至昆仑关的公路,由东面进攻。第五团则由北面向九塘进攻。

正当九塘之敌欲退五塘之际,陈明仁抓住战机,命令第六团向五塘进攻,截断日军退路。敌人四面被我堵截,乱作一团。陈明仁当即命第四、第五团发起猛攻,合击敌人,并协同友军将退至九塘之敌歼灭。

这时,五塘之敌退守四塘,陈明仁指挥全师乘胜向四塘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百登岭高地。



日军从南宁以一个联队增援四塘,企图夺回五塘。

预备第二师利用石登岭有利地形,重新部署兵力:六团居中阻击敌人反攻;四团、五团由左右两翼包围敌人。

日军前进运动,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火力之下,经一天激战,大部被歼,残敌退守南宁城,战斗结束。

预备第二师受到国民党桂林行营的嘉奖。

在欢呼昆仑关大战的胜利声中,在受到嘉奖的欣喜之中,二师的全体官兵,在四塘、五塘战场上度过了1940年春节。

昆仑关东南隅的高峰岩,是昆仑关之屏障,若保柳州,则必取高峰岩。

预备第二师夺下高峰岩后,陈明仁将师指挥所移到前沿阵地,他已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

受到重挫的日军不甘失败,不断扩充兵力,继续来犯。

一天黄昏,预备第二师第五团阵地突然吃紧,日军大军压境,突破五团防线,逼近师部指挥所,情况十分危急。

陈明仁情急生智,命令输送营全体官兵丢下担子,取出手榴弹,举起扁担当枪使,投入战斗。陈明仁自持左轮手枪,亲自督战。

输送营的官兵一连撂倒一批鬼子。日军见中国军队火力如此猛烈,加上夜色渐浓,不明虚实,你踩我挤,慌乱不堪,纷纷逃命。输送营乘胜追击,敌人伤亡惨重。

事后,广西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颂陈明仁的战绩。

“陈明仁,好将军,
带兵作战真英勇。
昆仑关,古战场,
日寇休想来侵犯!”



保山是一个南北长 75 华里、东西宽 25 华里的平坝，四周群山耸立，相传诸葛亮南征时曾到过这里，有点将台、诸葛营等遗址。

国民党军急调陈明仁部第七十一军及所属第二预备师等部队阻击日军，将日寇压迫退至怒江西岸。两军对峙于高黎贡山西南麓的腾冲和怒江两岸的龙陵、保山一带，从此拉开了滇西抗日战斗的序幕。

这时，缅甸全境和滇西边境的一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中印交通被截断，美援物资无法运入。

2月，以驻云南省的中国第五军、第六军两军为基干，编成远征军（辖第五、第六军及暂编第六十六军）。

3月，蒋介石委任卫立煌担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带兵进入缅甸；第二路准备进入越南。

由于袁某叛变告密，戴笠去洛阳，得悉卫立煌涉嫌亲共，蒋介石遂免去了对卫立煌的委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改由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代理。

4月，罗卓英接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并辖驻印缅境内的新一军、新六军和滇西前线的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陈明仁为副军长）、预备第二十师以及滇东南的第二十集团军等约 20 余万大军。

这些军队，由罗、杜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约瑟夫·史迪威共同指挥，配合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所率领的英缅军，抵抗在仰光登陆、向中国云南边境进犯的日军。

经商定，以仰光至曼德勒铁路以东为中国远征军作战地区。

经过多次战斗，英缅军不敌日军，首先被打垮，继而中国军队也遭受严重损失。



如今这一条路也被截断,中国抗战的形势严峻到了极点。

当时,滇西前线的第七十一军是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以七十一军、六十六军为基干组成)的主力,是首先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12个军之一,军长是钟彬,副军长是陈明仁。

七十一军奉命进驻保山后,当即部署两个师建立江防阵地,坚守三个险要渡口。

5月28日,陈明仁直接指挥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截击日军,击毙了一个敌军大队长,截获其图囊中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一份作战计划及一张地图,得知敌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集结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1.5至2万人左右。

陈明仁将此文件速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并转呈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林蔚立即电告军令部。蒋介石随即于31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留置一部分在西岸从事游击。

这样,滇缅路上的战争,遂演变成为对峙怒江的局面。而且这个局势一直相持到1944年5月反攻为止,时达两年,使日军未敢越怒江一步。

缅甸全境及滇缅边境的一部分被日军侵占后,中印交通被切断,美援物资无法运入,重庆国民党政府大为焦急。

美国顾问史迪威于1942年7月18日向蒋介石送交备忘录,提出反攻缅甸的意见和计划。蒋介石随即批交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军令部核议。

军令部立即提出“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此大纲要



点是中国陆军以 15 至 20 个精锐师的主力出滇西反击,英美陆军以 5 至 7 个师与中国留印部队联合,以英美联合空军、舰队控制制海权,掩护陆军作战。

此计划由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议妥,后又由军令部次长林蔚、刘斐及第一厅厅长张秉均同史迪威进行具体研究。研究后的会谈纪要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作了如下批示:“可照谈话结果积极准备进行,但留守滇省与昆明防守部队必须增派一军,尤其要增强昆明的实力,必须要有三个军防守昆明,应即筹划在第六战区或第九战区再抽一个军限明年 2 月以前到达昆明。”

11 月 28 日,军令部颁发了《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的训令,此计划定于 1943 年夏季实施,其兵团部署以第十一集团军为进攻部队主力。

陈明仁接受任务后,便立即作消灭侵入滇西边界的日寇、进军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准备。

反攻之前,陈明仁与卫立煌一道,缜密地研究和选择了进攻的路线,其中有一条由怒江岸边某处通往腾冲的山路,由于这份图是在多年以前绘制的,地图上没有标出。

陈明仁得知美国的军用地图都是用飞机照相制成,便找到卫立煌司令官,希望窦恩准将从中帮忙,派飞机重新照相。

窦恩将此情况汇报后,遂指示英国飞机在怒江到腾冲这一段线路上进行航拍,再根据照片提供的资料制成地图。

1944 年 5 月初,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他召集霍揆彰、宋希濂及各军师长在马王屯开会,派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挥以第七十一军为主力的战斗部队,



从沪水、双虹桥、惠通桥渡过汹涌的怒江，沿固东街南下，围攻腾冲城日军。

腾冲，是明末遗民修建的抗清石城。

腾冲守敌为日军一个联队，它于城郊构筑了来凤山、飞凤山、辉凤山、凤凰山等四个坚固阵地，且互有交通壕沟通，能以火力相互支持。阵地前还设置多层铁丝网，居高临下，能以强大火力压制我军进攻。其主力则利用坚固的腾冲城墙和坚固的房舍，步步设防，其炮兵则隐蔽布置在城内，城内城外，互相策应。

在腾冲，经过45天的激烈战斗，七十一军预备第二师协同友军一道，全歼日寇一个联队以及经外围战斗退回城内之敌约计4000余人。

9月10日收复腾冲，取得了滇西反攻的第一个胜利，陈明仁由此被誉为“能战之将”。

不久，陈明仁奉命率部围攻松山日军守敌。

松山是矗立在惠通桥畔的一座高峰，巍峨峻拔，形势险要，山路蜿蜒，峰回路转，是滇缅公路的天然屏障，日军在这座山上筑有坚固完整的工事，凭险顽抗固守，多处都在守敌的射击目标之内。驻守此山的日军指挥官，是号称“战争之花”的松井少将旅团长。他手中掌握着一支有相当战斗实力的部队，还有炮兵协同。

日军居高临下，炮火所及既可封锁惠通桥两岸的通道，又能控制怒江上下游广大正面的射界；还配属有一个工兵大队，从地面到地下，构筑了纵横交叉的坚固工事，自称为“攻不破的堡垒”。

因此，日军把松山作为全线的可靠屏障，而陈明仁则视其为前进道路上必须拔除的钉子，它已成为敌我必争、血战不让的战略重点。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围攻松山的战斗打响以后,中国军队集中所有的重炮、榴弹炮、山炮、迫击炮等各类炮群,在不同距离位置上,一齐指向松山敌阵昼夜不停地猛烈轰击,炮弹爆炸声震撼大地,惊心动魄。松山敌阵在中国军队强大炮火的轰击下,山石横飞,一片火海,地面上的所有工事与树木杂草,均被夷平烧光。

紧接着,陈明仁指挥围攻部队的步兵分成几路向敌阵发起连续冲锋。部队攻到山腰时,日军即凭借地下未被摧毁的工事,利用地面上的残存堡垒与山崖死角,进行阻击顽抗,特别是从地道中射出的交叉火力,使冲锋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攻势受挫,不得不停顿下来。

在攻夺松山之战打响不久,日军腾冲方向的部队开始集中攻夺龙陵,以解松山之围。当时,守卫龙陵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一师作战不力,节节败退,已至黄草坝。

师长张少勋率队抵挡乏术,要求变换阵地,放开公路。

陈明仁认为此举正合敌意,让开大路,日寇松山之围可解,松山围解,日军则可打过怒江,直指昆明。这样,不仅会使第一战役的成果前功尽弃,而且还会威胁大后方的安全,绝不可取。

陈明仁遂严令八十七师必须坚守,不准再退。

张少勋师长接到陈明仁不得再退的电话后,心急如焚,背着陈明仁直接打电话给总司令宋希濂,报告伤亡惨重,坚守不住,要求撤退。

恰逢这时陈明仁也要打电话给宋希濂,接线员告诉他话线已占,是张师长与宋总司令正在讲话。

陈明仁当即要接线员将塞子插上,监听他们的谈话。

他清晰地听到张师长在电话里叫苦不迭,同时又听到宋希濂



答复张说：万一守不住，可以变换阵地，放开公路。

听到这里，陈明仁按捺不住愤怒，对着话筒高声吼道：“张少勋，你必须给我守住，绝不可后退，这关系到整个战役大局。今天七十一军是归我指挥，我的命令不算数吗？”接着他又对宋希濂高声喊道：“总座，作为总司令，你不可以不与我商量，越权指挥！”

最后，他以严厉的口气警告张师长：“张少勋，你要知道，军人违抗军令是什么罪过！阵地守不住就别来见我！”

张少勋自讨没趣，并且也知道违反军令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他自知这仗不好打，战败后无颜再见陈明仁，挂断电话后不多时，便开枪自杀。

宋希濂将张少勋自杀的消息告诉了陈明仁，陈问道：“他死了没有？”

“还没有死，未打中要害，还不至于死，我去看了他。”

陈明仁更是火冒三丈：“张少勋战场自毙是为了逃避责任，咎由自取，他不死，我也要毙了他！”并义正辞严地对宋希濂说：“总座，你去看他，不是等于纵容他吗？”

宋希濂瞠目结舌，无言以答。陈明仁遂另派师长接替张少勋之职，指挥松山作战。不久，宋希濂和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均被调走，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七十一军军长分别由黄杰和陈明仁接任。

在攻打松山最激烈的危急时刻，陈明仁与其他前线指挥官一道，及时研究改变战法，命令各部选出一批身强力壮、射击优良、作战勇敢的士兵，组成小股突击队、敢死队，从各个方面与敌进行逐个山头、逐个地堡暗洞的争夺战。相隔稍远的即以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六〇炮扫射轰击，距离较近的则投掷手榴弹和展开白刃肉



搏。

对在地堡、山洞内因弹尽粮绝而无还击的敌散兵，我军则用日语喊话，促其投降。

鬼子兵虽毙命在即，却仍负隅顽抗，至死不降，直至我军用集束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猛烈轰击，阵地方才复归我手。

经过几昼夜的反复冲杀拼搏，终于全歼守敌，占领了整个松山阵地，两个联队的日本兵几乎全部战死，侥幸逃回龙陵的二三十名散兵，也被日军师团长以作战不力而全部处死。

中国军队打扫战场时，在山崖下的一座小屋内，发现了剖腹自尽的松山守将松井的尸体。这个罪恶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狂徒死有余辜。

在一个很深的杂草丛生的坑内，还发现了 11 具女尸，后经查得知，这是日本的随营军妓，鬼子兵发泄兽欲后将她们击毙，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在这次围攻松山的激烈战斗中，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第七十一军指挥的某团第三营参战时 600 多名官兵，战斗结束时仅仅剩下 18 名勇士，其中有 1 名排长、1 名班长和 16 名战士，营、连长全部为国壮烈捐躯。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松山阵地的每寸土地。面对如此惨烈的场景，连刚强的陈明仁，也不禁泪流满面地感慨道：真是一寸山河一腔热血啊！

1944 年夏，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陈明仁指挥第七十一军的四个师为主力，越过怒江，进攻龙陵方面的日军，以打通滇缅公路。

这是陈明仁将军指挥的一场重要的反击战。

6 月 1 日，第七十一军同第六十六军等友军一道陆续过江，进



攻龙陵。

陈明仁率领的第七十一军辖陆军第三十六、第八十七和第八十八师,从惠通桥、攀枝花一线渡过怒江后,以第三十六师攻打日军前沿阵地;主力由左翼迂回到龙陵城,将城郊各高地敌据点团团包围,各个击破,然后攻城。

为尽量减少伤亡,陈明仁急电卫立煌和史迪威,要求协同作战的盟国航空兵施行空中支援,对日军据点先以重磅炸弹俯冲轰炸,摧毁其堡垒工事和有生力量,然后以炮兵火力掩护步兵冲锋;对敌残存碉堡,以火焰喷射器喷火歼灭。就这样,日军的堡垒群几天内被一个个地清除了。

在扫除龙陵城外围敌人的战斗中,陈明仁特别注意情报的收集,以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一日,陈明仁得报,驻缅日军将于次日 12 时派三架运输机向龙陵城内日军空投弹药和食品。

陈明仁凝神望着桌子上铺开的地图,双眉紧锁,锐眼闪光,沉思片刻后,顾不得与卫立煌和史迪威联系,直接叫通盟国空军联络官的电话,不容商量地厉声说道:“我是陈明仁,明日日军空军要来龙陵空投,请你们务必派航空兵于明日 12 时来龙陵上空截击空投敌机。”见对方未置可否,便撂下了电话。

翌日 12 时整,三架日机果然从缅甸方向进入龙陵上空盘旋,准备向城内日军空投。这时,盟国航空兵九架歼击机适时地从龙陵上空掠过,居高临下,出其不意,俯冲攻击敌运输机。

一阵枪炮声后,日军一架飞机尾部喷出浓烟,一头栽到龙陵城北山坡上,之后便是爆炸的轰响和冲天的火光。另外两架敌机见势不妙,调头就想逃跑,也未得到什么好结果,同样在歼击机的一阵炮火后,吃了个倒栽葱。



围城中国官兵日击头顶上的一场空战,全歼敌机三架,无不欢欣鼓舞。

第七十一军在友军部队的协同下,将松山、龙陵城外围之敌大部肃清。但敌之主力退守龙陵一隅和回龙山、三台山阵地,拼死顽抗。

在重炮轰城之后,陈明仁抓住战机,以两个师的兵力由友邻部队配合,组成突击队,分别从东北、东南方向同时攻城。

日军逐屋扼守,负隅顽抗,我军攻城推进十分缓慢。

此时,陈明仁与攻城的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熊新民(师长因病请假)共同商量,重新研究了敌情、地形,作了新的部署,组成三个突击队,由炮兵协同,梯次轮番冲击,经过七八天的激烈进攻,将日龙陵守军 2000 多人大部歼灭。一小股约百十人乘夜突围,窜入大龙川与大盈江之间的崇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之中。陈明仁当即派出一个步兵营跟踪追击,经过十多天的追击搜捕,将逃敌逼于汹涌的大盈江边,有的被击毙,有的由于连日无粮饿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被我军生俘。

第七十一军在友军的配合下,终于攻占了龙陵城。

当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这些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官兵们眼里噙满了泪花。

1944 年 11 月,陈明仁担任第七十一军军长后,率领部队作战更是勇猛顽强,正如他在自传中称:“当时凡属任何部队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七十一军来担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龙山等,都是七十一军攻克的;而攻克回龙山一役,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整个战局,而且增加了我个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声誉,我自己也公然认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龙陵战役结束后,陈明仁立即挥师南进。这时,日军另一个残缺的联队以回龙山为核心,在三台山一带构筑坚固工事,组成环形防御阵地,控制滇缅公路,阻止我军前进。

1945年1月,一场惊心动魄的山地攻击战斗开始了。

回龙山是畹町的门户,要取得滇西抗日的最后胜利,夺取回龙山十分关键。围攻任务先由新增的第二〇〇师和第九师担任,由美国飞机掩护,两个师围攻一个星期之久,伤亡惨重,仍未攻下回龙山。司令部非常着急。最后,卫立煌电令陈明仁速来远征军司令部议事。

陈明仁到时,卫立煌正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表情严肃,室内几个人静坐着,没有人言语,空气异常紧张。还是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打破了这凝固的气氛,首先开腔。

黄杰与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他拍着陈明仁的肩膀,显得很亲切,但仍不失上司的威严,语音凝重地说:“子良啊,我们两个师围打回龙山久攻不克,我与卫立煌司令长官思谋良久,非请你出马不可了,攻打回龙山的战役交你统一指挥。”

上司的信赖,同窗的重托,使争强好胜的陈明仁激动异常,心想,如今能战之将的殊荣,我陈明仁受之无愧;恶战在即,由我统领千军万马,自然当仁不让。

未及他启齿,站立一旁的美国联络官和几个指挥官正通过翻译向黄杰传达:他们已经收到美军指挥部的指示,由于中国军队作战不力,美国空中支援也无济于事。

自明日始,美国空军将停止对攻击回龙山的部队作支援飞行,空运物资亦暂停。

黄杰没有理会美国联络官的话,却将风尘仆仆的陈明仁介绍



协同作战的炮兵应同时行动,必须归我直接指挥。“那么,联络官先生,你就只能收回成命,令美国空军继续助战飞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卫立煌、黄杰和盟国空军联络官当即表示同意,并报何应钦批准。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与几个美国高级指挥官被派往前线观战。总司令黄杰、炮兵指挥官邵伯昌遂以观战者的姿态,亲往前线欣赏陈明仁指挥的这场威武雄壮的战斗。

会后,陈明仁立即赶回部队作了紧急调动、部署。

黄杰也来到第七十一军前线指挥所。当时第七十一军辖陆军第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

陈明仁召集各师团长、炮兵指挥官、空军联络官、通信营长等,研究部署攻击回龙山之敌的作战计划。他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态势,然后语调铿锵地向大家指出:日本侵略者的战术是僵硬的、傲慢的、笨拙的,只知死守,同时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化,宁死不放下武器。因此,我军唯一的办法是:整体包围,各个击破,予以全部歼灭。说到这里,他猛抽了一口烟,似乎要一口吃掉日本侵略军。

“时下正值深冬,滇西进入旱季,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对陆空联络、步炮协同作战都十分有利。为了充分发挥我军火力优势,我们要首先集中全军和由黄总司令调来的友军的百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轻重迫击炮,以凶猛的火力轰击敌阵地,把回龙山炸成焦土,并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后由步兵在航空兵、炮兵掩护下奋勇冲击,消灭敌人。”他指着地图对各师长命令:“为了使敌军不能进入缅甸,以一个师沿左侧山丘地带迅速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退路;第八十八师由滇缅公路两侧主攻回龙山敌主阵地;另一个师为预备队,以一个团佯攻三台山。为迷惑敌人,要调动步兵向三



台山方面汇集,航空兵的飞机袭扰三台山上空,造成其我欲主攻三台山的错误判断。”

各师长点头称是,打心眼里佩服军长的战略战术。

陈明仁最后强调说:“我已立下军令状,把脑袋押在总指挥部了,各位务必严督部队死力拼杀,打不下回龙山,誓不回头。”他将右手一挥,“各自回去作战斗准备!”

战斗打响的前夜,山野万籁俱寂。陈明仁特地来到第八十八师师长熊新民住地,鼓励他说:“友军攻回龙山久而不克,八十八师虽然伤亡很大,但士气旺盛,又有攻坚作战经验。主攻回龙山主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你们,能否攻下,就看你这个湖南老乡了。”说着,一巴掌拍在熊师长的肩上,熊师长感到了千钧的重量,全身微微一颤,随即镇定下来,用常德口音坚定地回答:“上级命令,坚决服从,为国家赴汤蹈火,与回龙山共存亡!”

接着,陈明仁将指挥所设在第八十八师的前沿,亲自督战,鼓舞士气。

夜深人静,陈明仁在前线指挥所用电话检查各部队的准备情况,特别是炮弹储备补充情况,直至一切准备就绪,才抽空休息了一会儿。

翌日拂晓6时10分,陈明仁亲自命令以三分之二的火力猛轰回龙山主阵地,另以三分之一的火力指向敌之后方和三台山,截断其机动增援。

敌人把主要兵力迅速转移到三台山方面,以阻止中国军队的进攻。

8时许,陈明仁命令航空兵出击,轰炸机三架一批轮番俯冲扫射、轰炸回龙山高地。



当胜利的旗帜在山头迎风飘扬时,几个美国军官发狂似地把陈明仁抬了起来,连声说:“very good, very good,不愧中国名将,难得之将才啊!”美国随军记者将这次战役写了长篇通讯报道,陈明仁的威名从此传扬海内外。

攻占回龙山主峰后,陈明仁当即命令部队继续向左右扩大战果。

战斗持续到黄昏,回龙山、三台山之敌约 800 余人被歼,残部约百余人向畹町方向逃窜,也被迂回至此的中国部队拦阻歼灭。

第七十一军乘胜前进,与在大黑山战斗的友军同时攻击中缅边界上的畹町。

畹町位于瑞丽江边的中缅边界我国一侧,附近为五六百米高的山丘地带,林木葱茏茂密,小镇上的居民,不堪日寇的骚扰,早已逃入山中,已是十室九空。经过几场激烈战斗,我军收复了畹町。

至此,盘踞在滇西土地上的日本侵略军几乎全部被歼,少数逃入深山老林中的日本兵,也被我边民截获。

陈明仁知道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不久,陈明仁率第七十一军与驻印远征军新六军、新一军在中国畹町和缅甸芒友胜利会师。至此,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歼灭了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的大部分,击溃其第二师团和第三十三师团,对于日军在缅甸的占领起到了瓦解作用,为英印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减轻了麦克阿瑟进攻太平洋的侧面压力。

中国与海外的通道中印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重新被打通。中国军队在这多次艰苦的战斗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单是远征军的死亡人数就达 4 万余人。在芒友会师时,人们见到中国远征



军的官兵个个穿着美制军装,手持新式武器,配备有坦克、吉普车、十轮大卡车,个个精神抖擞,好不兴奋。

一路绵延十余公里的十轮大卡车队,满载作战物资和兵士,如长龙般沿着滇缅公路,经畹町、芒市、龙陵回国,沿途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热烈欢呼我军取得消灭日寇、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的胜利。

滇西抗战至此胜利结束,陈明仁因抗战功勋卓著而蜚声中外。

3. 陈明仁为湘梓和平, 决计“起义”, 誓死不“投降”

1946年初,蒋介石将陈明仁指挥的第七十一军调往东北战场。1947年,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后,蒋介石又严令陈明仁“死守四平”这一战略要地。

陈明仁率3.5万国民党军,死守四平,在四平坚守了二十多天,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蒋介石将其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而且立即将他升任为兵团司令官,亲手为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面对这种近乎登峰造极的荣誉,陈明仁一度喜不胜收。

可谁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没过几天,陈诚等人故意抓住陈明仁在四平以美援面粉做工事这件事大作文章,为排除仕途劲敌,还编出了陈明仁有野心的“确凿”根据,向蒋介石告御状。

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很快就下令革除了陈明仁的兵团司令之职,并将其调往总统府担任中将参军的闲职。

蒋介石对陈明仁褒奖的话音尚在他的耳边回响,撤职命令便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接踵而至。陈明仁为此大惑不解,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终日里借酒浇愁,恸问苍天:“蒋介石,你如此昏庸霸道!我为你卖命二十余年,效忠党国,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你却如此专制,哪有不亡之理!国民党如此腐败,哪有不败之理!”

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全国战场每况愈下”了,国事前途实堪忧虑。蒋介石在划破船,看来这只破船非沉不可。

自此,陈明仁决计谋取自救的出路,几经周折,于1948年底当上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初率部回到了长沙。

共产党湖南省工委为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对陈明仁进行了大量的策反工作。

陈明仁虽然表明了和平的心愿,但要真正转向人民,转向共产党,他的心里有“三怕”:

一是怕泄密。在陈明仁看来,对于自己的和平倾向和真实思想,除了几个贴身的亲信之外,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大凡公开场合,他都“隐真示假”,极力把自己伪装成坚决反共的积极分子。这样一来,虽然十分有效地取得了蒋介石、白崇禧的信任,但在广大人民群众乃至他的第一兵团官兵之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迷惑。不仅如此,就连省工委以及陈明仁本人的诸多亲信也一度认定他一直在摇摆不定,甚至不时地为他捏一把汗。

二是怕共产党算他的历史旧账。他不会忘记,曾为蒋介石卖命二十余年,效忠党国,客观上做了不少愧对人民的事情。特别是想到四平之战,他更是痛感罪孽深重。共产党若要算旧账,他将百身难赎。

三是怕戴投降的帽子和把他的部属在起义后当成俘虏对待。陈明仁作为一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深深地知道,“起义”与“投



降”是有本质区别的。说白了,如果戴着“投降”的帽子,他将不仅以败军之将记入史册,而且诸如兵团司令、陆军中将的官衔和利禄都将从此化为乌有,而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十余万部队也将“树倒猢猻散”。

“三怕”归一,实际是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足够的了解。恰在此时,与毛泽东和程潜素有私交的章士钊老先生向陈明仁转告了毛泽东对他的一段话:“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陈明仁得悉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之后,心情激动不已,决心求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表明起义的态度还不等于率部起义的事实。随着起义预定日期的迫近,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惊险了。

1949年8月1日,程潜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了和平通电。而此时代主湘政、握有军政大权的陈明仁,却显得无动于衷。期盼和平的湖南人民对陈明仁的态度深感忧虑,但是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此时正在精心地导演着长沙这一出威武雄壮的和平解放活剧,对陈明仁的动向已经有了特别的关注。

8月2日,由中央军委正式表态:“可以答复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一般说来,这份电文是可以根治陈明仁的心病的。

可是,阴差阳错,陈明仁并未及时得知这一重要消息。更糟糕的是,湖南省工委在未经陈明仁同意的情况下,已经指示陈明仁的参谋长黄克虎,把长沙警备区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毛健钧扣押起来了。

“打狗也得看主人嘛!”陈明仁心里挺窝火,连夜找到程潜,说,



“颂公，我们不是投降，低三下四的事我不干！我们和北平不一样，共军远在千里，和我们合作，合得成就合，合不成就拉倒。”

很显然，陈明仁同程潜产生了新的分歧。程潜一再说明这是合作，并明确表示他要尽快致电毛泽东，商榷机构设置问题。言下之意，程潜原本就希望陈明仁能到解放军继续担任兵团司令官。

陈明仁半信半疑，怒气非但未消，反而越来越大。

第二天，陈明仁召来所属第九十八军军长蒋当翊等人，正言相告：“投降我是绝对不干的！打死我也不干！”早已倾向和平的肖作霖立即解释：“我们是寻求局部和平，怎么能算投降呢？不是正在谈判吗？”

“什么谈判不谈判，反正都一样，我只问你，省政府怎么办？军队怎么办？政府要缴印、部队要缴械，不是投降又是什么？我只求对得起颂公，对得起朋友，只好把这个摊子交给你们，我马上乘飞机到香港去。”心情极为矛盾的陈明仁气呼呼地说。

肖作霖只好急忙去找共产党派来的代表李明灏。

“你们是怎么和子良谈的？想不到他要翻脸，这可怎么办？”肖作霖见李明灏还不明事情真相，又一针见血地说道，“我看中共如不能保证子良的省主席和兵团司令的职位，这事就完了，可这种要求中共能同意吗？”

不料李明灏却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地说：“这好办，这好办，是我大意了。”随即拿出一份电报递给了肖作霖，并说：“这是中央来的电报，昨天下午到的，正好答复了子良提出的问题。他的省政府主席和兵团司令都可以照旧不动，只要把他住在长沙的部队开到岳麓山方向去，让解放军入城就行了。”

肖作霖顿时喜出望外，说道：“这太好了，我们也不必要到颂公



那里去了,就请你将这个电报送给子良看一下吧。”

李明灏随即乘肖作霖的车赶到省府会晤陈明仁。

李明灏见到陈明仁,先是答应了陈明仁的要求,同意将毛键钧放了。接着他操着浓重的醴陵乡音对陈明仁说:“我1948年才到解放区,一年来我深感共产党确实英明,毛泽东、周恩来胸怀豁达,谋略超人,实乃举世无双,解放军不愧为仁义之师,为了人民和民族大义,不记前仇。近来,北平的傅作义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待为上宾。论反共反人民你莫过于傅作义吧!前有师表,你不必多虑,四平街这笔账,解放军不会找你算的,你只管放心。如果说毛主席请章士钊先生给你的传话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现在毛主席的亲笔密信还不足信吗?”

李明灏的一席话,说得陈明仁连连点头。

李明灏接着又说:“我这次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可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话。我来之前,中央已有言在先,你起义后,官阶衔级不会低于现在,具体问题还可以再商量嘛,绝不会把你削职为民!”

陈明仁忽地站了起来,把胸脯一拍,说道:“好!现在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就在近日付诸行动!”

李明灏又问陈明仁:“你手下的将领们怎么样?是否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陈明仁笑了笑:“先生所虑极是,明天上午我就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也可采取些强硬措施。”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指示阎锡山出面,派国防部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充当说客,携带银洋20万,重机枪50挺,由广州飞抵长沙,利诱陈明仁驻守长沙,挟持程潜去广州。黄杰向陈明仁送来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了蒋介石的亲笔信，陈明仁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吾弟为党国中坚，一生光荣事迹，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由冰雪（即黄杰）面告。

陈明仁读完信，不禁大惊，他长叹道：“连程潜先生这样的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也要下毒手，不义呀！”

陈明仁驱车径自驶至程潜驻地，向他报告了黄杰、邓文仪来长沙的经过，并把密信交给了程潜：“颂公，总裁又在‘关心’您了。”

程潜阅后，把信一扔，大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

1949年8月1日晚，程潜以个人名义起草通电，揭露蒋介石和桂系的罪恶，呼吁西南、西北各省军政长官幡然悔悟，站到人民一边。信写好后，程潜令次子、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团团长程元等连夜发了出去。

程潜率先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毛泽东又明令保留陈明仁兵团司令名义，再加上李明灏的劝说，促使陈明仁加快了起义的步伐。

8月3日，陈明仁发出了《告第一兵团全体官兵书》，以及给台北草山蒋介石、广州行政院阎锡山、国防部顾祝同、衡阳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的电文。

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陈明仁斥蒋道：“蒋政权是非不辨，赏罚不明，绥嬖当权。”

在致阎、顾、白的电文中指出：“时至今日，惟有倡导和平。”

在致电官兵时写道：“方令油尽灯枯，万难角战。”表示他不忍



以 3000 万众炎生灵,殉个人一己之私利;更不忍驱使三军将士,徒作无谓牺牲。而主张立即弭兵罢战,高举义旗。

当日下午,陈明仁派代表前往春华山解放军一三八师驻地,与解放军代表举行商议,达成了六条协议。

1949 年 8 月 4 日下午,历时近一年之久的湖南和平运动终于有了结果。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30 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名,向北京、广州及全国各省市发出了“起义通电”。

毛泽东、朱德马上致电程潜、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电文是: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暨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 8 月 5 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心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协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4. 朱总司令亲自下厨炒川菜,陈明仁感激涕零

1949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文给陈明仁:“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议请我公及仇亦山、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能



不善言谈的刘伯承司令员也庄重地说：“中国只要有我们这些土八路，过去的历史就不会重演了。”

陈明仁被这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的气氛深深感染了，像这样轻松和谐的谈话，他还是第一次享受，这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军中是不可能遇见的。

第二天，陈明仁和程潜专门拜访了毛泽东主席。

正在筹划建国大事的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中，与程潜、陈明仁等热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就许多建国大计征询了程潜、陈明仁的意见。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一大早来到程潜、陈明仁等人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们。与毛泽东同来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领导同志。

大家在十分亲切的气氛中畅游了天坛。

走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陈明仁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陈毅反应快，立即推了陈明仁一把，说：“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啦！”

边说边把陈明仁推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陈明仁很恭敬地站在毛主席的右边，照了张双人半身相。

照完相，毛泽东对陈明仁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面解释一下，介绍一番，写些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促使他们早日觉醒，及早过来。”



“颂公此次北上，承蒙主席如此优待，他的感激之情非语言所能表达。工作安排问题，我想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却坚持说：“不，还是请你先同颂公商量一下，明天再回我的话。”

程星龄点头答应。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几十年来，颂公戎马倥偬，宦海沉浮，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啊！这样安排，我想他不会有意见的。”

当程潜听说此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对程星龄说：“请你转告主席，这样安排本已过分，但有所任，无不从命。”

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高兴，对程潜的任命就这样决定了。

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

程潜在主席台上就座，陈明仁也出席了会议。他们都为自己能参加这样的盛会而兴奋不已。

当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致开幕词，宣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时，程潜与代表们热烈鼓掌，欢呼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

在开幕式上，程潜被特邀发言，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对新中国这座雄伟大厦将要建成而无比喜悦，他发自肺腑地说：“我们全国人民要谢谢领导建造这所新大厦的空前伟大工程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

陈明仁则在大会发言中说：“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



诉自己,还向自己征求意见。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和蒋介石共事那么多年,从未遇闻过他的机密。我刚刚投向人民,毛主席就这样信任我,如此推心置腹,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当时有些人议论说,要是程潜在渡江战役之前起义,和解放军南北夹击,就能加速国民党的灭亡了。

毛泽东知道后公正地说,那时白崇禧的力量还很强,控制着江南,程潜要这样做是很为难的。

23日晚,毛泽东、朱德又专门设宴款待程潜、陈明仁、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闾等26名从国民党营垒中回到人民阵营中的将领。

宴会上,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这一番话,充分肯定了包括程潜、陈明仁在内的在座的国民党将领的爱国行动。

席间,毛泽东、朱德频频举杯向大家祝酒庆贺,希望他们今后和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高规格的接待、热情洋溢的宴请和对起义将领的工作安排,使陈明仁惊叹不已。

陈明仁,字子良,曾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得力干将。

他比毛泽东整整小10岁,于1903年4月7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洪源乡陈家岭的一个农民家庭,与程潜同县老乡。

陈明仁成人之时,正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合作时期。当时受大革命的影响,旧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都以军事报国为己任。



1924年春,陈明仁告别家乡父老,只身前往广州,准备报考大元帅府陆军讲武学校。路途辗转,陈明仁到达该校时,已错过了报名时间。后来在校长程潜的关照下,学校才破例将他收下。

9月,因前方战事需要,陆军讲武学校仅有的四个队中第三、四队提前毕业随校长上前线,第一、二队与黄埔军官学校合并。由于后来传说黄埔军校拒绝接收讲武学校学员,陈明仁等12名学员代表学生去黄埔军校质问校长蒋介石。陈明仁等回到学校后即被校方开除,陈明仁愤然离校而去。

蒋介石见陈明仁颇有军人气概,于是暗中派人将陈明仁接到黄埔军校,编入黄埔一期第六队。

由此,陈明仁对蒋介石产生感恩之情,后来发展成为誓死效忠蒋校长的封建愚忠情感。

1924年冬,陈明仁从黄埔军校毕业。

在蒋介石的关照下,在蒋系将领的互相倾轧之中,经过20多年的苦苦征战,到1949年,陈明仁官至华中“剿总”副总司令,衔至中将。

陈明仁是蒋介石的嫡系,自然为蒋介石打内战、消除异己而出死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原大战战场、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和福建事变的中心福州,都留下了他为蒋介石卖命的足迹。

好在抗战期间,身为爱国军人的陈明仁率部参加了九江、桂南会战和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作战,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战功。

全国内战爆发后,陈明仁率第七十一军开赴东北前线,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特别是1947年陈明仁曾在四平街以少量



兵力固守四平月余，顽强保住了国民党军在辽北的惟一战略据点，为国民党立了大功，蒋介石为此提升他为第七兵团司令，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但事后因国民党将领内部争斗，这位“功臣”很快就被解职。

此事对陈明仁打击很大，对蒋介石的忠心也开始大打折扣。

蒋介石在遭受三大决战失败的打击之后，又重新考虑使用陈明仁这位爱将，胡宗南、白崇禧等也纷纷从前线来电要蒋介石起用陈明仁。

陈明仁认为，几十年来我都遭别人算计，这次我也来算计算计他们。

经反复考虑，他认为到华中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发展，便接受白崇禧的邀请，出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后又兼第二十九军军长。

程潜调这位老乡加学生来长沙，好就好在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起疑心，而且还可以利用陈明仁内心对蒋介石的不满，争取他共同参加起义。

程潜派人与陈明仁一联系，陈明仁极为乐意率部返湘，表示愿听从老师的安排。同时陈明仁也派政工处长吴相如赴奉化溪口面见蒋介石，表示忠于党国，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同时还派老同学、立法委员汤如炎专程飞往台湾，向陈诚报告第一兵团移防湖南的情况。

经程潜、陈明仁共同努力，1949年2月，陈明仁率两个军由武汉返回长沙。

不久，程潜向陈明仁透露了自己准备走和平起义道路的想法。陈明仁三思之后与程潜约定：表面上，自己仍以反共的面目出



现,暗地里配合程潜共谋和平。

4月20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商定的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

三天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仓皇南逃广州。

李宗仁电告程潜要全力支撑湖南,对广州作有效的外围防御。而程潜则加快了起义的各项准备。他在面见中共湖南地下党代表时,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接受了湖南地下党提出的有关要求。

当他得知老友李达即将前往北平的消息后,又托李达亲自向毛泽东转达他的起义决心,并赠李达500元路费相助。

5月14日,李达到了北平之后,毛泽东在18日专就程潜起义一事接见了李达。

李达把程潜的思想情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地说:“请你回去告诉他,我在此等候他的壮举。”

5月16日,白崇禧率数十万军队从武汉败退长沙,叫嚣要在湖南与共军决一雌雄。对于程潜在湖南倡导和平的言行,白崇禧本来就十分不满,对程潜心存怀疑。

到长沙后,他一方面剥夺了程潜的兵权,另一方面撤了程潜身边积极主和的心腹人员之职。同时,李宗仁又下令调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之职。

面对这种形势,程潜十分不安。为防止万一,他打算先送妻小去香港,自己随后辞职离湘。关键时刻,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人来鼓励程潜坚定起义决心,正式起草一份起义备忘录送交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主席。

程潜欣然同意。当程星龄代笔起草之后,他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备忘录中,程潜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表示:“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矣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

1949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的各路大军,在毛泽东主席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开始了向全国的进军。第三野战军陈、粟部和第二野战军刘、邓部,已经将战线推进至福建北部,正准备出击福州;第一野战军彭德怀部,已经给“西北王”胡宗南以歼灭性打击,并把胡宗南逼入了秦岭山脉。按计划该是解放中南和大西南、大西北的时候了。

正在此时,6月30日,程潜、陈明仁集团准备起义的备忘录送抵毛泽东的案头。对于湖南的解放,毛泽东主席是思考了很久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平解放。

湖南是他离别了多年的家乡,程潜、陈明仁也是湘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出现湖南人打湖南人的局面吧。

能不能和平解放,关键在于程潜、陈明仁。

现在两位老乡主动提出和平,真是解决了一个难题。

毛泽东对程潜准备和平起义的事十分重视,为确保起义成功,当即作了各方面的部署。

一是电示第四野战军从速派出部队,“陈兵湘鄂边界”,以减轻桂军对程潜的压力,并相机配合程潜的起义行动;

二是下令调吉林省政府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灏速赴武汉,就近指导湖南和平解放工作。袁任远是湖南慈利人,熟悉乡情;李明灏则与程潜有过多年的交往,当年程潜任讲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武学校校长时,李明灏是教育长。而且,陈明仁被破例收进讲武学校也是李明灏予以办理的。选派此二人去指导帮助湖南的和平起义工作,足见毛泽东对此事的深思熟虑。

接着,毛泽东主席于7月4日致电四野和华中局领导人林彪、邓子恢,指出“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并明确指示,对程潜在备忘录中提出的稳定湖南局势的三项权宜之策,“原则上均可照准”,要求四野和华中局“迅速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强调“此事进行要快”。毛泽东在电文中还专门说明,“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为使有关同志认识此事的意义,毛泽东再次指出:“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这份电文不仅对四野和华中局进一步积极开展对程潜的工作给予了明确的、详尽的指示,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程潜的关怀和期望。

当天,毛泽东主席又向他的这位老同乡写了一封亲笔信,再次肯定了程潜的决心,并对其表示了理解、信任和期望。

信是这样写的:“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编整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先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



多。此间已囑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7月11日，程潜于焦急不安中终于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读后心情异常兴奋，对左右说：“湖南的和平运动，我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我也吃了定心丸了。”

他握住送信人的手连声说道：“太感谢你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路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的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

7月14日，李宗仁派人到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赴职，被程潜断然拒绝。

白崇禧企图用武力强行裹挟程潜去广州。经程潜派人与之周旋，白崇禧同意程潜及长沙绥署移驻邵阳。21日，程潜到邵阳，即加紧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秘密起草起义通电；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联络员频繁接触，商定起义的地点、时间等具体问题。

当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程潜接到陈明仁的密电，要他速返长沙与解放军的代表会面。

29日，程潜秘密返回长沙，住进水陆州音乐专科学校。

第二天，李明灏等解放军代表即前往水陆州与程潜商谈起义的有关事宜。

就在这一天，国民党广州政府下令免除程潜本兼各职，由陈明仁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绥署总司令。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李宗仁等对陈明仁是多么信任，但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同共产党打过硬仗的陈明仁，由于中共和毛泽东多方面做工作，即将与程潜共举义旗了。

白崇禧还密令陈明仁对程潜“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职”。



当陈明仁把白崇禧的密令交给程潜时,两人不由得会心一笑。

1949年8月1日,经过数月紧张筹划的湖南和平解放事业,终于揭开了幕帐。

8月5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古城长沙,三湘大地终于避免了一场血火之灾,毛泽东、程潜和陈明仁,共同为桑梓父老办了一件大好事。

作为曾为蒋介石出过死力的陈明仁将军,终于在人生历程的十字路口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走向了光明。

6. 前妻作媒,陈明仁将军的生死之恋

说起来,陈明仁将军的爱情故事也是十分感人的。特别是他不弃糟糠,不攀高枝,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曾传为佳话。

1925年,陈明仁在东征中浴血奋战,勇冠三军、率敢死队第一个攻上“南方第一坚城”——惠州,把黄埔战旗插上高高的城楼,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令号兵吹号三遍,向陈明仁致礼,年仅22岁的陈明仁被晋升为黄埔四团三营中校营长。

青云直上、雄姿英发的陈明仁,立刻成为大家瞩目的年轻军官。

由于他健壮结实,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马上引来了众多牵线的说媒人。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见过陈明仁后,心中暗自赞叹。她想起了廖仲恺的女儿正值青春妙龄。并且这女孩美丽大方、楚楚动人。若能与陈明仁结为夫妻,真是天圆地合。

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慕英雄!

宋美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为了拉住黄埔



军,常用各种方式来笼络人心。他见宋美龄要为陈明仁提亲,并且亲家是廖仲恺,喜不自胜地说:“好的,好的!陈明仁仪表非凡,才华横溢。廖小姐端庄美丽、年少青春,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宋美龄立刻在家中召见陈明仁。

陈明仁昂首阔步地来到了蒋介石豪华的宅院。他一进门,便潇洒地给宋美龄行了一个军礼:“师母,学生陈明仁奉命前来,不知有何吩咐?”

“哦!英雄来了,欢迎、欢迎,请坐。”宋美龄笑嘻嘻地说。

宋美龄见陈明仁面颜庄重,不禁一笑:“子良,蒋校长近来常夸你在东征之中勇猛无比、智勇双全,尤其是在惠州之战中,不畏牺牲,挺身而出,首登城墙,为党国立了大功。校长非常欣赏你,廖党代表也喜欢你,苏联顾问赞扬你。只要你精忠报国,一定会前程无量。”

陈明仁谦逊地说:“子良还靠蒋校长、师母及廖代表栽培。”

宋美龄和颜悦色地对陈明仁说:“小伙子,看起来你有20多岁了吧?娶媳妇了吗?”

陈明仁脸一红,羞赧地说:“我13岁那年,为给家中冲喜,与家乡姑娘谢芳如结婚,至今9年了,而且有两个孩子。”

“什么?”宋美龄吃惊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13岁就结婚了?还有孩子?”

“是的,我真的已经成家了。妻子芳如朴实贤惠,深得我家长辈喜欢和乡亲赞美。”陈明仁如实相告。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宋美龄叹了口气,“姻缘命中定,红尘偶相遇。”说完,怏怏不乐地走进了里间。



备陈明仁,反而对他更有好感。

夜深人静,月明星稀。

陈明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妻子芳如的音容笑貌,儿子扬钊、扬铨的身影和回荡在山谷里那银铃般的笑声。

那时,陈明仁虽刚有13岁,但他才华横溢,胸有大志。璞玉如何雕琢?成了其父亲陈保廉的心事。为了能让陈明仁继续读书,其父再三求母亲。保廉的母亲见他们说得有理,便对保廉说:“可以让明仁再读几年书,但是,得赶紧让明仁成亲,给我这病重的儿媳冲冲喜。”

保廉连连称是,心中欢喜万分。

1916年秋,一行人拥着花轿,停在陈保廉门前。一时间,唢呐声、鞭炮声划破天空。

洪源村的父老乡亲们围满陈保廉家门口看热闹,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陈保廉家的明仁要成亲了。真快呀,几年前还穿开裆裤呢,转眼间就要娶媳妇了。”

在婚礼司仪的高叫中,陈明仁与新娘芳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喜结良缘。

陈明仁携谢芳如走进新房,揭开了新娘头上的盖头。只见新娘端庄美丽,面若桃花,肤似凝脂,明眸皓齿,靓丽可爱。陈明仁心中满是欢喜,他礼貌地对谢如芳一笑:“我今年13岁了,正在私塾读书。你呢?”

芳如红着脸看了一眼陈明仁,又慌忙低下头去:“我今年14岁,没上过学。”

谢如芳见陈明仁浓眉大眼,面貌和善,心想:“老天真是有眼,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父母为我找到这样一位好郎君，我定要当个贤妻良母。”

从此，芳如孝敬陈家长辈、照料明仁的兄弟，深得家人的喜爱和邻里的称赞。小两口过着幸福和睦的生活。

突然，屋外一阵小鸟飞扑的声音，将陈明仁从遥远的故乡带了回来。他索性披衣下床，写信诉情：

爱妻芳如：

你好！夫子良慰全家平安。

吾出山壑，业已数载。千里迢迢，赴穗求索，曾得贤妻相助、父亲鼎力，方有为夫之今日！

夫虽远尔千山，遥隔万水，却尝梦萦魂绕，倍思亲眷。

吾凝望北斗，心游故居，惦念家人，不胜唏嘘。

你幼进吾家，端庄贤淑，知情达理，情诚意笃，勤劳质朴，是我陈家好儿媳。我远出家门，你肩负重担，劳作持家，含辛茹苦，夫感激涕零。

自古以来，忠孝难全。夫痛惜上难尽孝、下未顾妻，为夫之过，安敢卸责？

吾抵南国，先进讲武学校，后入黄埔军校。学得新知，随军东征，投入战斗。子烽烟中杀敌，在硝烟中立功。

今为夫，已晋为黄埔军中校营长，虽不敢衣锦还乡，然可以携妻谋生。请妻携子，一同来穗，夫妻共处，以享天伦。

代吾向祖母、父亲、继母跪拜问安，向弟妹问好，向恩师茂秋行礼。

陈明仁写好家信，感到踏实了许多，便上床酣然入睡……

从此，陈明仁与妻子度过了许多年的美好时光。



全国解放后,在广西剿匪的陈明仁,怎么也挥之不去内心的情愫,他十分想见到在那遥远地方的肖毅。

时机终于来到了。

1951年秋,陈明仁奉命进京参加军事会议。恰好当年在湘雅医院工作的肖毅也在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进修。

也许是红尘的缘分,世间的巧合,使这对武将贤女之间,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相互仰慕的情感。

秋天的北京,天高云淡,碧空如洗。

陈明仁心情舒畅地在总参开完军事会议,便驱车匆匆赶往北京协和医院,看望肖毅。

肖毅见陈明仁将军抽空来看她,异常欣喜。她迎上前去,落落大方地伸出手来:“欢迎,欢迎。陈将军,是哪一阵风把您吹来了?”

“哈哈,当然是秋天里的春风,把我吹到你这里来了。”陈明仁赶紧用自己那双有力的大手,握住了肖毅那散发着药香的巧手。

“秋天里的春风? 不对吧? 我看是桂南的东风把你刮到了京城。”肖毅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人民日报》,向陈明仁展开后说,“我早就从报纸上看到你们在广西打了胜仗。”

“哦? 看来你这位小老乡还挺关心我这位军营武夫哩!”陈明仁笑着指点了一下肖毅。

“那当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亲之间理应相互关心嘛!”肖毅的脸微微一红。

陈明仁望着肖毅,小声说:“肖大夫,晚上我来接你去跳舞,有时间吗?”

“行! 今晚7点钟我在集体宿舍等你。”肖毅爽快地答应下来。这天,艳艳的秋阳在肖毅急骤跳动的心中缓缓西斜,沉落在地



陈明仁步态稳健,抬头挺胸,和肖毅配合默契,潇洒无比。

肖毅暗忖:“这陈将军不仅会打仗,舞也跳得这么好!”

陈明仁也暗叹:“肖大夫学识渊博,气质高雅,舞姿也挺美的。”

他们双双从内心顿生互佩之情。

陈明仁和肖毅在悠扬悦耳的音乐声中,跳完了最后一支舞曲。

返回的路上,陈明仁对肖毅说:“肖大夫,一周后我要到广西剿匪,那里的工作非常繁忙。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周末我们一起再游一下故宫好吗?”

肖毅看着陈明仁,点了点头。

这一天晚上,肖毅辗转反侧,长夜难眠。

这位出身在书香门第的“老小姐”,从小就看不起商人,瞧不起军人。她认为,世间商人,只重金钱,无视感情,视一切为买卖关系,不能与之共命运。而军人,则惯征于疆场,挥戈拼斗、浴血冲杀,有威猛之气,少融融柔情。

可是,令她仰慕的陈明仁,却偏偏是一名军人,从事的是她不喜爱的行业。

况且,陈明仁是在历史上走过一段弯路的起义将领。

怎么办?是和他在逐步建立的感情中,牵手走到一起,还是就此罢手,对他说清自己的想法,而坚持“终身不嫁”呢?

肖毅在纷乱的思绪中,一夜未眠。

翌日清晨,陈明仁早早地来到协和医院,接肖毅到故宫游览。他们在秋日湛蓝的天空下,轻快地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步入故宫,兴致勃勃地沿着青砖铺成的路,随着如织的人流漫步。

他们走过保和殿、太和殿、御花园,观赏着这里古朴宏伟的建筑、苍郁的树木和室内陈列的艺术珍品。



当他们走到一尊尊黄金镏成的大缸旁时,肖毅对陈明仁说:“你看,这些大缸是古人盛水用的,可惜的是,这些缸上的镏金,被八国联军用刺刀刮走了。”

陈明仁仔细看了看这些大缸,果然见缸的表面伤痕累累,有着明显的刺刀痕迹,他恨恨地说:“这都是清政府无能和八国联军的野蛮所致。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当持枪执锐,捍卫国土,在抗日战争时,我就毫不留情地痛揍了几顿那些小日本鬼子,以雪国耻!”

肖毅见他怒容满面,轻轻推了推他:“我们继续走过去看吧。”

陈明仁缓过神来,挺起胸脯,迈开军人的步伐,和肖毅并肩而行。

在艺术品珍藏室,肖毅指着一株用黄金和白玉制成的树,对陈明仁说:“看,这株树做得如何?”

陈明仁顺着肖毅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棵用黄金和白玉制成的树惟妙惟肖,巧夺天工,不禁慨叹道:“做得真漂亮,太美了!”

肖毅笑着对他说:“那当然。这株树称为‘金枝玉叶’。”

“哦?‘金枝玉叶’!这株树用金和玉做得这么漂亮,名子也取得很美。”陈明仁顿了一下,“我看与你差不多。”

“与我差不多?怎么说?”肖毅茫然地问。

“‘金枝玉叶’呀!”陈明仁俏皮地说。

肖毅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脖颈,她娇嗔地挖了对陈明仁一眼:“你真坏哟!”

陈明仁与肖毅在北京匆匆见面后。又急忙赶赴广西指挥剿匪去了。

从此,陈明仁利用进京开会之际,频繁约见肖毅,逐渐培养起相互的爱慕之情。



可是,陈明仁这位统领千军万马的将领,却难以启齿将内心的感情向肖毅表白。

对于陈明仁的婚事,引起了中共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

中南局统战部长张执一、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为促成好事,主动充当陈明仁和肖毅之间的红娘,并将原本可以在进修一年后留在协和医院工作的肖毅,调回了湖南医学院工作,以便他俩有更多的机会相互接触,增进了解,培养感情。

1952年8月,陈明仁将军与肖毅经张执一介绍,喜结良缘。

他们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年,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在婚礼仪式上,中南局统战部、二十一兵团、湖南省等地的领导及陈明仁的亲朋好友,纷纷为他们贺喜,祝他们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婚礼中,洋溢着祥和欢快的气氛。

陈明仁、肖毅夫妇在张张贺喜的笑脸中,品味着人生的甘甜。啊,空气是多么清新,人们是多么纯真,爱情是多么圣洁,婚礼是多么庄重!

一对新人的情感在交流中融汇升华,并在漫漫人生旅途中,把自己的行动融化在新中国飞涌的大潮里,奔腾向前!

婚后,他们夫妇相敬如宾,情挚意笃。肖毅对陈明仁的生活关怀备至,并常常风趣地说:“老陈,要是在解放前,你就是有八抬大轿,也休想把我抬到你家里来。”

“嘿嘿,要是在解放前,我也讨不到你这个千金小姐当老婆啊!”陈明仁也幽默地回答。

轰天炮神孔从洲



1. 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他的爱将孔从洲三次深夜密谈
2. 毛泽东的儿女亲家
3. 继承传统终回归, 又扛三十八军大旗
4. 西北农村娃, 结缘炮兵成行家
5. 刘伯承挥师渡江, 孔从洲用炮如神
6. 办炮校, 老亲家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给毛泽东写信



孔 从 洲

(1906 ~)

原名孔从周。陕西省西安市人。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独立第四十六旅少将旅长,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第五十五师师长。1946年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中将军长。1946年5月率部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后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 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他的爱将孔从洲三次深夜密谈

1935年夏。

正当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即将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之时，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张，民族危机急剧升级。

蒋介石于民族大业而不顾，急命东北军移防西北，准备“进剿”红军。张学良带着部队就此入驻西安。

张学良的部队初到陕西，人生地不熟，再加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当地老百姓时常发生纠纷，家乡沦亡的东北军倍感失落。

东北军装备虽很先进，但在三个月内，却连遭惨败，损失了将近三个主力师，张学良本来对“剿匪”就十分不满，连连失败使其更加沮丧。

杨虎城是陕西有名的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刀客”。从他率部参加陕西靖国军，一直到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讨逆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因刚正不阿、作战英勇，深得陕西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因爱国抗日与红军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1936年的一天，孔从洲接到杨虎城的来电，让他赶紧到杨家去一趟。

孔从洲来到杨公馆，见杨虎城正在荒废的网球场上和施工人员一起说话，便走上前去问道：“杨主任，您是不是要学打网球了？”

杨虎城说：“我是学不会啦。你知道吗？张学良将军喜欢打网球，我想请他来我这里，跟我们的人打网球。”

进屋后，杨虎城反问孔从洲：“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为张先生修



网球场吗？”

孔从洲琢磨了一下，答道：“主任是不是要和张先生交朋友？”

两人坐下以后，杨虎城接着说：“不久前，我曾与张先生谈过‘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张先生从口袋中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他的电令让我看，内容很简单，蒋介石命令张先生不许和日军发生冲突，静候中央处理。”

“张先生流着泪对我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他的部队就连下层军官都携妻带子地长途颠簸流离，背井离乡流落他乡。这就叫亡国呀！东北三省沦陷了，他们有家回不去，却让他们跑到这儿‘剿’什么匪！”说完，两人会意地苦笑了一下。

接着，杨虎城变得严肃起来，对孔从洲小声说：“今天让你来，不是专门谈东北军的事情的，而是要告诉你，准备将你调离炮兵团。”

孔从洲惊愕地抢着说：“主任不让我使炮了？”

杨虎城笑了笑说：“你可能也知道一些，西安的情况眼下更加复杂了。从现在起，你不要只会打炮，在新的职位上，要学会做更多的事情。”

孔从洲从杨公馆告辞出门时，杨虎城最后又叮嘱他：“你担任新的职务后，千万要注意和东北军的弟兄们多交朋友呵！”

几天之后，孔从洲奉命离开了炮兵团，在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任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担负西安防区的城防任务。

身为西北重镇城防司令的孔从洲着实没有料到，一场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暴正在等待着他。

这一年，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步伐逐渐加快。



团训话。

在王曲训练团的大操场,台上坐着蒋介石和军政大员,台下坐着几个整齐方块的是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学员们。蒋介石虽然讲话底气不足,但这天他情绪异常激昂:“国民党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急缓不辨,不‘剿共’而轻言抗日,实属‘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危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一定要予以制裁!”

在主席台上的大员们只是呆坐着,此时谁也没有觉察到杨虎城和张学良讥讽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两天以后,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张学良提出希望停止‘剿共’,蒋介石厉声予以反驳,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

一个星期后,蒋介石飞离西安,杨虎城不久便把孔从洲叫到新城绥靖公署他的住处,同孔从洲进行了第一次深夜长谈。

与杨虎城一见面,孔从洲看他神态十分沉重,便估计定是与这次蒋介石来陕西有关,杨虎城心情沉重地对孔从洲说:“你从定边参加军事教导队开始至今,也有十来个年头了,我们这支部队的经历,以及它的斗争历史,我想你是最清楚的,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孔从洲认同地点了点头。

“现在日军步步紧逼,民族危亡实为严重。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还专程从洛阳飞往太原,委托阎锡山,接着又亲飞济南会晤韩复榘,并通过韩复榘向宋哲元转达了他的新谓‘剿共’方针。”

杨虎城喝了一口茶,接着说:“这期间,南京方面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进行了多次会见,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磨也频繁接触。据我得到的情报,驻东京的许世英大使和有田外相也进行了密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一样,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至于我们和北边的关系,你也知道一些,千万要严守秘密!”

1936年冬天,蒋介石愈发加快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一方面,蒋介石大肆逮捕爱国志士,解散救国团体,枪杀爱国群众。并于1月间公然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即:救国会七君子)。另一方面,把视线死死盯住了西北这一抗日救亡的腹地。

因为“剿共”心切,12月4日,蒋介石再次精心做了对陕北红军的最后“清剿”部署后,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从洛阳飞抵西安。

早已静候在机场的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与一大批文武高官急忙迎上前去,向舷梯上下来的蒋介石敬礼,问好。

蒋介石一下飞机,立即示意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到他车跟前,直截了当地面谕诸位:“当前‘剿共’已经进入最后成功的阶段,一个月内将可完全消灭红军,无论如何,此时须立即讨伐共产党。”

蒋介石又警告道:“若有人违抗命令,将严厉处置!”

蒋介石训完话,便登车向下榻的临潼华清池驶去。

杨虎城和邵力子也上了各自的车,陪同蒋介石一起前往。他从张学良的情绪看得出来,这次张学良去洛阳面见蒋介石进行劝谏,没有成功。他预感到,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当天傍晚,杨虎城从临潼返回西安,他命司机把车直接驶向了金家巷张学良的住处。

7日下午,张学良又到九府街绥靖公署杨公馆回访杨虎城。



他俩在杨虎城的密室里,仔细地研究了即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具体方案。

杨虎城送走了张学良,边吃饭,边命副官紧急召见孔从洲,与孔从洲进行了第二次密谈。

这次见到杨虎城,孔从洲看出他比上次见面时,除了严肃之外还带有几分焦躁,孔从洲一进门他就问道:“警备旅的思想和训练情况怎么样?”

孔从洲作了汇报。没等他讲完,杨虎城便说:“你要抓紧搞好夜间训练,现在中央军在西安城有多少军队?都住在什么地方?西安城里的交通要道警戒需要多少兵力?这些你都清楚吗?”

孔从洲对杨虎城急切地提出这么多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他如实地说:“主任问的情况,我有的掌握了,有的还不太清楚。”

杨虎城显然不满意孔从洲的回答,他厉声说道:“你这个城防司令是干什么的?你负责城防,不掌握城防的具体情况行吗?”

孔从洲赶紧补充说:“中央军在西安驻有宪兵团、公安总队、交警总队、保安团,这些公开的部队我清楚,那些不公开的特务系统还不很清楚。”

杨虎城继续追问:“这些公开的驻军在哪条街?哪个巷子?”

孔从洲急忙回答:“西安的巷子很多,他们住的那些大点的巷子,我能说出来,那些小巷子,就……”

没等他说完,杨虎城就打断了他的话,略带命令的口气说:“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他们究竟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驻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个院子。这些都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孔从洲这时似乎已经明白了杨虎城的意思,他点了点头说: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我明白,这几天,我马上组织部队在城里连续搞几次夜间演习,我保证很快把中央军的驻军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请主任放心!”

杨虎城终于露出了点笑容,说:“那好,抓紧时间,赶快去准备吧!”

临走时,杨虎城又叮嘱孔从洲:“从洲,这次演习很特殊,演习的时候,既要搞清楚中央军在城里的驻扎情况,又不能惊动老百姓,要悄悄地进行,务必保持市内的平静。”

当晚,孔从洲回到城防司令部后,立即召开了连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他传达了杨将军的指示,布置了部队夜间演习的任务,他要求演习部队:一是必须切实摸清各地区中央军警、宪、特的实力和具体分布情况;二是必须切实摸清中央军驻地有几条街道、几个巷口以及封锁这些地方所需用的兵力;三是行动必须肃静,要保证市区平静,不得惊扰市民;四是要绝对严守机密。

不一会儿,杨虎城打来了电话:“命令演习从当晚 11 时开始!”

孔从洲放下电话,急忙乘车又赶到绥靖公署杨虎城的住处,汇报了演习部署的情况,杨虎城点头同意,接着他对孔从洲严肃而坚定地说:“你们在配置兵力时,他们有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有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

他再次叮嘱孔从洲:“行动时千万不能走火,对东北军一定不能发生误会,行动中如遇到中央军巡逻队,你们就说是夜间训练,要严守机密,不得走漏半点风声。”

12月8日子夜,月色朦胧,天上布有几片乌云,漆黑的西安城一片寂静,只见寥寥几家灯火,大街小巷空无一人。

此时,驻扎在西安城的城防部队管地,正在孔从洲的指挥下,



全副武装悄悄离开营房,向预定的街区走去,几乎什么声响也没有,听到的只是有节奏的行进的脚步声。

部队很快进入了西安的各个大街小巷,有的士兵在观察,有的士兵在用笔记着什么。此刻,中央军和东北军的官兵们正在酣睡。

凌晨5时许,趁着黎明前的漆黑夜色,演习部队迅速撤离。回到营地,各分队指挥员便纷纷向司令部报告了演习实况。

孔从洲带领作战参谋迅疾将中央军在西安城内外的兵力、驻扎位置,仔细地标在了一份西安市区详图上。

天一亮,孔从洲又带着参谋人员和标好的地图,对夜间演习地域重新核对了一遍,同时对重点位置的周围地形、地物又作了补充标图。

为确保部队行动万无一失,8日晚8时,孔从洲又命令部队进行了二次预演。

两次演习,孔从洲完全摸清了情况,觉得指挥已经是非常得心应手了。

12月9日这天,正值“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

清早,西安市1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从西安城徒步拥向临潼,他们高呼口号,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急令张学良镇压学生,张学良迅疾驾车赶到东十里铺,他激动地对满腔怒火的学生们说:“同学们,我和你们的心情一样,我张学良誓死不当亡国奴,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希望,决不欺骗你们,一星期内,我保证用我的实际行动答复你们!”

这一天,西安气氛异常紧张,孔从洲的第二警备旅,按预定计划又开始了第三次军事演习,此时,南京来的大员们正在易俗社观看秦腔,蒋介石和其随从们万万没有料到,这边张学良和杨虎城正



在有条不紊地谋划着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十七路军的演习部队已经到达预定位置，赵寿山的部队已经包围了易俗社，剧场到绥署的路上已是岗哨密布，北城上架起的大炮机枪，黑洞洞的枪口炮口对准了目标。

演习刚开始，孔从洲忽然接到通知，要他赶去绥靖公署接受命令。

当他赶到绥靖公署，见到的不是杨虎城，而是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王菊人向他传达了杨虎城的口头命令：“不要使南京方面看出破绽，我和张先生照常看戏，你部仍按原定计划，做好城防的各项准备，部队演习立即停止，回原地待命。”

三次演习，孔从洲踏实多了。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时，我对西安城区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分布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不管杨先生什么时候找我，无论问到什么情况，我都可以如实地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接到行动命令，我都可以得心应手地指挥了。”

12月11日晚10时许，孔从洲突然接到杨虎城召见的通知。

冬夜寒气袭人，一路上，他预感到要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他在心中默默地说：不管是什么事，我这个城防司令眼下应该掌握的内外情况，我心里已经有数，杨主任只要一发话，部队便立即行动！

于是，他们开始了第三次密谈，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次谈话。

当他走进客厅，杨虎城一见面就问：“这几天演习得怎么样？街道情况都弄清楚了吗？”

孔从洲回答：“完全清楚了，演习进展顺利，没出什么乱子……”

孔从洲边说边顺手从皮包里拿出了西安城郊地图。他把演习



这之前，杨虎城已经下令把这支部队调回了三原。

11时多，赵寿山、孙蔚如先后赶到了杨虎城住处，进了客厅见孔从洲正坐在杨虎城旁边。孔从洲起身，朝他俩把右手掌向上翻了一下，他俩立刻笑了起来，几个人都会心地笑了：要造反了！

在客厅，四个人坐定，杨虎城说：“不多说了，这次行动，东北军和西北军行动是一致的，有可能红军也会支持。”

孙蔚如抢着说：“为了国家民族，咱们坚决干！要干，就干到底！”

赵寿山紧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咱们干！”然后转向孔从洲，“从洲，你这边准备好了吗？”

孔从洲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赵寿山叫过孙蔚如一起看过地图后，激动地说：“好！主任你这就下命令吧！”

杨虎城让孔从洲先介绍西安的城防情况，孔从洲指着地图汇报说：“蒋系在西安的驻军单位约有120个，有武装的42个，其中宪兵第二团杨镇亚部约1000人，分驻在西安市东柳巷、柏树林、三学街等处。团部驻西大街北桥梓口；省保安处张坤生部约1000多人，分驻在钟楼附近，张坤生住民政厅附近；省公安局局长马志超总队2000余人，分布在西大街；江雄风的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武装最多，分驻在五岳庙等处；公秉藩的交警总队，即别动第一纵队系特务组织，约1000多人，分布全市，多作潜伏活动之用。”

孔从洲接着部署了十七路军城内各部队的行动任务：

警备第二旅负责解除宪兵团、公安局、保安处、交警大队、常驻省政府的宪兵连和西部飞机场驻军武装，占领飞机场，扣留飞行人员和蒋方在机场的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占领火车站，并以一部



分兵力担任西安各街道巷口警戒。每一街道均放两名武装士兵监视蒋方一名武装警察。

炮兵团的任务是占领省政府,解除省政府宪兵连武装,并负责西安火车站方向警戒,炮兵阵地设在北城门楼,做好轰击来支援蒋军的准备。

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率领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负责扣留驻在京西招待所的蒋方军政大员,解决中央宪兵二团团部,并监护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

西安绥靖公署的两个卫士队,一个队担任绥署及杨主任公馆的警戒,一个队担任新城临时指挥部的警卫。

由赵寿山直接指挥的教导营,负责警戒和守护新城,解除别动队和蒋系各部队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

宣布完任务后,三人齐声问杨虎城:“谁去捉蒋介石?”

杨虎城告诉大家:“东北军去捉,他们已有安排,我们负责西安城里的任务,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

当即,杨虎城任命孙蔚如担任第二天即将成立的戒严司令部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局长,孔从洲仍任城防司令。同时命令驻大荔的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以解除中央军两个团的武装。

杨虎城指示孔从洲还要掌握好机动兵力,特别是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

最后,杨虎城宣布:“我和张司令决定,部队明日凌晨3时准备完毕,4时开始行动,希望你们务必按计划明早8点以前解决战斗,10时必须恢复城内交通和社会秩序。”



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就要到来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红、绿两枚信号弹划破了西安漆黑的夜空。西安和临潼华清池方面几乎同时行动，由张学良、杨虎城指挥的捉蒋大行动开始了！

战斗是在周密计划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展开的，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击，仅用了3个多小时，西安城的绝大多数蒋方武装就被解除了。

接完各部打来的电话，孔从洲立即赶到新城绥署去向杨虎城当面汇报。

孔从洲见到杨虎城激动地说：“从凌晨4时起，不足4个小时，西安市国民党的军、政、宪、警、特全部武装已被一网打尽，共缴获步枪5000支，手枪1500余支，毙敌200余人，我伤亡60余人。

杨虎城又急忙问：“西安城的军政要员呢？”

孔从洲回答：“这项任务是由特务营完成的，营长宋文梅率部先把西京招待所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派兵逐个房间捉人。这些人当时有的藏在浴室和衣柜里，有的趴在了床底下，抓到的军政大员有：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方震、蒋白里、蒋锄欧、萨镇冰、张冲、万耀煌、邵之冲等，连同军统机关几个特务头子，共计56人。”

“其中，陈诚是在大餐厅烧水间的一个空啤酒箱子里抓到的，万耀煌是在女眷房间橱柜中捉住的，邵之冲翻墙逃跑被流弹击中，已经送往省医院抢救，公安局长马志超化装成人力车夫，已乘乱溜出西安，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平日作恶多端，顽抗时被愤怒的士兵当场枪毙了。”

“此外，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旷情、



军统特务头子兼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也同时被捕。”

杨虎城听完只“嗯”了一声，没作任何指示。

孔从洲环视了一下大厅四周，见大家都沉默不语，有的低头吸烟，也有的来回踱步。赵寿山走上来，拉了一下孔从洲，在他耳旁轻轻说道：“蒋介石跑了，没有捉到！”

杨虎城站起来说：“不对，他可能就躲在附近，假牙还放在桌子上，被窝还热着，衣帕、斗篷都在，车子也停在院子里，说明他不可能跑远。”

张学良接过话：“奇怪，他会跑到哪里去呢？”

杨虎城：“赶快叫部队加紧搜索，我看一定能找到的。”

张学良又问：“他会不会自杀？”

杨虎城说：“你还怕他投了华清池？不会的，他这个人最怕死，我保证他绝不会自杀。”

张学良又问：“虎城兄，你说他要逃跑的话，会朝哪个方向跑？商县有个交警总队，倒是有可能接应他。”

杨虎城答道：“我们可以一边加紧搜索，一边派部队到蓝田方向去堵截。”

杨虎城环视了一下四周，目光停在了孔从洲身上，孔从洲会意地走到杨虎城面前，杨虎城说：“你立即带部队乘车赶到骊山以东，在临潼和蓝田之间的油坊街一带布置警戒，严密封锁，不能让蒋介石从这里溜掉。”

孔从洲应了一声，回头便向司令部返去。他带一个营一会儿就赶到了油坊街，刚下车便接到杨虎城从总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东北军已经在华清池的后山上把蒋介石捉住了，命他立即返回西安。



按照爸爸的要求,李敏见到了孔令华,便仔细询问起来,孔令华笑了:“我俩认识这么多年,无话不说,怎么偏偏没说说家庭情况呢?”

说完家庭根底,孔令华还调皮地问李敏:“记住没有?还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李敏回家后,去书房将孔家的详细情况向父亲一一作了汇报。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哦,小孔的父亲原来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熟悉。”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站起身,习惯地在书房来回踱步,像是在回忆什么。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忽地转过身对女儿说:“好,好,什么时候领小‘孔夫子’来见一见呀!”

李敏长吁了一口气:“那您……同意了?”

一个星期天,李敏领孔令华来见父亲。

他们决定在7月暑假期间完婚,毛泽东和孔从洲都同意,1959年夏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发生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会议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专门从庐山打回电话,说一定要等他回京主持他们的婚礼。

直到8月,毛泽东又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还写了一封信,再次嘱咐等他回来主持婚礼。

8月下旬,毛泽东终于回到了北京,李敏与孔令华到车站接他,然后同车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把李敏和孔令华叫去,和两个孩子一起商量准备邀请的客人名单和婚礼细节。

婚礼仪式十分简单,邀请的客人也不多。主要有蔡畅、邓颖超同志,还有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先生和他的孙女王海荣、孙子王其



华,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罗光禄等。人不多,但气氛却十分轻松愉快。

当时,孔从洲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工作,此时正来北京开会,这天一早,毛泽东就派秘书乘车把他接来了。

孔从洲来到了丰泽园内的颐年堂。一见面,毛泽东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亲切地说:“今天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

毛泽东拉着孔从洲,向在座的客人介绍说:“这是我的亲家,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

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孔从洲与他初次见面的拘谨心情顿时驱散了。

这时,只见新郎、新娘相伴走了过来,他们胸前佩戴着红花,穿着很朴素大方。看着他们幸福的笑容,主持婚礼的毛泽东特别高兴。

婚礼的气氛很愉快,毛泽东和孔从洲都高兴地喝了喜酒,祝愿孔令华和李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生活美满幸福。

孔从洲随着小两口去看了“新房”,新房就是李敏住的菊香院小南屋,居室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和值钱的摆设,房子也没有装修,连墙壁也没有好好重刷一下。

毛泽东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还特别和孔令华、李敏两人照了相。婚宴后,毛泽东还邀请客人们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

当客人们离去看电影的时候,毛泽东请孔从洲和王季范先生一同到书房里谈话。毛泽东客气地请孔从洲和王老坐下,他也坐在沙发上。毛泽东向孔从洲介绍王老,说:“这是我的姨表兄弟,还是我的老师。”接着,又转过头来问孔从洲:“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孔从洲回答：“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问：“啊，当校长，高级炮校是炮兵的最高学府，那个工作很重要啊！那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

孔从洲略加思索，说：“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我的文化水平低，这个任务重，我过去在炮兵部队多年，但对炮兵理论、射击、技术的学习还不够。”

王老插话，问道：“炮兵要用数学的吧！”

孔从洲答道：“是的，但我数学很差。”

说到这里，毛泽东以他习惯的谈话风格，接上话茬：“你先人孔夫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们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们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尔、射、御、书、数六艺，六门科学就有数学，你是应当学好数学的。”

孔从洲说：“我过去学习基础不好。”

听到这儿，毛泽东又转向王老，向他介绍孔从洲过去的情况：“他在外边时，是杨虎城的部下。”

孔从洲介绍了杨虎城这支部队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又问：“十七路军从什么时候起有共产党活动的啊？”

孔从洲如数家珍地说：“据我了解是1923年以后，当时我们部队驻在三边一带，杨虎城先生在榆林养病，经过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同志，在这以后不久，部队里就开始有了党员活动。”

毛泽东显然对魏野畴很了解，说道：“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看过，写得有水平，他的学问是很渊博的。”



“噢！你们陕西出人才，你读过二十四史吗？著《史记》的司马迁，就是陕西人。还有班超，东汉名将，也是陕西人。撰写《汉书》的班固，是他的哥哥。妹妹班昭，是续撰《汉书》的女史学家。农民领袖李自成也是陕西人……”

孔从洲如实答道：“知道司马迁，他的《史记》我读过。”

毛泽东侃侃而谈，如同经历过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老人，孔从洲听得十分入神。

说罢历史，毛泽东将又将话题回到了杨虎城部队的党组织活动上。

谈到魏野畴当年组织皖北阜阳暴动时，孔从洲说：“这次暴动不幸失败，野畴同志也在部队突围后被土匪枪杀，牺牲时才31岁，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动和悲痛。”

毛泽东又接上一支烟，慢慢吐出一口烟雾，弹了一下烟灰，深情地说：“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了皖北这一带的革命烽火，四面八方的野火燃烧起来，为创造以后的鄂豫皖苏区作出了贡献。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

王老打量了一下孔从洲，问道：“这么说，你十几岁就到了那个部队？”

“是的。”孔从洲答道。

毛泽东又向王老介绍说：“他参加过西安事变，那时他是警备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

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毛泽东说：“杨虎城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的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噢，得保守秘密呀，走漏了消息可不得了。西安事变时，你为活捉蒋介石立下了大功啊！杨主任对你很欣赏的吧！”



孔从洲说：“杨主任是我的老上级，他把我一手培养大，是看着我长大的……”

毛泽东深思了片刻，说：“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了抗战，杨虎城部队和我们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辰……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起了“两个西北军”和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等历史情况：“为什么有两个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叫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也叫西北军，究竟哪个西北军是准确的？”

孔从洲详细准确地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杨虎城的西北军，从靖国军开始转战关中，成员大多是西北人，是就地域而言的，尤其是东北军进潼关以后，人们就都叫东北军、西北军。”

“冯玉祥 1924 年发动北京政变失败后，被段祺瑞政府赶出北京，任命他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后他同直、奉联军作战失败，部队到绥远西部集结。1926 年，他从苏联考察回来，在绥远五原誓师后，经宁夏、甘肃到达陕西，解了西安之围，他这个西北军是就外军方向而言的。”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那个部队的总司令孙蔚如在豫西时害过病？”

孔从洲没想到主席会问这些，于是回答：“那时他患的是胆结石。”

王老接着问：“坚守西安是怎么回事？”

孔从洲讲道：“当年吴佩孚与北伐军对峙，吴佩孚想保证他的右翼侧后安全，驱使刘镇华十万大军进攻西安，杨虎城和李虎臣率领部队坚守西安八个月。”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毛泽东动情地说：“西安孤城能坚守八个月，了不起呀！恐怕有不少人饿死。”

“是的，老百姓饿死很多，军队也有饿死的。‘杀军马充饥，跑跑步御寒’就是那时守城部队饥寒交迫的真实写照。后来，部队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孔从洲答道。

毛泽东赞扬孔从洲说：“你在这个部队做过不少工作。”

孔从洲谦虚地说：“也没做出什么成绩，人熟就是了，大家对我很相信，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他们对我都很信任。南汉辰、魏野畴我都见过，他们对我都有帮助，思想上启发很大，那时候我提出要求入党，他们说解决组织问题后，工作上会有困难，不解决更便于工作，我就相信了他俩的话……”

此时，毛泽东大概看出孔从洲就这一问题有点情绪，便插话说：“回来以后不就马上解决了嘛！”

孔从洲感慨地说：“是啊！回来后马上就解决了，华北局为此发往中央的电报，还是主席您批复的。”

此时，毛泽东又谈起了家常。问道：“你父母还在吗？”

孔从洲回答：“父母亲已经去世了。”

毛泽东又接着询问：“你多大出去的？”

“18岁，我上不起学，高小毕业后考取中学，只读了一个月。我家住在灞河边上，往往大水一冲，生活就成了问题，民国十三年是最苦、最困难的一年，家里穷，不能供我上学。”孔从洲说道。

毛泽东又问：“你为什么自己出去当兵？为什么要到定边那么远的地方去当兵？”

孔从洲回答：“我是慕名而去的，因为这个部队的前身是靖国



军,靖国军是为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而建立的,归孙中山领导,这个部队革命性强。尽管路很远,我还是日夜兼程到了定边。”

“好啊!年轻时要锻炼锻炼嘛,回到革命大家庭后感觉怎么样?”毛泽东又问。孔从洲说道:“好!很好!很温暖!处处受到组织的关怀。”

王老笑着接过话:“噢,这个人是老实人。”

毛泽东又转过头对着王老说:“他教育子女很严格的呀!孔令华很好嘛,两个孩子婚后一定会处好的,学得好,工作也会干好的!咱们当老人的就不用再操心了。人家成家立业了,可以自主了。”

光阴似箭,自上次儿子结婚,一晃就是三年,孔从洲没有到毛泽东家里作客了。

这期间,孔从洲已于1960年2月调离沈阳高级炮校,奉命组建炮兵工程学院。

这是一所新院校,军委决定以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为基础,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工程系合并扩建。

1962年2月,军委炮兵作出决定,炮兵工程学院迁驻南京,与炮兵学校互换校址。

2月5日,天还没大亮,孔从洲准备赶往南京去看炮兵工程学院新院址,正准备动身,突然接到通知,说当天上午,毛泽东要接见他。孔从洲非常高兴,不由一阵激动。

当时,军事院校为实现正规化,正在普遍开展教学改革,炮兵工程学院师生在教改工作中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难度还不小,认识还不统一,能够去见毛泽东,请教有关问题,听取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正是孔从洲急切盼望的事情啊!

早上7时15分,孔从洲驱车前往中南海。8时整,已经工作了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整整一夜的毛泽东未曾休息,就在中南海岸边的游泳池旁接见了孔从洲。

见到毛泽东,孔从洲立即行了个军礼。

毛泽东伸出那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他的手,笑着说:“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咱们是儿女亲家,不必拘礼。”

孔从洲急忙说:“很想见主席,但您很忙,我不便打扰您,占用您的时间。”

毛泽东满面慈祥地说:“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吗?”

两人坐定,先是谈家庭、子女以及教育,话题很快就转到了炮兵建设的问题上。

毛泽东和蔼可亲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孔从洲觉得非常轻松愉快。

毛泽东这天情绪很高,在以提问的方式详细了解了炮兵工程学院的情况后,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亮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说到这里,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并叫人给孔从洲续上茶,继续说道:“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根竹管子里,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型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烧毁,后来有人改为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洲,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

毛泽东边用手比划着,边笑着说:“要35匹马才能拉动它哟!”

毛泽东呷了口茶接着说:“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了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炮臼式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

毛泽东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兴致很高地继续说着炮兵现代化的话题:“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多,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回答:“现在是仿制。”

毛泽东明显地对仿制不赞成,他望着孔从洲问:“总仿制吗?”

孔从洲马上答道:“不!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



毛泽东又接着说：“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讨论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课堂就成了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

当孔从洲讲到炮兵雷达、指挥仪的具体情况时，毛泽东格外关心，说：“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

孔从洲插话说：“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泽东显然有不同见解，摆了摆手说：“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对雷达的干扰必须找出对付的办法。”

孔从洲认真地表示：“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毛泽东又问到炮兵指挥仪的情况，当得知85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时，毛泽东着急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用手指着桌面，动情地说：“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制，赶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呢？”

孔从洲说：“我们现在已经研制出新的指挥仪了，精度也比较高。”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好，要抓紧生产。”

最后，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了孔从洲的身上，问他：“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

孔从洲说：“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官训练团“受训”，于是，他和赵寿山一起专程从西安赶往上海与杨虎城见面，同时为他送行。

这天晚上，在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公馆与于右任公馆之间的一所西式寓所里，孔从洲和赵寿山见到了杨虎城。孔从洲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聆听知心老上级的教诲。

见面时，杨虎城紧紧握着孔从洲的手，激动地说：“哎呀！想不到在这里还能见上一面，太好了。兄弟，真对不起，临走的时候，我把家当都拆散了，分给了各个师，可没有分给你一个兵，一支枪，你不会怨我吧！”

孔从洲眼里噙着泪花，说：“没有什么，这些年你给我的够多了。”

杨虎城又说：“在经费、物质方面虽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但是，我给你交了个好朋友，北边的好朋友，这才是最宝贵的，比你几个兵、几支枪要有用得多了。”

孔从洲会意地笑着说：“主任，你给我们交的这个朋友，胜过千军万马！”

谈了一会儿，一同前来的赵寿山应于右任之约吃饭去了。杨虎城和孔从洲进行了诀别前的长谈。

杨虎城回忆起了十七路军的历史，说：“咱们十七路军，前身是辛亥革命以前的一部分被逼无路的穷苦农民队伍，长时期内是一种合伙的弟兄关系，民国初建军，到靖国军时期，一直是这样。靖国军失败后，我们退到陕北与共产党合作，举办了定边教导队，为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到了1929年，我们部队到山东集结，经过几次整顿训练，才成了一支像样的军队。1930年重回陕西，取得地方政权后，队伍



扩充到了6万多人。我今天被逼出国暂时离开的时候,回顾这20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能生存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够跟着时代的潮流前进,把自己放在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方面。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时候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

谈及眼下的西安事变,杨虎城不无感慨地接着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丢了脸,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这一点是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还很难说,主要靠你们了。蔚如、寿山和你相处好些年了,你们彼此了解,一定要真诚合作,团结一致。否则,就有被蒋介石肢解、消灭的危险。‘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我们是国民党部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你们一定要争取参加对日作战,共赴国难,多打胜仗。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战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在外边也会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夜深了,上海的街头一片寂静,远处外滩的黄浦江上偶尔传来几声汽笛。杨虎城越说越激动:“从洲,我还想和你说说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这也是最重要的。靖国军失败后,我在陕北结识了共产党元老魏野畴先生,从此和共产党有了接触。通过来往,我敬佩他们都是爱国爱民有献身精神的有识之士。在国共合作时,我们参加了大革命行列,打败了北洋军阀吴新田的部队;坚守西安城,有力支援了北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以及咱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才有了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我对共产党没有失望,只是对当时他们的某些政策接受不了。所以,直到部队回陕西,只能通过汉辰、斌丞、明轩他们做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



不侵犯的协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卖国投降,蒋介石不愿抗战,加上与红四方面军破裂而交战,使我很苦闷。1935年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使我看到了希望,毛泽东先生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咱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毛泽东是相信咱们这支部队是抗日的,因此,才有了这次“双十二事变”的合作,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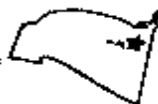
说到这儿,杨虎城舒了一口气站了起来,拉着孔从洲继续说:“从洲,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后悔,摔得值,摔得响!你要记住,你部队住渭北,北边(红军)是朋友,南边(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处于危险境地时,你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寿山也讲过。兄弟,你们有更艰巨的任务,好自为之,我相信,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此时,孔从洲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将军的教诲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今后的路怎么走,他心里有数了。

杨虎城走后,仅仅过了八天即7月7日,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帷幕拉开了,同时,蒋介石肢解杨虎城部队的计划也开始了。

抗战爆发前夕,十七路军的番号即被取消,缩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兼任军长。抗战爆发后,东北军立刻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在抗战前线迅速消耗,东北军被瓦解了。十七路军也一样,三十八军所属的十七师、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和教导团奉命开赴华北前线,被有意分割成了四块。

1938年4月,日军集结了3万人的精锐部队,向晋东南抗日根



据地发动九路围攻,黄河北岸的战略屏障中条山地区处境十分险恶。

蒋介石明升暗降,6月免掉了孙蔚如陕西省主席职务,7月任命他为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并率部前往中条山据守,企图使三十八军(此时军长为赵寿山,孔从洲任独立四十六旅旅长)和九十六军与日军两败俱伤,在战场上同归于尽。

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孔从洲率部经历了极为残酷的激战,击落了敌机,活捉了敌驾驶员。他运用游击战奔袭敌后,破坏了数条公路,袭击了安邑附近的火车站,偷袭了敌运城机场,炸毁了敌机数架,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在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牺牲最为惨烈的“六六”战役中,孔从洲出其不意地向北杀出重围。打乱了日军的部署,保障了大部队突围成功。

之后,自1938年8月至1940年10月,在中条山地区,第四集团军运用游击战和阵地战,先后粉碎了日军12次扫荡,光荣地守住了中条山。

三十八军愈战愈勇,蒋介石的疑惧也与日俱增。

与共产党合作多年的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又被明升暗降,蒋介石先电令他去重庆中央训练团任大队长,一个月过去,又宣布将他调往远离共产党的甘肃河西走廊第三集团军任总司令,同时,任命了他的亲信、特务头子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

赵寿山重庆训练团任职期满后,急忙回到前方,此时,张耀明已赶到巩县芝田镇抢任了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立即找到孙蔚如商量对策,最后二人商定,赵寿山走后,在三十八军内部指定由孔从洲统一负责这支部队。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接着,赵寿山约三十八军中身为共产党员的团、营长到和义沟开会。会上,赵寿山对大家说:“日本人看起来支撑不了一年了,抗日战争很快就要胜利,我调走后,出不了一年,孙蔚如也会被调走,孙蔚如调走后,就要调孔从洲。蒋介石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我们三十八军抽梁换柱分编遣散。所以,我们必须早做准备,已经暴露的人,要马上离开部队去延安。”

接着,赵寿山又说:“大家要拥护孔从洲,从洲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反蒋一贯坚定,是我们十七路军忠实的将官。”

最后,赵寿山叮嘱大家:“要切记两件事,一件是团长绝不能丢,蒋介石要撤谁的团长,整个团就马上开过黄河,党会设法与你们联系的;另一件是,要记住孙蔚如离职之日,就是全军起义之时!”

赵寿山临走之前又约来孔从洲长谈:“从洲,我还记得那年你徒步走来定边投军的情景,我们经历了多少坎坷和磨难,你和部队一起成长起来了。”

孔从洲说:“军长,你为咱们三十八军操了多少心血,现在头发都白了。”

赵寿山望着孔从洲,动情地说:“十七路军现在就剩下这支部队了,杨先生发动西安事变,原是为了抗日,现在抗战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坚持下去,三十八军多年的建设和巩固真是来之不易啊!一定要团结好内部,坚持斗争,保住这支革命力量,迫不得已时,就扛起红旗,坚决干!我走后,这副担子就落在你肩上了。望你勉力为之。”

“军长放心,我一定团结好党内的同志,把部队带好,担子重我不怕,我只是有个要求,请党中央派得力的同志来部队协助我工



作。”孔从洲恳切地说。

……

1944年4月,日军为改变其在中国的战略态势,发动了中原战役。日军渡过黄河,占领郑州后一路西犯虎牢关。第四集团军在虎牢关与日军激战十余天,反复争夺,战斗极其惨烈,其中三十八军更是损失奇重,在殿后作战中,兵员伤亡更大。蒋介石“借刀杀人”,妄想让日军消灭第四集团军特别是三十八军的阴险目的已昭然若揭。

此时,38军已处于极其危险的严峻时刻了,孔从洲忧心如焚,他想起了赵军长的嘱托,为了最后掌握住这支部队,决定派人去西安找蒙定军。蒙定军原是三十八军的特派员,担任地下工委书记。此时蒙定军正在西安任第三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主任,负责中央与赵寿山、孙蔚如、孔从洲的联系。

蒙定军听了孔从洲派员的汇报,也觉三十八军处境险恶,立即派人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不久,延安即派周仲英和张西鼎来到了三十八军驻地,周、张两位一见孔从洲就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十七路军十分关心,毛主席派我们来,要我们代表他看望在抗日前线的战友们。”

周仲英传达了党中央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失败的时候,蒋介石会更加加剧分化、瓦解、吞并、消灭西北军的政策,因此,西北军必须保证内部团结。既要保存好实力,不被蒋介石吃掉,又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除非万不得已,还是要维持团结抗战的大局。

张西鼎还回忆起了从1941年到1945年,他几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对孔从洲说:“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早就熟悉,他说三十八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军是陕西和地下党统战工作中的一个好典型。当我们向主席汇报到三十八军被山西、河南和陕西的群众戏称为“七路半”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了不起，你们的七路半比起八路来还要八路。”

周仲英插话接着说：“毛泽东还说，西北军这支部队早就有地下党组织。1935年以后，就接受中央领导。三十八军在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党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英勇地抗战，毛泽东强调指出，三十八军是很坚定的，很坚决的。”

周、张二人临行前又对孔从洲说：“从洲，中央的意思是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坚决将共产党员较多的十七师先拉出来，其他部队不成熟时不要勉强。”

这期间，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在军里一直是杀气腾腾，他公开地狂叫：“我知道三十八军有共产党！谁是共产党我也知道。听着，你们谁是共产党，赶快来自首、告密。告密有赏啊！”

在全体军官大会上他还说：“我知道你们这个部队是能打仗的，抗日是有功的。但是为什么得不到中央的补充呢？就是因为有共产党。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清党’。你们谁是共产党谁就举手。你们不要怕，要大胆告发。连长是共产党，排长就可以把他毙了，升为连长，排长是共产党，班长把他毙了就升成排长……”

时局发展很快，蒋介石果然开始下手了。先将孙蔚如调离了第四集团军，让其去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接着又准备派姚国俊等大批军官去十七师替换所有连以上军官。

孔从洲想起了赵寿山临别时的嘱咐：孙蔚如调走之日，就是三十八军起义之时！



7月10日,第四集团军总部为孙蔚如举行了送别宴会。宴会结束后,孔从洲和十七师五十一团共产党员刘威诚团长进行了密商。

刘威诚问:“孙先生被调走以后,我们师已经做了准备。我们十七师在二线,说拉就能拉出去,你们师还在前方第一线,你看咱们怎么办好?”

孔从洲说:“这事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眼下,我五十五师正在第一线阵地与日军成胶着状态,敌我阵地犬牙交错。拉锯式的反击战正在激烈进行,目前很难把部队拉出去,一来日军趁虚而入,我们在军事上将会十分被动,拉动过程中损失将是十分惨重的;二来,第一线如果被日军突破,你们十七师的行动安全也难以保障啊!”

刘威诚也说:“是的,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还没有破裂,如果阵地失守了,就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抗战前线的群众也接受不了啊!”

两人权衡再三,一致认为最好是五十五师暂时留下,坚守阵地,顶住日军,保证十七师先行起义,而后待机行动。

7月18日凌晨,由共产党员刘威诚、张复振、梁励生、徐又彬组成的行动指挥部发布命令,按照行军序列、路线,浩浩荡荡地向八路军豫西第二军分区开进。7月22日,到达目的地,受到了韩钧司令员、李聚奎政委的热烈欢迎。十七师在渑池县向党中央发去了起义通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孔从洲奉命接管郑州,受命兼任郑洛警备司令。10月下旬又奉命调离郑州驻商丘。就在这时,孔从洲得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一个军和



河北民军共1万多人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了。孔从洲心情极为兴奋。他认识高树勋，大革命时期西安保卫战时，高树勋是冯玉祥部的一员，西安城被围时，他任旅长率部在西安城郊猛攻刘镇华的司令部，那时高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高树勋率部起义了，孔从洲真是心潮起伏。

三十八军的起义，正在积极迅速地酝酿准备。孔从洲心里烧着一把火，迫切要求早日率部起义，不断向党中央和华北局、西北局提出起义请求。此间，刘少奇致电华北局、西北局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要求他们密切配合组织三十八军的起义工作。

就在这时，重庆谈判结束，蒋介石为夺取北平、天津和东北，在华北战场打了三个月的局部内战而以失败告终。内战暂时停止，国共展开和平谈判，这一变化使中央于1945年初，两次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三十八军暂停起义。中共中央1月12日电告：

陈毅并告刘邓：

巧(十八日)电悉。值此停战之后，三十八军举行起义不甚妥善。而且该部集中郑州附近，行动也有困难。因此，中央意见最好暂停起义，除最暴露不能立足干部离队外，其余尽量保存作长期打算。如一切已准备就绪，不起义就有重大损失，则要他们迅即拖到晋冀鲁豫去。

中央二十日(一月)

2月17日中央又复电刘伯承、邓小平：

陈毅并告刘邓：

……三十八军能争取改编一至二个师，不要随便拉出来。此时拉出来，政治上不利，将来编制也困难。在该部内要保守



说,刘威诚向他俩转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是:中央对五十五师和孔师长十分关心,刘伯承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一直在设法同其联络,因为部队调动频繁,一直没联络上。中央认为由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重庆召开,现在举行起义,对大局不利,还是暂不起义为宜。

就在此后不久,孔从洲突然接到张耀明的通知,叫孔去军部开会,孔从洲推说有病,派去了副师长孙子坤。

张耀明告诉孙子坤:“胡宗南长官说在西安已经查明,孔从洲是民主同盟的党员,要把他调到西安”。

孙子坤当即向张耀明说:“我保证孔师长没有问题,要调就调他去军部任副军长,师长空缺可由孔师长选人。”

和张耀明争执以后,孙子坤向孔从洲汇报了情况。孔从洲又把乔阶平叫来,对乔说:“现在情况吃紧,你须马上再跑一趟,找到刘威诚,就说蒋介石已下令全军整编,我们部队马上有变,要求急速起义。晚了,部队就有被瓦解的危险。你去后,用无线电和我联络。”

就在乔阶平赶到之前,刘、邓已接到冀鲁豫军区的报告,刘、邓于29日急电中央:“三十八军之孔师,已被整编为旅,孔被调为副军长。胡宗南知该师与我党及民盟有联络,拟将其营以下干部完全调换。孔在此种危机下,请求起义甚急,已派专人来邯郸面谈,5日左右可到。究应如何处理,请中央考虑速复示。”

当天下午5时,中央即复电刘、邓,同意孔师起义。

刘、邓:

绝密。俭艳电已悉。

孔师既无隐蔽且又危险,应乘东北尚未停战,陇海、平汉



尚在加修堡垒，以反对内战为号召，立即起义，拉至解放区。该三十八军之其他部分，凡不能隐蔽者，应一同起义拉至解放区。并请你们妥善布置接应与堵击追兵。此复。

中央艳(二十九日)

几天后，胡宗南召张耀明到西安，传令对三十八军进行整编，将其编为三十八师，张耀明任师长，五十五师编为五十五旅，孙子坤任旅长。孔从洲被调到另一个整编军任副军长。

早已熟知蒋介石“明升暗降”伎俩的孔从洲，愤怒地对张耀明说：“我不能去。我在三十八军多年了，留下来当马夫、伙夫都可以，就是不愿离开三十八军”。

张耀明没有办法，又请示胡宗南，胡宗南说：“想不离开部队不行！既然不愿去别的军，就留在三十八师当副师长吧。”

5月14日清早，孔从洲住处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他开门一看，是他原五十五师的秘书张云程，张云程喘着气急告孔：“我刚在师部得知，郑州裴昌会给张耀明来电，转发胡宗南命令，命五十五旅急于5月15日凌晨4时由巩县上火车，开赴新乡增防‘剿匪’。”

命令还说，只带三天干粮，重武器和其他物资一律不带，说罢，张云程匆匆离开了。

孔从洲想：敌人真的开始下手了，去新乡增防是假，上火车缴械才是真。

形势万分危急，必须当机立断！

起义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此时北渡黄河的船还未造好，东南西三面都有敌重兵防守，孔从洲决心背水一战。他准备晚上到共产党员较多的一六四团戴定江营去，这个营在离师部20多里的新沟村。



靖尘和张子馥等人的电报。

起义伊始,险象环生。

16日部队行至龙窝便遭敌军包围,洛阳的九十七军、郑州的二十七军、南阳的保安队一齐出动,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起义部队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经一天一夜的血战后,部队突至嵩山五支岭,还没冲出包围圈,敌人就出动飞机向五支岭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攻击。此时,部队已经伤亡严重,通信中断,弹尽粮绝。终因寡不敌众,于18日夜,孔从洲下令开始分散突围。在一六三团杨策勋副团长的掩护下,孔从洲和杨健带一六三团往南突围,其余部队由孙子坤指挥向东突围。

就在被敌军包围的16日晚,一六四团团团长陈日新叛变,带少数人跑回了军部。

向东突围的孙子坤,在激战中,突破了嵩山五支岭,接近了双泊河,但仍没冲出包围圈,后被二十七军强迫缴械,孙子坤等先被带至荥阳,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孙子坤始终坚贞不屈,在敌人法庭上,严正陈词,说自己的义举自己负责。

后来,蒋介石又命令将孙子坤和共产党员孙乃华押解到南京,两人多次惨遭酷刑,但二人大义凛然,在军事法庭上痛斥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径。

1947年11月19日,孙子坤和孙乃华同志被蒋介石下令以“阴谋反叛政府”罪,押至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向南突围的孔从洲部,18日晚,突围至登封附近,与自卫团相遇。此时,东南边有禹县的自卫团,后面有洛阳的三十七师紧追,孔从洲不敢恋战,且战且走,部队突围出去已经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他命部队立即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以图再举。孔从洲换上



了便衣,孙天爵将自己的记者证给了他,孔从洲自称孙天爵,带了几个卫士就走了。没出登封就遇上了四五个民团的人,拦住查问:“你是干什么的?”

孔从洲回答:“我是陕西报社记者,去登封采访。”

民团的人查问了多遍,没有找出破绽,孔从洲安全地过了第一关。

他和杨健继续往南走,在叶县附近的一道关卡,又遇到叶县警察局副局长的盘查:“你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孔从洲说:“我是陕西人,从西安到禹州买药材;药材买了,货也发了,还有点钱,想去镇平买些绸子”。

副局长问:“你是西安哪条街哪个药铺的?”

孔从洲答:“是南大街,德寿堂的。”

副局长又问:“你们经理姓什么?”

孔从洲说:“姓王,陕西蓝田人”。

原来这个副局长和药铺王经理是熟人,问过孔从洲以后,随便扫了杨健一眼,便客气起来,说:“我好久没见陕西老乡了,北山有部队叛变,我先去剿匪,今晚咱们好好扯一扯。”

副局长走后,孔从洲和杨健拦住一辆拉煤车,每人给了司机8块钱,坐到离南阳城外还有3里路就下了车。不出所料,此时南阳城门口的墙上,正贴着捉拿孔从洲的布告和画像。

孔从洲就此与杨健分了手,与王德义一起去找孔令敏。到了孔令敏家,孔家已经知道孔从洲正是悬赏捉拿的人物,孔令敏的老母急得直掉眼泪。孔从洲告诉老人,他得马上离开这里。老人说,令敏的父亲认识附近菩提寺的一位老和尚,当晚,孔从洲就转移到了菩提寺。孔家兄弟把他安排在菩提寺后山住下,山上树木很多,



孔从洲隐蔽在这里，总算暂时脱离了险境。

不久，王德义和孔家兄弟就与华北局取得了联系，局领导特派王国同志前来寻找孔从洲，王国说：“中央决定，你无论如何不能在白区呆下去了。不管部队剩多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其他干部也尽量动员回去，重新组织部队。”

几天后，他们离开了镇平，经许昌到了开封，由开封向解放区山东菏泽走去。

沿路他们通过党的地下联络站，机智地应付了国民党的层层盘查，8月间终于回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

孔从洲在菏泽前线指挥部见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度过了他终生最为庄严和激动的时刻——9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为正式党员了。组织部门负责同志告诉他：你的入党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孔从洲听了，激动得一夜未眠，往事像潮水一样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

几天后，孔从洲和刘、邓一起回到河北邯郸，重组三十八军的命令就要在这里向全中国宣布。

9月13日，邯郸各界4万多军民在这里举行“拥护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成立暨庆祝前线我军自卫反击胜利大会”。刘伯承司令员宣布：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正式重建成立，军下辖第十七师、第五十五师和一个教导团，孔从洲任军长，汪锋任政委。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都发来了贺电。

4. 西北农村娃，结缘炮兵成行家

孔从洲的戎马生涯中，很少离开过炮，炮是他行伍人生的路与桥。



在杨虎城麾下时,他因战功卓著,由炮兵排长、连长一直升到炮兵团长;到了人民军队,他又从二野特纵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直到军委炮兵主管科研的副司令员,与炮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5年初,杨虎城部从长城脚下的定边镇南下开到了耀县驻扎。在豫西的国民军孙岳部作为礼物送给杨虎城一门大炮,孔从洲因为在家时随二哥赶过大车,于是被挑去闵底镇,接受杨虎城得到的这第一门大炮。孔从洲驾驭着两匹枣红马拉着这个庞然大物,从闵底镇,经华县、渭南、富平,一直拖到了耀县。

这是门打药包的老山炮,炮身上刻着“光诸九年金陵兵工造”的字样,那是1883年南京金陵兵工厂制造的产品,它比1906年才出生的孔从洲还要大上23岁。

炮虽陈旧了些,但是总比没有好,部队还是把它当成了宝贝一样看待。

这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发动了“驱逐吴新田运动”。

吴新田何许人也?他是段祺瑞的亲戚,时任陕西军务督办,这股军阀势力在陕西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7月初,当孙岳率国民第三军进军陕西逼至潼关时,吴新田闻风而逃,驻耀县的杨虎城立即率部从耀县、三原出发,向宝鸡、岐山方向疾进,吴新田部逃至虎镇附近,即遭杨虎城截击。

当时正值渭河涨水,吴部在东岸乱作一团,杨虎城趁势猛攻,敌军边抵抗边挣扎着强渡渭河,就在这时,那门老山炮突然发威了,“轰轰轰”连续射出了几发炮弹,而且全都不偏不斜正好在敌军阵地中心开了花,接着步兵发起猛烈冲锋,敌阵即刻土崩瓦解,吴部一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营全部被歼。



这一仗，一下子缴获了 24 门德国造克虏伯野炮，杨与孙部各分其半。杨虎城就此组建了他的第一个炮兵营。

战斗一结束，孔从洲就被任命为第三排排长。

1926 年，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加紧筹划北伐，吴佩孚、张作霖为迎击北伐军，肃清在其侧背的与北伐军有联系的革命力量，命令无恶不作、嗜杀成性的陕西军阀刘镇华率领 10 万大军闯进潼关，直逼西安城下。在西安人民即将大难临头的时候，杨虎城除留一个旅与国民第二军第三师共同防守三原、泾阳外，亲率主力急速驰援西安，决心坚守西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

4 月 16 日上午，由姬汇百旅长率领的杨虎城部先头部队，经过一整夜急行军赶到西安北城门外时，就听到自城东南方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姬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进了北门直接向东门大街跑去，当部队抢占了东关以后，发现敌侦察部队已经占领了东关外的韩森寨。

“孔排长！孔排长！”

带着炮车刚赶到东关的孔从洲听到喊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韩寅生团长。韩团长勒住马，大声叫道：“敌军已占领韩森寨，正在建立观察所。从洲，快开炮，把它端掉！”

“只有几十发炮弹，杨师长说不准轻易打炮。”孔从洲回答。

“不要紧，你打，我负责。立即把炮推到前边高地上，快！给我狠狠打！”韩团长说完，转身勒马又跑回了部队。

孔从洲迅速命令本排战士把炮推上了指定高地，炮口对准了韩森寨，测好距离，摇动起落机，装弹开炮。第一发打了近弹，校正后，第二发打出去，只见轰隆一声，准确地在韩森寨高地的顶部爆



炸,敌军纷纷仓皇逃命。孔从洲又急命延伸距离再发一弹,炮弹像长了眼睛,跟踪着敌人,落在了溃退的敌群中。

敌军失去了指挥,进攻东城的敌军被打退了。

姬旅长立即向杨师长报告:“消耗了三发炮弹,打死了敌团长一名,打掉了敌观察哨,炮兵立了头功!”

杨虎城高兴地说:“咱们这个娃娃排长还真有两下子!”

不几天,孔从洲被任命为炮兵营三连连长,担负起了守卫西安城的战斗任务。

刘镇华在头三个月,对东城和北城发起过十几次大规模的进攻,都受到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杨虎城率领的第三师的反击。到了9月,由于城内粮食严重不足,外援不至,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甚至缩至只一墙之隔。刘镇华趁机又调动在东门的一个主力师,携炮10余门,妄图集中兵力打下小雁塔,攻入南门。在这里,刘镇华集中了十几门大炮,向守军阵地猛烈轰击,守军不得已撤到了第二道防线,继续抵抗。就在这危急关头,杨虎城率部前来增援。杨虎城命令孔从洲火速从北城拖两门野炮到南城门楼待命。

此时的孔从洲炮兵连,已从原有的134人已亡减员到70多人。

因为没有粮食,牲口也杀得只剩20多匹,官兵们饿得连腿都抬不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南城进发。战事紧急,饥饿逼人,战士们齐心协力,咬紧牙关,硬是又推又拉地将两门野炮运上了城墙顶道。

杨虎城见了孔从洲,立即命令:“集中火力,把大雁塔右后方小高地上那个指挥所打掉!”



孔从洲看准目标,迅速测定好距离,标定了射击诸元,又是连发三炮就将敌指挥所摧毁了,只见朝小雁塔方向运动的敌人,顿时停了下来,纷纷逃进了树林,敌人的炮也哑了,这时,守军立即从第二道防线发起反攻,杨虎城增援部队也从左右两翼包抄到了敌军侧后,小雁塔附近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之后,小雁塔阵地终于被夺了回来。

经过8个月的浴血奋战,西安守城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守城期间牺牲的官兵和饿死的百姓达5万多人,当年在举行革命大祭会时,杨虎城给死难军民的挽联上题写了“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足见当时西安守城战之艰苦悲壮。

1929年9月。

蒋、冯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命杨虎城部由胶东开往河南南阳,杨兼任南阳守备司令。由于北伐期间部队东出潼关,转战皖北、胶东,变化很大,这下又从山东回到陕西家门口,杨虎城有机会对部队进行了整顿,炮兵也作了整编和充实,正式组编了炮营,23岁的孔从洲被任命为炮兵营长。

12月中旬,蒋、冯战争爆发,冯军分三路向河南进攻,蒋介石派五路军讨伐冯玉祥,双方主力在洛阳以西展开了大战。不久,原为蒋介石讨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在郑州自封“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唐率军沿平汉路南进,总司令部设在驻马店。唐的主力眼看就要打到武汉,当时武汉防务十分空虚,一旦被唐占领,长江中游半壁江山,就可能落入唐生智之手。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惊。杨虎城深知这个新军阀的底细,他权衡利弊,决定对唐作战。

杨率部12月31日赶到驻马店附近,突然对唐军发起攻击,唐



生智立即组织装甲列车上的火炮对第一线主攻部队进行反击,对杨虎城部构成了很大威胁。关键时刻,杨虎城又给孔从洲下令:“从洲,现在就看你的啦!”

孔从洲立刻带了两门山炮,摸黑拖到了唐军铁甲列车附近,当头一炮就将铁甲列车击中,又是几炮,铁甲列车被炸了个稀巴烂,主攻部队趁势一举攻占了驻马店车站和市集的大部。唐军又从前方调来七车皮弹药,准备与杨部决一死战,杨虎城又命孔从洲用炮将其摧毁。孔从洲不负杨将军的厚望,仅几炮就击中了两个车皮,接着五个车皮连续起火爆炸。杨虎城在驻马店城里,从容指挥,时而反复争夺,时而巷战,唐军大败,唐生智也仓皇化装逃出了驻马店。

这次战斗,蒋介石原来拨给唐生智用来对付冯玉祥作战的两个炮兵团的崭新装备,也落在了杨虎城的手里。战斗结束,大部分战利品都上缴了蒋介石,杨虎城只留下三八式和架腿式野炮8门,迫击炮12门。这些炮运回南阳后,又组编了三个炮兵营,加上孔从洲炮兵营,共四个营。从此杨虎城部队便正式有了自己的炮兵部队了。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积极主张抗日,为了做好对日作战准备,他的十七路军也扩编到了5万余人。

长期的战争经历,使杨虎城倍感炮兵装备和组训的重要性,于是,他对炮兵又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孔从洲被任命为炮兵团长。

5. 刘伯承挥师渡江,孔从洲使炮如神

孔从洲的炮兵生涯,从拖一门老炮开始,到操炮、使炮、造炮,最为辉煌的时期应该是他参加人民军队以后。



1949年元旦前后,淮海战场喜讯频传,时任郑州警备区司令员的孔从洲和他的搭档吴德峰政委接到了刘伯承、邓小平从淮海战役前指发来的密电,要他们选派得力干部,深入武汉三镇侦察敌人九江至宜昌的江防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师以上军官姓名等情报资料,为渡江作战、解放武汉作准备。

孔从洲兴奋极了,多少年来他所向往的夺取全国胜利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一幕幕横渡长江、追歼残敌的作战情景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不由自主地说道:“我孔从洲使炮的老行当没准又要派上用场了!”

果然,2月下旬,二野前委来了电话,要他立即动身前去见刘伯承司令员。

“有仗打了!”孔从洲心里又高兴又激动,他马上交待了工作,乘车一溜烟向二野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商丘城东的张菜园开去。已经两年多没见刘伯承司令员了,他着实有些想念。

一见面,刘伯承就紧紧握住了孔从洲的手,问他身体怎么样?郑州情况怎么样?

孔从洲说:“司令员,一切都好,就是有些想念你!”

刘伯承让孔从洲坐下,然后对他说:“从洲,还是在陕北的时候,红军和十七路军合作时,我就听说你使炮如神了。”

孔从洲连忙说:“司令员过奖了,我只是与炮多打了几年交道,和炮有感情,爱琢磨那玩艺儿。”

刘司令员笑着问:“那现在呢?”

孔从洲已经明白了司令员的意思,回答说:“和过去一样,还是对炮情有独钟,特别是遇上好炮、新式炮,我都会多看看,多摸摸。这几年我看到缴获的美制大炮,确实比我们当炮兵时使的炮强多



的扩编。经中央批准,8月初开始按新编制方案进行落实。说干就干,8月下旬整编工作就基本完成,特纵由不完整的三个团扩编为完整的七个团,总人数增加到16819名,增加了七倍多,火炮也增加了十倍。特纵从2月下旬在河南商丘组建,到8月在南京奉命扩编,仅半年的时间,得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使孔从洲激动得夜不能眠。

不久,扩编后的特纵就接到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命令。此间,毛泽东在苏联给中央发来电报,说台湾和西藏还有待解放,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斗争任务。二野此时面临的就不仅是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了,还要担负解放西藏的艰巨任务。

根据这种形势,西南军区决定将特纵一分为二,把所属的炮兵和工兵分开,组建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工兵部队由特纵副令员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委,并立即开赴西藏抢修战备公路。炮兵部队改建为西南炮兵司令部,由孔从洲出任司令员。

新组建的西南炮兵部队共17200余人,在西南,孔从洲率领这支部队参加了剿匪、征粮、修筑成渝铁路等一系列巩固边防,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为培养炮兵干部,他还成立了西南军区炮兵学校,并亲自任校长。

6. 办炮校,老亲家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 次给毛泽东写信

1956年,孔从洲整50岁。这一年,他的战斗生涯又一次面临着重要的选择。

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调动他的工作,一是在成都军区任



职,二是去沈阳高级炮校任校长,由他任选。

面对选择,孔从洲思绪万千。17岁那年,他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从莽莽的西北黄土高原,跋山涉水,顶着风沙暴雨,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走上了革命队伍。算起来至今已有33个年头了。这33年,无数革命志士离他而去,他的尊师杨虎城也离开了他,他更珍重的是今天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他的这份信任。

孔从洲想到:我们的炮兵目前还是骡马炮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炮兵基本上都是机械化炮兵部队了。新中国也应该有强大而现代化的炮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炮兵的建设十分重视,1951年5月,毛主席亲笔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建设、发展炮兵,培养干部,人才是关键。办好高级炮校是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的需要。

想到这里,孔从洲毅然决断:迎难而上,为人民军队的炮兵建设再做新的贡献!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7月,他轻车简从,离开重庆到沈阳高级炮兵学校赴任了。

途经北京,军委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热情地向他介绍了高级炮校的基本情况:“从洲,从现在起,你就要改行从事军事教育了。我们仗打了不少,无论将来战争样式怎么变化,人才始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战争年代,军事人才培养主要通过战争实践;在和平时期,人才培养就得靠院校了。过去我们和敌人在战场对抗,现在和敌人是在院校里对抗。我们的院校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是否能有所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战场上最后胜负的结局。从洲同志,担子不轻啊!”

陈司令员又说:“这些年,我们忙于打仗,院校教育训练的经验



很不足,这同打仗一样,我们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你看,毛主席1938年为抗日军政大学规定的教育方针多么好啊!按照这个方针规定的培养干部的目标和标准,抗大出了那么多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才!现在,我们有时间了,可以集中精力搞正规化的院校教育训练了。”

来到沈阳高级炮校,孔从洲马上投入到学校的全面建设之中。首先,他对学校的教员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这里的教员一部分是我军解放战争和新中国诞生不久培养起来的,一部分是旧军人留用的,当时还聘请了部分苏联军事顾问。这样一个来源结构组成的教员队伍对当时适应我军炮兵建设需要,对改善教员的知识、智能结构以及学校的学科建设是很有利的,既能使教员充分发挥特长,各得其所,又能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为了调动留用教员的教学习积极性,针对这部分教员当时思想顾虑多,怕戴政治帽子的思想,在校领导中,他要求大家坚决不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对这些教员的思想教育要特别强调耐心细致。1955年授衔时,他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历史情况清楚的一律按时授衔,尚未查清的,一经查证落实,也都及时授了衔。为了落实学校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他规定:教员野外作业必须配备小车,教员的宿舍要安排最好的,教员理发、洗澡、看电影都要保证最优先。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凡自己外出,只要车有空位,一定要司机主动停车带人。和带兵打仗的年代一样,孔从洲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基层官兵一起度过的。在课堂、在野外作业场时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正是在教学第一线,他不仅有和教员们一起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他自己也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炮兵射击理论,使他这个只读过一年多中学的一校之长,很快变成了



一个办院校的行家里手。

建国以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我军的炮兵武器装备也很快得到了发展,不仅有各种不同性能的火炮,而且还有各种对空,对地面的雷达、指挥仪、测地仪器、光学侦察仪器以及有线、无线通信设备。当时,高级炮校的任务是培养师、团两级指挥军官。学制1-2年,在这么短的时间,要使学员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难度很大,孔从洲想起了自己从摆弄一门光绪年间的老炮成为一名炮兵指挥员的成长过程,进一步认识到,惟有实践才是获得真知,院校教学和打仗是一个理,实践性教学应该成为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炮兵训练多半是战术、技术的训练,院校很难或根本无法提供这样的实践环境。为此,孔从洲和教员一起经过反复琢磨,在学校建成了战术、射击、兵器等七个专修教室,制作了一批直观实用的教具和模拟战术作业沙盘。为了逼真再现射击科目训练,他们还建成了全军第一个枪代炮射击场。

孔从洲任校长三年,高级炮校为全军输送了大批优秀的炮兵指挥人才。

1960年2月,孔从洲调离沈阳高级炮校,奉命去南京组建炮兵工程学院,1964年又出任了主管科研的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研院院长。

孔从洲上任不久,恰逢我军高炮部队奉命开赴越南战场。打了一辈子仗使了一辈子炮的孔从洲自然对这场战争十分关注,炮兵这个战争之神的战场作用更是他关注的焦点。

他不时地派出科研人员赴越到我军高炮部队进行调研,一份份情况汇报和战地快报摆在了他的案头,调查结果是十分严峻的,



他紧锁眉头,为我高炮部队将士的劣势装备英勇抗击绝对空中优势的美军的悲壮而自豪,更多的是为我军装备的落后而着急。他一方面急命炮兵立即组织人力拿出科研攻关报告,解决加强空中火力的问题,一方面又建议军委组织召开赴越前线代表座谈会,具体研究改进和发展我军防空武器的问题。这就是炮兵建设史上的“六二〇”会议。

会上,一位战士说:“首长,当我们眼看着用我们的肩膀扛上阵地去这些老炮打不下敌人飞机,而我们的战友却倒下去的时候,我们心里不知有多急呀!我不明白,咱们国家原子弹、氢弹都造出来了,怎么就是造不出自己的高射炮?”

一位连长又说:“我们用的仿苏 100 毫米高炮,虽然有雷达,可是受敌人干扰后不仅成了瞎子,还成了敌人的攻击目标,我们好多战士就是这样牺牲在炮位上的。”

一位副团长两眼望着在座的首长,深情地说:“首长,我只希望,如果我们还有继朝鲜、越南之后第三次出国作战机会的话,能用上我们自己造的新式高炮就好了。”

听了这些从前线回来的指战员的发言,孔从洲的心情十分沉重,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

作为一个科研战线上的负责干部,听了这些感情真挚的发言,真是如坐针毡哪!说不清几分是激动,几分是惭愧。我们的战士多好啊!他们拿着落后的武器,在高度现代化的敌人面前毫无畏惧,敢于战而胜之,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代表。而我们在后方专门搞武器装备建设的人,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难道不应为他们所付出的牺牲而自责吗?我暗自下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拼着老命,也非抓出新高炮来不可,



达的干扰必须找出对付的办法!”

将军自有将军梦,孔从洲急切地盼望中国军队也有自己的电子对抗部队。

孔从洲先是找到了主管军事电讯和电子工业的王诤将军,王诤将军1974年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会议分析了几次局部战争中电子战的经验和教训,一致认为,必须尽快加强我军雷达和电子对抗装备的研究工作,最后总参谋部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呈送了专题报告。

在那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对这一报告,张春桥一句话就给顶了回来。孔从洲面对事关战争胜败的重大事情,他决意要给毛泽东写封信,是与非,甘愿一人承担。这是孔从洲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他写道:

主席:

近几年来,电子对抗技术发展很快。苏联、美国的电子侦察,已经对我军的作战通讯、导弹制导和各类雷达等电子装备,造成严重干扰和威胁,如不及早采取措施,战争一来,将使我指挥失灵,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电子对抗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它不仅是技术装备的试制、生产和使用问题,而且是与情报的收集分析、作战方案的制定、对抗技术的选用等有关的作战指挥的问题。经过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的电子对抗工作从无到有,目前,科研、生产和使用队伍已经初具规模,关键是要将这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加强领导。因此,建议组建电子对抗领导小组和专门机构,统筹负责我军进行电子对抗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手段、拟定发展规划和组织协调,收集研究外军情报

轰天炮神孔从洲



并确定对策等。我们必须争取时间,解决我军现有装备的抗干扰问题,同时积极发展对敌实施侦察和干扰的手段。惟此,才能使敌人不能制我,而我可以制敌。

以上情况,事关我军安危,我再三考虑,决定向主席报告。当否,请指示。

孔从洲

1975年6月21日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做了批示: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这事终于经过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叶剑英的关心和支持,有了一个说法。

1976年,是中国极度悲哀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异常猖狂,叶剑英也被停止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这件事也只有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6月在叶剑英同志的亲自关心下,在当时成立的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才得到了最终落实。

孔从洲立即向炮兵常委建议,经常委决定,在炮兵司令部设立了电子对抗和雷达工作处,在炮兵技术研究所设立了电子对抗和雷达研究室,炮兵部还组建了炮兵直属的电子对抗部队。

1976年秋,孔从洲度过了他70岁的生日。也正是这时,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横行了近十年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孔从洲兴奋极了,他说:“压抑在我心中的怒火燃烧了,对党的事业,对党交给我的工作,真有使不完的劲。”

这年夏天,他在北京主持了全导弹系统的方案审查会,同工程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技术人员一起,共同研究商定我国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大计。从1977年经军委正式批准,到80年代中期几经改进,我国代号为“302”的反坦克导弹系统终于研制成功了,这次重大的科技成果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4年国庆节,已经78岁高龄的孔从洲身穿将军服,胸前挂着勋章,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参加了隆重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

摩托化机械化的方队隆隆地驶过金水桥前的长安大街,走在最前面的竟是两个崭新的“302”反坦克导弹方队。

孔从洲的热血在沸腾,他是多么熟悉它们啊!多少酸甜苦辣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的眼睛模糊了,此时的孔从洲已是老泪纵横了。

海战将星邓兆祥



1. 黄埔小海军邓兆祥, 驾回了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
2. 建设中国海军的崇高理想,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破灭了
3. 伴随着“重庆”号的最后航程, 邓兆祥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4. 侄子策反, 邓兆祥大义灭亲



邓兆祥

(1903 ~)

广东省肇庆市人。1924年起先后入黄埔、吴淞、烟台海军学校和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学习。1927年后,任国民党海军飞鹰军舰枪炮正、航海正、副长。1930年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任国民党海军水鱼雷营营长,第二舰队司令部参谋,长治号军舰舰长,重庆号军舰舰长。1949年2月25日于上海吴淞口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安东海军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快艇学校校长,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青岛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年纪的他系统学习了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海军专业知识,已经成了中国第一代海军的佼佼者。

年轻的学子此时脑海里闪现的是:在祖国辽阔无垠的大海上驾驶威武的战舰纵横驰骋,保卫国家的海疆!

然而,毕业后他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军阀混战,战火迭起,旧军阀你来我往争夺地盘,中华大地一片狼籍。旧军阀背后都有洋人支持,祖国的海疆更是有主无权。

邓兆祥决意要走出国门,他想到国外学成后,回来建设自己国家的海军。

1929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电告海军第四舰队择优选送两名去美国海军的留学人员。

邓兆祥凭着自己的实力,理所当然地被选中了,最后他以练习生的身份,登上了“麦西顿尼亚”号客轮,告别了上海黄埔港。

“麦西顿尼亚”号客轮劈风斩浪行驶在茫茫大洋上,战胜了比斯开湾大浪,印度洋的惊涛,绕过了无数暗礁险滩,先后经香港、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孟买、亚丁、苏伊士运河、波赛、马耳他、直布罗陀海峡,历时22天,于1929年12月27日到达英国伦敦海港。

在英国,邓兆祥因为好学,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海军业务知识和操炮技术,美国海校老师也把邓兆祥当作了得意门生。

美国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方法使邓兆祥耳目一新,在这里,学员们第一次使用了模拟训练教室,教室就如同一艘舰船,所有的驾驶技术、操炮技术、雷达技术都是在专修室里进行学习的,学习内容也很实用。

在这里,学员们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中国学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邓兆祥经常受到教员的赞扬。



邓兆祥进校不久,教官就告诉他:“你们要想了解英国历史,掌握更多的海军知识,不能不去伦敦博物馆看看,我们大英帝国有世界上最多最大的博物馆,全国有各类博物馆 950 多处。”

坐落在伦敦西南的南肯辛顿区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品吸引着邓兆祥。

这个博物馆始建于 1851 年,全馆展示面积达 30 万平方英尺。飞机、车辆、气象、纺织、农业、原子物理、造船、分析化学应有尽有,馆内还陈列着 19 世纪远征探险时使用过的各种仪器与机械装置,邓兆祥在这里了解到不少海洋知识。

他还参观了位于市中心的新伦敦博物馆,这里的展品更是丰富,展现了从石器时代到 20 世纪的伦敦历史。伦敦 1665 年发生的使 6.8 万名市民丧生鼠疫和 1666 年使 1.3 万幢房子被烧的大火的凄惨情景,使邓兆祥了解到了英国的昨天。

最使邓兆祥难以忘却的,是坐落在朴茨茅斯港的英国海军皇家训练营。

那是一次痛苦的见识。他站在阅兵式操练的那座大厅正中,凝视着被当作战利品而陈列着的清朝铁炮、铜砗炮和军旗,还有中国古老的青铜器、陶瓷、牙雕、玉器、名字、名画和中国帝王的玉玺……他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不禁联想起了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八国联军入侵的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种种罪行。

在英国,邓兆祥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海军训练,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知识。但是眼前看到的,却使他陷入了无比的苦涩之中。

1945 年 3 月,在国民党军委会海军署下成立了“赴英接舰参战学兵总队”,又在南京成立了海军潜艇学校,被招收的学生经过



培训,将有一些人被分别派往美、英学习。去英国的学兵,同时还有接收“重庆”号和“灵甫”号的任务。

“重庆”号原名为“奥路勒”号,是英国皇军地中海“K”舰队的旗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誉为“银色魔鬼”。1935年6月在克里斯——茅斯(Cores—Mooth)船场开始建造,1936年9月20日完成下水,造价为25995英镑,是一艘排水量为7500吨的战斗巡洋舰。舰身长505英尺,宽51英尺,日耗油量18吨,航行耗油100吨。总动力6.4万匹马力。满员编制650人。舰上有6英寸装甲主炮6门,4英寸副炮6门,高射机关枪8挺,6英寸炮指挥台1座,4英寸砲指挥台2座,配有雷达炮火指挥仪。舰的左右两舷,装有21英寸鱼雷发射管6门,舰首设有防水雷的扫雷具2套,并有磁性水雷防卫电网,舰尾设有攻击潜艇用的深水炸弹发射架2具。舰上还装备有对海空搜索雷达,一部声纳,61部无线电台,自动淡水装置,机动汽艇等装置。

这艘舰二战时战绩辉煌。1940年,它在挪威海面一带,作为英国海军部长的旗舰,海战中曾参加过追击德国的“俾斯麦”号战列舰,曾击沉“伯力克”号巡洋舰,大败意大利海军。1943年英王曾乘此舰访问马尔他。1944年,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在该舰指挥盟军对班泰雷利亚岛的攻击。更显眼的是,它还参加过西西里岛登陆战。

“灵甫”号原名“H·M·S·Mendip”(“孟狄甫”号),1940年建造,是一艘护航的驱逐舰。排水量1500吨,航速28海里/小时,满员编制100余人,舰前后装有150毫米大炮各一尊,还有一尊100毫米高射炮,舰尾有两排深水炸弹。

这艘舰在二战期间,曾击沉纳粹潜艇五艘,参加过著名的诺曼



底登陆战。

英国巡洋舰“奥路勒”被“重庆”号取代,主要是国民党用来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

英国当局缘何会把他们的英雄舰送给中国?

原来,1937年,国民党政府派孔祥熙特使、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驻英武官周应聘随陈绍宽在此期间曾访问过德、英、比利时、梵蒂冈四国,在德国和意大利订购过几艘潜水艇、快艇、巡洋舰。这些订购协议因二战爆发而被搁置,向英国购买的舰艇也没交付,英提出原定交付的“重庆”号和“灵甫”号改为租借,租用期满再由中国作价。英不守诺言,国民党政府很是不满,于是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向英方提出:日军入侵香港时,港英当局撤退,曾带走中国六艘缉私船,英国应按价偿还中国。英方无奈,只得将“重庆”号作为缉私船的抵偿。“灵甫”号仍作为租借,租期五年。

1946年3月,南京海军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办公室,收到英国大使馆海军武官的一封密件。

中国海军总部:

中国海军赴英接“奥路勒”号巡洋舰日渐临近。望贵部及早确定舰长人选,速报我部……

陈绍宽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了信,端起茶杯,扫视了一遍报文,突然起身,“唰”地拉开挂在墙上的“国民党海军各舰队舰长一览表”,深思了片刻,向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秘书说:“你告诉英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我们将尽快决定舰长人选。”

不久,中国海军司令部的几位高参匆匆忙忙研究并向陈绍宽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报告后,由海军总司令代表拿着舰长名单,迅速送到英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办公室。

英国海军武官接过名单,逐个审视了一遍,用惊疑的口气问中国海军总司令代表:“请问,你们推荐的这些舰长是哪个海军学院毕业的?有多少年的航海史?在太平洋、大西洋航行过吗?”

海军总司令代表面对英方的提问,不知如何回答。

英方海军武官摇摇头,苦笑着说:“如果你们选的舰长不是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优等生,或者起码是驾驶过驱逐舰的,那么,是没有资格任该舰舰长的。再说,我们赠送的这艘‘奥路勒’号是我国的一艘功勋舰,这样一艘有知名度的舰,要把它开到中国,必须经过大西洋比斯开湾、地中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太平洋,谈何容易呀!如果在途中发生了问题,这对于盟国的友谊,对我们皇家海军,都是十分可悲的!”

英方代表两肩往上一耸,责问道:“你们知道我们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吗?”

中方海军总司令代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英方海军武官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所谓英国皇家海军——英国的国家元首是国王,海陆空三军都属于国王统帅,所以三军分别称为皇家海军、皇家陆军和皇家空军。

在英国军舰的舰名前,常冠有 HMS 三个大写字母,意思是:女王陛下的舰船(Her Maie sty's ship)

中方海军总司令代表听了英方海军武官的话,感到特别难受,他无可奈何地向英方海军武官告辞后,匆匆赶回海军总部,向陈绍宽作了详细汇报。

陈绍宽将军 1889 年 9 月 13 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胪雷乡一



个农民家庭,自幼入私塾读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08年在南洋水师学堂毕业。1909年在“通济”练习舰见习,授海军少尉,1916年代“海容”舰舰长,赴日、美学习航海。1917年至1918年被派赴英国观战,1919年升任中国驻英使馆海军正武官兼海军留欧学生监督,授海军中校,并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海军专门委员、国际海道会议中国海军代表,而后任海军部部长。1935年授海军一级四星上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

从陈绍宽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他对海军的熟悉程度。

陈绍宽听完代表的汇报后,立即召开了会议,并请来了四五位自己信赖的高参。听完了诸位的发言后,他选中了“奥路勒”号舰长——邓兆祥。

陈绍宽之所以慧眼挑选邓兆祥为“奥路勒”号舰长,是因为他了解邓兆祥,信任他那不同寻常的航海经历。

邓兆祥第一次在英国学习期间,就在“厄利巴斯”练习舰、战斗舰、驱逐舰见习,而后又在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和朴茨斯海军学校学习鱼雷、航海、信号、枪炮等专业技术,后又分配在英国海军大西洋舰队、地中海舰队的战列舰实习。

同行们夸赞说:“邓兆祥可把舰船驾驶到全世界任何一个海港。”

陈绍宽还了解到:1931年盛夏,邓兆祥被分配到3万多吨的“决意”号舰上实习,一天,当舰船航行到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突然狂风大作,不一会儿就达到了11级。大风惹怒了大海,大海掀起了巨浪。航海人都知道,这是一种飓风,而飓风又是和恐怖连在一起的,航海的人提起飓风几乎没有不胆战心惊的。只见那排山



当时，“奥路勒”号舰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之一，能在这艘军舰上出任舰长，邓兆祥是多么地自豪和荣光！他仿佛看到了茫茫的大海上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幻想的重振中国海军的风帆将从这里扬起，中国海军的宏伟蓝图也将从“奥路勒”号上描绘。

1948年5月19日，在英国朴茨茅斯港码头举行了“重庆”号和“灵甫”号的交接仪式。前者是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一艘巡洋舰，后者是英国政府租借给国民党政府的一艘驱逐舰。英方交舰的代表是英国弗雷汉海军上将，朴茨茅斯市市长、基地司令及海军有关的军政大臣等；中方参加交接仪式的有驻英大使郑天锡和海陆空军官，此外，还有中外记者及华侨代表200余人，交接时，新任舰长邓兆祥、副长刘荣霖、协长林炳尧等军官就任。

交接后，双方代表登上二舰，检阅了两国海军仪仗队。

这时，有位两鬓斑白的英国老舰长，大步走到邓兆祥面前，深情地说：“邓兆祥先生，你们就要走了。几天来，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心里有许多话儿要和您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海军曾经侵犯过中国的领土，英国的炮弹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我希望今后中英两国人民别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邓兆祥紧紧搂住这位老舰长，说了一句：“让中英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这时，英国乐队奏起了英国国歌，军舰上英国国旗和英国海军军旗从桅杆上徐徐落下。接着乐队又奏起了中国“国歌”，悠扬动听的乐曲回荡在朴茨茅斯港，回荡在蓝天和碧海之间。在乐曲声中，中国“国旗”徐徐升上军舰桅杆。英国巡洋舰上的“H·M·S·MANDIP”被金黄色的铜铸大字“重庆”所取代。

这些天来，人们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重庆”号经过一周的



准备,油满水足,给养和弹药也都塞满了航舱。

5月26日,是“重庆”号启程回国的日子。

这一天,天空阴沉,四处飘飞着淡淡的薄雾。朴茨茅斯港人山人海。

突然,“重庆”号上咚!咚!咚!……响起了象征最高礼仪的21响礼炮。在震耳欲聋的礼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重庆”号启航了。邓兆祥深情地望着朴茨茅斯港,郑重地向送行的人们敬了个军礼。

“重庆”号旋桨飞舞,搅动着海水,犁开碧海,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邓兆祥站在蔚蓝色的海图前,不时地审视着航线。他深知指挥“重庆”号安全返回祖国的责任重大。

海水在舰下奔腾不息地翻滚着,邓兆祥双眸紧盯着海面,思绪也像海水一样奔涌着,他想到了自己曾被英国人“OK”的荣耀时刻。

1947年7月的一天,伊丽莎白陪同父亲英王乔治六世乘“阿罗娜”号舰去非洲访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王第一次出访非洲。邓兆祥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荣幸地接受了为他们护航的任务。启航前,英王和伊丽莎白首先接见了参加护航的全体海军官兵们。

当时,邓兆祥乘的是“王冠”号舰。这艘护航舰与其他五艘护航舰整齐地排成一字形,英王与伊丽莎白公主在随行将领的陪同下,站在“阿罗娜”号艇上,微笑着举手示礼,然后围绕着这六艘护航舰环行一圈。

邓兆祥精神抖擞地站在“王冠”号舰舷边,目睹英王和公主的



风采。

乔治六世身穿黑色礼服，双肩佩戴金黄色的礼带。站在他身旁的伊丽莎白长得非常美丽。她有着令人着迷的蓝色眼睛，雕塑般的下颚骨，肌肤细嫩。尤其是她身着一身洁白的海军女式服装，显得更加潇洒、俊美、富有魅力。

“呜——呜”随着码头上发出的汽笛声，出访的舰队启航了。浩浩荡荡的舰队驰骋在大海上。那海，犹如蓝色锦缎，轻柔的海风轻轻抖动着它，像绣上了数不尽的奇花异葩——这图案千姿百态，变幻无穷。海鸥翱翔在海天之间，一会儿掠过海面，一会儿又高高盘旋。

天有不测风云。不一会儿，震天动地的雷声滚过巍峨的浪峰。“皇冠”号高高挺起胸脯，劈风斩浪，奋力前进。船尾的英国海军军旗迎着疾风哗哗飘响。邓兆祥和英国水兵们头顶狂风，迎着飞溅的海水，雄赳赳地屹立在大洋上。

邓兆祥拂去满脸的水花，威武地站立在甲板上指挥着。

望着邓兆祥坚忍不拔、一副大海骑士的神态，英国水兵们伸出大拇指，齐声说道：“邓兆祥，OK！”

“皇冠”号和其他五条护航舰经过十多个日夜的航行，出色地完成了护航任务。邓兆祥伫立在甲板上，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脚下一望无际的大洋，为中国海军军官的风采而自豪。

“咚！咚！咚！”门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邓兆祥的思绪拉了回来，他定了定神，说了一声：“进来！”

进来的是值班副官：“报告舰长，英方派来一名联络官和六名轮机兵要上舰护航。”

“护航？”邓兆祥诧异地问：“为谁护航啊？”



副官回答：“说是为我们‘重庆’号护航！”

“噢。”邓兆祥应了一声。他心想，“重庆”号从现在起已经是中国舰了，英方这是什么意思？他对值班副官说：“英方讲没讲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值班副官支吾着：“说是为了保证沿途航行安全，保证军舰在航路上的补给和排除途中所出现的轮机故障。”

邓兆祥听着，心中明白了些什么：“英方对我们够‘关心’的了。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能把舰驾回祖国吗？”

他拿起本子，记录下英方上舰的几行字，然后又把海图往自己的胸前拉了一下，睁大眼睛继续审视着。

在舰艇业务部门领导会议上，邓兆祥向大伙讲了英国海军派联络官上舰一事。之后，他大声地说：“诸位，你们回去后，各部门都要教育好自己的部下，以大局为重，搞好团结，切实保障‘重庆’号平安地返回祖国。”

“重庆”号驶出英吉利海峡，进入比斯开湾。浩淼无垠的大海，迎接中华儿女的不是轻柔的海风，而是惊涛骇浪。海水伸手可及，狂暴的风撞击着船身，发出哗啦哗拉的吼声。庞大的舰体在浪谷里跃上跌下，大海在考验着中国水兵。

邓兆祥转身走到海图前，用他那双粗大的手指在图上轻轻一量，接着戴上眼镜，对着蔚蓝色的海图比划着：航行路线没问题！他饱经风霜的脸庞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不是一条平常的航线，它凝聚了邓兆祥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为了这条航线的平安，邓兆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翻阅了大量的世界航海资料，熬了六个日日夜夜才绘制出来。

邓兆祥审视着航线图，想到明代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曾在这



里留下过航迹。500多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历经沧桑,受尽了折磨和苦难。想到这里,邓兆祥感慨万千。

邓兆祥在值班副官的陪同下,手扶栏杆,朝后甲板走去,他想到各机舱了解一下水兵、军官的工作情况。

“邓舰长,有事要向您汇报。”一位胳膊上佩带“值更官”袖章的军官话音急促、声音高亢地向邓兆祥报告:“上舰来的六名英国轮机兵不守规矩,工作时间打牌、吸烟、喝酒。他们在舰上肆意浪费淡水,我们的水兵上去劝阻,他们当作耳旁风,粗暴野蛮的行为叫人无法原谅。”

邓兆祥一听心中十分他恼火,他告诉值更官:“你立刻去和白能吞联络官讲讲,让他出面去管管那些轮机兵。”

“是,舰长。”值更官转身离去。

邓兆祥望着值更官远去的身影,心想,英国人对中国人一向傲慢无礼。“重庆”号在离开英国后,他就预感到途中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果真,刚启航几天便发生了这种事情。如果现在不加以制止,那么,在往后一个月的航行时间里,将会出现更多的麻烦。

他思忖着,又气又烦,转过身回到舰长室,拿起烟斗,装上烟丝,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没过几天,“重庆”号航行到大西洋,老天考验中国海军的时刻到了。热带低压不断增强,风力由六级增加到八级,海面由中浪变成大浪,“重庆”号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涌浪里跃上跌下。

邓兆祥瞪大双眸注视着航海图,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重庆”号已进入大西洋了,大西洋气候复杂,海深浪高,它是世界第二大洋,“重庆”号如果在这里发生一点点故障,那将是十分



现在你乘坐的是中华民国的‘重庆’号巡洋舰，而不是英国的‘奥路勒’巡洋舰。”

白能吞听罢，轻蔑地瞅了邓兆祥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对不起，‘奥路勒’是我大英帝国赠送贵国的，我们有权指挥。”

邓兆祥面对这位“英国佬”的胡搅蛮缠，尽力使心情平静下来，他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说：“你们派一些轮机士上舰协助我们工作，我们感谢，可你们必须遵守舰规。否则，我们可就不欢迎了。”

联络官听后，脸色一下子变阴了，蛮横地带有威胁口吻说：“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护航，你们在航行中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要全力协助排除。如果你们认为没有我们保驾，照常可以驾舰回国，那么，我可以让轮机上下舰。可是，舰上一旦发生什么问题，一切后果由你方自己负责！”

邓兆祥对这次远航早已胸有成竹，他没有丝毫惧怕，愤然离开了联络官，向轮机舱走去。他听取了几位军官的意见，许多军官对于英国联络官的无理取闹十分愤怒，大多数人同意邓兆祥的意见：撤开英国人，独立自主地把“重庆”号开回祖国去！

这时，航海官牟秉钊悄声提醒邓兆祥：“邓舰长，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我们从英国海军那里学习了技术，如今咱们让英国轮机士下舰，英方会讲我们忘恩负义的。再说，他们如果下了舰，我们把‘重庆’号开回祖国也会惹来麻烦的，若海军总部知道了，定会处罚我们。”

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邓兆祥回答道：“我们去英国学习海军技术要遵守英国的法规，英国人在我们的舰上要遵守我国的法规，这是天经地义的，至于回国后的情况，我看不要顾虑那么多。天塌



下来,我顶着。”

众人向邓兆祥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邓兆祥又找到联络官白能吞,通报了“重庆号”由中国水兵自行驾驶回国的决定。

白能吞听后满面不悦,高傲地说:“你们既然认为自己能独自安全航行,但必须写出书面保证,以后航行中发生的一切,我皇家海军总部一概不负责任。”

邓兆祥欣然同意,立即挥笔写下了一份保证书,递给了白能吞。

白能吞原以为邓兆祥不敢负这个责,一看邓兆祥在保证书的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不由大吃一惊,他蓦地站起,向邓兆祥高声地说:“好!我让轮机士下舰,我看沿途用水、油、食物谁来为你们补给?”

邓兆祥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白能吞先生,你若真的想走,我们不挽留。”说罢,他转身大踏步来到舰长办公室,让传令兵叫来了报务兵,命令报务兵马上给南京海军总部发报:

南京海军总部:

随同“重庆”号前来的英方联络官白能吞和六位轮机士要求离舰返回,我们表示同意。但为了保证“重庆”号能顺利抵达祖国,我们希望联络官白能吞继续留下。但是,白能吞如坚持要离开,我们也有能力完成返回祖国的光荣使命。

邓兆祥

接着,邓兆祥又给英国伦敦海军总部起草了一份同样内容的电报。



“嘀嘀嗒，嘀嘀嗒——”悠扬悦耳的电报声，乘着飞速的电波，越过浩瀚的大洋，带着邓兆祥和中国 500 多名水兵的心愿，飞向了南京海军总部桂永清办公室和伦敦英国海军总部。

第二天，英国皇家海军总部电令英国驻科伦坡大使馆海军武官，待军舰到达科伦坡后，“重庆”号上的英方轮机七全部上岸，并指示联络官白能吞继续送“重庆”号到香港，然后回国。

南京海军总部回电，要求邓兆祥和全舰官兵团结好英方朋友。电报最后还特意加上了一句：希望邓兆祥不要辜负了英国朋友的一片良苦用心。

邓兆祥看过电文，把刚点燃的烟斗叭叭磕去，愤然长叹一声。

2. 建设中国海军的崇高理想，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破灭了

邓兆祥用他高超的航海技术，驾驶着“重庆”号，战胜了比斯开湾大浪、印度洋的惊涛和南海的狂风暴雨，于 1948 年 7 月 28 日安全抵达了祖国的南大门——香港。

邓兆祥伫立在甲板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展翼飞翔的海燕，思绪万千。

几天来，在香港这块土地上，邓兆祥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使他脸上布满了愁云。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让人眼花缭乱的夜总会、酒吧间、赌场、妓院里灯红酒绿，乐声靡靡。

香港的港湾内，停泊着插有英国国旗的舰队，有时也有美国的舰只经过。港湾南北两岸的码头或岸边，英、美、法的舰只比比皆



是。

内战的隆隆炮声,使他感到震惊、凄凉,悲伤,他望着茫茫的大海,暗暗思忖,难道“重庆”号要去打内战吗?不!不!绝不能这样做,那不是我的初衷!

邓兆祥无精打采地回到住舱,扭开电灯,翻开一张陈旧的小报,上面刊登了一则来自延安新华社的电讯:

……抗战八年,中国人民饱经战祸,多少善良的人们,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我们的国家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今天,总算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期待着发奋建设,重整山河,要求有起码的民主、自由,要求有最低的衣食住行保障,可是,蒋介石却镇压民主,破坏建设,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啊,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卷在内战的漩涡之中!

这几天,舰上也是人心不稳,很多人想离开“重庆”号,邓兆祥命令舰上各部门清点一下人员的外出归队情况。

邓兆祥坐在舰长室里等候汇报。

“邓舰长,我们枪炮部门有六人未回。”

“邓舰长,我们帆缆部门也有四人未归。”

“邓舰长,我们机电部门……”

“邓舰长,我们……”

邓兆祥最后一数,不由大吃一惊,竟有 30 多人没有归队。

面对这个现实,邓兆祥孤独地徘徊在甲板上,痛苦地思索着,一股股无名的惆怅涌上心头,此时,远航归来的他败兴至极。

邓兆祥望着舷窗外大风掀起的巨浪,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他记得,1945 年国共《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单方撕毁协定,蒋介石派兵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

海战将星邓兆祥



今天,当他风尘仆仆地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时,嗅到的不是祖国泥土的芬芳,而是呛人的内战硝烟;听到的不是田园牧歌,而是中华民族危亡的呻吟。

邓兆祥百感交集。在中华大地上,迎接他的是一场散发着血腥的内忧外患。

1948年8月13日,邓兆祥率领“重庆”号跨洲越洋历经79天,终于安全抵达了上海吴淞口。

“啊!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官兵们伫立在舰舷,面向上海,伸出了双臂,深情地向祖国母亲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呼唤。

邓兆祥第一眼看到上海时,心情异常激动,急切地向信号兵说:“发信号:‘重庆’号要求在外滩停泊。”

信号兵忙用熠熠闪亮的灯光,向海岸信号台发出了信号。

信号台回答:“‘重庆’号没有经过英国海军当局的批准,外滩不能停泊。”

信号兵一溜小跑,来到邓兆祥跟前,报告了回应的信号。

“真是岂有此理!中国的江面为什么只允许外国舰船停泊!”邓兆祥说着,把胸前的望远镜叭地往桌子上一放,颤抖地拿起烟斗大口大口地喷吐着浓浓的烟雾,只见他脸色发青,两眼冒火。他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港口为何不让停泊自己的军舰?上海的外滩,为什么成为英国军舰和花旗的世界?我国的军舰行动,为什么要由英国海军批准?

想到这一切,邓兆祥像有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心中。

“砰!砰!砰!”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进来!”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水密门轻轻地被推开,邓兆祥见值更官进来,问:“有事吗?”

值更官双手将电话记录本递上。

邓兆祥看完记录,惊讶地站起,命令道:“通知全体员兵在后甲板集合!”

“嘟嘟嘟——”紧急集合的哨声,划破了机舱的宁静。

不一会儿,队伍集合完毕。邓兆祥大踏步地走到队伍面前,亲切地笑了笑,说:“各位员兵,我们劈波斩浪,历尽艰险,今天终于胜利归来了!一会儿,海军桂永清总司令登舰来看望大家,下边,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邓兆祥的一席话干脆利落,员兵们“唰”地一声散去,回到各自的住舱,分头整理军容,身着礼服,个个忙前忙后,期待着桂永清总司令的莅临。

桂永清何许人也?许多员兵都非常陌生,但一些“老海军”对他还是比较熟悉的。桂永清老家是江西贵溪,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

他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对苏区的“围剿”,而后,去德国留学深造,学步兵专业。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总长、四十六师师长、二十七军军长。

对于陆军,桂永清还算是个行家,但是对于海军,他却是“一窍不通”。但是,他又是怎样当上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呢?

中国海军自民国以来,派系林立,政出多门,既有马尾系,也有东北系,还有1932年蒋介石欲分权海军,在江苏江阴成立的电雷学校的电雷系。

蒋介石有心扶持电雷系,可惜,这些学生因抗战缘故只招了二期,而且时间都较短,他们对海军知识的了解和掌握都很肤浅。



鉴于此种情况,蒋介石苦思冥想,最后拍板敲定,先让自己的心腹陈诚参谋总长兼任,时间不长,东北战事吃紧,蒋介石为挽“狂澜”,毅然决定把陈诚调往东北,海军代总司令的“桂冠”便落到了桂永清的头上。

桂永清任职期间拉帮结派,打击马尾派,扶持电雷派,此外还调来了大批陆军“干战团”亲信,建立了特工组。

由于桂永清对海军一窍不通,在训练中又一意孤行,所以惹出了不少笑话,还造成了重大事故。

英国曾送给国民党海军一艘战舰,桂永清无端地把舰长撤换,水兵下调一半,换成了新兵。并扬言说:“我在陆军时就常这样调换部队,效果不错。”

结果在一次航行中,这艘舰由于操纵驾驶错误,与一艘商船相撞,葬身于大海,发生了航海史上罕见的惨剧。

“重庆”号上,员兵们整齐列队,焦急地等待着桂永清的到来。

晴朗的天空被几朵乌云遮住了,徐徐的海风摇晃着庞大的舰身,人们不停地朝码头方向张望,呈现在眼前的只是朵朵白色的浪花和江面上几只孤单的小帆船。

“邓舰长,总部来电说,桂总司令来了!”机要员向邓兆祥报告。紧接着,信号兵跑到邓兆祥面前报告说:“报告舰长,桂总司令来了!”

顿时,员兵们的目光一齐转向了海面。

眨眼工夫,桂永清乘坐的小汽艇靠上了“重庆”号,桂总司令在海军参谋长周宪章的陪同下,在警卫员的搀扶下,登上了甲板。

邓兆祥以标准的军人姿势向桂永清报告:“报告总司令,‘重庆’号全体员兵胜利归来,热烈欢迎总司令亲临指导!”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桂永清摘下白手套,和邓兆祥握了握手,说:“邓舰长,你们辛苦了!”说完他笑了笑,向列队的员兵们挥动着手臂,沉默了片刻。

邓兆祥从桂永清那张脸上已经预感到,今天桂总司令会给自己点颜色看看。

邓兆祥看着整齐的水兵队列对桂永清说:“请总司令做指示。”

桂永清点点头,脸上堆满了笑容,说:“诸位,你们告别了亲人,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两年之久,你们辛苦了!在这期间,我们海军总部的各级长官对你们非常关心。今天你们凯旋归来,我代表海军总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转达蒋总统对你们的问候!”

一阵掌声之后,桂永清立即换了一副面孔,瞪了邓兆祥一眼,便劈头盖脸地训斥起来:“邓兆祥,你的翅膀硬了,刚学了一点本事就忘恩负义了,把老朋友都忘了?你真能干得出来,硬是撵走了护航保驾的英国朋友们!”说罢转身离开了。

对桂永清的无理,邓兆祥只是无言地听着,然后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舰长室。

几天来,桂永清变着法子找邓兆祥的麻烦。邓兆祥预感到,自己将会有不祥之事。

邓兆祥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早已心怀不满,这次驾“重庆”号归国后,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一些情况,他经常到马路边的报童那里购买一些刊登时局政况的小报,拿回舰上偷偷阅读。

有一次,舰上放假,邓兆祥在外滩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女报童,迎着刺骨的寒风,高喊道:“卖报,卖报!最新消息,解放军给国民党兵送饭……”

邓兆祥站在小姑娘面前,说:“小姑娘,给我一张。”

小女孩取出一张,递给了邓兆祥。



邓兆祥拿起报纸浏览了一番,没有发现小姑娘呼喊的那些内容。于是,他问道:“怎么这报上没有你讲的事情呢?”

小姑娘警惕地望了望邓兆祥,然后从报袋底下又抽出一张报递给他,便一溜烟跑开了。

原来,这个卖报的小姑娘,不愿把刊登解放军、共产党的事情的报纸卖给国民党海军长官,怕惹麻烦。

邓兆祥手握报纸,匆匆赶回舰上,把门一关,仔细阅读起来。

他觉得,许多文章说出了他欲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他读着,感到格外亲切,心中好像点燃了一盏明灯。报上文章虽然短小,可字里行间洋溢着和煦的阳光,温暖着他那颗冰冷的心。

特别是他在报上看到,1948年的除夕,中原战场上,国民党的20多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啼饥号寒,处于四面楚歌之中,身边米无一粒,柴无一捆,个个抱头绝望。而解放军宁愿自己忍饥挨饿,把热腾腾的大馒头摆好,邀请他们一起来联欢,还把仅有的一点粮食也送给了国民党兵。解放军的这一行动深深感动了卧在战壕里的国民党士兵……

夜深了,邓兆祥毫无睡意,面对报上刊出的条条消息,一个又一个问号使他再度陷入苦闷之中。

回国后,桂永清把他视为“异己”,让他仍在“重庆”号上干,那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亲信。他不愿再受窝囊气,他想解甲归田,当一名平民百姓,过个太平的日子。

邓兆祥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暗暗地问自己:难道我就这样悄然离开海军,离开“重庆”号吗?他又想起青年时代自己为捍卫万里海疆而立下的雄心壮志,想到了两次去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艰苦历程,又想到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海军的历史,他从迷茫



中惊醒了!

大海啊!我热爱你,我一生一世也不能离开你!

邓兆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天快亮才打了个盹。在睡梦中,他变成了一只迎风搏浪的矫健海燕,在蓝天、在大海上自由飞翔。他在甜甜的梦乡里舒心地笑了。

翌日,邓兆祥从沉睡中醒来,推窗远眺,天空阴云密布,混浊的江水翻腾不已,锚泊的“重庆”号在激流中跳上跳下,似乎要挣脱岸边的缆柱,游向自由的海洋,游向梦寐以求的理想彼岸。

邓兆祥焦急地期盼着梦中的一幕!

其实,邓兆祥并不明白,桂永清的倒行逆施还有他更大的企图。

1948年10月的一天,桂永清派其参谋长周宪章上舰,命令“重庆”号立即北上。周宪章封锁了消息,水兵们谁也不知道这一去要到什么地方。待“重庆”号划破黄浦江水面,改变航向向北驶去,人们开始猜测:是去青岛?

看方向像。但舰驶到青岛外海域后仍在全速向北驶去。航行到渤海海面时,军舰突然减速、转向,缓缓地驶进了天津塘沽港。

中午时分,周宪章命令邓兆祥:通知舰上仪仗队和乐队,做好迎接宾客的准备。

下午3时许,海面上一艘灰色的小驳船向“重庆”号徐徐驶来。

小驳船快要靠近“重庆”号时,舰值更官把一个铁舷梯放在舷边,待驳船靠近,从小船上爬出几个便衣武装人员首先登上了舰台,紧接着,七八个军官前后左右护卫着一个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长袍、外披一件黑色大氅的老头登上了舰。

原来是蒋介石来了。



“总统,请!”

“立正——敬礼!”

军官行举手礼,士兵持枪注目

蒋介石挥动了一下手臂,毫无表情地点点头

尾随在蒋介石身后的有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还有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等高级将领。

桂永清下令,后甲板戒严,舰上的军官、士兵不得随意走动。

蒋介石上舰后,在桂永清等人的侍卫下,直奔上层甲板,住进了该舰最佳位置:司令走廊住舱。

10月6日,“重庆”号白塘沽北上,夕阳落山时,到达葫芦岛。

夜幕降临,天空闪烁着几颗稀疏的星,远处高耸的灯塔闪烁着惨淡的光,幽静的海面显得异常恐怖。

蒋介石斜坐在沙发上,双手托腮,闭目沉思。他在考虑今天晚上在“重庆”号上要召开的“沈阳战区高级军事会议”。

“重庆”号会议室里,墙上挂着一张桌面大小的军事地图和蒋介石身着戎装的标准像。这次会议关系到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乃至全国战场大决战的命运。因此,气氛显得特别紧张。

先后到会的有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范汉杰,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蒋介石一走进会议室,唰!与会者立刻起来,齐刷刷地向他郑重地敬礼。

“请坐!”蒋介石环视了一下四周,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一边脱掉白色手套一边说:“今晚我叫诸位到这里聚会,主要是想告诉你们,目前东北战局很严峻,共军已从四面八方云集在锦州战场,妄图把我驻守在沈阳、锦西的部队扼杀在东北,尤其是卫立煌总司令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和范汉杰副总司令,第九兵团廖耀湘司令官的部队更是共军的目标。针对这种情况,这次会我要听听诸位的高见。”

与会的各位高级将领几乎都发了言。

会上,蒋介石指着墙上挂的东北作战图,亲自布置了作战方针和要求:“这次东北之战,关系到党国存亡,诸位务必全力以赴,不负众望。要坚决打退共军的进攻,彻底消灭他们。这次战役的胜利全靠在座的诸位将领了……我们要把不利的战局扭转过来,首先必须打通葫芦岛至锦州的通路……”

蒋介石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势之后,作了如下部署:由沈阳出重兵向锦州靠拢,在葫芦岛方面,派 11 个师登陆,再调动 20 多艘运输舰,以解锦州之围。

会议延续到第二天黎明,海面上升起一片淡淡的霞光。

蒋介石起身,准备走出会议室,到会的各位将领整齐地站起来,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突然,蒋介石转身对站在身旁的桂永清厉声道:“你要坐镇‘重庆’号,重炮朝共军的塔山、高桥阵地猛烈射击!”

大家听了猛然一愣,但谁也没吭声。

接着,蒋介石又说:“我们有陆海空军,我们还有‘重庆’号嘛!桂永清你要亲自指挥‘重庆’号!”

桂永清受宠若惊,又躬腰又点头,急忙回答:“是,我懂。总裁,卑职一定从命,不成功便成仁!”桂永清慷慨激昂地表着忠心。

蒋介石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又用阴沉的目光扫了一下其他将领们,最后冒出了一句:“我在南京等待诸位的胜利消息!”说完,在桂永清的搀扶下,缓缓步入上层甲板的司令住舱。

第二天上午,“重庆”号官兵列队站在甲板上,送蒋介石离舰。



“放——”他咬牙切齿地下了命令。

短短几个小时，“重庆”号就把 3100 多发炮弹倾泻在塔山阵地上。

炮弹，在塔山阵地燃起冲天火光，在水面上搅起了冲天大浪。

已经被剥夺了指挥权的“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站在后甲板上，面对这情景，他的心在流血，眼前，似乎无数的父老乡亲在向他哭啼，大海也在怒斥他这个不孝的儿子。

邓兆祥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想，多少年来，自己两次赴英国皇家海军学习，做梦都盼望能为国家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以报效祖国，而今却成了泡影。现在用自己手中的大炮打自己的同胞，这比割自己身上的肉都要难过！

他端起望远镜，呈现在眼帘里的塔山、高桥是一片废墟。有的工事被摧毁，有的村庄在燃烧，人们在熊熊烈火中挣扎。

邓兆祥站在甲板上，脸色铁青，极力克制着揪心撕肺的悲痛，他又掏出烟斗，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另一处，桂永清端着望远镜还在一个劲儿狂喊：“打得好，狠狠地打！狠狠地打！”

看着上司得意忘形的样子，邓兆祥非常气愤，但是，桂永清坐镇“重庆”号后，把邓兆祥晾在了一边，大权独揽，包办一切。此时此刻，邓兆祥虽然气愤，却不能下令“停射”。怎么办？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走到桂永清身边，小声说：“桂总，炮膛已打热了，再打下去怕要出故障，还是停一会儿吧！”

桂永清半信半疑。他走到一个炮位前，伸手一摸，果然灼热烫人。无奈，这才暂停发射。

谁知刚停了一会儿，桂永清再次下达了炮击的命令：“开炮，继



续开炮！”

邓兆祥望着岸边渔村解放军阵地上燃起的硝烟烈火，心急如焚。有几位水兵望着呼啸飞去的炮弹，也暗暗流下了眼泪。他知道，这几位水兵的家乡就在这一地区，那里住着他们的亲人。是啊，用自己的双手杀害自己的亲人，士兵们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呀！几十年来，他梦寐以求的是实现海军的“船坚炮利”和国家的独立富强。半个世纪过去了，看到的却是失望：慈禧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蒋介石用海军去打自己的父老乡亲。祖国的海疆，有海无防。外国的洋枪洋炮堵上门来欺侮我们，肆意在祖国的海域上横行……

隆隆炮声震荡着邓兆祥的心灵，也在呼唤着邓兆祥的良知。

本来，蒋介石把扭转东北战场败局的最后希望，放在了打通葫芦岛至锦州的通道上。调兵遣将，妄图摆脱人民解放军的围困。然而，计划成了泡影，锦州解围不但没有完成，解放军还将廖耀湘的 11 个师与 3 个骑兵旅全部消灭在黑山。同时，缴获了停泊在葫芦岛的 20 多艘运输舰和大批商船。从台湾调来的 11 个师在葫芦岛登陆以后，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被阻挫在塔山、高桥一带。

塔山、高桥的国民党残兵被歼灭后，“重庆”号又去营口港外，掩护国民党军从沈阳突围。

辽沈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

东北“剿共副总司令”杜聿明一面指挥残余部队撤离，一面布置破坏锦西、葫芦岛设施。“重庆”号从营口返回葫芦岛以后，桂永清为了将码头设施全部破坏，命令部队将大量的 TNT 炸药堆放在码头上，待最后一艘舰船驶离后，用舰炮轰击码头引爆炸药。由于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桂永清本人提前乘“重庆”号走了，解放军又进展神速，TNT炸药来不及引爆，葫芦岛码头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重庆”号在一路向南撤退航行中，不断对沿海解放区的城镇、村庄实施炮轰、打射，洗劫海上渔民帆船、货船。

航行中，“重庆”号接到掩护一部分蒋军从海上撤退的命令。

一路上，桂永清坐镇“重庆”号，在舰上制定了许多制度，为防止解放军的胜利消息传到舰上，他下令对士兵往来的信件实行严格检查，拆封过目，分别处理。

“重庆”号回到了上海，士兵们在上海看到的是一片民不聊生的凄冷情景。很多有着一腔爱国热血的年轻水兵在内战隆隆的炮火硝烟中惊醒了，殷切地渴望着一个自由的新天地的到来。

这些天来，邓兆祥不论是走在上海街头，还是回到舰上的官兵中间，听到的见到的都是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物价飞涨、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消息，以及外国士兵专横跋扈、奸淫掠夺，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民主爱国人士惨遭杀害的事件。

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呻吟、挣扎。

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邓兆祥非常苦恼，他在心中默默发问：中国海军的前途在哪里，希望在哪里，光明又在哪里？

这天是星期天，舰上放假，不少官兵请假上了街。

中午，一位上岸归来的军官，急匆匆地来到邓兆祥的住舱，悄悄对他说：“邓舰长，我们几个人在酒馆吃饭，听一位在海军总部任参谋的好友说，桂永清要撤掉你的职务，据说命令马上就要宣布。”

邓兆祥听罢，点了点头。他从衣袋里掏出烟斗，巴嗒巴嗒地吸起来。从他的神情上看，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出奇的冷静。桂永清早已把他视为“异己”，只不过眼下还离不开他，仍让他维持着



这个局面。出乎他意料的是，撤他的职竞会来得这么快！

从第二次归国后，邓兆祥对舰长这个职务就已经厌倦了，他总想寻找机会，正式向桂永清提出辞呈。

邓兆祥又想，现在向桂永清提出退出海军，比登天都难，如果私自溜之大吉，那后果不堪设想：桂永清不用他了，很可能总部要调他去台湾或澎湖列岛，那就更糟了。

于是，邓兆祥决定，向桂永清请“长假”。他连夜疾书，写出了变相脱离开海军的报告。第二天，就将报告交上。

桂永清总司令：

我和“重庆”号的兄弟们从英国归来后就参加了东北之战。在这次战斗中，据不完全统计，逃跑的官兵就有200余人。我作为一舰之长，带兵无方，不能胜任，请另选高明。

另外，我离家已数年，妻子儿女生活实属困难，请求归乡，长期休假。

请予以考虑。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

1949年×月×日

报告交上后的一连几天里，邓兆祥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一个名叫何遂的人，他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派来做邓兆祥的工作的，他对邓兆祥说：“邓兆祥呀，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爱国志士来完成，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殷切期待着你早日投向人民的怀抱！”

邓兆祥记得离沪去葫芦岛执行接送蒋介石的任务时，他抽空到好友、时任国民党海军杂志《中国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那里



告别,郭寿生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老地下党员。两个人一起喝起闷酒,邓兆祥一杯接一杯地饮。郭寿生一把抢过酒杯,劝说道:“老弟,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但是,你也不能喝得太多呀!”

邓兆祥说:“老兄,今天咱们哥俩喝的是辞行酒,往后这种机会不会太多了。酒后吐忠言,让我们彼此祝福吧!”

郭寿生忙拉过邓兆祥的手,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好自为之,向北开!”

邓兆祥听了,眼睛忽然一亮,嘴巴也抽动了几下,默默无语。分别时,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郭寿生站在门口凝视着邓兆祥的身影,直到他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3. 伴随着“重庆”号的最后航程,邓兆祥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向何处去?此时“重庆”号已经有200多人开小差,许多进步官兵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地下组织积极策动和中共政策感召下,于1948年底和1949年初先后秘密串连,开始酝酿准备起义。

开始,由一二人、二三人个别串联,到三五人小组互相联络结合,逐渐形成了两个大的秘密策划起义组织。一个是由王颐楨、毕重远、陈鸿源、武定国、洪进先、张启钰等6人为首的起义组织,他们最早萌生起义念头,然后分别在自己的同乡、同学和好友中联络感情,交流思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各自发展了几个小组。2月,他们发展组织了“重庆号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放委员



“重庆”号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加紧地进行。27名起义骨干定于晚上在起义人员的秘密集结点——281雷达室召开紧急会议。

守在门口的士兵，警惕地检查着每一位来这里开会的人。十几分钟后，281室挤满了人。因为平时都是单线联系，进来之后大伙才恍然大悟，他们有的平时彼此就认识，有的还是多年的知心朋友，今天为了寻求自由和光明而走到了一起，个个都很兴奋和激动。

与会者情绪高昂、精神饱满，他们畅所欲言，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会上，武定国和王颐桢提议给起义组织起个名称。起初考虑叫“非常行动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但感到都不是太确切。

武定国突然想起共产党那边叫“解放区”，建议是否就叫“解放委员会”。

王颐桢接上补充说：“咱们起义的组成人员都是士兵，应明确是士兵解放，就叫‘士兵解放委员会’”。

武定国又对大伙重复了一遍：“我们起义的组织名称就叫‘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名字无所谓，只要能表达这个起义组织就行。咱们来开会的兄弟，最高军衔是上士，最低是上等兵，当官的一个没有，这是我们‘重庆’号士兵为渴望自由、民主而成立的自己的组织。‘士兵解放委员会’反映了我们的心愿，就这样定下来吧！”

在这里秘密开会的进步士兵们，谁也不知道和他们同步进行秘密策反的还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两个组织互不知情，有的地下党员就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组织成员。

“士兵解放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毕重远是天津人，曾在南京读书，1945年上中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南京市委的地下



党员。1946年考入国民党海军赴英潜艇训练班,经党组织同意赴英学习,1948年接受“重庆”舰回国任枪炮下士。

‘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另一组织者张启钰,人称“宣传部长”,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转中华大学经济系毕业。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负责中共四川省眉山县委领导工作。1945年夏考入国民党海军后出国接舰,起义前是“重庆”号舰轮机下士。

会上,张启钰就曾提议‘士兵解放委员会’和舰上的共产党地下起义组织拧在一起干,但是有的人怕不可靠,为了稳妥,决定暂不联合。

毕重远最焦急的是和南京的地下党尽快取得联系,他要向党组织汇报“重庆”号的现状,并听取指示,以便使起义工作能顺利进行。一天早晨,他站在甲板上,忽然身后有人叫他:“小毕,你的信!”毕重远急忙转身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上边有“南京市五中校友会李斌”的字样,噢,他惊喜得几乎要跳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太好了,我早就盼望老朋友的来信了!”

毕重远疾步如飞地走到炮塔前,打开信,信是这样写的:

重远同学:

匆匆别后,未及细谈,甚念。现在母校校友会在沪并无校友,只好由母校南京校友会的一位干事胡玉民同学来信将南京校友会的情形告诉你,并且希望你再回南京时,常来母校玩玩谈谈,报告一些在英国的生活情形和海上生活的滋味。若有空的话,将它写成几篇通讯寄来,刊入校友会的月刊中,使大家分尝一点海上滋味。

再会! 敬祝健康



胡玉民听后点头说道：“噢，既然‘重庆’号有这样大的威力，海上俘获确实困难不少。你在‘重庆’号上要随时掌握士兵的思想动向，采取各种方式，把官兵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并设法随时报告‘重庆’号的行踪。”

最后二人商定：第一，根据“重庆”号海上活动特点，毕重远的党组织关系仍留在南京；第二，为了使组织和毕重远取得联系，确定以如意里33号为联络点；第三，为便于联系，给毕重远在党内起名为王健。

此后，毕重远便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在“重庆”舰上积极开展工作。他发现舰上的图书馆是个宣传革命思想、推荐进步书籍的好地方，便千方百计地争着当上了图书馆管理员，利用士兵们来借书的机会，从借书人中选择“目标”，积极发展参加起义的进步士兵。

“重庆”号停泊在上海吴淞口。舰上，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陆续涌现。少尉轮机官蒋树德同舰上的雷达少尉莫香传、枪炮少尉曾福祥，也在悄悄酝酿，准备在“重庆”号上举行起义。

莫香传是首批赴英接舰人员，他到达英国以后，在皇家海军格拉斯哥雷达专科学校学习，而后留任教练。曾祥福在英一直担任枪炮教练，他们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早就仇恨在心，在英国学习期间，曾多次组织士兵掀起反抗中英海军当局的斗争。

蒋树德想，组织“重庆”号起义，一定要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来领导，得到地下党的支持。

曾祥福和莫香传看出了蒋树德的心思，问：“蒋树德，你对我们武装起义有什么想法？”

蒋树德开门见山，把想得到地下党支持的想法一古脑儿地向他俩端了出来。“上海这么大，要找到地下党，那可真是大海捞针



啊！”曾祥福、莫香传说。“要说难，那真是难于上青天。要说容易，也容易。”蒋树德说，“咱们不妨去找一下王淇，他可能有办法找到地下党。”

说起王淇，曾祥福、莫香传都了解他。王淇是“伏波”号炮舰上的少尉雷达官，性格倔强，在英学习期间曾多次受过处罚，回国后也多次被关押。他的关系较多，路子广。

为了使“重庆”号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他们议定由蒋树德到南京去找王淇。蒋树德到了南京，很快找到了住在南京汉口路的王淇家。老同事一见面备感亲切，蒋树德把“重庆”号回上海后一些官兵向往光明、酝酿起义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同时，他也急切地告诉王淇：“现在我们就像没了娘的孩子，渴望早日找到地下党，让他们来领导‘重庆’号进步官兵的起义。”

王淇听了蒋树德的一番话，激动地说：“我也早就盼望这一天了，你今天讲的‘重庆’号起义，这个行动太好了。你快说，需要我做什么？”稍稍停顿了一下，王淇又接着说：“现在，全国的形势很好，东北已解放，北京、上海、南京各大城市的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你马上回‘重庆’号，把起义骨下的思想工作做细，把起义的事宜安排妥当。南京的工作由我做。我立即和我弟弟王毅刚（中共地下党员）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会设法迅速和你联系的。”

蒋树德带着王淇的期望和嘱托，赶回了“重庆”号。

王淇送走蒋树德，立刻找弟弟谈了蒋树德专程来南京找地下党的事。王毅刚认真地说：“大哥，我这就去联系，一旦有情况，马上和你通气。”

王淇点点头。从此，王淇成了“重庆”号起义的联络员。

此后，王毅刚又向王淇引见了地下党派来的史永同志。王淇



很容易耽误。因此,‘重庆’号上活动由上海方面负责比较方便。”

这样,王淇的关系由南京转到了上海地下党。

王淇又汇报说:“船上几个人仍主张在岸上买枪偷偷运上舰。”

陈修良耐心地解释:“你们舰上肯定会有很多武器,我们要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

陈修良感到“重庆”号起义是件大事,又对王淇强调说:“你们在组织起义时,要注意政策。为了保证军舰安全抵达解放区,必须竭尽全力争取舰长和有技术的人,包括士兵和军官,让他们都站到我們这边来。你们最好在近期拿出个关于起义的具体计划来。”

后来,王淇、蒋树德等人经过酝酿讨论,由莫香传起草了一个起义计划,主要内容有十条:

- (一)起义前的组织以士兵为主,军官做顾问;
- (二)起义时对军官的处理;
- (三)发表告全舰官兵书;
- (四)如何与解放区取得联系;
- (五)如何向国民党海军谎报舰位;
- (六)到解放区后进何港口,沿途如何防空;
- (七)航行中的作战部署;
- (八)舰上要害部门部署可靠人员掌握;
- (九)路遇国民党海军如何处理;
- (十)要求解决留岸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问题。

起义计划很快送给了地下党。

王淇按事先约好的联络点,来到法国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同陈修良见了面。陈修良欣喜地说:“你们送来的起义计划我们研究了,感到还不错。但由于情况千变万化,所以我们考虑,一旦情



况突然变化,你们可根据具体情况当机立断,提前起义。”

陈修良说到这里,满脸笑容,她沉思了一下说:“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毛主席会很快得到消息,我们会马上通知北方沿海解放区港口做好迎接工作。”陈修良又告诉王淇,今后由上海地下党派人同他们联系,联络地点在上海霞飞路国泰电影院附近的咖啡馆。

起义时间日渐逼近,武器已是夺取起义成功的关键。毕重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着如何搞到舰上的武器。武器全部放在“司令走廊”——军舰的指挥中心处,这里防备严密,旁边舱室分别住着舰长、副长和军需长等舰上的重要人物,昼夜 24 小时都有人值勤,副长、协长、枪炮长经常来此处检查,无关人员绝对不能随意来这里。

幸好毕重远是个枪炮兵,他以甲板清洁班长的身份为掩护,多次到司令走廊窥测,侦察武器存放的位置和数量。

一次,毕重远去司令走廊打扫卫生,惊喜地发现舰长卧室外铁丝网柜里放着一排锃亮的左轮手枪,他悉心一数,不多不少整 30 支,他又看到墙上挂着 4 支冲锋枪。毕重远把这一发现及时告诉了‘解委会’的几个人,大家都欣喜若狂。

“枪里有子弹吗?”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对啊,枪里有子弹吗?毕重远被这一问题难住了。

几天后,毕重远再次以整理卫生为名,又一次来到了司令走廊,他看到除了武器,地下还放着几只箱子,一般是枪离不开子弹,难道箱子里放了子弹?他用脚踢了几下,纹丝不动,又弯腰搬了搬,很重!毕重远环视四周,见没什么动静,伸手欲开箱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又忙用抹布擦拭柜子,骗过了值更军官。



木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子弹？毕重远下决心一定想办法将木箱内的秘密揭开。

开始，他打算在起义那天组织人马强夺，又想，万一木箱内没有子弹，那不就糟糕了吗？弄不好会贻误了起义时机。

毕重远想，还是以智取为上。

按舰上的规定，担任舰厨值更的士兵才有机会到司令走廊，而担任舰厨值更官又必须是舱面的枪炮兵和帆缆兵，而“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只有陈鸿源和毕重远符合这一条件。加上自“重庆”号从葫芦岛回上海后，不少人开了小差，值更人员更是缺少，在司令走廊值班既频繁又辛苦，一般人不愿去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差事。毕重远就在如何打进舰值更上动起了脑筋。

值更上兵吴德周映入了毕重远的眼帘，对，就从他身上作文章！

一天，吴德周到图书室借书，毕重远问他：“吴德周，你今天怎么没上岸玩玩啊！”

吴德周扫兴地说：“值更忙得团团转，哪有闲时间啊！”

毕重远又接上说：“你不愿干值更，我替你去。”

“当真？”吴德周吃惊地说。

毕重远拉住吴德周的手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吴德周欣然答应，毕重远喜上眉梢。但真正调换的话，还得由副长办公室负责安排值更的军士长汤博文同意才能决定。

汤博文入伍前是名大学生，是第一批去英国学习的，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毕重远曾为汤博文干过勤务工作，两人又同是北京人，“重庆”号在离开英国的前夕，汤博文分配到“重庆”号，两人交往很多，听说舰值更由汤博文安排，毕重远心中暗喜。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事隔一天,吴德周约毕重远一块来到汤博文办公室,汤博文见到毕重远便很热情地起身让座,问道:“你俩有事吗?”

两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毕重远向吴德周使了个眼色,说:“你向汤军士说说吧!”

吴德周一五一十地向汤博文叙说了自己如何愿意调换舰值更的事,列举了长期值更次数太勤,不能登岸,一旦失职就会受到处罚等理由,因而要求汤博文帮他调换一下位置。

汤博文听后,问吴德周:“你值更既然困难这么多,那谁愿意来干?”

吴德周连忙说:“小毕愿意和我调换,我俩都说好了。”

汤博文扭头问毕重远:“小毕,你同意调换吗?”

毕重远点点头,说:“吴德周向我提出来了,再说,我这个人不愿到处玩,我就答应了。”

汤博文听罢,深思了一会儿,对吴德周说:“你要把舰值更的职责、注意事项好好向毕重远交待清楚!”

毕重远和吴德周的调换成功了。从此,毕重远领取了一张合法到司令走廊的通行证,他可以畅通无阻地活动在司令走廊。他利用自己合法的身分摸清了开枪弹柜架的钥匙,并把钥匙号码记在心里。由于取玻璃柜的钥匙必须由协长或枪炮长批准,这些地方的钥匙又都套在一个铝制的圆形盘上。因此,要想开枪柜,还必须熟记铝制圆盘的号码,只有这号码和柜子上的标号相吻合才能打开。毕重远一一都记在了心里。

1949年2月17日晚6点,毕重远值班。刚接班,就接到“重庆”号启航的命令。傍晚,“重庆”号驶到高桥镇抛锚,值更官下令要舰上加强警戒,吩咐从司令走廊的柜子取枪和子弹。正在值更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准备起义的上兵们伫立在甲板上，望着两岸的农舍、田野，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当“重庆”号驶到上海外滩白渡桥时，岸上挤满了观看的人群，人们向“重庆”号投去了鄙视的目光。人们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月以前，就是这艘“重庆”号，在葫芦岛用大炮轰击了塔山的解放军和人民群众。

今天，“重庆”号又出现在这里，是去台湾？还是去青岛？要不就是去江阴阻挡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

毕重远和陈鸿源踮起脚尖，向岸上的人们眺望，毕重远悄声对陈鸿源说：“喂，岸上的老百姓能想到我们要起义吗？”

陈鸿源轻轻拍了一下毕重远的肩膀，说：“也许老百姓还认为我们是逃跑呐！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即将要驶向光明，他们一定会为我们祝福的。”

不一会儿，“重庆”号驶出了黄埔江口，在吴淞口随着一声巨响，偌大的两个铁锚，抛向了东流的大江，粗大的铁环把庞大的舰体牢固地扎在了江底。

“重庆”号不是去青岛执行拖船坞的任务吗？怎么一下子在这里抛锚了？难道去青岛的任务有了变化？官兵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去青岛执行任务没变。说不定明天就起程了。”有的说：“咱舰上装了几十万块银元，说不准要去台湾了。”还有的说：“现在人民解放军紧逼江北，战事紧张，看样子有可能把‘重庆’号开往江阴地区阻击人民解放军渡江啊！”

针对这种变化，“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十几个人立即来到了281雷达室，分析情况，商量对策。他们感到情况有些变化，眼下，最要紧的是搞清“重庆”号的动向。



2月19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恰好,这两名引水员是武定国的老熟人。武定国急忙跑上去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问道:“我们去青岛拖船坞的任务改变了吗?”

两位引水员说:“那任务交给‘峨嵋’号了,你们的任务是去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武定国一听,心里不由得一惊,他转身飞跑到王颐桢处,告诉他“重庆”号要去江阴的消息。

就在这时,一艘中型小驳船嘟嘟地驶向“重庆”号,十几个士兵在值更官的吆喝指挥下,七手八脚地忙活了起来。油管、水管和炮弹一齐呼呼啦啦地往“重庆”号上装。无疑,“重庆”号一定是要去江阴阻击人民解放军渡江了。

晚上,“士兵解放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又来到了281雷达室。

这次参加会议的有毕重远、陈鸿源、武定国、王颐桢、张启铎、王元方、刘懋忠、李铁羽、王洛、睦世达、于家欣、赵家堂、孙西昌等人。

会上临时决定把航行中起义改成停泊中起义。大家认为,“重庆”号去江阴后再起义困难重重:由于长江航道狭窄,沿江两岸炮台、信号台密集,很容易被敌人发现;起义后,“重庆”号想在长江里调头也很困难。考虑再三,只有在吴淞口停泊状态起义为上策。

而后,对起义的分工又作了细致的安排。平时,主机发动必须由舰长下命令。张启铎、王元方、刘懋忠三人认为到时候只有制造开船的假命令,才能保证既发动了主机又让舰艇可以随时启航。大家听了一致赞成。

随后又详细周密地安排了起义程序:

1. 启动电罗经;



2. 发动起锚机；
3. 绘制去烟台的海图；
4. 控制无线电话和切断电路等。

为了防止起义计划被泄露，“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委员们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决定：2月25日1时30分发动起义。因为这天午夜司令走廊的值更和上甲板哨兵带更的都是“解委会”的成员，所以这是举行起义最好的时机。

2月24日晚9点，舱外春寒料峭。这时，281雷达室里，小方凳排列整齐，几个茶杯放在桌子上，一副扑克牌散落在桌面上，门口地上的电炉正红，上面放着一个铝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正煮着满满一锅猪蹄。外表看，他们刚刚玩完扑克，正等着吃猪蹄呢！其实，此刻“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正在举行秘密会议。毕重远在会上提出：选举两个领导人，便于起义后的统一指挥。

因为大家刚结合不久，有些人彼此不太了解，怕选不好引起内部不和和纠纷。

最后确定选举王颐楨和武定国为联络员。王颐楨接受大家委托，宣布了起义行动计划，甲板、舰尾、军官舱等几个要害部位都布置了固定哨、流动哨。在上甲板司令走廊和舰尾军官住舱、通往士兵的通道、走廊楼梯口都派了联络哨。

在发动起义之前，轮机部门的委员张启钰和王元方分工起草两个“通告”，即《告全舰同学书》和《告海员技工书》，并将“通告”印制成了传单。

方案确定以后，起义者们个个热血沸腾，只等时间一到，便立即行动。他们坚决表示，即使在航路上受到敌人袭击，舰体遭到破坏，也要用鲜血和生命抗争到底，驶向人民的怀抱。



2月25日子夜,吴淞口江面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江水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

“重庆”号停泊在江面上,它的旁边是“紫石英”号驱逐舰,远处还有一艘加拿大驱逐舰和几艘大型货船。司令走廊的时钟有节奏地的嘀嘀嗒嗒地响着。1点15分,起义的时刻就要到了,集中在281雷达室待命的起义者们,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冲向自己分工的战位。

上洛首先跑到配电房,切断了舰上的通信联络和警报器电路。洪进先到无线电总办公室,切断了无线电天线和备用电源。

“重庆”号立刻变成了“聋子”和“哑巴”。

接着,于家欣以带班班长的身份到上层甲板,走到三名哨兵面前,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了281雷达室“吃夜宵”。三名哨兵一进门,就被缴了械。

毕重远在24日晚的会议中途便提前退场佯装睡觉,等待上一班哨兵来叫换岗。

毕重远接岗后,蹑手蹑脚地来到后甲板,走到两位哨兵跟前,关切地问:“天这么冷,怎么不去281室暖和暖和呀?”

“谁敢?漏报了情况可要掉脑袋啊!”两个哨兵缩着身子打了个寒战,齐声说:“今晚格外冷,有点吃的就好了。”

毕重远上前一步,拉住两名哨兵的手说:“走,跟我去吃点东西,喝点热奶茶,暖暖身子”。

哨兵听了,尾随在毕重远身后,乐滋滋地直奔281雷达室。两人刚一进门,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他们,他俩还没反应过来,就哆哆嗦嗦地被缴了械。接着,又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马达间。

毕重远随后又去了司令走廊,沉着机敏地将玻璃橱打开,把标



朝着司令走廊舰长室走去。

他们三人手持冲锋枪和短枪，走到舰长门前，借着壁灯的暗淡光束，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仔细一瞅，舰长的门没有锁，虚掩着。三人轻轻推开门，悄悄走进会客室。

接着，王颐桢、武定国、刘懋忠先后迈进卧室，邓舰长面朝里躺在床上，还在熟睡。

“邓舰长，请你起来一下。”王颐桢弯下身子靠近邓兆祥的耳朵轻轻地喊道。邓兆祥听到有人在叫他，忙翻动了一下身子，坐起后，双手轻轻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一边下床穿衣，一边急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刘懋忠压低了嗓门说：“邓舰长，您先穿好衣服。”

邓兆祥穿好衣服，借会客室的灯光瞪大眼睛仔细一瞧，只见面前的三人全副武装，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便立刻全都明白了。他镇定地问：“让我去哪？”

王颐桢和蔼地说：“请舰长到会客室。”

邓兆祥点点头，随他们走出卧室。

“邓舰长，请你在这里不要出去，等会儿我们再和你细谈。”三个人说。

邓兆祥面对水兵们的举动，并没觉出有任何敌意。水兵们从邓兆祥的平和神态上，也感觉到老舰长对“士兵解放委员会”没有任何反感。

接着，武定国、刘懋忠、陈鸿源、于家欣急匆匆地跑到司令官厅处，这里住着刚上舰不久的海总作战处上校处长卢东阁。听说他是来“重庆”号帮助搞训练工作的。

武定国等来到卢东阁住舱门前，朝铁门“咚咚咚”地猛敲了几



下。

“谁呀？有什么事！”室内传出了卢东阁粗门大嗓的询问声。

武定国站在门外告诉卢东阁：“海总来了紧急电报，邓舰长请你去。”

室内传出了开灯、穿衣服、穿鞋、挪动凳子的声音。

武定国等人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军官住舱走廊，逐个对少尉以上的军官进行了拘禁，统统都被关押在舰尾的洗浴室。

拘禁在前甲板舱室里的准尉军官们，由孙国桢、韩师忠严密看守着。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毕重远让陈鸿源把原来放乐器的水下仓库打开，把押在军官洗浴室里的十几名军官一同押进了进去。

拘禁前后甲板军官的战斗到此结束了。

“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委员们担心被关押的这些大小军官们受冻，又派人分别发放给他们棉被、毛毯，让他们遮身御寒。

士兵舱里的军士和新兵们仍在梦乡中，当他们醒来时，谁能想到展示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生的“重庆”号呢？

这艘载有 570 多名舰员的庞大现代化巡洋舰，几十名起义士兵仅用了个把小时，就以武力把各关键部门都控制了起来。

武定国拍着王颐桢的肩膀，兴奋地说：“定国，咱们开始走下一步棋吧！”

王颐桢微微一笑，点头说道：“好，我去大兵舱梯口。”他没有忘记起义发动前对舰上另一起义组织负责人的承诺，他们急步来到底舱，走到王继挺床前，轻轻摇晃了一下，说：“老王，快穿衣裳起床，我们已经动起来了！”

王继挺一听他们“动起来了”，二话没说，穿上衣服飞身下床，



向王颐楨说：“我现在做些什么？”

王颐楨把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递到他手里，说：“你快叫人，我们要启航！”

“噢！”王继挺惊喜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箭步飞身去招呼自己策划起义的士兵去了。

蒋树德、王继挺他们那个组织的成员和他们联络过的人员，全部冲出住舱参加了起义。

2月25日凌晨，“重庆”号移动锚位的时刻到了。

“士兵解放委员会”利用移动锚位的机会，拟定了起锚的假命令，让轮机军士快速发动轮机，唤起海员起锚。

起锚的“命令”果真灵验。七八个海员和轮机士一听起锚的命令，立刻从床上一骨碌翻身爬起，火速跑到轮机舱，有条不紊地打开机器开关，做着移动锚位的各种操纵。

霎时，机舱里马达轰鸣，轮机飞旋，四部主机开始了正常运转，整个机房一片沸腾。

“重庆”号起义的消息在士兵舱里很快传开了，许多人纷纷来到“士兵解放委员会”，强烈要求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去。

“重庆”号像往日一样，庞大的舰体被漆黑的夜色紧裹着，混浊的江水撞击着它摇来晃去。

“重庆”号就要启航了。王颐楨、武定国仔细地检查着各部门的工作。他俩从前、中、后甲板，轮机舱、舰桥一一检查后，径直向司令走廊走去，在邓兆祥住舱外间的办公室门前停下了脚步，彼此相视一下，王颐楨伸手“咚咚咚”敲了三下，邓兆祥听到敲门声，迅速开开了门。

王颐楨、武定国忙走上前，和气地对邓兆祥说：“邓舰长，我们



有件事要同您商量,我们成立了‘士兵解放委员会’,准备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请你指挥航行。”

邓兆祥一听,警惕地抬头看了看王颐楨、武定国。稍停片刻,他把烟丝装进烟斗,轻轻用手指按了按,点燃后便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室内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邓兆祥脑海里也像翻起了浓雾。

王颐楨语气温和地对邓兆祥说:“邓舰长,现在全国革命的洪流已经锐不可当。过些日子,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还能为国民党、蒋介石去卖命吗?国民党黑暗腐败,已经日趋土崩瓦解,我们对国民党海军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邓兆祥仍坐在那里吸烟,烟斗内的烟丝已完,他仍在吸着。他在苦苦思考。

伫立在一旁的武定国深情地看着邓兆祥,接着说道:“邓舰长,说什么咱们再也不能用外国的军舰和炮弹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姐妹了。再说,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尽力建设自己的海军呢!”

邓兆祥听后,心里仿佛有所触动,他挪动了一下身子,把燃尽的烟灰在地板上叩了几下,担忧地问:“你们要驾舰驶向解放区,我支持。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的‘重庆’号在什么地方?”

邓兆祥那张被海浪吹打的黝黑脸颊越发显得严峻。他接着说:“我们的‘重庆’号现在吴淞口,而在吴淞口上有一座高高的信号塔台,站在塔台上,江面上频繁往来的舰船看得一清二楚,庞大的‘重庆’号稍一行动就会暴露,埋伏在江边的岸炮对‘重庆’号就会猛烈轰击……再说,主机和电罗经启动,需要的时间都是4至6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机器轰鸣,烟囱冒烟,都能暴露目标。除



此之外。‘重庆’号技术装备复杂，要调遣这么个大家伙驶向解放区，靠几十个人启动，是很难保证全舰官兵航行安全的。”

邓兆祥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默默吸起烟来。

王、武两人把“士兵解放委员会”仔细研究过的问题和对策一一告诉了邓兆祥。邓兆祥仍然愁容未消，他突然反问一句：“你们能行吗？想起义并不是坏事，如果搞不成，哪不是要坏大事吗？……‘重庆’号上聚集了不少国民党的亲信、耳目，一旦事情败露，或者搞不成功，那是要人头落地的！”

“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起义态度十分坚决，邓兆祥此时已确信无疑，他深情地望着王颐楨、武定国说：“你们发动起义，我很同情你们，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可要负好这个责任啊！”

王颐楨见邓兆祥口气松动，又恳切地说：“邓舰长，你不负责任不行啊！军舰这么大，又是夜间航行，你对长江口这段航道熟悉，只有你来开船才能确保航行安全啊！”

邓兆祥心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开船谁来开船呢？天已快亮，天亮之后再开出去，那就危险了。为了全舰几百名官兵的生命安全，也为了这条来之不易的军舰，他详细询问了机器发动和其他准备情况，便毅然支持起义，答应指挥航行。

邓兆祥在王颐楨、武定国等人陪同下，大步流星地走上舰桥。

“邓舰长来了！邓舰长来了……邓舰长，我们启航吧！”士兵们一片欢腾。邓兆祥在舰桥舰长指挥位上坐定，转过头，突然问道：“卢处长在哪里？”

武定国对李铁羽说：“你把卢东阁处长请来。”

很快，卢东阁应邀上了舰桥。

卢东阁这时已答应协助“士兵解放委员会”开船，他来到舰桥



见邓兆祥坐在那里，马上说：“邓舰长，我听你指挥！”

邓兆祥又叫来航海官陈宗孟。卢、陈两人协助邓兆祥很快绘出了“重庆”号驶往烟台港的航线图。

这时，前甲板的绞盘转动，锚链缓缓拉起，邓兆祥伫立在海图前，认真地审视着海图上的各种标记，他望着海图上标出的一座座小岛，一直望到自己熟悉的烟台湾。

烟台是一块已经解放了的土地，驾驶“重庆”号驶向烟台港，邓兆祥万分激动。一切准备就绪，邓兆祥又像往日一样，把手中的烟斗暂放一边，把各部门的准备情况一一询问过后，一声令下：“准备启航！”他伫立在舰桥上，胸前挂着望远镜，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接着又果断地命令：“启航！”

庞大的战舰在邓兆祥舰长的指挥下，终于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向大海驶去。

邓兆祥嘴里含着紫黑色烟斗，大口大口地吸着，不时地下达着一个又一个舵令，“重庆”号离开长江口后，像离弦的箭向北疾驶。

天已渐亮，被监控起来的士兵一看“重庆”号全速向北航行，便开始怀疑舰的去向。为防止发生意外，王颐楨建议“士兵解放委员会”立即向全舰广播《“重庆”号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重庆”号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并散发了宣传单。

王颐楨庄严地宣读道：

全体同学们：

我们在一群极端自私的军阀豪门的欺骗与压迫之下，度过了多少年悲惨的日子。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从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剥削了20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之后，国内每年就



有2000万左右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其余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朝不保夕的苦境之中。以上海一地而论,每天就有200左右的儿童在饥饿与寒冷之下死亡。中国目前景况,就是广大人民辛劳的果实,只不过是供给极少数人享用与他们国内外财富的增加而已。由于他们想要把四万万人民都置于他们的暴力压迫之下,不惜掀起空前未有的惨绝人寰的内战。但是,这个内战是全体老百姓与军人所反对的。请看从济南、东北以至平津的蒋介石军队,向解放军投诚和起义的就有100万人之多,空军也正高涨着起义的热潮。今天,每个爱护祖国的人,都不愿支持这个为豪门保持特权的战争了。

回头再看看我们自己,老同学中有一部分是在战时参加赴英接舰参加海军的,目的是驱逐我们的敌人日本,有一部分人投效海军为的是要建设起中国的潜水艇舰队;而还有一部分是桂永清用欺骗手段把他们骗进来的。例如桂永清派他的官员到河南去对青年学生说:“中国需要知识青年做新海军的干部,海军的待遇很好,一个海军士兵的薪饷比陆军的校官还多,还要发眷属米,在船上有机器替你们洗衣服,不需要你们亲自动手,船上有理发师给你们理发,搽凡士林,还要用烫发机把你的头发烫起一弯一弯波纹。”

可是我们统统都上当了,在船上我们辛辛苦苦一个月的结果,得到的薪饷,还不够一天的用费。我们大都是20岁以上的青年,家庭的经济需要我们负担,现在呢,连我们自己都不够了,我们只能眼看着家里亲人处于饥寒冻饿之中。桂老总不单在薪饷上虐待我们,而且他还要强迫我们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去为几个豪门拼命,再加上不准我们海军士兵结婚的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命令,桂老总已经剥夺了我们应享有的人的权利了。在短期内,国民党的陆军将完全被消灭在大陆上,本舰也将很快的开往台湾。到那时,老家回不了,海军离不开,只有一辈子在桂老总的压迫之下,过着奴隶牛马的生活了!眼看着灾难就要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岂能不起来奋斗吗?!

本舰的同学们,都是社会人士所尊重的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应负起领导社会的责任;我们不能容忍那些暴虐无道的豪门军阀,把国家带到无比悲惨的境域;我们更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之下为他们充当炮灰,去反对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解放军。今天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用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把他们消灭掉!

“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

1949年2月25日

王颐桢读完以后,舰员们欣喜若狂,拍手叫好。

接着,喇叭里又传来王颐桢的声音:“请海员、技工们注意,下面我宣读士兵解放委员会给大家的一封信。”

海员、技工同志们:

我们与诸位相处的时间,长者两载,短者数月,感情甚浓,对诸位的熟练技术,尤为敬佩。

诸位都知道,目前的政府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而是一个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机构。请看,当着老百姓无衣无食的时候,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家产,就累积到200万万



美元以上。军阀们还逼着我们去为他们当炮灰，去为他们对解放军作战。解放军是为工农及劳苦大众谋福利争生存的正义部队，如果我们对他们作战，我们就对不起良心了，更对不起全国在痛苦之中的人民了。诸位都是以自己的工作来谋求生活的人，正是解放区所极端尊重的人物。

我们全体士兵都憎恨那些残忍的豪门与贪官污吏，我们都反对内战，而希望中国快快的出现一个良好的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现在我们要把这条船开到解放区去了，盼望诸位同志能够帮助我们，与我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为了酬劳诸位的热心，我们向你们每位敬赠 500 元。到了解放区之后，诸位愿否继续在本舰服务，均听诸位之便。希望海员与技工同志与我们一齐奋斗。

反对为豪门保持特权的内战！

打倒压迫与剥削人民的政府！

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

1949 年 2 月 25 日

宣读完两封公开信，船员、海员、技工们立刻精神大振。顿时有很多舰员、海员和士兵纷纷站出来，大胆地加入了起义队伍。

2 月 26 日 6 时，“重庆”号历经 25 小时航行，行程 520 海里，在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安全到达烟台。军舰抵达烟台后，毕重远向王颐楨和武定国说出了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两个起义组织派出代表毕重远、武定国、蒋树德和赵嘉堂一起乘小艇上岸联络。

根据烟台军政领导指示，邓兆祥舰长当天下午应邀上岸共商



军舰有关事宜,胶东军区海防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张少华,烟台市长徐中夫等领导到码头热烈欢迎。

邓兆祥上岸后,紧握住诸位领导的手说:“重庆舰陷入泥途已久,过去的一切罪恶事情,都由我一人负责,今天,我把重庆舰和全体官兵交给人民,任凭发落。”

张少华主任激动地说:“热烈欢迎重庆舰全体官兵回到人民的怀抱!”

徐中夫接着说:“欢迎你和‘重庆’号水兵回到人民的怀抱,我已经把这个喜讯汇报给党中央毛主席了。”

由于“重庆”号吃水要 19 英尺,烟台港水浅,只能抛锚在港外,加上国民党飞机不断狂轰滥炸,人们的思想开始混乱起来,舰上部分人甚至公开鼓动“要求开到安全的地方去”,有些老船员煽动开到中立区去。

解放军派驻“重庆”号的联络组长张震英一方面做了应急部署,命令全舰官兵迅速进入备航状态,另一方面立即向海防警备旅司令员贾若瑜汇报情况,贾司令员立即指示张震英,将“重庆”号开往葫芦岛,同时告诉张震英,从即日起任克加同志任“重庆”号军事代表,到达葫芦岛后由锦州军区副司令员朱军领导。张震英临走要求贾司令员给他 400 公斤“TNT”炸药,以防不测时用。

鉴于“重庆”号面临的困境,邓兆祥也建议把舰立即开到可靠码头的深水港葫芦岛。

3月3日下午,邓兆祥站在驾驶台上,双手端着望远镜,下达了“全速航行”的舵令,“重庆”号在夕阳的映照下离开了烟台港。

这一夜,“重庆”号军舰在茫茫的渤海海面上拖着巨大的波浪以 30 英里的速度开进,在邓兆祥的指挥下,“重庆”号穿过了航线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重庆”号已走过的航路,数百艘国民党海军舰艇,万千有志的海军青年,必将跟踪而来,团结在你们——普照着新中国领海领土领空的明灯周围。

3月15日,东北军区正式任命邓兆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号舰长,任克加任政治委员。

“重庆”舰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就像在蒋介石心上扎了一刀,蒋介石大骂海军司令桂永清坏了他的大事,又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沉“重庆”舰,绝不许把舰留给“共党”。

从3月16日下午开始,到3月20日,国民党空军P-38型侦察机和B-29型轰炸机连续在渤海湾一带,对停泊在葫芦岛的“重庆”号舰进行轮番侦察和轰炸,舰上的对空武器和我军高炮两个连,同时与敌展开激战。这时舰上的官兵已经撤离,留舰人员和炮兵连的同志打得非常艰苦,虽然迫使敌机不敢低飞,但舰上6名士兵在护舰战斗中壮烈牺牲,高炮连的战士也有十余名受伤,舰体也中弹受到严重损伤。

晚上,朱军召集任克加和东北军区海防科、军事联络组、工作组成员开会,会上对海上激战、去复州湾、沉船三个可行性方案反复比较。由于渤海湾有敌人潜艇攻击,空中有敌飞机威胁,我军高射炮弹也已消耗过半,油料消耗也很大,难以保障。朱军果断地下令“必须沉船,是非和责任,我朱军一人承担”。当即与任克加一道在码头指挥,连夜卸下搬运出了罗经仪、雷达、舰舱指挥仪、几十部电台、一个鱼雷发射管、鱼雷、深水炸弹、轻炮以及各种航海、通信、扫雷和帆缆器材等。20日凌晨,朱军命令“放水沉船”。

此时,列队站在码头上的全体官兵,面向巡洋舰庄严肃立,注



视着与他们朝夕相伴的“重庆”号徐徐下沉。

“重庆”号沉没了,无尽的叹息,无尽的呼唤伴随着它走完了最后的航程。

4. 侄子策反,邓兆祥大义灭亲

1959年8月,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反攻大陆,接二连三地向大陆派遣特务,有的从海上来,有的是空投入境,千方百计窃取我军事情报,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我军内部,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策反活动。

一天傍晚,邓兆祥从海边散步回到家,刚进门,外边就传来了报告声,警卫员向邓兆祥报告说:“首长,门外有一位年轻人,说是您的侄子,从肇庆赶来。”

邓兆祥惊喜地说:“噢,赶紧请他进来。”

邓兆祥自从军后,每天忙于公务,前前后后已有30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天登门来的这位侄子,长得啥模样,是哪个弟兄的后代,他都一无所知。不过,对来自故乡的亲入他还是蛮喜欢的。平日里,他也常思念家乡人,期盼着家乡有人来他这里聚一聚。

“首长,您侄子来了!”卫士的声音打断了邓兆祥的沉思。

邓兆祥大步迎上去,把客人请进屋。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是邓兆祥弟弟的孩子,专程来青岛探望久别的六叔。随后,他从旅行包里掏出肇庆的特产,双手递到邓兆祥手里,郑重地说:“六叔,这是我阿爸亲手做的腊肉,听说是您小时最爱吃的东西。”

邓兆祥对故乡亲人的到来,显得特别高兴。他坐在侄子身旁问长问短,十分热情。还让家人为侄子做了饭菜,又拿出青岛啤



酒,陪着侄子共进晚餐。

这位侄儿 30 岁左右,前额高高凸出,穿着朴素大方,乍看上去,给人一种憨厚淳朴的印象。

邓兆祥和侄子越拉越亲热。两人从家乡的风土人情聊到家族的历史,从家乡的变化又谈到祖国美好的前景,从国民党失败后逃往台湾又谈到了共和国的建立……

晚上,邓兆祥派人把侄儿送到青岛华侨饭店休息。

侄子到来时,恰赶上邓兆祥参加舰艇海上编队演习的筹备工作,训练任务非常紧张。邓兆祥安排侄儿白天上街或海边转转,等星期日休息时,再陪他出去玩玩。

星期日,邓兆祥和侄子及妻子、儿女一行五人来到了濒临大海的鲁迅公园。邓兆祥在百忙之中亲自陪同家乡来的亲人漫步在海边,参观水族馆、栈桥、小青岛灯塔景点,这位侄儿玩得非常开心。到了中午,几个人玩得有些累了,坐在礁石上歇息。侄儿选择了一块黑褐色礁石,双手托腮,迎着凉爽的海风,怡然自得。

突然,远处海面上传来了一阵隆隆的引擎轰鸣声,向前看去,浪尖上飞出了三艘鱼雷快艇。

这时,海滩下许多游人停住脚步,踮起脚尖,朝海上望去。

侄子拉了一下邓兆祥的衣襟:“六叔,您看那是什么船?”

“那是鱼雷快艇。”

“它们去干什么?”

“去外海搞训练。”

稍停了一会儿,侄儿瞅了邓兆祥一眼,支支吾吾地问:“六叔,他们去训练,您怎么没有去呢?您要是去的话,我能跟着您出去该多好呀!”



侄儿说到这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一阵沉默。

邓兆祥和侄子并肩往前走着，脚下的海水滚动着白色的浪花。

太阳偏西。邓兆祥及家人陪同侄儿整整玩了一天。晚上，邓兆祥与侄儿又闲聊起来。

几天下来，侄子对六叔渐渐熟悉了，他感到这里的一切都不再陌生，说话便随便起来。

一天晚上，侄子抬头看着墙上挂着的邓兆祥身着礼服的大幅照片，毫无拘束地问：“六叔，你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干了十多年了，怎么才是个少将？”

邓兆祥听了不以为然，说：“按规定，我就该授少将军衔呀！”

侄儿转过身，把木椅往邓兆祥身边挪动了一下，悄声说：“六叔，我在家时早就听说，同你一起在黄埔的同学，他们在台湾早就当了大官，连最小的也是中将了。”

侄儿说完，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邓兆祥，看他的神态。

邓兆祥从话里听出一点呛人的味道，于是便试探地问：“噢，你说的这话倒是不错，你是怎么知道的？”

侄儿听了六叔的话，以为六叔可能动了心，忙又关切地说：“六叔，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邓兆祥双眉一紧，说：“我和‘重庆’号上的爱国官兵们驾着‘重庆’号驶到人民的海洋后，工作、生活都很好。”

侄子抬头瞟了邓兆祥一眼，显出十分关心的样子，又问：“六叔，你觉得你选择的路对吗？”

邓兆祥立即意识到对方话里有话，他极力控制住内心的愤怒，大脑在飞快地转着；自己对这个侄子过去不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



“住口！”邓兆祥气得两手颤抖，愤然站起身斥责说：“不许胡说！”

“六叔，请别想不开，侄子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啊！您的学生在台湾的，现在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啊！”

侄子见六叔没吭声，收起黑褐色的本子，虔诚地对六叔说：“台湾方面说，你到了台湾，起码给您中将或上将军衔。”

邓兆祥仍在沉默。侄子见有苗头，苦口婆心地劝说：“六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就下决心吧！我可以立刻返回广州，联系接你走的事宜。”

邓兆祥见事情已真相大白，便口气平静地说：“去台湾是件大事，让我再考虑两天吧！”

侄子见六叔动了心，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惊喜地握着邓兆祥的双手说：“六叔，您这么想就对了。”

邓兆祥双手背后，迈着沉重的步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问道：“台湾方面还让你干什么？”

侄子说：“他们就是盼望你去台湾。”

接着，侄子向六叔述说了此行来大陆的情况。

原来，台湾当局得知邓某和邓兆祥是直系血亲，特务便瞄上了他，邓兆祥的侄子在金钱的诱惑和特务的威逼下，以探亲为名，从缅甸入境，打入我军，对邓兆祥进行策反活动。

侄儿掏出的黑褐色的本子，便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的“委任状”。

邓兆祥终于识破了侄子的用意，他万万没想到侄儿会成为蒋帮特务。为此，他十分痛心。

邓兆祥送走了侄儿，在屋内踱来踱去，推窗凝视着小青岛熠熠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闪烁的灯塔,心里翻腾着。他抬起左臂看了一下手表,时针已指向23点多。尽管时间已很晚,但他还是立即叩响了刘昌毅司令员家的大门,汇报了侄子来策反的事。

舰队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由舰队保卫部长范维纲负责实施。

保卫部长迅速与青岛市公安局联系,立即擒住了邓兆祥的这位侄儿。

侄子扑通跪在邓兆祥膝下,连连哀求:“六叔,你不能这么冷酷无情!难道你不要我这个侄儿了吗?!你不顾及我,难道你也不顾及邓氏家族吗?!”

邓兆祥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警告他说:“迷途知返,悔之不早。老实交待、低头认罪,这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经过专政机关的审查,掌握了这个特务大量的罪行,他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英雄之后林遵



1. 长江千里布防, 海军司令无可奈何
2. 地下党加紧策反, 林司令隐忍待时机
3. 桂永清心怀鬼胎, 林遵“瞒天过海”
4. 林将军笆斗山起义, 毛泽东双清别墅写诗
5. 刘伯承司令员会见林遵将军的地点竟是南京蒋总统的议事大厅
6. 林遵将军原来是林则徐的侄孙, 毛泽东说: “民族英雄人人敬仰呐!”



林 遵

(1905 ~ 1979 年)

福建省福州市人。1924年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1929年考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934年毕业回国。任国民党海军枪炮员、航海官、副舰长。1937年赴德国学习海军潜水艇技术。1939年回国，任国民党海军永绥军舰代副舰长，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大队长，国防部研究院海军研究员，参谋总长办公室海军参谋。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长江千里布防,海军司令无可奈何

1949年2月至3月间,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逼近长江,蒋介石心急如焚,开始加紧调兵遣将,苦心经营长江防线。

陆军已经在他发动的两年半多大规模的内战中给他丢尽了脸,这最后一搏,他只好把赌注下在了海军、空军上,屡战屡败的陆军也指望着海军、空军的掩护,作最后的顽抗。

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1800多公里的长江中下游沿线,蒋介石部署了近70万兵力,海军舰艇120多艘,空军各种飞机280架,支援陆军作战。

担任长江中下游江防任务的是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舰队司令林遵将军。

林遵,又名林尊之,1905年生于福建福州,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

林遵的父亲林朝曦曾任职于北洋海军,并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由于近代中国海军发祥地的熏陶和祖辈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林遵对海军便情有独钟。

1924年,19岁的林遵怀着振兴中国海军,洗雪甲午之耻的雄心壮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烟台海军学校。

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党员郭寿生,郭寿生任《新海军》月刊主编,林遵是“新海军社”的成员,也是《新海军》月刊的忠实读者。

1929年,林遵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934年毕业回国,任国民党海军航海官、副舰长;1937年又赴德国学习潜艇技术,任国民党海军驻德联络官;1939年回国后,先后任国民党海军“永绥”舰代副舰长,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大队长。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抗战期间,林遵曾率领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在安徽境内同日军作战,多次深入日军占领区侦察敌情,并亲自率领布雷队在长江布雷。在此期间,他还和皖南新四军有过接触,受过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遵被派往华盛顿任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1946年调任国民党海军驻美接舰指挥官,率领“八舰”(指美国“援助”的太平、太原、永胜、永顺、永定、永宁、永泰、永兴8艘军舰)横渡太平洋回国;同年10月,又担任收复和进驻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舰队指挥官;12月12日乘太平舰率部登上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在岛上勘察、立碑、升旗,举行了庄严的接收典礼。

1948年1月,林遵调任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奉命率部进入长江。

长江防线西起湖口,东至江阴,正好是解放军强渡长江中下游极其重要的地段。第二舰队所配合作战的国民党陆军部队,是京(宁)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兵力。在江阴(包括南通至镇江)地段是第一绥靖区的部队,芜湖一带是第七绥靖区的部队,安庆一带是广西部队和刘汝明的部队。

海军的兵力部署是:江西湖口以上是江防舰队,兵力仅有几艘江防炮舰和炮艇,江阴以下至吴淞口是海军上海基地和海防第一舰队,从湖口至江阴之间是海防第二舰队。

海防第二舰队本身配属有四个区队,驻守着四个防区:第一区队的防区是江阴至镇江,第二区队的防区是镇江至芜湖,第三区队的防区是芜湖至安庆,第四区队的防区是安庆至湖口。各区队都设有指挥官一人,各种舰船五六艘,其数量多少视情况而定。兵力



其他事情会议后再说。

常州会议开了两天,头一天由各军长、师长汇报各自的兵力部署和士气情况,第二天汤恩伯发表讲话。他指着作战地图上长江两岸国民党军的兵力布置标志,煞有介事地讲解了兵力配备的原则和“江防”的作战方案。

随后,汤恩伯说:“总统英明,准备战略退却,据守长江,以待转机。滔滔长江,自古天险,共匪是无法渡得过来的,但要固守长江,则江北岸的桥头堡必须加强,这不仅是固守长江所必需,也是为将来战略反攻作准备。各桥头堡不但有实力雄厚的江南陆军作后盾,而且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要塞的支援,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临近结束时,他又得意洋洋地说:“长江天堑,固若金汤。这一回我们陆、海、空军都用得上了,还有强大的江阴要塞,而共匪只有陆军,其能奈我何?”

这天下午,汤恩伯分别接见了一些军官,林遵和陈务笃也被单独接见。没等汤恩伯开口,林遵就对汤恩伯说:“海军到了江里,用处是不大的呀!长江那么长,桥头堡又那么多,我这几条军舰有什么用啊!”

汤恩伯反驳道:“这不要紧,我跟你们桂永清说说,叫他多派些兵舰给你,不就行了嘛!”

接见完毕,在回去的路上,林遵对陈务笃说:“汤恩伯是一厢情愿,桥头堡有什么屁用!共军一来,他们就做缩头乌龟,最后一个一个被共军抓活的。我可以给他们起个名字,叫‘乌龟战术’。你看今年每次战役不都是这样,开头总是耀武扬威,摊子铺得很大,其实他们色厉内荏,后来就收缩、收缩,缩到乌龟壳里,最后被活捉,完蛋。”林遵说到这里笑了一笑,接着说:“长江那么长,只守些



点,管什么用?共军随便什么地方都能渡江啊!”

陈务笃明白了林遵的话意,也随即一笑。

回到镇江,陈务笃向林遵提出了把炮艇队分成两个队的主张,他说:“炮艇队一般都只是20条左右艇只,而我队却有50多条,从江阴到湖口这么长的防线,为便于指挥,是不是可以分成两个队?”

林遵认为陈务笃的主张有道理,但他又不能回答这有关建制变动的大问题,为了落实常州会议部署的“江防”任务,林遵又与陈务笃一起到南京海军总部去请示解决。

海军总部研究后决定:

原第二炮艇队分成第一、第三两个机动艇队,每队选20条较好的艇,剩余的艇充实到第五巡防艇队。

第一机动艇队队部设在南京,负责马鞍山到镇江口的防务,队长仍由陈务笃继任。

第三机动艇队队部设在镇江,负责镇江到江阴的防务,队长由原第二炮艇队副队长查良煦升任。

第五巡防艇队留一部分艇交湖口巡防处,余艇随队移驻大通,负责安庆到芜湖的防务,队长仍为杜澄琛。

把江防舰队中几艘较好的军舰充实到海防第二舰队来,第二舰队防线太长,为便于指挥,又划分成五个指挥区。

每区有军舰3至5艘,各区除指挥舰外,其他各舰可根据情况调动使用,各炮艇队的炮艇到指挥区的辖区时,听从指挥官指挥。

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部设在旗舰“惠安”舰上。旗舰经常性驻地设在镇江、南京,根据情况去上下游巡弋。

这样,海防第二舰队总共20多艘军舰和近60条炮艇,就布防在江阴到湖口的500余公里的长江上了。



诚意,想不到上了共军的大当,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和平,公正的和平。总之,我们要和,中共要战,要战就战吧!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与共军周旋到底。”

他继续说道:“这次我巡视了长江防务,我们江南配备有100多万部队,江北有坚固的桥头堡,防守严密,还有海军、空军的支援,真是坚如磐石。我们有宽阔的长江,有敌人所没有的海军坚守,你共军来吧,我将以我强大无敌的海军,掀起长江滚滚的洪水,扑灭共军熊熊的烈火,我们必操胜券,请各位好自为之,效忠党国,莫负厚望,在战争中立功,救国于危难,以实现三民主义,而慰国父在天之灵。”

训话完毕,刘广凯安排大家坐下“随便聊聊。”

没聊一会儿,桂永清便大声说:“‘重庆’号不争气,公然叛变投敌,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吧!他们不顾党国培养之恩,叛党叛国,甘当共匪,实在为党国所不容,听说他们跑到东北去了,不管他们跑到哪里,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抓回来,按军法从事!”

停了一下,他又巡视了一周,问道:“假如你们的军舰在海上碰到‘重庆’号,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得大家一时不知所措,不知桂永清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都沉闷着不讲话,过了好久,桂永清等得不耐烦了,又向大家扫了一眼,然后目光盯在唐涌根脸上,问道:“唐舰长,你说说看哪!”

唐涌根尴尬地笑了一下:“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停了一下,又说:“我没有想象过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接着,李宝英也摇了摇头,干脆说:“不晓得怎么办。”

轮到陈务笃了,他说:“‘太原’舰是一艘浅水炮舰,总在长江浅



水区活动,不会出海碰上重庆号的,重庆号也不可能开到芜湖来,所以太原舰不存在这个问题。”

宋继宏没等点到他的名,就抢着说:“我‘吉安’的火炮比‘重庆’差得多,航速比‘重庆’差得远。要打,打不过它,要跑,跑不过它,要是碰到了它,我只有两个办法:要么老远发现了它就开溜,开足马力向浅水区溜,向岛屿背后溜,给它来个‘捉迷藏战术’,叫它抓不到我。要么就是溜不掉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举白旗投降。”

桂永清恶狠狠地盯着他说:“没出息的东西!”

宋继宏不服气地说:“总司令,我讲的是老实话呀!不然,你看咋办哪?”

“什么老实话,我早知道你们是没办法的,没用的东西!我自有我的办法。”

桂永清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训完话、授完奖,这几个舰长竟是如此向他答话。他气得都要跳起来了,咬着牙,两手攥紧拳头,猛力向沙发的扶手砸下去:“我桂永清受命于危难之时,当尽全力效忠领袖,他妈的,你们到时看好了!”

会议室里陡然安静下来,谁也不敢再吭声,这场打了一肚子窝囊气的“打气会”就这样收场了。

2. 地下党加紧策反,林司令忍耐待时机

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毛泽东对他的战友和前线将领们说:“今后解决100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乎北平、天津、绥远三种……”

夺取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他认为,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做好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工作至关重要,而争取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又是分化长江防线的关键。

于是,争取林遵起义的分化工作便在毛泽东的精心部署和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

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要迅速组织力量,从多方面对第二舰队的司令、舰长及有关人员进行程度不同的策反工作。

林遵是国民党海军的少壮派将领,仅他率“美国八舰”横渡太平洋回国,和率舰接收及进驻西、南沙群岛两项任务的完成,就成了国民党海军史上的创举。

照一般常理来说,林遵应得到重用。但是,实际结局并非如此。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逼马尾系的陈绍宽下台,又派对海军一窍不通的桂永清来当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一上台就企图把马尾系排挤掉。林遵属于马尾系,所以只被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海军点验委员会主任的闲缺。

1948年1月,桂永清突然宣布林遵任海防第二舰队司令,且晋升为海军少将,命令其率部开进长江布防。

林遵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怔住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桂永清为了排除异己,把他推到内战第一线当炮灰,因此不能不对自己的前途有所考虑。

1948年9月,中共中央驻沪情报机构负责人吴克坚,派出地下工作人员林亨元去找国民党海军《中国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要郭利用他和林遵的校友关系去第二舰队动员林遵率舰队起义。

1948年秋,吴克坚找到林亨元,对他说:“国民党已把海防第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二舰队调进长江,企图利用这些‘水上活动堡垒’和长江天堑组成一道防线,阻止解放军渡江。中共中央要求设法打进第二舰队,争取和团结一批有爱国心、反对内战的人,组织他们举行起义。”并具体指示说:“国民党海军有个月刊社社长叫郭寿生,过去有过革命的历史,在海军里有一定影响,你想办法与他联系,通过他去争取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

林亨元接受任务后,先找了一个叫张汝砺的朋友,张认识郭寿生。张汝砺过去也是中共党员,以后脱党,但仍是进步人士。

郭寿生家住在虹口公园附近。林亨元第一次随张汝砺到郭寿生家,假称是路过造访,自己是广西大学教授,因生活艰难,现弃教从商。经过几次接触,林亨元和郭寿生很谈得来,林还请郭和他的妻子到馆子里吃饭,还到北四川路一个小舞厅(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去跳过舞。

交往中,他们慢慢谈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时局问题,彼此相谈甚投。林亨元还从侧面了解到,郭寿生与党失去联系后,仍一直倾向中国共产党。

林亨元向吴克坚汇报这些情况后,吴说:“你现在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叮嘱,“你可以同郭寿生讲‘周恩来同志叫你归队’”。那时,中共驻沪情报机构有电台,这件事吴克坚显然是向中央汇报并得到了批准的。

于是,在一次会晤中,林亨元严肃地对郭寿生说:“现在我告诉你,我是中共党员,今天奉组织之命来跟你谈话,周恩来同志叫你归队。”郭寿生听后非常兴奋。

林亨元又说:“我来这里和你交朋友也是有目的的。你过去有过一段革命的经历……”



说到这里,郭寿生马上说:“是的,北伐时期,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时,我和周恩来同志同在一张办公桌面对面地办公,周恩来同志很了解我,他叫我归队,我愿意归队。”

林亨元遂向郭寿生具体交待了争取林遵起义的任务,郭很快专程到镇江去找林遵。

第二舰队司令部原在上海,1948年秋移驻江苏镇江,一部分人驻在镇江岸上,一部分人驻在“惠安”旗舰上,林遵带领几名参谋常驻旗舰,其余参谋人员则由舰队参谋长麦士尧带领常驻岸上。

1948年11月的一天,郭寿生在第二舰队总轮机长阙晓钟陪同下来到镇江。他身着笔挺的海军军服,上了旗舰“惠安”舰,林遵将他迎进司令舱。郭寿生说明来意,一是为《中国海军月刊》约稿,二是叙旧。由于舰上耳目甚多,两人没有深谈。林遵察觉到郭寿生言犹未尽,问郭是否还有别的使命,郭称还将去南京一行。林遵邀郭从南京返回时再来镇江,将陪郭去金山寺一游。

郭寿生从南京再来镇江后的老友相见,二人很快便敞开了心扉,都想借此机会一吐心声。他们边走边谈,不觉已登上了金山之巅,郭寿生见四周无人,便郑重地对林遵说:“我这次来先告知你一件事,最近,中共周恩来派人向我传话,叫我归队,我已经明确答复,愿意归队。”接着,郭寿山又说,“蒋介石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这个政府已经腐烂到头了……”

一说到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林遵一下子接过话茬,气愤地说:“国民党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郭寿生又说:“解放军将渡江,你这个江防舰队司令不知有何打算?”

林遵答道:“作为一个指挥官,只要还有良心,下达炮击生他养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解放军渡江时决不向解放军开炮,但是也不调转炮口轰击长江南岸,因怕伤害江南的无辜百姓。至于渡江地点,以安庆上下为突破口最有利,因为这里的守军是国民党非嫡系刘汝明的杂牌军。”

林亨元通过这次面谈,弄清了林遵不直接见解放军代表的原因,不是拒绝而是担心,因为中间没有熟人引见,周围又密布特务,自然顾虑较多。

林亨元最后对林遵说:“好,今天我们双方直接见面会谈,就算决定了,我回去后再跟三野联系,要他们速派人来跟你见面,共同合作,举行起义。”

林遵与中共中央驻沪情报机构的联系,除主要通过阙晓钟居间进行外,欧阳晋也是联络人之一。欧阳晋原任“重庆”舰通信官,在德国留学和在长江布雷队任职期间,都是林遵的部下,两人关系甚好。林遵为了找可靠的助手在身边,主动将欧阳晋调到第二舰队司令部任中校参谋组长。

1949年1月,欧阳晋奉林遵之命到上海向郭寿生汇报过第二舰队起义的准备情况,由郭转告了中共地下组织。

同年4月18日,欧阳晋又奉林遵之命连夜赶到上海,于21日会见林亨元,汇报了第二舰队即将起义的情况。

解放军代表潜入江南与林遵的代表秘密会谈。达成的初步协议是:

人民解放军渡江之日,第二舰队到时按兵不动,在中共中央驻沪情报机构积极开展工作的同时,中央军委通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由三野派人潜入镇江、南京、上海,准备直接协助林遵指挥第二舰队起义。

淮海战役结束后,三野部队转移到苏北淮阴以西的吴集一线



休整。

1949年的2月间,时任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政治委员的孙克骥接到命令,要其立即到兵团报到,接受新任务。

到兵团报到的第二天,三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与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原苏北兵团副政委吉洛(姬鹏飞)一起,召见了孙克骥和苏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杨进。

钟期光操着极重的湖南口音说:“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军退到长江一线,妄图阻我渡江南下。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分驻在安庆、芜湖、南京、镇江、江阴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我军为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决定今春集中第二、第三野战军全力南渡长江,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尔后再向东南、中南、西南等地区进攻,解放全中国。”

钟期光阐述了渡江战役必然胜利的种种条件后调转话题,极其严肃地说:“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军中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和我们拉关系、找退路。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已向我们表示在适当时机将率部起义。上海党组织考虑到策动林遵起义,需要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去协助,中央军委决定由三野派人前去。经研究,决定派你俩作为陈毅司令员的代表,去执行这一任务。”

钟期光眼睛盯着孙克骥,鼓励说:“你执行这项任务有方便的条件:第一,你是福建人,林遵也是福建人,可利用同乡关系进行工作;第二,你在抗日战争以前在白区工作过,有白区工作经验;第三,你又有部队工作经验,可以在政治上军事上协助林遵组织起义。”



江,总不能就此回苏北。问题的关键是,在镇江等林遵回来很不安全。

杨进考虑了一下说:“镇江地面小,没有社会关系掩护很不安全;上海是个汪洋大海,可以找到掩护的社会关系,我看暂且到上海去住几天,等林遵返镇江后再来。”

孙克骥同意杨进的意见,当天他们便乘夜车于翌日天刚亮抵达上海。

杨进有一位温州同乡名叫黄宗甄,是个研究生物学的科学工作者,在国民党的科学研究机构工作,住在愚园路中山公园附近。黄宗甄政治上很开明,知道杨进的政治面目,过去不止一次地掩护过杨进,这次便欣然接待了他们。

在黄家,他们每天买镇江的报纸,注意林遵行踪。

林遵终于回镇江了。当天,孙、杨连夜返回镇江,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二人相约,杨进在旅馆待命,孙克骥亲自去“惠安”舰面访林遵。

这天天气阴沉,江上雾气弥漫。

孙克骥来到海军码头。距码头一二百米的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军舰,码头上有几个国民党军水兵用福州话闲聊。孙克骥故意在他们背后走了几个来回,凑上去也用福州话同他们拉同乡关系。

水兵问:“你找谁?”

孙克骥答道:“我找林遵司令”。

水兵似乎觉得孙有些来头,便亲热地问:“你找林司令有什么事?”

孙克骥说:“生活困难,没有职业,想找林遵司令谋个差事。”

“唉!这光景你来找他有什么用?你还不知道吗?”水兵们瞪



大眼睛,用手指一指江北。

“没办法啊!只好这样了。”孙克骥叹了口气,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

水兵们似乎很同情孙,便说:“你等一等,过一会儿交通艇过来,你乘交通艇去,林司令就在‘惠安’舰上。”

交通艇把孙克骥送上“惠安”舰。孙克骥向舰梯口的哨兵说明来意,哨兵立即进舰通报。

出来接待孙克骥的是一位很英俊的海军军官,少校军衔。这位军官名叫戴熙愉,福州人,是舰队的参谋,林遵的亲戚。

戴问孙有什么事。孙便把以“李治军”名义写的信交给他转交林遵司令。戴要孙在甲板上等候,自己进船舱去了。

等了好一会儿,戴出来对孙讲:“林司令说,不认识李治军,很对不起,他不能接见你。”随即叫交通艇送孙上岸。

虽然下了逐客令,但是态度很友善,没有恶意,孙克骥只好默然告别。

一上岸,孙立即雇三轮车去旅馆找到杨进。二人商量,在此处久留危险,赶快买船票返回江北。

那时,国民党还没封江,镇江与扬州沿江口岸每天都有小商轮来往。当日午后,他们乘商轮到达江都的新老州,第二天赶到扬州,把此行经过详情电告了兵团部并转报三野总部。

孙、杨在扬州等了数日,接到兵团部电报,要他们立即去淮安面商。吉洛(姬鹏飞)副政委在淮安接见了他们。

他们将此行的经过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再去江南的话,先到上海,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在上海党组织领导下,对林遵进行策反工作。



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告诉了他们寻找上海党组织的办法。于是,孙克驥、杨进又到了扬州。

这时,国民党已经封锁长江,除军队运输船可以通行外,商船、民船一律不准通行。好在华东局社会部的杨帆是个老情报员,有很多江南江北的红黑道关系,过江的问题由他负责解决。

经商议,杨帆决定由设在扬州的情报站全力保障孙克驥、杨进二人从扬州西南的十二圩过江。

十二圩是长江北岸的一个市镇,与镇江隔江相望,驻有国民党军第四军的一个步兵营。镇里有一个名叫杨大炎的青帮头子,是我们的情报关系,他与这个步兵营的营长混得很熟。通过这些关系,买通了那个营长,使孙克驥、杨进二人乘国民党军的运输船,顺利地到达了江南。

到上海之后,他们先在杨帆安排的一个社会关系陆悦庭家住下,尔后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暗号,与上海党组织派来的代表林亨元接上了头。

孙克驥向林亨元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如果可能,希望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见见面,今后策反林遵的工作,由上海党组织领导;二、请详尽地介绍有关林遵的情况,研究今后策反的方针和步骤。

同时,约定了今后联系的时间和地点。

几天之后,上海党组织由吴克坚与孙、杨二人见了面。经吴克坚同意,决定在上海党的领导下,由林亨元、孙克驥、杨进三人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进行策反林遵的工作。

林遵虽然表达了在适当时机起义的态度,但起义时机、起义方式及军事代表如何参与起义的组织工作等细节,都还不够明确,还



需要进一步具体决定。同时,林遵起义的决心,也需要进一步巩固。

在林亨元的安排下,孙克骥、杨进与林遵的代表阙晓钟见了面。阙一再表明,林遵起义的决心已定,决不撤离长江,只是说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

孙克骥提出,起义最适当时机是我军发起渡江战役之时,调转炮口,火力支援,配合我军渡江。

阙晓钟向林遵作了汇报,并又向孙、杨转达了林遵的观点,说是决不能调转炮口向江南开火,因为江南老百姓多,容易误伤,只能按兵不动,这就是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

至于军事代表安插到舰队的要求,林遵认为不可能,因为海军舰只人员复杂,桂永清的特务监视很严,万一被怀疑,反而误事。

孙克骥又提出同林遵会见,当面商谈,再次被婉辞谢绝。答复是:已同林亨元见过面,林遵处境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孙克骥同林亨元约见阙晓钟,会面的地点在虹口公园。当时虹口公园游人很少,他们找了个僻静处,用福州方言交谈。孙克骥、林亨元根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基本精神,指出国民党所谓的“和谈”,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妄图得到喘息的机会,再卷土重来。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决不能对“和谈”存有任何幻想。

至于第二舰队的前途,只有两个:一是已经选择的起义道路,归顺人民,将来成为创立和发展人民海军的基础,有海军军事学识的国民党海军军官,在未来的中国人民海军中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前途是广阔的;二是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大军一过江,只有



当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孙克骥、林亨元最后强调,综上所述,明智者应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这些意思,阙晓钟和盘转告了林遵。

孙克骥在进行策反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途径:他有一位姑表兄叫邵仑,20年代在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学习,以后留学英国,抗战以前在国民党海军服役,同他已多年不曾见面。孙克骥向阙晓钟打听邵仑的下落,不料邵仑就在第二舰队下属的“永绥”舰任中校舰长,而且是林遵策划起义的助手之一,邵仑同林遵的私交也很密切。

孙克骥在南京见到邵仑,相别20多年,几乎互不相识。

他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住在“永绥”舰上,同邵仑先后作过几次长谈,谈内战的形势,谈新中国,谈中国的海军,谈国民党海军起义后的前途……谈话后,孙克骥请邵仑牵线再次约见林遵。此次林遵答应与孙会见,但因孙回了上海,林接着也奉命去了安庆,结果又失去了直接晤面的机会。

为了加快策反工作的进展,孙克骥向邵仑转达对林遵的三点要求:一、舰艇不要开出长江;二、战斗时不能攻击人民解放军;三、如果国民党飞机来轰炸,可将军舰移靠北岸浅水处停泊。

邵仑如实转达,林遵均表同意并明确:起义的决心绝对不会动摇;起义的时机选择在我军渡江之时,并约定昼夜联络信号;对军事代表安插在舰队机关问题再次表示拒绝,原因是舰队机关编制人员很少,军舰上活动范围也小,人员复杂,容易引起怀疑,但起义时军事代表可以上舰,协助组织起义。

孙克骥回到上海,将上述商谈结果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



4月上旬,解放军渡江日益迫近,林遵正奉命到安庆一带活动。孙克骥和杨进认为,此时第二舰队已不是解放军渡江的主要障碍,主要是动员林遵尽量多留一些舰艇在长江内,勿使逃跑,以增大起义的规模。

4月中旬,孙克骥叫杨进住在镇江,加强同阙晓钟的联系,他本人到南京再次住到“永绥”舰上,准备渡江一开始,就通过邵仑的关系上林遵的旗舰——惠安号,协助林遵指挥起义。

3. 桂永清心怀鬼胎,林遵“瞒天过海”

在整个策反工作中,孙克骥、杨进虽然始终未与林遵直接晤面,但他们通过阙晓钟、邵仑等,一直与林遵保持着联系,进行指导。

海军司令桂永清自从沿江“授勋”之后,特别是重庆舰起义后,对林遵更加怀有戒心。于是便加紧了对林遵的监督和控制在。首先,他不让林遵有直接调动舰艇的权力,林的一切行动都要通过桂永清本人及他把持的海军总司令部。其次,他频频地对林遵进行调遣,先是叫林遵去沿江“点验”部队,继又叫他去安庆“督战”,最后又叫林遵将旗舰“惠安”舰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这样就使林遵的行动完全置于他的严格监控之下。第三,桂永清为了架空林遵,还将驻泊在南京统归第二舰队指挥的19艘军舰和炮艇分成两个编队,分别让“惠安”舰舰长吴建安和吉安舰舰长刘宜敏各兼一个编队长。吴建安负责第一编队,有“惠安”、“吉安”、“永修”、“永绩”4舰及炮艇11艘;刘宜敏负责第二编队,有“兴安”、“武陵”等运输和修理舰艇。桂永清还命令他们开往舟山群岛定海港待命,以保存实力。



遵立即去芜湖指挥舰艇拦击在黑沙洲一带渡江的解放军。林推说“惠安”舰主机出故障。桂说：“‘惠安’（舰）坏了，你也要先乘‘美盛’（舰）去，到芜湖再换‘永嘉’（舰）当旗舰”。

林遵无奈，只好仓促地向情报部门了解一下情况，即于18日晚趁夜色乘“美盛”舰从南京逆流而上，驶向芜湖。沿途除听到一些枪声外，航路上一切如常。19日早晨到达芜湖，在距芜湖下游四五公里的广福矾江面抛锚。当时已有几艘军舰泊在那里，其中有“永嘉”舰、“永修”舰、“太原”舰、“安东”舰。

芜湖防区的指挥官原是“安东”舰舰长唐涌根。唐涌根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加之他原已厌烦内战，值此时期以病重为借口，离舰就医去了。4月16日，海军总部参谋长周宪章持着桂永清的亲笔信到芜湖，要“太原”舰舰长陈务笃搬到“安东”舰上兼代芜湖地区指挥官。在这紧张的特殊时刻，去当唐涌根的“替死鬼”，陈务笃实在不愿意，拒绝了任命。周宪章原是陈务笃的老师，周先用桂永清的“手令”逼陈，后又用师生的感情恳求，陈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兼代指挥官的职务，但仍未肯搬到“安东”舰去。因为陈务笃随时准备起义，“太原”舰官兵已完全掌握，应变比较容易。

林遵到达芜湖码头时，陈务笃前去迎接，向他报告了芜湖地区的情况。据陈讲，江北桥头堡已被全部吃光，江南沿江守军驻点也都收缩到繁昌和芜湖，准备逃跑。芜湖地区能大批渡江的地方有十多处；小批可渡江之处无以数计。从15日开始解放军就陆续小批渡江了。渡过来的部队站住脚后，正准备迎接大部队渡江。

随后，林遵由陈务笃陪同，前往第七绥靖区司令部会见张世希司令和他的参谋长等。交谈中，林问张：“据传江北据点业已撤退，不知是否属实？”



张答：“实不相瞒，江北据点已于昨晚全部撤出。”接着，张又振振有词地说：“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之后，我军兵力所剩无几，能撤出一人就能为江南守军增添一分力量，怎能不及时撤出！”

林遵忙说：“原来的作战方案是海军舰艇协同北岸桥头堡守军阻击共军，如今我舰完全暴露在共军重炮火网之下，又将何以阻击他们？”

张答：“那你们就到黑沙州靠近南岸待机吧。共军渡江时，就在江中横冲直撞地阻挡一阵算了，实难指望你们把他们挡住。”

张世希既已亮底，林遵就放心地率领“永嘉”、“永修”两舰停泊到旧县附近一个隐蔽的锚地，平静地过了两昼夜。

4月22日下午，张世希突然紧急召见林遵，林又到了他的司令部。只见张姿态狼狈，神色沮丧。张首先传达了海军总部要他转告林遵的电话：共军大军已突破江岸，政府已于本日全部撤离南京，舰队也将全部撤走。要求林遵把芜湖至安庆的舰艇全部迅速地集中到南京来，并要本人于4月23日拂晓前向南京海军总司令部报到。

张又对林讲，他的部队已经开始撤退，并十分哀伤他说：“现在长江已守不住了，政府也快要覆灭了，我们都是罪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

林遵说：“现在大局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回去后就开始备航，今晚即率舰艇驶回南京，请你仍用电话通报海军总部。”

话虽这么说，但林遵心里有数。

此时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林遵告辞时，只见张世希的司令部电话频繁，人马纷乱。

离开第七绥靖区司令部，林遵立即回到“永嘉”舰召集各舰长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开会,传达了会见张世希的情况和海军总部的电话“命令”,着重说明:大势已去,国民党政权已将覆灭,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刻再做危害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立即准备于黄昏开航,以“永嘉”舰为前导,灭灯航行,尽量走南航道,必须走北航道时也尽量靠南航行,保持隐蔽;尽量避免战斗接触,不要开炮,即使遭到炮击,也要迅速离开,不要还炮等。

各舰舰长听后,心情都很紧张,立即备航,准备迅速离开。

大约下午六七点钟,芜湖防区的舰艇和人员全部离开。沿途虽然没有特殊严重情况,但是北岸远处的枪炮声也隐约可闻。在这几小时的航行中,林遵的心情十分紧张,思考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自己应该采取的措施。

午夜前后,舰队到达了南京。“永嘉”舰向下关海军码头靠岸。其余各舰则驶往附近下游抛锚。平时南京和浦口两区,夜晚总是灯火辉煌,这时都看不见了。

浦镇方向的炮声正隆隆作响。在海军码头上,除永嘉舰外,还靠着其他几艘舰。海军机关特别是后勤机关的人员,正紧张地搬运物资,乱哄哄地忙着上舰逃命。这些情况表明,解放军确实已迫近南京,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正准备从水路逃窜。

海军码头上,一辆吉普车已停在那里,是接林遵司令的。林遵下舰后,带了参谋戴熙愉乘车去挹江门附近的海军总司令部。

平时,总司令部的门口内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岗哨林立,十分森严;眼下到处满目凄凉,一个个办公室门户洞开,办公桌柜东倒西歪,到处抛着破箱碎纸,零散地堆着一些箱子和行李包,还有一些烧完东西剩下的残灰、余焰尚未熄灭。

桂永情的办公室也是零乱不堪,因为停电,办公桌上的两支红



江阴。”

林遵面带难色，考虑了一下，也很严肃地向桂说：“舰队撤沪，责任重大，我才疏学浅，实难单独担此重任，恭请总座亲临舰队坐镇才好。”

桂没想到林竟会“将”他一军，一发愣。但他狡狴多“谋”，用手把眼镜往鼻梁上一推：“总裁有令，要我今晨即飞上海转奉化，共商国是，不宜在舰队耽搁，以免贻误党国大事。”随又佯装笑脸，环顾周宪章、王天池二人说：“林遵司令指挥若定，屡建功勋，这一次率舰队东下，定然不负重任，一定马到成功。待林司令到达上海之时，我们当亲临码头迎接，摆宴庆功。”

周、王二人陪着笑脸，顺着桂的话对林遵奉承吹嘘了一阵，把林遵捧得只是连连摇头，口称“不能，不能”。

桂接着装得很郑重地向林说：“只要林司令能把舰队从南京带到上海，哪怕到上海时只剩下一条舰也属奇功。我当面呈总裁，保升你为中将副总司令，并颁授你青天白日勋章。”

周、王二人赶忙谦恭作揖地说：“林司令劳苦功高，真可算得是屡建奇功。它日荣任副座之时，我等当在麾下，效犬马之劳，辅佐在侧，共筹戎机。”

林遵连忙还揖：“不敢，不敢，老前辈如此谦恭，叫我如何担当得起哟！”

林遵又转向周宪章：“既然总座不能亲临舰队坐镇，则请参座来舰队督阵。参座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定能完成此任了。”

周宪章感到突然，皱了皱眉头，慢慢推辞说：“我已年老力衰，不堪担此重任了。”说着，把脸转向王天池：“王署长是不是可以陪林司令辛苦一趟？”



悄悄，黑洞洞，无一人影。桂永清这一行，踏着蒋家王朝覆灭前夕撒满地上的碎文破纸，走向即将封闭的总部大门。门口停着桂的轿车。桂直奔轿车，顾不得向周、王、林打招呼，就一头钻进车里。吴家苟顺手关上车门，自己钻进前座，向司机发出命令：“直开飞机场！”

“嘀——”的一声，轿车向南疾驰而去，很快消失在黑暗里。桂永清要乘飞机跑了！

随后，周宪章、王大池等也乘小汽车逃往上海。

林遵等人离开海军总部不远，作战署副署长林光祥又追了出来，交给林遵一封桂永清的亲笔信。信上写道：“着你率队于23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21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江阴要塞，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23日夜间接离此地，以免空军发生误会。”林遵看后，一眼看出桂永清明显地以飞机轰炸相威胁，林遵把信撕了个粉碎，摔在地上走了。

在返舰的路上，林遵反而激动了，他兴奋地自言自语道：“起义的时机到了！”

从4月20日晚开始，南京一带的舰艇，都陆续集中到下游约8里的笆斗山江面锚泊。这一段江面，北而是八卦洲，南面是江岸。靠近江岸有一座小山叫笆斗山，因此叫笆斗山江面。江面水道是长江的南航道，南北宽1.5至2公里。江面上游1公里多处就是南京的名胜燕子矶。吴建安首先将他指挥的舰艇撤至草鞋峡、八卦洲、笆斗山一带。

22日下午，桂永清召集在南京江面的各舰舰长开会，要他们当晚冲出长江。第三江防区海军舰艇指挥官、“永绥”舰舰长邵仑为了拖延时间，马上向桂提出：“第二舰队尚有好几条舰在安庆，我



们可否留在南京等它们下来,取得联系后再走。”桂只好表示同意。

22日傍晚,海军总司令部又催促邵仑:“江阴已失守,通知各舰相机行事。”

邵仑趁机改变通知对下传达说:“江阴已失守,冲出长江有危险,大家是否留在下关,等各舰由安庆开到南京时,一同行动。”各舰长都同意。但当晚南京两岸发生炮战,所泊各舰便都移至下游笆斗山江面。次日凌晨,“安东”、“太原”、“美盛”等舰也陆续到达笆斗山江面。

笆斗山锚地,樯桅林立,盛况空前。在这样窄的江面上,集中了这样多的舰艇,甚是壮观。

4. 林将军笆斗山起义,毛泽东双清别墅写

诗

林遵离开海军总司令部后,马上乘“永嘉”舰直奔笆斗山锚地。一路上,他缜密思索着起义的时机问题。他原曾设想把起义的时机选在吴淞口,那样可能集中的舰艇更多一些,起义的规模更大一些。但目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一鸟在手,胜于二鸟在林”,多得不如现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立即采取起义行动。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对起义是极为有利的,集中待命的各舰舰长中,有一部分是他确能掌握的。因此,他决定采用召开舰长会议的办法来决定起义行动。

林遵到达舰艇的集中地时,大约是4月23日上午7点钟。林遵一到,“惠安”舰舰长吴建安即登上“永嘉”舰与其会见。林、吴商量后,决定立即召集各舰长和艇队长开会。



上午8时左右,舰长和艇队长们齐聚在“永嘉”舰上,除吴建安舰长外,还有“永绥”舰舰长邵仑、“楚同”舰舰长李宝英、“美盛”舰舰长易元方、“安东”舰舰长韩廷枫、“太原”舰舰长陈务笃、“兴安”舰舰长刘宜敏、“永嘉”舰舰长陈庆坤、“永修”舰舰长桂宗炎、“永绩”舰舰长陈情生、“美亨”舰舰长陈绍平、“武陵”舰舰长刘怔,以及第一机动艇队队长张汝樵和第五巡防艇队队长杜澄琛,还有参谋戴熙愉,共十多人。

吴建安主持会议,宣布开会,说明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形势,研究第二舰队下一步如何行动。

林遵随后讲话。他首先介绍了会见张世希和桂永清的情况,然后说:“张世希痛苦绝望,大有凄然落泪之势,悲哀地说:‘长江天堑都守不住,无险可守的沪杭一线,更是无可阻挡。’”接着,他既像启发又像试探地说,“总司令要我把大家带往上海。目前长江下游的形势,江阴炮台已易手,三江营和仪征一带共军有重炮扼守。如欲下驶,交火后必使长江两岸人民遭殃。同时,江道狭窄,舰艇易被击中,下驶谈何容易。”

然后,他话锋一转,又说:“我一再恳请总司令上舰指挥,但总司令不允。我又邀请参谋长、作战署长上舰协助,他们均不肯来。现在桂永清乘飞机跑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舰艇,性能不一,情况各异,事关大家切身安危和全体官兵的前途,形势又如此紧迫,特邀大家来共商前程,请各位慎重考虑,我将聆听大家的意见。”

林遵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思虑。舰长们从研究任务开始,逐渐转入讨论时局,讨论海军中存在的问题,讨论舰队面临的形势,讨论“走”与“不走”等问题。对于国民党大势已去,反动政府即



将灭亡,共产党即将接管中国,这些问题全体认识都是一致的;对于海军的种种腐败和桂永清的无耻,大家的愤慨也是一致的。但对于“走”与“不走”问题,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走,三分之一的人要留,三分之一的人犹豫不决,没有表态。林遵则静坐在那里,倾听两方面争执,一言不发。

上午9点多钟,“永嘉”舰值更官跑进会场报告说:“‘永定’、‘吉安’、‘江犀’、‘联光’四舰从安庆开来了!”值更官的话音一落,大家都站起来跑到舷边向上游眺望,只见“永定”舰在前,“吉安”舰在后,指挥舰“江犀”舰拖着大概是发生故障的“联光”舰在中,慢慢驶人锚地。

这消息令林遵喜出望外,因为“永定”舰舰长刘德凯、“江犀”舰舰长张家宝、“联光”舰舰长郭秉衡、“吉安”舰舰长朱继宏,大多倾向起义,这不仅增加了起义的舰数,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支持起义的力量。林遵宣布会议暂停,立即派艇接四位舰长来“永嘉”舰。

新来的四舰舰长到齐后,继续开会。林遵把会议开始时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把大家辩论的情况概括了一番,然后说:“把四位舰长请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没等新来的四位舰长发言,吴建安先开了第一炮。他说:“党政之争,挑起内战,自相残杀,我们不能再跟着跑了,应当退出内战,交出军舰,战场起义,接受和平。”

吴建安讲完,跟着发言的是“永定”舰舰长刘德凯。他说:“受党国培养多年,背离国民党在良心上说不过去,可是国民党贪污腐化,确实令人痛心。最可恨的是海军总部不管我们死活,我舰在安庆就有人受伤,无处医治。昨天从安庆下来,在路上又挨了几炮。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有一炮打在驾驶台上,好几个人受伤,没有医务人员抢救,没有止痛药,伤员痛得哭爹叫娘,真使人寒心!”他越说越伤心,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

刘德凯这一哭,无疑是火上浇油,引起了在座多数人的共鸣。“联光”舰舰长郭秉衡紧接着也边哭边说:“想当年我们当海军,原是想保卫海疆,哪晓得我们竟做了蒋、桂之流的工具,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到了危难的时候,那些搜刮饱了民脂民膏的官僚们老早带着太太们跑了,桂永清也乘飞机溜了,丢下我们不管。他们不仁不义,逃之夭夭,却要我们忠党爱国,我们再也不能助纣为虐,应该择善而从了。”

会场气氛越来越激动起来。

这时,有一舰长站出来说:“我们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值此国难当头,寸功未立,却弃义投降,良心上说不过去,要被子孙后代骂为贪生怕死,会受到历史的唾弃。”

另有的舰长也随声附和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苏联一定打不过美国。共产党靠的是苏联,所以投共没有出路,中国要建设海军只能靠美国。”

这些舰长讲完,双方又争执起来。

“江犀”舰舰长张家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必须认清形势,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现在还有十多艘军舰,还是一支力量,应当团结一致,奔向光明。时至今日,还继续去充当内战的工具,只能是死路一条。”

“太原”舰舰长陈务笃接着说:“从中国海军历史来看,我们的先辈把一些破烂舰艇代代留传下来,前清留给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又留给国民政府,才保存了这么一支可怜的海军舰艇。我们今天



再把这份财产交给新政权,总不会受到历史的唾弃吧。”

这时,个别舰长提出:“我们既不跟国民党走,也不投奔共产党,把军舰开到公海去打游击,或开到第三国港口当‘白华’。”

一直未讲话的林遵听后不软不硬他说:“做‘白华’也要有钱啊!到海上打游击,补给从哪里来?去抢劫商船,即是海盗行为,国际上也不允许。”几句话,把持这种意见的人顶了回去。

会场上时而争执不休,时而沉默无语。也有少数舰长始终不吭一声。

会议持续到午后,双方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会议出现僵局。林遵借口天气闷热,宣布暂时停会休息。

借休息的机会,林遵同邵仑、吴建安、张家宝等舰长交换意见,要他们分头去做反对起义的舰长的工作。强调要从大局和前途出发,要识时务,要走光明的道路。通过个别做工作,有的舰长改变了态度,个别舰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会议继续开始后,气氛缓和了许多,只有几个舰长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林遵虽然心里有底,但他在这种场合不愿说出自己已与中共有联系的情况,怕过早暴露,被反对派斥为“内奸”,授人以柄,反而误了大事。因此,他仍因势利导地说:“如果将舰队带下去,跟国民党走,我本人既有荣誉又有奖赏;但从形势看,带下去确实困难。我本人决心为大家着想,尊重大家的意见,大家说留就留,大家说走就走。”

又经过一番讨论,林遵见火候已到,便决定用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行动。舰队参谋戴熙愉把事先就准备好了的票发给大家,16位舰长均投了票。

投过票后检票时又有一小段休息时间,林遵继续征询了一些



人的意见。在会议室外,林遵碰到“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便问:“你投的什么票?”

陈务笃答:“空白票。”

林遵诧异地问:“你在会上多次发言都是要留下,为什么要投空白票?”

陈务笃说:“司令,大家这样激烈讨论,你却一直没有表态,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还不清楚,我不愿白纸上落黑字,所以投空白票。再说投票主要是测验那些还没发表意见的人的意愿,我投不投票,没啥关系。”

林遵又问:“那你还是愿意留下起义的?”

陈务笃反问:“林司令是不是愿意领导大家起义呢?”

林遵随即表态说:“当然。”

陈务笃紧接着说:“那我当然也留下起义。”尔后又带笑地问了一句:“司令,中将副总司令和青天白日勋章你都不要了?”

林遵哈哈笑了起来,说:“那是桂永清的鬼花招,能算数吗?”

最后,陈务笃严肃地说:“司令率领我们起义,我由衷拥护。我说话是算数的,请司令放心吧!”

林遵高兴地点了点头,与陈务笃紧紧握手,随后又同其他舰长进行了交谈。

检完票后即复会,林遵发言。他说:“经过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现在又投票测验,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参加投票的16位舰长检票结果是:赞成留下起义的10票,反对起义的2票,弃权的4票,说明大多数人愿意留下起义。我曾向一些人个别征询了意见,弃权的6人中,有的是愿意起义的,有的则随大多数人行动。两位投反对票的人也表示,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要留下,他



们也不固执己见。”接着又说，“起义与否，是关系到各位和全舰官兵前途的大事，一定要自愿，绝不能勉强。假如哪一位现在还想走，那还可以走，决不强留。各人命运由个人自己决定嘛！”

林遵再次征求大家的意见，无异议后，随即布置了三件事：

第一，请吴建安和张家宝两位舰长商量拟稿，写信与解放军联系；吴建安和戴熙愉商量派人送信去浦口。

第二，各舰电台暂不与海军总部断掉联系，在未与解放军联系好之前，会议情况不要让海总知道。

第三，各舰锚泊太密集，今晚需调整疏散锚位，以防发生意外。

林遵同时还宣布：凡从安庆下来的舰只，4月份没领到伙食费的，现司令部尚有部分余款，请回去后通知军需官带花名册来领。

林遵宣布完后，张家宝迅速拟写了与解放军联系的信稿。内容是：

解放军驻浦口部队钧鉴：

驻京（指南京）海军全线官兵，鉴于濒年内战，人民不胜倒悬之苦，根据贵军“八条二十四款”第××条，我部愿意放弃战争，进行局部和谈。兹派我部×××、×××前往贵部洽谈，请查照见复为荷。

张家宝念了一遍，林遵表态说：“很好，很好。”其他人也均无意见。

此时是1949年4月23日。

林遵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庄严宣布起义，也是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一举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住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听到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和林遵起义的消息,兴奋不已,激动万分,当即写下一首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5. 刘伯承司令员会见林遵将军的地点竟是南京蒋总统的议事大厅

第二舰队起义后,为了暂时迷惑敌人,防止和延迟敌机轰炸。林遵指示各舰仍继续与国民党海军总部保持无线电联系,同时要求解放军暂缓发布起义的消息。

23日午夜,桂永清电告林遵:“只要你能把舰带到上海,任何事情都有商量的余地。”国民党海军总部其他一些官员,也以同学、同乡等名义,分别来电向熟悉的舰长诱说。林遵回电推托:“舰艇有的受伤,有的发生故障,待整修好后才能下驶。”其实是在争取时间。

过了三天,国民党海军已判明第二舰队确已起义,便欲将其置于死地。



一场轰炸与反轰炸斗争开始了!

26日晨,林遵令各舰除炮位人员外,一律下舰疏散隐蔽。他在“惠安”舰上召集舰长、艇队长开会,草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上午9点多钟,3架美制轰炸机飞临锚地上空盘旋,各舰发出战斗警报,准备抗击。但敌机只在高空盘旋两圈后即飞离,没有发生战斗。

当天下午,桂永清又给林遵来电称:“限你们在26日子夜通过江阴下驶,届时有空军掩护,幸勿延误。”林遵立即和各舰长商量,翌日驶进南京港,三分之二的人员离舰,各舰伪装疏泊。

27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各舰把作息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也就是在敌机可能来到之前把全部工作做完。早晨6点钟之前,各舰把舰体各个部分擦拭得特别干净,人员都换上整洁的军服。军官们摘弃了青天白日大帽徽,士兵们拆掉了披肩上的国民党党徽。7时整,各舰举行升旗仪式。

今日不同寻常,升旗仪式特别隆重,因为今天升的是新的象征着革命的红旗。

官兵们在甲板上排着整齐的队伍,值更官陪舰长检阅了仪仗队。舰钟敲响6下的时候,军号吹起了升旗的乐曲。“立正——敬礼!”全舰官兵庄严地向红旗行礼致敬,凝视着红旗冉冉升起。

待各舰红旗都升到主桅以后,以旗舰“惠安”舰为首,驶离笆斗山江岸,在大江中列队,向南京下关驶去。

舰艇整齐地靠上下关海军码头,官兵们在码头上列队,等候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来检阅和接收。

8时整,陈士榘乘吉普车赶到。他快步走上码头,与林遵等人紧紧握手。林遵简短地介绍了情况后,陈士榘点头微笑:“好吧!”



我们上船看看。”

林遵引导陈士榘到各舰参观，陈士榘仔细巡视各部，不时地问这问那，当走到“安东”舰驾驶室时，看到本钟、罗经、舰轮等擦得金黄锃亮可照人影，各种仪表保存如新时，深为赞赏。

在会议室里，陈士榘发表讲话，他对第二舰队的起义进行了勉励和慰问后，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存我们的舰艇和人，而主要的是人。敌人飞机已侦察过，下一步必定要轰炸。敌人不让我们有海军，但我们却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我们必须与之斗争。舰艇我看过了就算接收了，细节以后再说。现在舰队须尽快疏散隐蔽，船上大部分人员先下来集中学习，少部分人把兵舰开离码头，按预定计划疏散防空。”

9时以前，各舰离舰人员携带轻武器和贵重仪器等下舰。接着，各舰由留舰人员驶出疏散停泊：“安东”舰泊东梁山，“永绥”舰泊马鞍山，“联光”舰泊当涂，“吉安”舰、“太原”舰泊采石矶，“江犀”舰泊下三山，“美盛”舰开到安徽和县附近的江边抢滩隐蔽，“惠安”舰泊三叉河口的头关，“楚同”舰泊燕子矶，各炮艇都隐蔽在下关附近的金川河内。

28日上午9时45分，美制轰炸机6架，对疏泊在各点的第二舰队起义舰艇进行狂轰滥炸。各舰都组织人力奋勇反击。终因火力过弱，“惠安”、“楚同”、“永绥”三舰被敌机炸沉。“惠安”舰枪炮员何友生，士兵童如恒、吴本祥、陈一起、王幼琴、顾立卿6人被炸牺牲，战士董福利、施依顺、张善鑫等16人受伤。

当晚，我第三十五军通知各舰“舍舰保人”，全部人员离舰。

4月30日，国民党军飞机炸沉“吉安”舰。

5月4日，炸沉“太原”舰，继而又炸沉“安东”舰。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上桢在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陪同下,在南京下关海军码头视察起义的国民党军舰“永绥”舰。

第二舰队的“惠安”、“楚同”、“永绥”、“吉安”、“太原”、“安东”6舰虽然相继被国民党军飞机炸沉,但它不仅没有使广大起义官兵屈服,反而更加激发起他们极大的革命义愤,更加激励他们参加建设人民海军的决心。

1949年4月30日,第二舰队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全文是:

5月11日,新华社就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在林遵将军率领下于南京附近江面举行起义的壮举发布消息。

同日下午5时,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在南京伪总统府原蒋介石的“议事大厅”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起义的第二舰队司令和全体官兵。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亲切接见和讲话。他那风趣幽默、道理深刻的讲话,令起义官兵永志不忘。

刘司令员操着满口四川口音说:“你们晓得这是个啥子地方吗?”他自问自答:“这是蒋介石四大家族和那些战犯们‘议事’的地方,他们就是在这里决定挑起内战,屠杀人民,要消灭共产党。他们吹牛皮,说是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今天呢?要被消灭的不是我们,被消灭的是他们,是他们自己!毛主席要我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我看离他们彻底完蛋的时间不长了!”

会场上逐渐变得严肃起来,刘司令员的话也愈讲愈快:“毛主席领导百万军队,拿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南京的解放,我们在这里会见,就意味着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我们即将成立新中国,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人民政府。我们要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接着,起义的国民党军九十七师王晏清师长讲话。他兴奋地说:解放军为人民服务,上下一致,军民一家,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我很惭愧,过去曾做了屠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很懊悔觉悟得太晚了,现在决心急起直追,为人民立功。最后林遵将军致词。他说:“我们坚决拥护和接受刘司令员给我们的指示,今后一定努力学习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为建设人民的强大的海军而奋斗到底。”欢迎会结束后,刘伯承司令员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军区司令部设宴款待起义人员的代表。二野政治部还召开了专门的文艺晚会。

随后,根据部署,各舰人员离舰后都集中在南京挹江门内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旧址学习。华东军区海军指定林遵、李进和廖卓之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领导。5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指出:

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的壮举。你们率领25艘舰艇(后经核实应为30艘),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2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3月间炸毁以后,4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



分起义人员时说：“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对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取得全国解放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将载人史册；第二舰队的起义，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它。”

历史记载着海防第二舰队官兵光荣起义的壮举。

6. 林遵将军原来是林则徐的侄孙，毛泽东说：“民族英雄人人敬仰！”

1949年8月，新中国的各项筹建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毛泽东更加忙碌，他继续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进行广泛交谈，共商建国大计。

同时，为了加速胜利的到来，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共同制定了解放全国的战略规划。毛泽东电召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来京汇报海军情况。

此时，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已经拟定，在662人的代表名单中，林遵的名字就在其中。

毛泽东很想见见林遵，这是因为：一方面，凡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代表大部分人毛泽东都见过，都谈过话，林遵起义后一直在南京忙于舰艇防空的疏散，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另一方面，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有关国家建设特别是人民海军建设的一些问题，他要同林遵谈一谈。

于是，林遵与张爱萍等便应召从南京来到了北京。

1949年8月28日。中南海内碧波荡漾，荷叶飘香。

林遵与张爱萍等乘车来到毛泽东住所门前，毛泽东在门口迎



接他们。张爱萍向毛泽东介绍林遵时，毛泽东紧紧地握着林遵的手，高兴地说：“你是林则徐的侄孙，久闻大名啊！你的先人林则徐是抗英英雄，民族英雄，全国敬仰啊！你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率部起义，同样是英雄壮举，可钦可佩可喜可贺呀！”

毛泽东把林遵和张爱萍等人让进会客厅，指着第一个单人沙发请林遵落座。

张爱萍等人依次坐下，毛泽东坐在林遵对面，微笑着问：“你是国民党党员吧？”

林遵一时摸不着头脑，还未及回答，毛泽东便接着说：“要说国民党党员，你们谁也没有我资格老！1924年国民党的‘一大’，我就是候补中央委员，在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下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成了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毛泽东点着了一支烟，接着说：“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过不成太平日子，我们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我们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他们的力量。”

毛泽东呷了一口茶，继续说：“我们人民军队从白手起家，今天已经发展成了强大的陆军部队。其所以不仅没有被消灭而能战胜国内外敌人，发展到如此强大地步，主要是军队是人民的，我们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人民拥护我们，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地击垮了所有强大敌人，最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定决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为独立的了的中华民族努力奋斗。

斗转星移,共和国迎来了她的第五个生日。

1954年9月,正值秋高气爽的季节,林遵从南京来到了北京。

当时,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主任,正全身心投入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培养训练。他从1952年开始担任这一职务后,对海军系的筹建、教学及学术研究方方面面的工作抓得相当紧。他凭着多年海军生涯积累的经验,深知人才培养的重要。

当时,人民海军初建不久,党中央毛主席对他寄予的深切期望,也是他倾全力于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培训工作的重要动力。

林遵这次来北京,不全是为海军方面的事情,而是专程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几个重要法律文件。

在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遵郑重地投了票。

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兼任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林遵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共和国五周年的庆典热烈而隆重,首都各界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9月30日晚,林遵以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晚会,第二天又在天安门观看了盛大阅兵式和游行。

能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庆共和国的生日,林遵心中无比兴奋,特别是亲身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的短短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五年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他打心底里钦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组织领导能力。

庆祝活动结束后,国防委员会于10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彭德怀等16位副主席及81名委员共聚一堂,共议国防建设大计。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这使从事了大半辈子海军工作的林遵振奋不已。

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了1953年2月他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的情景。他说:“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19到23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

毛泽东讲这段话的时候,慈祥的眼神一直注视着林遵。

林遵顿觉心中热乎乎的,他理解毛泽东称他为“先生”,是对他的激励,是要求他和原海军人员在海军建设中充分发挥技术作用。

他更理解毛泽东对建设强大海军的决心和愿望。毛泽东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先后五次题写了相同内容的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这是领袖的心声,人民的意愿,它深深铭刻在林遵的心中!

飞天将军刘善本



1. 蒋介石四次给刘善本“上课”，
刘善本四次反叛蒋介石

2. 刘善本导演的一场空中“闹剧”一直闹到了延安

3. 接济刘善本妻子的原来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中豪杰——施剑翘；帮助刘善本妻子的竟然是国民党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郑钧汉

4. 蒋介石要刘善本为他开“美龄号”专机，毛泽东要刘善本为新中国创建人民空军

5. 伴随着人民空军成长的进行曲，刘善本五次光荣飞越天安门



刘善本

(1915 ~ 1968 年)

山东省昌乐县人。1935年考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1938年毕业于。曾任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飞行参谋。1946年6月驾机起义飞抵延安。起义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领航主任、飞行主任、副大队长。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副旅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蒋介石四次给刘善本“上课”，刘善本四次反叛蒋介石

1935年，刘善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平大学附中。

此时的民族危机已是十分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设在北平东郊的通县。

北京已危在旦夕，亡国奴的命运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刘善本和无数爱国青年都在思考救亡的良策，“航空救国”这一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决胜思想一时被众多的热血青年所拥戴。当时，有2000多人争相报考国民党航空学校，刘善本和40多名学生被录取了。

9月初，他们来到南京市小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入伍生营”受训。

跨进学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大横幅标语——“攘外必先安内”。进了宿舍，白色的床单上印着“安内攘外”的字样，这批单纯的年轻人此时全然不解这条校训究竟是什么意思。

直到一天上午，上司突然通知全校师生员工到校礼堂听报告后，刘善本才明白了“安内攘外”的确切含意。

只见蒋介石操着满口的浙江话，挥舞着拳头对学员们讲道：“有些青年人张口就喊，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闭口就叫，收复东三省，这可真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我们的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呢？如果抵抗，最多三天就亡国！”

蒋介石的“亡国论”使刘善本这位热血青年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他对眼前的这位委员长大失所望，所指望的“航空救国”也一下



中国必胜。”

这和蒋介石主张的“失败论”和“亡国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刘善本的心里开始亮了起来，他痛悔自己走错了路，错上了贼船，他也庆幸自己从这里找到了指路明灯。

他偷偷地把斯诺的文章翻译过来，用化名寄给了天津《大公报》。

从此，刘善本更加刻苦地钻研航空理论，学习飞行技术。

1937年3月，他以总评“优”的成绩从这所学校毕业了。1937年4月，刘善本等人又到杭州的笕桥机场接受中高级飞行训练。

这里，要对飞行员进行特殊的十条“飞行信念”教育，刘善本以他良好的飞行训练成绩，又一次第一个取得放单飞的资格。

“七七”事变之后，航校几经辗转，最后迁移到了昆明。这期间已经学会了歼击机、轰炸机驾驶的刘善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被动挨打、节节后退、不予反击的败局和日寇越来越凶恶的狂轰滥炸。

他也亲眼看到了8月14日在笕桥上空我军高志航等飞行员迎战日军大机群，击落敌机6架，我机无一损失的辉煌空战。

在昆明，敌机不断从越南机场起飞，进行狂轰滥炸。但是，蒋介石却命令这里的空军，在敌机袭来时不得反击，一律飞往山里躲避。

学了一身飞行本领的刘善本再也按捺不住，他火冒三丈地向停机坪冲去，跃身跳上一架侦察机腾空而起，只身向来犯的敌机群冲去，没想到这架飞机根本就没有装子弹，他无可奈何只得被迫降落。

刘善本也因违反蒋委员长手令被禁闭了起来，放出来以后，心



犹未已的他决意再找战机。

在机场第二次拉响警报时,刘善本又一次奋不顾身地跨上了一架美制 A9—6 新式飞机,冲上蓝天迎击敌机。他再一次失望了,这架飞机上没有装机枪,刘善本再次挥泪迫降。

不用说,等待刘善本的将是更加严厉的军法处置。

抗日有罪,报国无门,使这位血气方刚的飞行员心灰意冷了。

虽然在同事们的保释下刘善本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他要驾机去解放区参加打鬼子的念头也就由此产生了。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蓄意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

刘善本想,抗战以来,在祖国广阔的抗日战场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完全相反的是,另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大举进犯、蒋军大溃退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后退一步,反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他痛感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他自叹“徒悲不见九州同,按长剑,仰天吟啸,寻良策,凝北斗,航空救国,误入贼营。”

1942年,有一架苏联新型运输机经兰州去延安,国民党空军八大队派领航员王毓兴为该机领航。

这是中苏达成的一项协议,即苏联飞机不能直接飞到延安去,必须经国统区,由蒋空军人员陪同前往。名义上是协助领航,实际上是监督苏联和中共的活动。

他们到达延安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亲切召见谈话,并亲自赠送了延安军民亲手制做的皮大衣、毛毯等物品。

刘善本渴望了解被长期封锁和歪曲了的延安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真实情况,他巧妙地借机询问了延安机场的跑道情况和保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刘善本在美国也亲眼看到了美国这个所谓的天堂之国的道德沦丧、种族歧视，特别是对中国人的无端侮辱。

在美国，刘善本从报纸上经常看到许多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的报道，大官财阀们竟把发国难财的巨款存入了美国银行，腐败透顶的国民政府再次使刘善本心灰意冷。

在这期间，他有幸偷读了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身处异国他乡的刘善本更加向往延安，向往毛泽东。

他在给妻子周叔璜的信中写道：“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力量用在推动社会进化、促进人类文明这方面来。”

这是对家人的期望，也是刘善本的心声，他再一次下定了铲除逆潮流而动的腐朽不堪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决心。

他盼望早日回国，早日起义去解放区参加抗战。

1945年1月，在美国某军用机场，以老八大队为基础，宣布成立了国民党空军新的第八大队，刘善本被任命为上尉一级飞行员。

5月5日，八大队机群从美国机场腾空而起，他们就要绕道大西洋，跨越非洲经印度回国了。

到了印度，接到通知：蒋委员长命令大队暂不回国，住卡拉奇待命。眼见已经到了祖国大门口，却不让回去，这是为什么？

刘善本疑惑不解，回国的心情也更加强烈。

8月，他们接到命令大队火速回国的急电，这又是为什么？刘善本预感到将会有重要事件发生。

果然，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了《波斯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啦！”刘善本和他的队友们一片欢腾。

10月，八大队回国驻防上海。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令他们吃



惊的是,机场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从飞行指挥员到站岗值勤的警卫人员全部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大兵。

之后,刘善本看到的则是机场上天天一片忙碌,美国飞机正加紧为国民党向北平、东北运兵员,送物资,机场上下一片杀机。

刘善本明白了,国民党是决心要打内战了,急调他们回国,就是要让他们参加内战,打共产党了。

在上海街头,刘善本看到的是大官财主们照样寻欢作乐、吃喝嫖赌,舞厅里舞女们的尖叫声,街头流氓们的嚎叫声,把整个上海弄得乌烟瘴气。

刘善本怒发冲冠,他彻底绝望了!

抗战胜利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却要把人民推向内战血海。

难道我能把美制炸弹扔到无辜的同胞头上吗?能够去为蒋介石杀害积极抗战的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吗?

一天,刘善本下班路过四川北路,看到书摊上有本《新民主主义论》,他翻开首页就看到标题是“中国向何处去”。

于是,他匆忙地看看四周,见没人,就买了一本带了回去。

书中那精辟的论述,好像是巨手一下子掀开了遮住他视线的帷幕。他突然茅塞顿开,捧着书思索了很久。现在的他才真正看清楚了,到延安去,那里才是中国的前途,既然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就跟着走!

从此,刘善本几乎天天秘密地定时收听延安和张家口广播电台的播音,他还从在解放区工作的二妹的来信中,不断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他正在积极地寻找机会并决意独自行动,驾机飞向他向往的地方——延安。



2. 刘善本导演的一场空中“闹剧”一直闹到了延安

正当刘善本积极筹划起义，苦于难找机会的时候，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机会。

一天，蒋介石突然下了一道手令：限令八大队6月26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这一天前，将昆明美军移交的全部无线电器材空运成都。

刘善本想：这准是蒋介石准备将这批无线电器材送往内战前线使用，内战看来已经迫在眉睫，八大队也开始被投入内战的赌注上来了！

这次，八大队共拟定派出7架B—24式飞机去完成委员长交给的任务。本来没有刘善本，可他主动找大队长王世箴，借口需要人掌握气象和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去执行此次空运任务。

大队长沉思了一下，他考虑到云南、四川雨季天气多变，为防不测风云，确实需要有一个像刘善本这样全天候、且又有丰富气象知识的航空队员去。

于是，大队长欣然批准了刘善本的请求。

6月19日，刘善本说：“今天天气不好，不能飞。”

事实上他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

他要归还清欠私人的债务；要考虑爱人、孩子、母亲及弟弟妹妹的安危；他要把隐藏在八大队当机械兵的五弟善初悄悄地送出八大队，暂到上海一家亲戚处躲藏。

6月21日晚，刘善本从机场回到虹口区迪斯威路（现改名溧



阳路)麦里一号空军家属宿舍的家里。家里除了爱人和3岁多的女儿外,还有母亲、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等八口人。

他坐在卧室的床上,抱着可爱的女儿,看着怀孕的妻子,他什么都没敢说,因为他怕动摇自己去延安的决心,要去延安的事他对妻子和母亲始终未敢吐露出半个字。

刘善本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母子说,他心里感到十分愧疚。当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不久,刘善本就到美国去受训两年多,妻子带着孩子吃了许多苦。现在,当她要生二胎的时候,刘善本又要远离她,甚至也可能是和她永别……他躺在妻子身边,望着眼前的亲人,两眼不禁涌出了泪水。

第二天清晨,刘善本强忍着分离之痛,和亲人们一一告别。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他一遍又一遍仔细地凝望着亲人们,含着依依不舍的泪水走出了家门。

早饭后,上海天气湛蓝一片,晴空万里。

刘善本驾机从大场机场起飞了。同往的共7架飞机,没有编队,各飞各的。他和530号机长、正驾驶员,机组共6人。

副驾驶员张受益,三十来岁,上尉军衔,大家都叫他小瘦子,是个直性子。通信员唐玉文是个年轻士官,空中机械师唐世耀也是士官军衔,地面机械师一人。绰号叫“鬼样子”的上尉领航员李彭秀,平时对国事政事不闻不问,只想跑单帮赚点钱。最近他正积极准备着结婚的事,盼望能赚笔钱回来办喜事哩!

刘善本等人驾机于当天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昆明。第二天,场站组织工人,把美军移交的大批无线电通信器材装进了机舱,共6000磅重,准备24日运往成都。

24日清晨,昆明市的天阴沉沉的,刘善本借口询问成都天气,



边地图盒里的手枪子弹取了出来,统统装进自己的裤兜里。

随即,他叫醒副驾驶员,把领航员、机械员都叫到身边说:“你们听,新津的导航台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重庆台的声音却很大。现在又看不见地面,我看不如先到重庆,再飞成都,免得迷失航向出事。”

谁知话音刚落,几个人都不同意。

“经过重庆,太绕路了。”张受益反对说,“在云上飞行不会迷航的,更何况地面已经通知新津机场,导航台一定会打开的。”

鬼样子抢着补充说:“我们也可以直接呼叫新津机场打开导航台。”

唐玉文随即发出了呼叫的信号。

刘善本心中十分恼火,他的理由本来也不充分,无法说服别人,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眼看着满机舱的现代化无线电通讯器材送不到延安去,他心里非常焦急。

于是,刘善本在飞机降落之前,又找机会把机械员的子弹夹放了回去。但是,副驾驶员张受益的枪摆在明处,无法放回去,也只好再等机会了。

530号飞机在刘善本的驾驶下,像一匹驯服的烈马平安地在新津机场着陆了,他把飞机滑到跑道一头,停在指挥员指定的停机线上。

可是,张受益的子弹夹还没有还给他,怎么办?刘善本的脑海里飞快地运转……

有了!于是,刘善本磨磨蹭蹭地不下飞机,假装在整理自己的行装,等其他人都下去了,他才从窗口向外喊道:“喂!谁的子弹夹丢在飞机上啦?”



刘善本想：小受一向爽直，又是我的同窗同事，如果能动员他和我共同发动空中起义，那岂不是更好？

刘善本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对自己说：“不妥！他是炮筒子脾气，装不住话，我告诉了他，万一他和我嚷起来可怎么得了？”

“机长！机长！”只听唐玉文和一位同事敲门，他们来约刘善本看美国电影。

刘善本把头伸出窗外，说：“可能马上要下大雨，我不去啦！”

唐玉文走后，刘善本想起了唐玉文在美国刚分配到自己的机组来的情景。

那天，他到机组报到时，刘善本见他是个中矮个子，性格文静，长得精干，话不多，像个腼腆的小姑娘。上司介绍说：唐玉文聪明好学，1944年在圣路易城等地学习无线电航空通信期间，他是第一个英语电报每分钟抄发达到30组的学生。

1943年秋，唐玉文在成都参加了蒋介石空军重轰炸机留美训练，他和刘善本等人被派赴美国受训，由于共同的爱好，刘善本和唐玉文成了好朋友。

能否对他讲明要驾机起义的事呢？又一想，还是不能，因为刘善本毕竟还没摸透他的底细，不能这样轻易地相信任何人，否则事情一旦败露，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外边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躺在床上拿过《华西晚报》看了起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接着，又看到上海群众反内战游行，要求停止内战的请愿，代表阎宝航、马叙伦和雷洁琼女士等在南京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等消息。

此时，刘善本心潮澎湃，气愤不已。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走到门口向外张望,周围无人。于是,他急忙从包里取出一张地图,并开始地图上标识,他想:同这些摸不清底细的人谈起义大事,弄不好要坏大事,倒不如自己下!

6月26日清晨,很闷热,天空阴沉沉的。

刘善本机组经过红牌楼拉上陈泰楷一块儿来到新津机场,准备再次飞回昆明去运无线电器材。

到机场后,刘善本先到气象台询问天气情况,工作人员的回答是:“还没有收到气象报告。”

“那请把最近的天气图给我看看。”

“嗨,早就不画那玩艺了!”

刘善本看到满屋灰尘,航空图散落得到处都是,于是,他顺手拣了些地图,心想:无线电器材带不到解放区,带些航空地图也可能会有点用处的。

陈泰楷不认识机组的其他人,只好在飞机前等刘善本。

刘善本把拿到的地图折好放进怀里走了出来,远远地看到老陈,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主意。

吃完早餐,大家在休息室里聊天,等天气预报。9点多钟,一个气象员跑来报告:“昆明的天气预报来了,可以飞。”

“其他地方的天气怎么样?”刘善本特别想了解西北的天气情况,但又不好直说。

气象员摇头说:“目前还没有收到其他地方的报告。”

刘善本想:成都下的这一夜大雨,说不定是受西北的气候影响,凭经验,他判定,西北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了。于是,他驾机起飞,很快就钻到云层上面。他把飞机对正了昆明的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让飞机自己平稳地飞着。



疗时认识了护士刘建生，他俩成了好朋友。刘小姐和他山盟海誓，并确定于今天动身去上海结婚。现在，要送共产党去延安，误了婚期怎么办？

“无论如何你不能去。”刘善本赶忙拉住小受劝阻说，“你这么大的火气，去了准坏事。你惹祸，弟兄们都要跟着遭殃。”

刘善本这么说，大家更慌了，都反对他去。他一屁股坐下来，叹着气说：“唉，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又不是外国。”

小受这句话打破了窘境。刘善本趁势又说：“对啊，反正延安不是在国外。再说，咱抗战八年没有死，要是这样和他们拼死了多冤枉！就送他们去延安！”

“去就去！”唐世耀说，“共产党没长三头六臂，我们也没有杀过共产党，怕什么？”

争辩的结果：与其同归于尽，还不如飞一趟。我们把共产党的人送去，共产党也得把我们放回来，他们不会恩将仇报吧！

“老李。”刘善本说，“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大家无可奈何，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只有“鬼样子”眉头紧锁。不一会儿，他突然一拍地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办法啦！”

刘善本皱了皱眉头，说：“我去告诉他们。”边说边站了起来。

“要得！”小受首先表示赞同，主动地接过了操纵盘。

“没有地图，去不了延安更好。”“鬼样子”等人露出了笑容，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机长的意见。

刘善本果真要到后舱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的地图，不能飞延安”吗？不！那是因为刚才张受益吵着要到后舱去找共产党说理，他很担心：“万一后舱的人跑到前舱来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到延安



去？谁是共产党？’那西洋镜不就全被戳穿了吗？”

他把手枪子弹推上膛，准备应付可能突发的机上战斗。

走进后舱后只见陈泰楷两手抱头，躺在后舱二层甲板上，其他几位年轻军官也无异常举动。他轻吐了一口气。

“老陈！”刘善本一声唤，陈泰楷猛地坐了起来。

“你知道，我们要到延安去，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刘善本边说边拍拍腰间的手枪，“你可千万不要再到前边去！否则，发生生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

突然，刘善本感到飞机在下降。他心里一咯噔：不好！要降落吗？他顺手把弹舱门关好，匆忙奔回驾驶舱，问：“怎么了，飞机下降这么厉害？”

“准备飞回新津机场降落……”副驾驶说。

“机长，是这样的。”“鬼样子”抢着说：“新津机场快到了，我们想趁你去缠住他们的时候，把飞机偷偷地降落到机场上，抓住他们去请功？哈哈！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既不能去延安，又能为党国立功！”

“胡闹！”刘善本怒斥他，“快升到原来的高度，不要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

“怎么啦？”“鬼样子”问。

刘善本用命令的口吻说：“我是机长，听我的！快上升高度。你想得倒挺美，想把飞机偷偷地降落，活捉共产党去报功。恐怕还等不到咱飞机后轮胎着地，我们就要挨手榴弹，吃‘花生米’啦！”

刘善本这几句话果然见效，机舱里的几个人嚷嚷开了：“哎呀，妈呀！共产党要动手吗？”

“快上升高度！”几个人听说共产党要动手，脸色都变了，一齐



催促副驾驶别再犹豫。

小受的心嘭嘭地乱跳,他也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共产党把飞机炸了,那么,我也不能回上海和刘小姐结婚度蜜月了。想到此,他忙转动方向舵,飞机徐徐抬头,立刻爬到原来的高度上。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气。

“不能上升高度!”“鬼样子”歇斯底里地威胁说,“绝对不能去延安!那里是匪区,到延安去是背叛党国!难道你们要……”

“什么背叛党国?好汉不吃眼前亏!”

“识时务者为俊杰!”

“难道我们要自找死吗?”

好几个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和他争吵起来。

“那怎么办?”“鬼样子”大声地质问刘善本:“降落不行,去延安又没有航行地图,你说,难道我们就在空中把油耗干等死吗?”

“别急。”刘善本看到飞机已上升到原来高度,心情轻松了许多,他强装镇静地说:“老李,弟兄们!别吵了,请冷静。大家听我的不会出大事。我作为机长,要全力保证大家和飞机的安全。”

“鬼样子”噘着嘴,还想说什么。刘善本笑笑说:“啊,弟兄们,干嘛都这么紧张,要死要活的,咱不能不死吗?想想飞行信念第十条是什么呢?”

“嬉皮创造性愤怒是罪恶!”不知谁马上对答。

“对嘛!”刘善本为了避免矛盾激化,特意缓和大家的情绪:“我们搞飞行的,任何时候都要冷静、正确地处理空中发生的一切故障和特殊问题。事在人为,唐世耀,你还记得去年冬天我们在长江三峡上空那次即将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是怎样化险为夷的吗?”

“记得,记得!”唐世耀和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终身难忘。”



刘善本点点头说：“现在的问题比上次严重吗？我们不是商量过吗？按照商量好的意见办，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请大家放心。”

“我们听机长的。”唐世耀深有体会地抢先表态。其余的人有的点头，有的咧嘴。

刘善本说：“刚才我的朋友说，他们的话既已出口，不管怎样，一定要送他们到延安去。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要冲到前舱来监视我们。我说：别去了，以免弟兄们精神紧张，心慌意乱，操纵失误，发生事故。我的朋友说，好吧，尊重机长的意见。不过把话对你说清楚，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平安送到延安，大家好见好散，和平解决；另一条是你们坚决拒绝去延安，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啦！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由你们选择！他们还说：地图就在你们那里。”刘善本边说边指着暖水瓶后边那堆乱七八糟的地图说，“咱们找找看。”

“报告机长！”唐玉文说，“地面电台不断地询问我机的现在位置，怎么办？”

“你告诉了没有？”刘善本反问。

“没有，我想告诉他们‘等待’可以吗？”

“很好！”刘善本赞扬说。他想：如果地面知道飞机上有人劫飞机，派飞机来追打就麻烦了。

领航员翻了翻那堆地图说：“没有。”

刘善本也过去找，又在自己提包里翻。最后，他把西北地图找了出来，十分惊讶地说：“嗨，共产党真有办法。瞧啊，他们竟敢把地图塞到我的手提包里来了！”

小受说：“我就知道你这朋友来头不小，估计还是个老资格的



地下工作者。”

其实,这两张西北地图是刘善本在上海时就早已准备好了的,并经多次测量,计算好了航程、时间、磁航向等有关数据。他还准备了一册导航资料、两支手枪和一个照相机等。起飞前的晚上,趁别人去跳舞、玩耍时,他又拿出这两张地图,偷偷地画出航线。为了防止别人认出他的笔迹,还特意用左手写的字。

领航员在地图上量过后,告诉机长从新津到延安的磁航向、距离,跟刘善本曾经测量过的差不多。李彭秀把磁罗盘的指标调在延安的航向上。飞机越往前飞云层越厚,云顶越高。刘善本考虑到若在更高的高度上作长时间的飞行,需要用氧气,便把飞机调整在3200米高度后钻入云中。从地图上看,飞行航线上距成都西边的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大山只有几十公里,为了防止偏航撞山,他把飞机向右转了90度,飞了3分钟后,估计过了那座高山,又向左转,对正了原来的航向前进。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得飞机刷刷直响,玻璃窗上水直流,飞机好像在水里钻。座舱里黑暗得很。刘善本开了十多年的飞机,从来没有飞过这样恶劣的天气。他原来估计西北坏天气已经过去,谁知竟是这样糟糕的天气,他的心情格外沉重。

“我们在云中乱飞一气,上下滚翻,把后边的共产党人摔昏了,抓活的!”“鬼样子”伸过头来,出了一个非常阴险毒辣的计谋。

刘善本对他突然提出的消灭飞机上的共产党的办法,一时想不出理由来反驳。他无可奈何地皱着眉头信口哇啦了几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啥。好在发动机声、大雨声响得很,“鬼样子”虽然听不清,但他看到机长的表情是坚决不同意,便缩回头去。

过了一会儿,“鬼样子”又说:“我们前边有伞,我们干脆跳伞,



让后边的共产党和飞机一块撞山去见阎王！”

刘善本听到他又提出更恶毒的主意，感到很难对付，只好又一次皱着眉头，对“鬼样子”哇啦了几句，表示不同意。

飞机上的气氛一紧张，早把张受益的瞌睡虫吓跑了。他来精神后，不断地替换、协助刘善本驾驶飞机。

从成都飞向延安，对刘善本机组来说，是处女航。飞长途的新航线，即使是好天气，也很困难。今天这么复杂的气象，真是难上加难，他不断地检查地图，仔细观察飞机上那十个人的言语举动，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事件。

突然，他发现要经过的秦岭最高峰是 4100 多米。这时，无法判定飞机的确切位置。为了避免飞机撞山，他只好把飞机升到了 4300 米高度飞行。

飞机爬高，领航的鬼点子又出来了：“他们后边都没有氧气，我们继续爬高，使飞机升到万米高空，把后边那几个家伙活活憋死！”

刘善本既要操纵飞机、指挥大家与恶劣的气候拼搏，又要重点对付这个“鬼样子”，心中真是又气又急。

李彭秀是个经验丰富的领航员，他提出这些对策都是很阴险毒辣、行之有效的击败劫机者的措施，也很容易被同事们采纳、接受。如果真拿它对付劫机的敌人，那是能致敌于死地的。

刘善本意识到，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大家本来就有恐共、怕去延安的心理，再被重新挑逗起来，那就糟糕了。说不定要去后舱打起来。

“鬼样子！”刘善本真火啦，他大声说，“鬼样子，你怎么啦？你是不是跟我们大家过不去？我再提醒你：共产党人还说了，他们把集束手榴弹捆好，放在机舱里，把手枪子弹推上了膛，只要发现我



们有敌意行动,他们就先打死我们,再炸飞机。你三番五次地要拖我们往死路上走,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你别尽出鬼点子啦!”小受的暴躁脾气又来了,“刚才听你的话差点闯了大祸。我们去延安好去好回嘛!”小受哇啦哇啦地和他吵了一顿。

刘善本以攻为守,果然有效,此时,“鬼样子”基本上被孤立起来了。他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可过了一会儿,狡猾的“鬼样子”又说:“现在天气这样坏,西北山多且又高,没有无线电导航不行,要他们告诉我们延安导航台的波长呼号。”

刘善本想:他这话好像是从保证飞行安全出发,但也可能是又在耍花招,刚才我去后舱,差点出了大事,现在,不能再离开指挥的岗位。

“问过了。”其实,刘善本能向谁去问?他为了对付“鬼样子”,果断地回答说:“他们说,按照导航资料上的波长呼号飞。”

刘善本随手把准备好的那本导航资料丢给了“鬼样子”。

李彭秀按导航资料调整无线电罗盘,立刻找到了。刘善本觉得很奇怪,噢,我本来是为了搪塞他的呀!

延安导航台是在有要求的情况下才开放的,可我们预先没有联络呀!莫非碰巧他们正在开放!

刘善本仔细听了听,噢,原来是李彭秀听错了无线电呼叫,前一个字母的电码,西安是 HA,延安是 YA,他把西安听成延安了。不过,他是真的听错了,还是故意干的?难道他要把飞机引导到西安去?李彭秀真是个难以对付的家伙,刘善本将计就计,不追问他,便把无线电罗盘“咔嚓”一声关掉,说:“节省电,反正距离还远,归航不可靠,等靠近时再用。”他怕按李彭秀对的这个电台飞,被归



航引导到国民党的西安机场上去。

他早做好了两手准备。万一找不到延安,就改飞张家口,他把张家口机场作为起义的备降场,继续冒雨向前飞去。

飞机穿云破雾,飞过秦岭,按计算再有 30 分钟就可到达延安。他看地图上的山脉都在海拔 2000 米以下,便把飞机下降到 2300 米飞行,这样便于观察地面目标,这时候雨小了,云也没有刚才那么厚了,灰白色的云彩从机头掠过,座舱里也比刚才亮堂多了。

刘善本忽然发现前下方有团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个云洞,他立即关掉自动驾驶仪,推机俯冲下去,猛然发现前方一座长满青葱树林的高山插入白云里。他急忙转动方向舵,拉起飞机,重新上升到原来的高度。飞了一会儿,又看见一个云洞,推下机头一看,云和山峰已经离开几十米。他们就在云下的山上飞行。

这时候,外面还在下着小雨,刘善本看到左下方出现了一条河,河东边有个城市,按飞行的方向、速度、时间计算和依地形、河流看,这里应该是甘泉。但是,在他用的这张日本出的地图上,甘泉在洛河两岸,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是否迷航了?

这时,“鬼样子”已经变得无精打采了。他既不向外看,也不看地图。刘善本只好把地图拿过来,自己计算,如果这里就是甘泉,那么,从甘泉到延安只要 8 分钟。

于是,他改飞行航向 10 度,向下看,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飞了约 8 分钟,过了一座山岭,忽然看到有三条河岔。一片开阔地展现在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见城市,也没有机场,刘善本驾机在三岔河上空盘旋寻找,可是仍然看不到机场。

他问过以前到过延安的飞行员,他们都说延安的机场很简陋。莫非近年来已经开荒种了庄稼?但是,城镇还应该有呀,按说延安



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城镇。为什么找不到呢？难道我们真的迷航了？

“看，那边有房子！”小受忽然喊了起来。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座青砖瓦房。刘善本立即向右转弯，一条明显整齐的跑道出现在眼前，他高兴极了，对正跑道右边山飞行，这才看见左边山腰上有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窑洞。他断定延安城就在这里！

刘善本驾机向左急转弯，转动方向舵，对正了跑道，将机头向下一推，迅速下降高度，减速，下滑，着陆……成功了！

此时，刘善本仍然没有放松警惕，他没有关掉发动机，坐在机舱里观察情况，一旦判明不是延安，他要随时准备紧急起飞。

突然，他发现左边深草丛里有两个士兵端着长枪，猫着腰向飞机冲过来。刘善本看到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心头略喜，直到清楚地看到他们穿的灰色军服，他才完全放了心，伸手把四个发动机全部关掉了。

这时，刘善本紧张的心情才随着发动机的平息而逐渐平静下来。一阵阵胜利的喜悦涌上心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他把头转向外面，对着窗口热情地向前来的军人招手，对方隔着机舱的玻璃窗，立刻看见了他的友谊的手势，互相看看，便半信半疑地直起腰，端着枪跑了过来。刘善本立刻打开机舱门，收起所有的手枪，首先跳下飞机，跑到带手枪的军人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是反对内战来的！请各位立刻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报告！”接着就把四支手枪全部交给了他。

“你是什么人？”来人警惕地问。

“我，我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

“欢迎，欢迎，热烈地欢迎你！”二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噢！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飞机后舱有人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在窗口前问。

“到延安啦！”刘善本拉长声音回答着，说着他气愤地把头上戴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军帽帽徽摘下来，扔到了地上。

3. 接济刘善本妻子的原来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中豪杰——施剑翘；帮助刘善本妻子的竟然是国民党四十七军情报处长——郑钧汉

自从刘善本去四川、云南执行空运任务后，一直杳无音讯，他的妻子周叔璜心急如焚，心乱如麻。

一天，她突然听说：“刘善本的座机撞山了。”犹如晴天霹雳，周叔璜几乎昏死过去。悲痛欲绝的她从此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不相信这是事实，善本是“刘太平”啊，他怎么会……

但是，毕竟飞机升空三分险，遇到恶劣天气、紧急情况，出事也是可能的，她害怕极了。

一天，刚刚入睡的周叔璜，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刘太太，刘太太！”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她赶忙穿好衣服下楼开门，站在眼前的是天天见面的清道夫老赵。

老赵平时从没到过她家，今天是干什么来了？还没等周叔璜想清楚，老赵迅速塞给周叔璜一封电报，转身便走了。

电报上写的是：“他已平安到达延安。”

周叔璜反复看着电报，她无法判断真假，这些天她也确实听到有人说“刘善本逃跑了”，还有的说“刘善本失踪了”。不管人是死是活，这封电报必须马上烧掉，周叔璜顺手把电报扔进了炉膛。



自从刘善本离开上海到达延安以后，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即命令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派警察和特务把虹口区迪斯威路麦嘉里一号——蒋介石八大队家属院包围了，正怀着身孕的周叔璜被软禁了。

一天早饭后，突然有辆美式轿车停在了她家门前，从上面跳下了几个人。领头的正是八大队队长王世箴，接着是八大队政训处主任李承初，他俩是陪同南京航委会特派员王道忠来的。

王道忠是熟人，在兰州曾和刘善本一家同住一个院子。平时不来往，今日登门莫非有什么事情发生？周叔璜心头不由地紧了一下，几个人不禁沉默了下来，片刻以后，王世箴便忍不住开了口：“刘太太，”王世箴强装关心地问，“太平一向本分，怎么听说突然跑到延安共匪那边去了？”

周叔璜惊愕地望着他一眼，没有说话。

王世箴又紧逼道：“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明天我去南京，也好当面代你向老头子讲明情况。”

机敏的周叔璜马上明白了，这是蒋介石要亲自追问王世箴了，蒋介石要是向他要人，他可就……

周叔璜接过话茬反问：“刘善本不是你派他去昆明了吗？我没向你要人，你倒反问我，你派他走了，我一家老小日子怎么过？”

王世箴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王道忠见状，急忙补充说：“刘善本是个老实人，他做什么事不和别人说，总应该和你说一声吧！你好好想想，他临走前和你说了些什么？他从家里带走了什么？”

“他就说是王科长要他去执行任务。”周叔璜又加了一句，“走时什么也没来得及带，和平常飞行一样呀！”



她。周叔璜一见面觉得很奇怪,在记忆中,没有这位表姐,更未见过这位表姐夫啊!

这对年轻的夫妇到楼上周叔璜的卧室里闲坐了一会儿,留下钱就走了,以后便是清道夫老赵送钱来。

有一次,一位老邮差把一封沉甸甸的信塞到周叔璜手里,周叔璜赶快装进口袋,跑到楼上打开一看,啊!是五条黄灿灿的金条,一条一两。

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一次,周叔璜抱着孩子去菜市场买菜,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提的篮子和她的篮子一模一样。周叔璜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周叔璜买什么菜,她也买什么菜;周叔璜买多少菜,她也买多少菜,她还主动地帮周叔璜抱孩子。周叔璜开始对她有些戒备,等到周叔璜回到家里取出菜时,发现篮底竟放着一包金圆券。周叔璜再仔细看,篮子也不是自己家的那个了。也不知道是啥时候篮子被那位妇女换去了。

一天中午,国民党空军的一辆轿车开了过来,车停稳后,下来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这女士身穿黑香云纱旗袍,头发剪得短短的,长相和穿戴非凡,派头不小,有些盛气凌人,一开口就大声训斥在刘家执行监视任务的几个特务。

特务们知道,刘善本的案件是蒋介石和郑介民主任亲自抓的。这个女人乘的是空军轿车,可能是蒋介石空军总司令部的大人物,也许是南京新派来的特工人员,他们不敢盘问,问出事情来咋办?

正当那些人忐忑不安时,那位女士又由施威变为施恩,赏给他们钱去买汽水喝。她趁警戒人员去买汽水的间隙,来到楼上和周叔璜寒暄几句之后,拿出几叠金圆券放到桌上,请周叔璜快收起来。周叔璜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她也搞不清这位不速之客是



延安的还是南京的？哪里敢收她的钱。

“我叫蔡梅影。”女客人很直爽，她好像猜透了女主人的心事，自我介绍说，“刘太太，是周恩来先生和邓大姐用了激将法才促使我壮着胆子来给你送点生活费的。难道能眼看着让你一家老少挨饿吗？”

周叔璜听了她的自我介绍，还是半信半疑，没有答话。

坐在对面的蔡梅影又对周叔璜解释说：“是这样的，昨天我到周先生家，邓大姐对我说，‘有个航空队员为了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去了，家属还留在上海，他这家人怎么办呢？恩来很关心她们，可是，她那里又被军统特务封锁得很严，想救济他们些生活费，谁敢去一趟！’我说，‘难道反内战有罪吗？他家属该饿死吗？你不要多说了，我去。邓大姐，您拿钱来吧！’就这样，刘太太，我今天就成了你家的不速之客啦！”

女士留下钱下楼时，碰到正在客厅里喝汽水的—个军官，她厉声向军官喝道：“好好看着，别叫人跑了！”

军官立正：“是！”

来周叔璜家的这个女人，其实不叫蔡梅影，此人真名叫施剑翘，是苏州从云小学的一位教员。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半，她曾在天津市佛教居士林的大殿里枪杀了前五省（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大军阀，为父报仇雪恨，成为为民除害的世界闻名的当代女英豪。

她的父亲施从滨是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在皖北固镇战役中，被孙传芳部队俘虏，解往蚌埠市。孙传芳无视国际公法，竟然残杀俘虏，将施从滨枭首示众。

当时才20岁的施剑翘痛不欲生，誓报父仇。10年后，她终于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亲手开枪将仇人打死，闻名全国。她在重庆多次拜见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对施剑翘很信任，又知道她在蒋空军中有熟人，于是，就决定将此事拜托给她。施剑翘立即从苏州专程赶到上海，欣然接受了这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当时的周叔璜当然不知坐在对面的这位自称是蔡梅影的女士就是名扬中华的施剑翘，这个秘密直到解放后才揭开。

那是解放后的一天，周叔璜陪同刘善本到全国政协礼堂看戏，正巧，周总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也来看戏，并且坐在他们的前一排，他们彼此问候之后，邓颖超又转过头来问周叔璜：“1946年在上海给你们送生活费的施剑翘，后来，你见到过她没有？”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周叔璜想了一下说。

“当年总理和您派去给我送钱的那位自称叫‘蔡梅影’的女士找过我两次……”

“嗨，就是她！”邓颖超恍然大悟地说，“‘蔡梅影’是她的化名，‘梅影’就是没影，国民党特务想要抓她，她就无影无踪啦！那是她为了对付敌人起的假名，她的真名叫施剑翘！”

时局越来越紧，由于蒋介石的破坏，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国民党限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全体人员于1947年3月撤离上海，周恩来被迫撤回延安。可是，他又不能带周叔璜他们去延安，于是就托人转告周叔璜说：“最好你先离开上海，回四川娘家去。刘善本的母亲、弟弟、妹妹们回山东老家。至于今后怎么到解放区去，再根据情况另想办法。”

周叔璜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就和家里人商量，按照周副主席的意见办。于是，便向八大队和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带孩子回娘家去。



上海空军司令王叙铭也不敢轻易杀害一个怀孕的航空队员的妻子,他说:“留个家属怎么办?‘放长线钓大鱼’,钓了半年,一个鱼也没钓住。现在,她孩子也生了,留她有什么用,还不如让她回四川算了。”国民党特务也觉得从周叔璜身上捞不到油水,也就只好同意让周叔璜回四川。

不久,周叔璜把家具全部变卖了,给婆母他们做路费。她带着兰平、海平两个孩子,在两个特务的押送下,回到了四川丰都县。

但是,国民党县政府要周叔璜找人作保才释放他们,周叔璜拜托姐姐和姐夫请了十家人做联环保,才把他们保释出来,住在县城中正路妈妈家里。在办保释手续时,有规定:周叔璜和兰平、海平这三个人中如果跑了一个,县政府就要拿那十家保人抵命。

周叔璜仍然在特务机关的监视下生活,随时都有被再抓和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谋生,周叔璜在姐夫家的均灵医院帮忙,学做药房工作,顶个小工用。一个人艰难地抚养着两个孩子。

1949年秋季。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被人民解放军二野和一野十八兵团及四野的一部打得大败而逃。他们纷纷向四川境内溃退,妄图依靠山区保存实力,将来东山再起。

一天,中央军第四十七军要强占民房,就连私人开设的小医院也要霸占,这家医院正是周叔璜大姐周叔梅和姐夫陈原基开的,一个军官一定要他们把三间住病人的房子腾出中间那间来给他们住。周叔梅坚持腾边上的一间,那军官说:“老子给你们拼命打共产党,要你腾个房子还不干。”

正在双方激烈争吵的时候,突然来了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他问清了情况后说:“这医院你们不要占了,另外去找房子。以后,弟兄们有生病的还可以到这里来看病嘛!”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周叔璜看这个人很面熟，而这位情报处长也早就认出周叔璜来了。周叔璜忽然想起来了，这个情报处长不就是蒋空军八大队在兰州电台的报务员郑约汉吗？周叔璜、刘善本和他都很熟悉。他突然出现在面前，周叔璜心中有些忐忑不安，是不是来抓我们娘三个的？

周叔璜正想着，情报处长向她走了过来，对周叔璜大大咧咧地说：“到了这个鬼地方（丰都），真不好找。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门牌号码，可是没有找到你，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

“谢谢您了。”周叔璜不明对方身份，不卑不亢地回答。

情报处长没再说什么，笑了笑走了。

后来，这位情报处长又来到周叔璜家，并特意带来一笔钱，还送给兰平一个玩具小汽车。10月1日那天，他又来约周叔璜到她原来读书的中学——适存中学听广播。

电波传来一阵久违了的亲切的声音，啊！那是丈夫的声音！周叔璜清晰地听到了刘善本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讲话，周叔璜如同做梦一样。啊，善本还活着，确确实实还活着！这时，她高兴得几乎心都要蹦出来啦！

情报处长郑约汉也喜形于色地微笑着看着周叔璜。周叔璜一时猜不透他是真高兴，还是假意献殷情！

一天晚上，周叔璜正在医院结账，郑约汉又突然来找她，而且神情紧张地说：“请你给我找件便衣，再借点路费，我暴露啦！今晚上就得走，上面还未发月薪。”

周叔璜对他还是猜不透。

原来，这位蒋空军的报务员，在从兰州调往成都时，他绕道走到延安后就起义了。党又派他到四川来做策反敌军的工作。他的



这段经历蒋帮不了解,并提升他当了国民党陆军四十七军情报处长。由于他工作不够老练,不让部队占医院,和周叔璜接触了几次,并且同周叔璜一起去其母校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等一系列活动,引起了蒋特务的注意和怀疑。

郑约汉又低声告诉了周叔璜几句话,周叔璜听了大吃一惊。她说:“谢谢你的关怀。不过你来得不巧,如果早来一会儿就好啦,我刚才把账结算清了,把钱交给掌柜了。”

情报处长听了非常焦急。

周叔璜想到这些天他对自己及家人的关心和帮助,便把自己仅有的金手镯押掉,凑了几十块银元给了他,又把她父亲遗留下来的衣服找了件给他。

郑约汉处长和另一个人一起连夜逃跑了。临走时,他再三叮嘱周叔璜:“你千万不要再呆在这里了,一定要马上逃跑,重庆的大屠杀马上就要开始啦!无论被他们在押的,或是能够抓到的,即使是亲属子女,也统统格杀勿论。”

周叔璜带着两个孩子深夜两点钟逃走了,离家之前请求大姐和姐夫分头替她去通知十家联环保人,他们闻讯也都连夜逃走了。

周叔璜背着3岁的海平,拉着6岁的兰平,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处境十分艰难。她心急如焚,惟恐敌宪兵突然尾随追来。娘仁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一步三跌地往前跑,走了半夜和一整天,才跑出60华里,到了一个老乡家里歇歇脚,那家好心人给她们煮了些面条吃。住在这家,周叔璜还是很不放心,生怕宪兵队赶来,第二天天刚亮,她叫醒两个孩子又继续走上逃亡之路。

周叔璜娘仁就是这样在外边整整逃了两个多月。



会,甚至八大队的主官们,谁也不知其去向,一直不敢吭声,以为是气候恶劣撞山失事了。

正在蒋空军当局无法向委员长交代、万分焦急的时候,陈立夫深夜接到了潜伏在延安的特务直发国民党中央的特急密电:“刘善本等11人窃B—24式飞机530号,于26日下午到达延安。今探实是刘等所谓反内战而叛逃,刘是主谋。‘共匪’在延安已开了欢迎大会……”

陈立夫看罢电文,吓得脸色惨白。正当老头子杀气腾腾,恨不能一口将“共匪”吞灭的时候,怎能发生这种事情!

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便和航委会联系,从航委会那里得到证实:6月26日,确实有一架飞机从成都飞往昆明途中因气候恶劣失踪。驾驶员姓名、飞机机种、号码等都与密电一致。跑掉一架飞机,已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了。他摸了摸脑袋,不敢马上去见蒋委员长,但又不敢不如实报告。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来见蒋介石了。蒋介石听了之后气得两眼直呆呆地盯着陈立夫,陈立夫赶紧垂着头向门外溜去。

“回来!”蒋介石嚷着,“娘希匹!出了乱子你到哪里去?”

陈立夫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他转过身来,连气也不敢出,低头站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用手拍了拍秃脑袋,说:“哼!我想起来啦!这个刘善本就是那个‘刘太平’对吧?你们和航委会不是曾经再三向我推荐,说他忠诚老实,诚信三民主义,技术高超,是空中明星,要他来接替美国人给我开‘美龄号’专机吗?那个调令发了没有?”

“发了。”陈立夫又忙改口说,“哦,没发。准确点说,准备发,但是还没有发。因为美国飞行员说和他们订的开专机的合同还没有



到期,还差……”

“要续订合同。”蒋介石说,“我看,还是美国人可靠,他们是绝对不会把我的专机开到延安‘匪区’去的。如果是我坐在刘善本开的飞机上面,那他岂不是也要把我带到延安向‘共匪’献礼了吗!娘希匹!多么可怕的‘刘太平’啊!差一点又要演‘西安暴乱’!”

蒋介石一提起西安,他就想起当年被张学良、杨虎城把他扣押在西安的情景来了。他咬牙切齿地嚷着:“好一个‘刘学良’!”

陈立夫吓得胆战心惊,支支吾吾地说:“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说什么绝对不可能,很有可能!你们越来越蠢啦!以后,再也不准跑飞机啦!再跑,我看你和郑介民(军统局长戴笠乘飞机于1946年3月17日摔死后,郑介民任代局长)能长几个脑袋!”

“是!”陈立夫回答,“在我们力求在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非常时刻,发生了这种事情,让党国和您丢脸。而且,在美国朋友面前也不好交代。都是学生们不争气,没有做好防范工作。”

“你懂得就好,别小看跑这架飞机,这不是一架飞机的问题!美国现在真正的敌人和对手是苏联。我们把美制的重型轰炸机没管好,跑到‘共匪’那里去了,这岂不等于是把美军的现代化飞机技术情报送给苏联人了吗!美国人追究起来,我们作何回答,要赔偿他们多少钱。而且,美国以后还能把新式飞机卖给我们吗!”

“哎!”陈立夫看着老蒋那副焦躁样,不敢再作答话,心想:咳!怎么问题偏偏出在这种时候,又出在美国培训的最现代化装备的八大队。八大队是委员长的掌上明珠啊,党国空军曾声称:“八大队如果把36架B-24式重轰炸机开到前线去,能把共军吓死!”

几乎同时,在延安,毛泽东却看到了另一条消息,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特大新闻:决心退出内战漩涡,刘善本上尉



驾机飞延安。一时间,报纸电台纷纷争相报道了这条震惊中外的特大新闻。《解放日报》同天头版还同时报道了《延安举行欢迎晚会》的消息,毛泽东亲临,朱总司令致词:“刘上尉退出内战的义举,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高潮已经到来。”

从7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刘善本等驾机起义的第一条新闻起,到9月底止,《新华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刘善本驾机起义的有关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各报先后发表的有关人士包括刘善本亲属、同学等发表的贺电贺信达70多篇。美国的《华侨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国民党空军四大金刚之一,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的消息。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在美国受训的蒋空军人员的反应更是强烈,反蒋、反内战的情绪一浪高过一浪。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杨尚昆找刘善本等人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党中央和总部准备给你们分配工作,派你们到东北去参加我军第一所航校的建设,不知你们是否愿意去?”

刘善本当即表示愿去,其他人也都想去。

杨尚昆说:“很好,我把大家的意见向军委首长汇报,是否去,何时去,请等通知。”

刘善本从《解放日报》上看到蒋介石正在更加频繁地调兵遣将,准备全面进攻解放区,胡宗南也在陕甘宁边区外屯集了几十万人,扬言三个月内把共产党赶出西北去,形势十分严重。

然而,延安却仍然保持着它那特有的沉着和镇定。杨家岭周末舞会照常开;中央大礼堂里的节目照常演出;逢五逢十,附近老乡牵着毛驴,带上自产的红枣、香瓜、烟叶、羊皮到延安赶集市,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过,刘善本还是看出了延安外松内紧的



异常情势：街头穿军装的人显然少多了，驻延安的战斗部队虽然已开往外线去迎击来犯之敌了，延安只剩下少数卫戍留守部队，形势很紧张，刘善本暗暗在为延安的安危担心。

可是，当他每天晚上看到杨家岭、枣园闪烁着彻夜不息的灯光，想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党中央就在身边时，心里就踏实多了。

一天早饭后，他接到党校一位同志的通知：“毛主席请你们去一趟。”唐世耀、唐玉文、张受益等起义人员听了都十分高兴。

毛主席住在杨家岭的一排普通窑洞里，到了主席住处，毛主席正在埋头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电报、报刊。看到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进来，忙起身招呼工作人员搬椅子，倒茶水，说：“都是熟人嘛，莫客气，请坐，请坐。”

毛主席身穿延安生产的粗黑呢制服，住的窑洞和其他同志的一样，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几只木箱子，还有几把旧椅子和几条旧凳子，床铺是用木板搭的。

刘善本看着毛主席这位高大魁梧的共产党领袖，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你们从前驾着飞机跑东跑西，还跑到地球那边的美国去。”毛主席风趣地说，“可是，我们1934年从江西出发长征到延安整整走了一年呀！”他看了看刘善本，又说，“延安是个小县城，比不上国民党的重庆、上海。你们来了三个月，先谈谈对这里的印象吧！”

“延安很好！”刘善本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延安到处生机勃勃，这里的人们充满了信心和活力。”

“延安是团结、进步的象征，和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军队和老百姓就像一家人，连外国人在这里也很守规矩。”



大家争先恐后地和毛主席拉话。

毛主席听着,点了点头说:“国民党那个宣传可信不得罗!”

毛主席回顾说:“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吓唬老百姓说,‘朱毛、朱毛,共产党都是红胡子、红头发、红眉毛’后来,有位老乡见到我就特别注意端详我的长相,他看了看,一拍大腿,说:‘嗨!怪罗,你也是长黑头发嘛!’所以说,国民党那个宣传可不敢信啊!”

刘善本等人听了哈哈大笑,顷刻,大家一下子轻松了。

谈起刘善本他们将来的工作,毛主席接着说:“听说你们不怕吃苦,都很愿意到东北航校去,这很好,到了那里,你们就可以大显身手,英雄有用武之地罗!”

“那里的条件很艰苦,但艰苦得有意义。我们要在陆军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建立人民空军。你们是在还没有人民空军的时候,去筹备创建人民空军的,是人民空军的创始人之一,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也是十分光荣的。”

“国民党搞了几十年,用钱买了一支小小的空军,还常吃败仗。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他,但是,将来的前途无限。新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一定要自己制造飞机!所以,我希望你们把眼光放得远些,要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为创建人民空军建功立业。”

刘善本等人听了毛主席的话,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感到浑身是劲。

毛主席用右手搬着左手指头说:“你们到东北去,一路上要通过陕甘宁、晋绥、晋察冀、东北等好些个解放区。你们沿途可以做些调查研究,把解放区和蒋管区,共产党与国民党进一步作比较,这样可以加深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理解。”

毛主席和刘善本等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主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席休息,他们才知道毛主席习惯夜里办公,白天睡觉,耽误了毛主席的睡眠,大家都过意不去。

这天,毛主席非常高兴,没有丝毫睡意,一定要留刘善本他们吃午饭,他叮咛工作人员,菜里要多放些肉,因为听说到东北去,不大能吃到肉。中午,毛主席和刘善本等四位起义人员就在他住的窑洞里吃了一顿便饭,也算是为他们饯行。

刘善本接受了毛主席交给的参加创办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后,心里无比高兴和激动,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光荣的人民空军创始人的一分子。

刘善本离开延安的前夕,又和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到杨家岭向毛主席告别。来到杨家岭,他们老远就看到毛主席在窑洞前的草坪上踱步,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见到他们,特别高兴,关切地握住刘善本的手问:“你们过冬的棉衣是否准备好了?东北冷得很,搞不好会冻掉耳朵、鼻子的!”

“前几天,总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件皮大衣和新棉袄,还做了一套呢子制服。”刘善本回答。

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很好。”他转身告诉工作人员,“快去请总部摄影的同志来。”

“你们这次是长途跋涉。”毛主席继续刚才的谈话,“交通嘛,碰到什么就用什么,有马骑马,有车坐车,有船乘船,什么都没有就走。有时,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如果行不通,不要强行,可以暂时住下,然后再走。不要着急,不要硬碰,否则很危险!当然,沿途各个解放区都会派人照顾你们的。”

“你们要特别注意安全。有情报说,蒋介石下了手令通缉你们,派特务到处找你刘善本。所以,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不过,蒋



介石下通缉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是曾悬赏要捉我吗?去年,我去重庆登门拜访他,他又不敢抓,又把我送回这个山沟沟里来了。总之,我们在安全上,既不能大意也不要害怕。”

刘善本十分感动,他一再请毛主席放心,誓死完成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到了东北后,要向周围的同志学习,搞好团结,要加强政治学习。我建议你们读一读《社会发展史略》。”

毛主席说着,示意秘书拿来四本《社会发展史略》,亲手赠给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

几个人双手捧着毛主席赠的书,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干一辈子革命。

正说着,总部摄影师来了。

“来!”毛主席亲切地拉着刘善本的手笑着说:“留个纪念吧!”

于是,毛主席站在中间,刘善本等四人分别站在左右两侧照了一张相。照完相,大家要走了,毛主席再次和刘善本等人一一亲切握手,说:“祝同志们旅途顺利,请多保重!”

“请毛主席多多保重!”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毛主席,再见!”

9月25日一早,刘善本和他的航空队带着简单的行李,肩负着领袖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离开了延安。

总部为了照顾他们,给刘善本四人每人配了一匹马,其余的同志每四人配一匹马,中央首长还特别给刘善本配了一名警卫员,发给他一部日本造的收音机。

在延安虽然只住了三个月,现在要离开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刘善本着实舍不得,他挥泪上马,径直向东北方向走去。

中央和总部已经给沿途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发了电报,



要求他们要保障好航空队的安全和生活,并要求不准以任何借口留用这批航空人才。

沿途,航空队经过晋察冀解放区时,受到了薄一波和邓小平同志的热情接待;走到胶东半岛时,他们受到了许世友司令员的接待,许司令还派了三个连的兵力护送他们,冲破了敌人的海上封锁。经大连绕道朝鲜、最后到达哈尔滨时,林彪、彭真、李立三为他们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经过四个多月的行军,行程2万余里,航空队跋山涉水,漂洋过海,冲破了敌人层层封锁。在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掩护下,最后终于到达了祖国东北边境上的一个小镇——东安镇。

这就是我军最早的航空学校所在地。

“东总”任命刘善本为航空学校副校长,张受益任训练处副处长,唐世耀任机械科副科长,唐玉文任通信教员。

从此,刘善本的命运便和人民空军的成长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刘善本来航校不久,为了尽快适应空军发展的急需,首先向校长建议尽快成立领航班。

他知道,现代战争大型轰炸机、运输机,没有领航人才是不行的,他渴望着人民空军的领航员能带领着自己的轰炸机,去轰炸南京蒋介石的总统府。

创业是艰难的,处于战火纷飞的险恶环境创建航校更难。蒋军不断派飞机来轰炸机场。蒋介石命令:地面打不过去,就用空军消灭共军航校,炸死刘善本。

面对敌机的频繁轰炸,学员们只好每天夜间3点钟起床,天亮开飞,8点停飞,转入学习,教室就设在机场。没有教材,自己编写;没有桌椅,就用背包;没有电灯,就自己做油灯;没有教具,就自



已设计制作；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

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刘善本教出的中国第一期领航班的学员们终于飞上了蓝天。

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即将举行全国性反攻。

为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转变，驻在松花江南岸扶余、长岭的第一纵部队亟需南下的作战地图。“东总”急电航校，命令航校火速派飞机前去送图。

接到命令，刘善本根据敌情和任务，连夜组织飞行员和学员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和航行计划。按照刘善本的要求，飞行员始终保持600米以下的低空飞行，避开了敌人的雷达侦察，顺利到达扶余、长岭一带的空投地点，将地图全部投掷到位。航校的学员们为秋季反攻立了一大功。

时局发展极快，解放军1949年1月31日进入北平。北平守敌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和平改编。至此，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宣告结束，蒋军154万余人被歼，大半个中国解放了。

刘善本又奉命前往北平接收国民党飞机，就住在南苑机场，当时南苑守敌已经逃至北京南面的大红门一带。

国民党空军在南苑机场储备了大量的航空器材，有67个大型机库和一个修理厂，还有没来得及起飞逃跑的10架飞机。不甘失败的蒋空军不断地炮击和空袭机场，刘善本和航校的学员奋不顾身日夜不停地抢运和疏散，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急速南逃，我军乘胜追击，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后，江南和西北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8月的一天下午，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突然找到刘善本，当面交



刘善本仔细一看,那瓜上都写有收授者的名字。原来,彭总又特意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首长每人送了两个哈密瓜,还给在北平的几位老总各送一个。彭总委托刘善本负责把这些哈密瓜转送给各位领导和同志。

毛主席、朱总司令知道刘善本负责给西北野战军先头部队送去了军饷后,十分满意。

西北野战军有了军饷,继续向祖国大西北挺进,追歼国民党匪军和马步芳、马鸿逵等残匪。

9月21日19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刘善本坐在会场里聆听毛泽东致开幕词。开幕式历时4个小时。

毛主席的致词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当主席讲到:“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时,刘善本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会议期间,在休息室里,刘善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像看到老朋友那样走过来,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问:“中央已经批准你入党,你是否知道了?”

“我知道了,谢谢主席的关怀。”

“你爱人和孩子现在在哪里?”毛主席又关切地问。

“听说,她们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押送到四川老家去了。”

“噢。”毛主席点点头,停了片刻又说,“她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成都、重庆也快要解放了,你赶快写信,叫她和孩子们来。”

“谢谢主席。我一定写信叫她们快来。”

1950年2月,刘善本的妻子周叔璜和两人孩子终于被接到了



北京,北京空军参谋长王秉章又派司令部警卫战士专程把她们送到哈尔滨,刘善本一家终于幸福地团圆了。

5. 伴随着人民空军成长的进行曲,刘善本 五次光荣飞越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阳光灿烂,古老的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前汇集成了人的海洋。30万刚刚翻身的劳苦大众欢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地庆祝自己亲手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内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都准时到达了大会主席台——天安门城楼。

15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

由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光辉灿烂、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徐徐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艰难之后,今天,终于站起来了!

毛主席讲话完毕,隆重的阅兵式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任阅兵式检阅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受阅部队成分列式通过主席台前,由东向西阔步前进。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骑兵师相继跟进。



接着,和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人民空军以空中分列式整齐列队由东向西,沿着东长安大街向着天安门广场上空飞来。

广场上 30 万双眼睛不约而同地向空中望去。人们雀跃欢腾,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今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刘善本等起义人员亲自驾驶的战机参加了隆重的阅兵式。

“看!”周总理用右手指着空中的战机对毛主席说:“那一群三头的大运输机领头的一架,就是刘善本驾驶的!”

毛主席点点头,一双大手不停地向空中挥着。

刘善本似乎看到了毛主席在向他招手,他在空中俯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汇成的欢乐海洋,不由想起了当年冒险驾机起义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机场的情景。

刘善本豪情满怀,翱翔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组织大机群飞空中分列式,是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由起义人员驾机接受国家最高领导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检查,也是世界上的首例。

在开国大典前夕的 9 月 21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作为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刘善本,亲耳聆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庄严地提出:“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自 1946 年 6 月刘善本光荣驾机起义起,到开国大典前,蒋介石空军就有 60 人驾驶 21 架各式飞机起义,并成为年轻的人民空军的技术骨干。短短的一年时间,为了保卫北平和党中央,军委决定并筹划建成了以 P—51 为主战飞机、由航空局直接指挥的人民空军第一个飞行中队。为了保证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共和国、



新政府的诞生,军委又于7月26日决定加强和扩大了飞行中队,航空局迅速命令将飞行中队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1驱逐大队,该队仅仅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担负起了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9月,军委又赋予该队担负起开国大典的飞行受阅和空中警卫两项重要任务。

任务十分艰巨,驱逐大队既要警惕地守卫刚刚解放的共和国首都北京上空的安全,又要圆满地完成举国首次空中受阅,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他们。

由于受阅飞机几乎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机种、机型不一。驱逐大队根据当时飞机的性能、速度和各飞行员能驾驶何种飞机的技术状况,临时编成6个分队,编号为第11分队至第16分队。

参加受阅各式飞机共17架,刘善本是15分队的带队长机。他的左僚机是1949年1月15日从青岛驾驶C-46到沈阳起义的飞行员邹耀坤,副驾驶员是王恩泽;右僚机是起义飞行员谢派芬。

为了保证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刘善本主动地与总领队徐兆文、邢海帆、方槐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计算。

阅兵指挥部选定了两个机场:南苑和西郊机场,分别作为起降机场和备降机场。设立了三个指挥塔台,即南苑机场塔台、西郊机场塔台和天安门指挥台。

老天作美。10月1日,北京天空格外晴朗。

在南苑宽阔的机场上,一排排银色、绿色、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两旁待命。

一架架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鲜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镶金黄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间的条纹。人民空军的飞行员正神采奕奕地整装待发。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的芭蕾舞。1950年2月6日,蒋介石派飞机对上海进行了大轰炸,上海的重要工业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

5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同时出兵入侵了中国领土台湾。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为了保卫上海,配合陆军和海军解放舟山群岛和台湾,立即于4月27日批准空军从各航空学校抽调速成班毕业学员组建三个飞行团,刘善本为轰炸团团长。后来,军委又命令在南京组建空军混成四旅,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旅长,李世安任旅政委,刘善本任副旅长。

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都十分重视和关怀人民空军的建设,在这支战斗部队成立之时,都对空军题了词。

军委主席毛泽东题词:“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朱总司令题词:“努力学习,掌握技术,为建设一支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奋斗。”

刘少奇副主席题词:“强大的人民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与民航事业。”

周恩来总理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邓小平题词:“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陆军结合起来,我们将是无敌的!”

面对蒋介石匪帮的不断挑衅和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的急骤升级,军委要求混成旅领导一定要把部队建设好,带出好的作风,抓紧训练,使之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争取过好‘打仗’这一关。一定要抓紧总结经验,以我军第一支空军战斗部队为起点,使空军部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完善。



人民空军第一支战斗部队虽然光荣地诞生了,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也是空前的。

7月25日和29日,两个驱逐机团奉军委空军命令分别调往上海。旅部随后于8月8日也搬迁到上海。刘善本主要兼管轰炸团的训练作战。

部队成员绝大部分来自陆军,旅团两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不会组织指挥飞行部队。旅领导干部中仅有刘善本是内行,其他领导都不懂飞行技术。他们虽然是从陆军中挑选来的优秀指挥员,但隔行如隔山,初到空军,很难适应空军现代化的技术要求,一时难以适应。

为了使部队建设尽快走上作战与训练的轨道,旅党委决定,吸收不是党委委员的刘善本列席党委会,主抓飞行训练和作战。

从此,刘善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部队的作战训练中。

他每天八小时抓地面课目训练,还要抽出两小时自学,只要有可以飞行的天气,部队就要坚持飞行,政治教育从不占用好天气,政治学习一律安排在阴雨天和分散时间。

干部、战士练兵热情空前高涨,部队仅用了一个半月就正式开飞了。飞行训练的进度也惊人地快,十天,全旅飞行员就全部放了单飞。接着,刘善本又组织进行航线起落,三机编队、打靶、投弹等基础课目的训练。

9月,混成四旅正式从苏联防空军手中接过了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刘善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正当刘善本带领着他亲手培养的航空学子们在上海全身心地创建我军第一支空战部队,并紧张地进行着空战准备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到来了。



两个团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必须能执行战斗任务,部分飞行员要能在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及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单机战斗任务。

刘善本繁忙异常,他亲自驾机首先进行了夜间飞行的处女航行,为人民空军的夜航训练开辟道路。

每天天不亮,刘善本就起床赶到机场组织昼间飞行,下午上夜航课,晚上带飞行教员。不到一个月,终于带出了新中国第一批轰炸机夜航教练员,做好了随时执行作战任务的准备。

这一年10月1日,正当举国上下欢庆人民共和国诞生两周年的时候,刘善本、王学武率领刚刚诞生几个月的年轻人民空军的A师指战员,到达了抗美援朝的前线——辽阳机场。

部队到了前线,立刻展开了敌前练兵活动,经过短暂的训练,到12月底,这支主要由陆军成分编成的空军轰炸机部队,绝大部分已经具备了一般条件和夜航条件下单机飞行的战斗能力。

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为了夺取制空权,把最新、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F—86投入战斗,对人民空军轰炸部队构成了极大威胁。

在北朝鲜的西海面上,一群岛屿像珍珠般撒在海面上,闪闪发光。比较大的几个海岛叫大和岛、小和岛和灰岛等。敌百马部队约1200余人盘踞在这一带小岛上,是美军人侵中国的跳板。

美军司令部及伪国防部海际空军司令部情报机关把电台设在大和岛,搜索人民空军活动情报,指挥联络敌空军轰炸扫射中国军民。敌B—29轰炸机常以12至20架,在几十架F—86和F—84式驱逐机编队机群的掩护下,不断袭扰中国安东至平壤一带的交通运输线及秦川一带新建的机场。敌军舰每日21时至次日晨1



时,活动于大和岛以东及东北附近的海面上,炮击人民军阵地。

志愿军总部决定拔除这些海上据点,命令全军配合陆军第五十军,完成歼灭以大和岛为中心的白马部队并占领该岛。

敌人新投入的喷气式歼击机是 F—86。刘善本根据彭总和空军联指对 A 师的指示,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空军的作战实力,预先草拟出夜袭大和岛的作战方案。

在联指召集的作战会上,刘善本说:“当前,敌空军占优势,我空军居劣势,但是,我们能否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呢?我们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出奇兵,打敌人!”他大胆地提出夜间奇袭敌巢的方案,并坚决要求亲自带领机群去完成战斗任务。

刘善本提出的方案很快就得到前线指挥部的批准,但是,司令员不同意刘善本亲自驾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上级规定:凡飞行师长要亲自驾机作战的,需经志愿军统帅部批准。

对于刘善本这样政治影响很大的人物,要亲自驾机去轰炸敌人,更要严格掌握。按照作战想定,师党委号召各级领导认真组织部队做好各项战前准备工作。机务进行大检查,备足油料,弹药。飞行前进行了认真试飞,刘善本和飞行员们详细地研究计算了到大和岛的距离、方位、地形等各项有关数据和诸元。

11月29日,空联司安东前指空军指挥所命令 A 师 22 点 19 分起飞,一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战鹰冲向夜空。为了保密,这次奇袭除了少数人外,谁也不知道何时到何地去轰炸敌人。

当夜,气温零下 10 多度,夜幕降临,指战员们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刘善本下达命令:“为了祖国,为了和平,同志们,记住你们钢铁般的誓言,为了中朝人民而战!”

为了防止敌人电子干扰和窃取机密,起飞时,规定不准用无线



电通话,改用规定的信号联络。同时规定在接敌的航线上,空中指挥,非十分必要时也不得用话机,而用电报指挥。

领队长机是一大队队长姚长川。他是江苏睢宁县人,曾在东北老航校飞行2期学员队和一航校速成班学习飞行,是刘善本亲自带飞出来的优秀学员。他要第一个代表祖国和人民去夜炸敌巢。他坐在驾驶舱看到号令后,立即驾驶雄鹰冲向寂静的夜空,率领第一梯队的另外4架飞机每隔1分半钟跟随起飞。第一梯队的5架飞机在接到命令后,仅9分钟就全部腾空而起。王恩泽副团长率领第二梯队的5架飞机也相继出航。22时34分,刘善本指挥的10架飞机全部进入战区。

敌空军占很大的优势,A师10架轰炸机在没有驱逐机护航的情况下执行战斗任务,如何避免被敌人发现,有效防止敌人的电子侦察,是能否顺利完成轰炸任务的关键。

第1架飞机升空后,射击员张俊卿就不断地从麻袋里掏出一把把金属丝往飞机外面扔去。这是刘善本为了避免敌雷达发现目标想出的一个施放干扰的办法。这在人民空军战斗史上是一个首创。他事先让各机组都准备了许多金属片,按敌雷达波长的一半,即剪成半米的一长段,每架飞机上装一麻袋金属丝片,塞在射击员的座舱下,到达丹东上空进入航线前,每隔半分钟撒一把。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每架飞机上的灯光都全部关闭。

为防止空中相撞,刘善本师长还规定:在起飞时间上每架飞机拉开一分半钟的间隔。在飞行高度上,也要相差1000米。参战的10架飞机都在3000至4000公尺高度的范围内机动。第一架飞机高度3000公尺,第二架飞机高度4000公尺。第三架飞机与第一架飞机高度相同,其他飞机高度依次类推。



就这样,刘善本指挥的作战机群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敌人阵地上空。每架飞机载着10枚250公斤的炸弹,还有3颗是55公斤重的闪光照明弹。前机投下照明弹后,立即脱离战区。照明弹把海面照亮,给后面赶上来的飞机指明目标。

姚长川驾驶的第一架飞机于23点16分进入目标上空,投下6颗炸弹,接着投下3枚照明弹,为后续飞机指示目标。

此后,我空军9架飞机也相继接连不断地向敌占岛屿和敌舰投掷炸弹和照明弹,机群投下的27颗照明弹,把海岸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正在熟睡的美伪军官兵突然被震耳欲聋的炸弹声惊醒,像热锅上的蚂蚁,东奔西窜。在一串串闪光照明弹的照耀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年轻的飞行员们,代表中朝人民,把近百颗复仇的炸弹倾泻在敌岛和海面,炸得敌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

侵朝美军司令接到大和岛一带深夜遭志愿军空军猛烈袭击的报告后,声嘶力竭地叫着:“这样组织精密的夜间连续轰炸的高超战术和飞行员所具有的飞行技术,肯定不是黄种人可以办得到的,中共的空军还是躺在摇篮里的婴儿,他们不可能夜间偷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苏联空军在偷偷地参战。我们要向联合国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刘善本的苦心组织训练和A师指战员们共同的努力,刚刚诞生几个月的人民军队的轰炸机部队,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夜间轰炸。

更难想到,组织、指挥夜袭他们的,正是美国培训过的飞行员——刘善本!

姚长川驾驶的首机于24点15分着陆,翌日1点零9分,10架



个国庆节。10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

朱德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布命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朱总司令发布命令之后，空前浩大的游行开始。

游行的人们在排山倒海的沸腾声中，突然听到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隆声。巨响由远而近，强大的空军机群一批紧接着一批凌空而过，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们的检阅。

当数十万人抬头仰望，首先看到的最前面的那架飞机，正是空中总领队刘善本亲自驾驶的。

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海，红旗似潮，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真正独立强大起来了！

刘善本豪情满怀，灵活沉稳地驾驶着战鹰，在左右两侧各一架杜—11护航机的陪伴下，顺利地飞临天安门上空。他看了看表，他驾机率领的排成品字队形的大机群，于11点17分准时整齐地飞越天安门上空。

他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频频地向空中招手致意，他牢牢地把握着方向，向前飞去。

空军参加这次受阅的飞机架次之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他们是由空军4个航空兵部队组成的。

第一个是轰炸机师，是由刘善本率领的苏制杜—2式轻型轰炸机组成的，5个大队，46架。

第二是强击机师，由某师依尔—10式苏制飞机45架组成。

第三、四是两个驱逐机师，由苏制米克—15新式喷气式战斗



送走甲团,A师便投入了掌握改装苏联先进的喷气式轰炸机的紧张工作。

这了适应新喷气式轰炸机部队编制要求,A师进行了人员整编。这种飞机,苏联叫依尔—28,速度快、性能好,机上设备复杂,载员只有三人,操纵难度极大。

为了确保改装新式机种顺利进行,空军司令部从院校和兄弟部队抽调了38名教员前来讲课,并请苏联顾问负责指导改装技术。刘善本既是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又是新机种的试飞者。他曾经飞过美、德、英、意、日等许多国家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有丰富的飞行实践经验,学习又非常刻苦认真,很快就掌握了苏制新式飞机的操纵技术。

飞行员通常需要顾问或技术人员带飞15至20个起落才能放单飞,刘善本仅用了8次带飞,就率先在全师第一个放了单飞。

5月,A师改装苏制喷气式轰炸机的工作圆满结束,官兵们整装待发,只等军委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朝鲜战场,再次狠狠地打击侵略者。

就在这时,刘善本突然接到命令,空军命令A师再次担负国庆受阅任务。这次受阅和前三次不同的是,空军要求刚刚改装完的喷气式轰炸机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亮相。

6月,刘善本便带领全师进入了紧张的受阅训练,先是以团为单位开展单机训练,后转入以大队、团、师编队训练。

1954年8月17日和18日两天,空军在北京隆重地召开了军人代表大会。

从全国空军数十万名官兵中推选出129名代表来北京出席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空军各个工作岗位上的英雄模范。在这些



优秀代表人物中,又选出了三位代表,他们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二七三〇部队长刘善本和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郑长华。他们将出席全国首届人代会。

9月15日下午,刘善本来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刘善本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由于部队参加受阅的喷气式轰炸机刚刚改装完,训练时间很短,特别是在复杂气候条件下的飞行训练还很不成熟,刘善本放心不下,会议一结束,他就急着赶回了部队。此时离受阅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刘善本夜以继日地研究各团报上来的飞行计划和各飞行员的飞行日记,一个一个地亲自带飞,逐个地指导飞行员放飞。为了保证训练质量,每天他都要亲自驾机侦察空中的实际能见度。

国庆节的前一天,空军阅兵总指挥、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亲自来到南苑机场,询问受阅准备情况,他对第二天受阅时天安门上空的气候变化十分担心。

第二天,果然天气不好,这样,大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是有危险的,中央有关首长也在考虑是否取消空中受阅。阅兵指挥部首长坐立不安,拿起电话向刘善本询问:“今天,你们有没有把握完成任务?”

刘善本在塔台接电话,他望着天空,心想,如果说没有把握,首长就要报告周总理,请求撤销空中检阅任务,这有损于国威军威。通过几个月的训练,刘善本对他的部队心中还是有数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首长,我们有决心、有把握,保证完成任务!”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首长放下了电话。

起飞前,刘善本师长再次向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今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天我们就要驾着我们亲手改装的喷气式轰炸机,接受党和毛主席的检阅了,虽然不是上战场,但比打仗更加重要,更加光荣!这是一场政治仗,它关系到共和国的国威和军威。我们一定要好好飞,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大家有没有决心?”

“有!”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们响亮地回答。

10月1日,首都50万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天安门广场。

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国防部长彭德怀乘车从天安门出发,在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的陪同下,检阅了列队在广场上的陆海空三军。然后,游行开始。

在地面部队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同时,东方天空响起了震耳的轰鸣声,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威武的战鹰。两架歼击机和一架领航机飞在前面,接着是重轰炸机、喷气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一队一队地掠过天安门上空,一幅壮观的立体画面呈现在了宽广的天安门前。

参加空中受阅的共有111架飞机。其中有刘善本所在师45架喷气式轰炸机,兄弟部队54架米格—15比斯、10架杜—4重轰炸机和两架护卫机米克—15比斯。姚长川率领大型轰炸机杜—4飞在最前面,大机群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是200公尺,空速每小时700公里。编队总长度23.31公里,两分钟时限从天安门上空轰轰隆隆地飞过。数十万人仰望着天空,凝视着人民空军的最新式飞机,不断地欢呼雀跃:“我们有了自己强大的喷气式轰炸机啦!”

刘善本出人意料地大胆率领大批三机(品字队形)编队跟进,间隔距离保持得很好,保证了10点56分36秒准时到达天安门上空。指挥部要求到达时间误差不得超过正负20秒钟,航线误差不得超过50米。机群到达复兴门上空转变上升高度时,云越来越



低,飞机进入了云层。在刘善本高超的飞行技术的指挥下,经过南苑机场塔台的正确引导,受阅飞机全部安全着陆。

刘善本再次光荣地完成了空军交给的受阅任务,空军给 A 师记了集体三等功。

1955 年,沈空召开了军官授衔大会,刘善本特地从唐山机场赶来出席。会议首先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衔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审议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请授予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第一批名单,决定授予朱德等 570 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其中就有刘善本的名字。

面对崇高的荣誉,刘善本感慨万千。

会后不久,空军部队就要实行授衔后统一指挥的大考验——到天安门上空去,再次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检阅。

1955 年“十一”国庆,刘善本所在师共出动齐尔喷气式轰炸机 46 架,组成 15 个 3 机编队中队受阅。其他部队出动米格—17 式喷气战斗机 24 架,组成 8 个 3 机编队中队。以米格—15 比斯 24 架组成 8 个 3 机编队中队,以齐尔 1 架为总领队,编号 001,由刘善本亲自驾驶,两架米格—17 为护卫机,组成总领队。右护卫 107 号机,由边克平驾驶。左护卫 108 号机,由李文德驾驶,总领队机群后面紧跟的是第一轰炸团。飞机间隔 20 公尺,距离 30 公尺。第一轰炸团距离总领队长机 4000 公尺,机组之间距离 60 公尺,间隔 35 公尺。二组与三组之间距离为 1200 公尺。

第二轰炸团与第三轰炸团相距 4000 米,三个轰炸团、两个歼击机团和总领队共有飞机 96 架,队形总长度 45 公里,时间限定 9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分零7秒,全部安全通过天安门。通过天安门时真空速700公里,高度600公尺。

当人民解放军战车方队似铁流汹涌步过天安门广场时,刘善本率领的大机群像道道闪电穿出云层,伴随着雷霆万钧的马达声,一架架银鹰依次掠过。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再次频频地向空中健儿招手,广场上空回荡着毛主席那洪亮激昂的声音:

“同志们万岁!”

“人民万岁!”

领袖和群众的心深深交融在一起。

这是刘善本第五次光荣地领队通过了天安门上空受阅,刘善本创造了中国空军最为辉煌的受阅纪录,成为中国空军中领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受阅最多的一位飞行家。

1955年,《人民空军》记者在撰写的《人民空军接受毛主席检阅》一文中这样写道:“受阅的机群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某部指挥员刘善本同志率领的。在国庆节前夕,他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当他听到这个喜讯时,激动地说:‘在毛主席发布的命令中,授予了我一级解放勋章,为了回答祖国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一定要更加谦虚、谨慎,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水平,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祖国和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中贡献更大的力量。’今天,他率领着部队,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陶峙岳

(1892 ~ 1988 年)

湖南省宁乡县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后加入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湘军营长、团长。1926年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团长,第四十军三师副师长、师长,第八师旅长、师长。1937年任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七军军长。参加淞沪抗战,后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率部在新疆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 陶峙岳“礼送”群凶出境，免新疆战火之灾

1949年初，华东、华北战场炮声隆隆，国共两党欲决雌雄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

两战均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给了蒋介石致命一击，他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告“引退”，让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和全国剧烈动荡的局势相反，此时的新疆却是一片寂静。

天山北麓、乌鲁木齐河畔的迪化市正静静地卧在雪原里，任凭白毛风卷起的团团积雪肆意欺凌，寥寥无几的行人，紧缩着身子，沿大街匆匆而过。

国民党政府新疆驻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警备司令部，静得令人窒息，只有全副武装的哨兵在廊檐下和门道口呆立着。

楼上是总司令办公室，门窗紧闭，落地的黑色窗帘垂吊着，宽敞整齐的办公室中央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长方桌子，简单的陈设和这房间的主人显得是那么协调。

陶峙岳，这位新疆驻军的最高长官是去年8月从兰州调来上任的。

国民党政府在兰州设立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掌管了西北几省的军政要务，军政长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副长官就是张治中的密友陶峙岳。

只因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局势极为动荡，为了这



里的和平与稳定,张治中派陶峙岳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身份进疆任警备总司令。

张治中心里明白,只有陶峙岳才能不辜负他的期望和重托,也只有陶峙岳有能力挑起缓和新疆各方矛盾、稳定全局的重任。

为了新疆的稳定和各族人民的团结,12月,张治中又电令陶峙岳:要他出任省政府主席。

此时,已年近花甲的陶峙岳身着便装,正端坐在他的雕花木椅上,审视着放在笨重的办公桌面上的一张地图。凝视着眼前的地图,他盯住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华东和华北大地。

他完全没有想到形势的发展竟如此迅猛,国民党政府竟如此不堪一击,解放军挺进竟如此势如破竹。

他站起身来两手合抱胸前,不禁长叹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他想:战乱已经半个世纪了,人民急需休养生息,他盼望着内战早点结束,盼望江山早日统一,也盼望着新疆和平稳定。

正在这时,只听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卫兵把南京方面来电递了上来。陶峙岳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代总统李宗仁发来的电令,令陶峙岳除留一个旅的兵力担任边防任务外,其余部队全部入关,并令陶峙岳速赴南京面商大计。

读罢电令,陶峙岳呆立无言,老成的他已预感到蒋介石已经危在旦夕了,新疆最后历史性重大抉择的时候也要来临了……

危难之时,陶峙岳最先想到的一个人就是张治中。张治中既是他的直接上级,更是他的知己。当年陶峙岳入疆就是应张治中之邀而来的。去年8月,张治中命陶以副长官入疆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时,两人在兰州张的私宅还长谈过,张治中一再谈到在国内



应实现和平的主张,还出示了许多苦心说服蒋弃战求和的信件。有着同样想法的陶峙岳听后感动不已。张治中嘱咐陶这次入疆后一定要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在新疆继续贯彻亲苏及和平统一的政策。

张治中没有看错人,半年来,陶峙岳以良好的人品在新疆谨慎艰难地主持着工作。他拜托刘孟纯以省政府秘书长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秘书长的名义主持政府工作,屈武主持迪化市政,刘泽荣主持外交,他自己负责军事工作。

他们密切配合,按照张治中制定的和平统一政策,尽其所能。陶峙岳上任后总算相安无事,各种矛盾无多大发展。

陶峙岳身为新疆驻军最高领导人,面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战到底的政治图谋,他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一关系到新疆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清楚,他所掌握的10万军队是稳定新疆局势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听命于李宗仁的调遣,参加内战,部队一动,新疆民族间、政权间、军队间、军地间的原有矛盾就会马上表面化,新疆立即会腥风血雨。

他也知道,在新疆,国民党的嫡系及其军事力量的势力还不小,也有相当实力,这些军队的官兵对人民解放军的疑惧很深,许多官兵对人关参加内战不知真情,少数顽固派坚决要求人关,有的甚至已经蠢蠢欲动,开始进行进关的准备了。

内战已经把无数无辜的同胞和国军将士推向了灾难,现在领兵人关,无异于再次把众多将士推向死亡的深渊。

出于反对内战的政治愿望和保证新疆的安定,陶峙岳暗下决心:决不人关,决不做千古罪人!



陶峙岳舒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又陷入了更深的沉思。违抗军令,怎么向李宗仁交待?按兵不动,怎样才能不惹怒军队?

几天之后,迪化市市长屈武来到陶峙岳官邸。屈武是受中共周恩来委托前来和他会晤的,屈武向他详细介绍了当前的时局,告诉他人民解放军4月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南京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新疆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屈武明确地告诉他,毛泽东的意图是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周恩来的意思也很清楚。他建议陶峙岳尽早做好思想准备。

陶峙岳说:“李宗仁这次电令我领兵入关,也许就是与共产党的最后一搏了。李宗仁想保住半壁江山,和共产党隔江而治谈何容易!恐怕也是徒劳一场。”

屈武走后,陶峙岳苦苦地寻思着,面对新疆眼下脆弱的暂时和平局面,他必须找到一个完全之策,才能稳住眼前局面。他觉得,只有稳住新疆,新疆才有出路,他自己也才有出路。

急中也许真能生智,陶峙岳眉头一皱,一声惊呼:“有了,既然进不得,退不能,拖!以拖待变,不失为策中之上策!”

自从内地的时局发生急剧变化以来,新疆的形势也在剧烈动荡。军政上层逐渐分化成了两派,主和派已经明显看到大势已去,从新疆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积极主张走和平统一的道路。为了新疆的和平安宁,他们期待着早日和平解放,归向人民。他们也在悄悄地做着各项准备,为了这天的到来,倾注着心血。

主战派有的是蒋介石的亲信,有的是马步芳的亲信,有的背后有美帝国主义分子在支持。

这些人坚决主张入关,试图与解放军作最后的拼争,心想着跟着蒋介石内战到底,以图东山再起。



对以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阻力究竟有多大,可以依靠掌握的力量有多大,陶峙岳必须首先摸清楚。为此,他决定以部队整编为借口,召集驻疆部队师旅以上军官开一个会,在会上进行一次“火力侦察”。

这天,陶峙岳身着军装,端坐在会议桌正中,显得格外威严。

军官们陆续到会,待大家坐定,陶峙岳扫视了一遍会场,到会的连同机关师旅军官共40余人。

这是一次非常时期的非常会议。陶峙岳非常谨慎。为防止节外生枝,他一开始便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地对大家说:“南京来电,李总统电令我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继续留守执行边防任务外,其余均由我率领入关。此事关系到党国利益,也关系到在座诸公利益。事关重大,今天请诸公到此,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因为尚未最后定夺,为便于保密,只好以讨论部队整编为名通知你们开会,还望诸位见谅。”

不出所料,会上顿时争吵了起来。以赵锡光、陶晋初为代表的主和派坚决反对入关,而以新疆实力人物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要求入关。会上,这几个人一直占着上风,他们凭着手里掌握的兵权,趾高气扬,百般要挟,态度极其跋扈。他们互相配合,紧逼陶峙岳表态。

“还是让总司令决断吧!”赵锡光机智地说。

陶峙岳接过话茬说:“好了,不必争了。入关不入关,其实很简单,大可不必发火,这事就交给我好了。但是,我要提请诸位回去再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入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恐怕吵上三天也没用。凡对此有高见的可以随时找我而谈。”

陶峙岳就势宣布散会,他站起来,重新扫视了一遍会场,随即



问题就好办了。”

最后二人决意起义,约定北疆的起义准备工作由陶峙岳负责,南疆起义准备工作由赵锡光负责,同时约定,一旦起义成功,一是把部队如数交给解放军;二是两人均解除职务,解甲归田,别无他求,三是部队改编时,不能在民族军的监督下进行,以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影响改编。

对于马、叶、罗一伙的问题,两人一致认为,还是以拖为妙。为了拖住他们,陶峙岳说:“我们总得做个姿态稳住他们。我准备派总部警卫团长毛熙峙率两个营进驻安西,看守甘新大门,再派第一七八旅副旅长刘伦元率两个营进驻玉门油矿。安西是新疆大门,玉门油矿是新疆唯一的能源供给地,两地唇齿相依,关系全局。如果大门失守,能源遭到破坏,一来部队行动将会瘫痪,二来第九十一军黄祖坝部和第一二〇军周嘉彬部就会构成对新疆的直接威胁。这样做不仅在军事上是必要的,而且这一动定会给马、叶、罗造成一个内调假象,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

赵锡光说:“总司令想得很周到。不过我建议,这两支部队必须明确,除你的命令外,不得接受任何外来的调遣命令。”说到这里,两人都轻松了许多。他们互道珍重,只待起义成功,迎接新疆和平解放。

陶峙岳兴致勃勃地回到迪化,刚走进警备司令部办公室,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就来了电话。

叶成直言不讳地质问陶峙岳,是不是去南疆找赵副司令商议要向共产党投降了?

陶峙岳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转问叶成:“叶师长,是不是我执行公务还得向你报告一声才是。我早就说过,你有什么高见可以直



接找我来说嘛！”

陶峙岳想,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新疆的时局会发生急剧变化,预料不到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这些人一旦狗急跳墙,部队一乱,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怎样,继续稳住顽固派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想到这儿,陶峙岳当即拿起电话,镇静地邀请马呈祥、罗恕人和叶成一起来他家谈谈……晚上,三人如约来到陶峙岳家中。

谈话仍然是从内调这个话题开始的,陶峙岳对全国形势、新疆的时局、今后出路等等,层层深入地进行了分析,告诫他们,眼下人关极其险恶,没有后勤支援,没有物质准备,进入戈壁滩就等于拉着部队去送死。

这次谈话虽然没有结果,但谈总比不谈好,陶峙岳又一次暂时拖住了他们。

9月的新疆,强劲的秋风横扫着枯黄的落叶。在中国,毛泽东以他近乎神妙的本领,以他无与伦比的雄才大略,精当地完成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他那双透视历史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新疆。

新疆,一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最后较量就要到来了!

时局发展很快,一个星期后,省府秘书长刘孟纯前来晋见,告知陶峙岳北京方面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届时苏联将立即予以承认。

8月26日,兰州解放,解放军已迈进新疆大门。

陶峙岳知道,越是走近和平,新疆局势将愈加剧烈动荡。

马步芳也不断以西北军政长官名义,电催马呈祥急速人关,马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活路……从今天起,总部就开始调集车辆为你们入关作准备,至于怎么走,还望仁兄仔细合计,归根到底是怎么能走得了。”

其实,马、叶、罗也很清楚,从迪化到兰州,沿途荒无人烟,大部队行动是断难实施的。

会后,三人虽极为沮丧,却也不好再说什么。

此后的陶峙岳心境愈加沉重,时常夜不能眠,上次会议虽然把话算说清楚了,但仍无宁人迹象。

果然,会后马、叶、罗开始动手了。

9月14日,叶成由迪化返回景化师部,召集师直营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随后,又命第二二七旅旅长朱鸣刚、旅参谋长师景岳准备作战,整装待命。并下了一道手令:(1)汽车连50辆大运输车检修保养待命。(2)限9月17日前,将师部、迪化第一七九旅、绥来第二二七旅的随军家属110家,全部送往哈密第一七八旅集中,每户发给银元10块。(3)限9月18日一天内,集中全部车辆,将迪化野战仓库所有战备物资转送吐鲁番,待命转移。(4)9月20日前,如期完成上述任务。

9月19日,第一七九旅电台收到胡宗南急电,让叶成将新疆部队转移至南疆待命。并指示:如果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出,可采取措施断然处置。

于是,他急忙召集马呈祥、罗恕人等,准备做最后一搏。

那些日子,老满城马呈祥司令部虽然出奇的平静,但时常听到他们经常集会窃议,也不见这班人来警备区继续叫闹。陶峙岳预感到,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人民的力量,几乎是一切反动派的通病。就在新疆这伙顽固分子妄图绝处逢生、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新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可接受。绍周、孟纯、经文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

张治中

9月10日

张治中处事十分小心谨慎,为防止万一,他于9月11日就新疆和平解放的局势问题又单独致电陶峙岳,指出:

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兄曾加考察并予开导否?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愿负道义上责任,决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债事。

省内保守一派之潜在势力不可忽视,尤其维、哈两族中,惧苏恐共之心理时有流露,可否以治与兄之名义,发表文告,特别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团结,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政策,新省对中央关系虽转变,而新省施政纲领所提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既定政策,绝无改变,以祛其疑惧之心,并盼与包主席邀约色以提、乌迈尔、尧乐博斯、表斯武德,伊敏、贾尼木汗等到迪,分别予以开导。

张治中也就新疆的军队部署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他叮嘱陶峙岳要考虑周到,严密部署,顺利完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大业。



9月15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包尔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四人到机场迎接。

接着,陶峙岳、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梁客浔等,也和邓力群见了面。

邓力群首先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大家表示慰问。

陶峙岳等人向邓力群汇报了有关新疆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后,邓力群陆续会见了拥护和平起义的进步人士和各民族的代表,转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希望与关怀。

邓力群的到来,对陶峙岳等主张和平起义的人,无疑是个极大的鼓励。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联名复电张治中。电报是由邓力群交伊宁电台发的,并报毛泽东主席转交张治中。电文如下:

文白将军钧鉴:

9月10日戌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余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护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代表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三区原有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暂行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圆满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受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有不负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外,谨电奉闻,乞释廑注。此间人民,殷切钧座早日工作莅临指导。何时命驾,愿先电示为禱。

9月19日,包尔汉就接受中共领导,决意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的问题又通过邓力群致电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

4日之后,毛泽东主席复电包尔汉:

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

守疆儒将陶峙岳



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复,敬颂勋祺。

9月21日,新政协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当天又为新疆起义的事写信给张治中: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付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包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围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敬问日安!

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叮嘱陶峙岳立刻派人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并宣布起义。

张治中告诉陶峙岳:“以我的名义致电,叮嘱在河西的黄祖坝、周嘉彬两军必须接受陶峙岳的命令,火速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此时不能再有半点犹豫和顾虑。”

电报中,张治中还告诉陶峙岳和包尔汉:“新政协已经开幕,待



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后,我们再定是否赴迪化的问题。”

这个时期,陶峙岳的心情格外地激动。他不时地翻阅着毛泽东和张治中近期发来的一封封电报,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他为有张治中这样的知心上级而感到欣慰,是张治中领着他一步步地走向了人民的队伍。他更敬佩毛泽东。毛泽东远离新疆,但他对新疆的情况却是如此了如指掌。是毛泽东以神灵般的智慧把新疆引向了光明,也使我陶峙岳从此真正赢得了新生。

然而,这一时期,陶峙岳也着实有些焦躁烦闷。和马、叶、罗周旋了几个回合,虽然把他们拖住了,但他自己也同时被拖得心焦。他时时担心着事态的演变,惟恐这伙人又闹出什么乱子,担心他们又做出什么样的荒唐事。

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他披衣起身,迎进的不是别人,而是叶成。

“司令,他们准备马上动手,清君侧了。”叶成慌张严肃地说。

原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认为,陶峙岳迟迟不下“人关”令,全是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人的要挟,他们是在挟持陶峙岳向共产党人疆解放军投降。

叶成献计说:“先下手为强,说干就干,今夜动手。干掉刘孟纯、陶晋初、屈武,便立即开拔人关!”

马、叶、罗三人觉得陶峙岳平日无害人之心,往日与他们又无怨无仇,便派叶成先来向陶峙岳通报,只待叶成返回,便马上行动。

陶峙岳大吃一惊:“你们胆子不小,要杀人吗?”

叶成有些紧张。

“杀了他们你们就有出路了?”陶峙岳紧接着厉声问道,并顺手抓起电话,打给马呈祥、罗恕人,“我和叶成都在,就我二人,今晚咱



们见面再聊聊,你们即便走,也要喝完我这瓶老葡萄酒再走!”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马、罗二人还是驾车来了。罗恕人进屋后径直在电话旁坐定,马呈祥则背靠墙壁坐了下来。

陶峙岳深深吸了一口气:“你们想好了吗?抓了人以后,只要枪声一响,新疆立即大乱,乱了你们就有便宜了吗?”

此时的罗恕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突然声泪俱下:“事到如今,我们走不得,留不下,可怜我们妻儿老小,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

陶峙岳对他们说:“新疆既不能战,又不能守,更无退路。虽说有10万官兵,但首尾不能相顾,彼此无法救援,粮弹补给又如何解决?”陶峙岳稍停了一下,继续说:“三位弟兄,今天你们若还认我这个总司令,就应该知道我陶峙岳绝无害人之心,现在可以摊开来说,我这个司令心里除了装着你们,还装着10万官兵和新疆的父老乡亲们呀!如果我们失去理智,放弃和平,点燃战火,新疆天下便立刻会大乱,新疆人民就会立刻流离失所。告诉你们,眼下大部队内调已绝无可能,我也决意不离开新疆,誓与全体将士及其家小共存亡,与全疆百姓共存亡,我陶峙岳死而无憾……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我决不将我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不干涉你们的自由。但是你们执意要走,只能个人离疆,部队不能走,也走不了!”

陶峙岳这一席发自肺腑之言,叶成、马呈祥、罗恕人虽然为之动容,但要他们脱离部队,交出军权,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却是绝无可能的。屋里的气氛异常紧张,几个人一个劲地吸烟,就是不答话表态。

东方已经发白,几个人只好垂头丧气而去。

危机过去了,但危险还没过去。陶峙岳决定单刀赴会,一来探听虚实,二来也好给这几个人一个最后的交待。第二天,陶峙岳独



自一人闯进了老满城骑一师师部。

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几个人正在开会，看见陶峙岳突然而来，一阵惊慌，可一看陶峙岳一个随从也没有带，这才放下心来。

陶峙岳机敏地环视了一下四周，见并无异样，便缓缓坐下。陶峙岳想，昨天叶、罗、马“清君侧”的险恶图谋被挫败以后，危机虽已暂时过去，但此时他们的内心想必一定是极其复杂的，危险并没有过去，还是隐忍为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冷静沉着。

陶峙岳佯装不以为然，也不依官场规矩，而是摆出朋友相交的样子和他们聊了起来。

出乎马、叶、罗的预料，陶峙岳告诉他们：“目前全国的形势和前几天又大不一样了，解放军已大举挺进全国，中南、西北、西南即将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获得解放，新疆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这几天，驻疆部队变化也很大，赵锡光副总司令，陶晋初参谋长，联勤总部驻新疆供应局局长郝家骏，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副师长陈德法、南疆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王根增，一师师长韩有文，一七八旅旅长刘伦元，一七九旅旅长罗汝正，二二七旅旅长朱鸣刚，四十二师参谋长韩际隆，六十五旅旅长李祖堂，一二八旅旅长钟祖荫，二三一旅旅长田子梅，骑兵四旅旅长杨廷英和九旅旅长马平林等已经表态，他们都倾向于和平起义解决新疆问题。”

陶峙岳接着又说：“是啊！我们在新疆驻守多年，承蒙这里的百姓供养才有了我们今天。他们不愿挑起战祸，给新疆人民发难，这也算是良心所在呀！”

马、叶、罗几个人听了，彼此相顾无言，对陶峙岳也无言以对。陶峙岳这个“欲擒故纵”之计，实际是对他们的最后通牒，意在尽快地把这伙人逼出新疆，只要把他们送走了，就可保一方平安。



临走时,陶峙岳转回头又说:“今晚,我请你们喝酒,希望能给个面子!”

当晚,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如约前来,陶峙岳请他们入座,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对准了陶峙岳。

陶峙岳并未开口,伸手递给他们两封电报。

一封是9月22日张治中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电报对他们的和平起义决定给予了高度的赞许,并指示陶峙岳立即派员去兰州面见彭德怀。

一封是陶峙岳给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电报称:“新疆地处边陲,内部矛盾复杂。目前已四面受困,解放军兵临城下,乃实属不得已面顾全新疆大局,惟追求和平为上。”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为了和平,想留我们欢迎,想去我们相送。”

叶成终于说话了:“前两天,胡宗南给我们发来电报,电报中一再催促我们领兵反击出疆,并说只要我们举兵,胡宗南将立即派兵接应。据新疆的地理条件,胡宗南就是真的接应,也得三五日才可到达,真他妈的一派胡言。”

马呈祥接着说:“原以为马步芳与我并无二意,没想到这小子全军覆没逃往香港时,竟带走了我骑一师的军饷5万大洋,这等不仁不义之辈,算我瞎眼认错了人!但是我今天也实言相告,我马呈祥断然不相信共产党,我主意已定,一走了之!”

陶峙岳听完,站起身握住叶成的手:“既然你们去意已定,我不再勉强。我已为你们准备好了足够的盘缠,即刻派人送你们出疆。你们不便携带的私人财物,我折价收买,兑付黄金。”

至此,阻挠反对起义的几股反动势力,总算烟消云散了。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除了他们自己积蓄的金银外,一切予以从优估价,共折合黄金 800 余两,由包尔汉主席签署证明,银行支付。

9月24日,马呈祥、罗恕人离开迪化。

25日清晨,叶成、刘汉东从迪化启程追上了他们,他们分乘6辆卡车,满载黄金、银元等贵重物品,于9月30日到达阿克苏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五旅旅部,10月5日,从蒲犁县西南翻过昆仑山,经包尔汉批准,持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签发的出国护照,灰溜溜地踏上了逃亡之路。

随着陶峙岳“礼送”群凶出境,新疆和平解放的最顽固的一块障碍被清除,陶峙岳便立即和包乐汉商量通电起义的具体事宜。两人商定,为稳定人心,陶峙岳领衔军方先行通电,而后,包尔汉领衔政府次日通电。

9月25日晨,陶峙岳即将事先拟好的起义电文交梁客浔设法发出。梁客浔找到新疆电信局局长王章权处理。

当时,因各地电信联络中断,找不到收报电台,王章权通宵守在发报机旁,不停地呼号,终于找到了张家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电台。

因这封电报是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起义通电,张家口电台欣然接收,并立即转报毛主席、朱总司令。

电文如下: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以来,秉承张文白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

守疆儒将陶峙岳



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陶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之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在(为)人民革命事业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峙岳等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9月25日下午,陶峙岳召集总部少校以上军官在西大楼举行大会。

当时陶峙岳已脱去国民党军中将军服,换穿派力司中山装。他在讲话中分析了时势,就为什么要起义和新疆今后的前途一一作了介绍,最后郑重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统治,接受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归入人民的行列。

9月26日,包尔汉率新疆省政府委员刘孟纯等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代表新疆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同胞郑重宣布:

自即日起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时邀请在伊宁的省委委员们回到迪化,共同合作。深信本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省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必能迅速地走上光明灿烂的和平建设大道。

至此，160余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消息传开，迪化全城顿时沸腾起来，全市各界人士纷纷涌上街头，各民族文字署写的标语贴满了全城。

9月27日，陶峙岳、包尔汉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同心协力，要做到：不伤害他人生命财产；不扰乱地方秩序；不破坏民族团结；不对他人报复过去的嫌怨；不提高物价；不挑拨军民感情；不伤害外国侨民；不侵损公家财物。

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嘉勉陶峙岳、包尔汉。

新疆和平起义的实现，新疆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新疆军政界主和派也如释重负，从此他们终于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从酒泉入疆，新疆军区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

12月30日，在迪化召开大会，宣布第二十二兵团正式成立，陶峙岳任司令员。从此，陶峙岳领导的新疆起义军完全地归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2. 护送共产党人回延安，与新疆结下不解之缘

陶峙岳一生为人严谨，一切行为无不循规蹈矩。然而，从他选



第八师连连作战,蒋介石就是不给休息机会,更不给补给,任其自生自灭,陶峙岳只有忍气吞声,艰难地维持着。不过陶峙岳也就此认清了他的这位“领袖”究竟要领他向何处去。

为此,陶峙岳曾多次仰天长叹:“领袖不领袖,像这样连年内战打下去,中国总是不得了的!”

真是冤家路窄。

1935年,第八师前任师长朱绍良调任甘肃省出任省主席,第八师也随之从江西“围剿”前线撤了下来,陶峙岳随其来到甘肃驻防秦安,就在这里,他又遇上了冤家胡宗南。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委派他镇守西北,着实狠狠武装了他一番,他兵员充足,武器精良,待遇优厚。别看他没指挥打胜过一仗,但仰仗后台,平时却是耀武扬威,盛气凌人。

一向崇尚文德武功的陶峙岳哪里看得起此等轻浮傲慢、不学无术之辈?于是二人同在甘肃驻防,却是冤家对头。胡宗南对外畏敌如虎,对内却是野心勃勃,他下决心要把陶峙岳或吞或挤,最终拿掉他的兵权。

胡宗南采取的办法一是调,二是派,三是升。

1938年9月,胡宗南将陶峙岳的第八师与他的嫡系第一军对调,就这样明摆着把第八师夺走了,陶峙岳到一军只是摆设,被架空了,名义上是军长,而实际交给他的只有一枚关防大印,军部的所有人马早被抽空了。当时,抗日战争战事正紧,陶峙岳只好从他的八师把曾震五要来任一军参谋长,从头苦苦经营这个军。

经过陶峙岳一番整治,特别是通过他人格魅力的感化,军内军纪不振、士气低落的败相很快有了好转,陶峙岳也因此受到了军内



上下的拥戴。

但好景不长,胡宗南又盯上了陶峙岳,他怕这样下去,一军真的被陶峙岳训导过去了。

于是他又急忙派他的嫡系丁德隆接任了第一军军长,派陶峙岳去当第四集团军副司令官。这一派一升,陶峙岳再次兵权被夺。

挂着空衔,顶着虚名,陶峙岳羁留大西北;苦恨报国无门,又遇奸贼,陶峙岳终日苦闷。

从此,陈峙岳便干脆不问公务,经常借家人观光关中胜景。所到之处触景生情时,即赋诗寄意:“偷得闲时出帝城,攀登无处不心惊。投书泪洒苍龙嶽,拒台名传落雁岭。瓦釜雷鸣谁独醒,全瓿壁碎赖群英。身经百地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

陶峙岳像走马灯似地被调遣着,1941年被调去洛阳,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又调任三十七集团军任总司令;1943年被调往酒泉任警备副司令。

至此,胡宗南把陶峙岳的兵权彻底没收了。

胡宗南没有预料到的是,自己的卑劣行径却给陶峙岳带来了一个远离于他的契机。一次偶然的机会,使陶峙岳结识了国民党大员张治中。陶峙岳是在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赴重庆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同张治中相识的。两人情趣相投,自然谈得投机,从此建立了密切联系。

1945年,张治中临危受命,奉蒋介石之命去新疆解决三区起义问题。张治中入疆,途径酒泉,故友再次相见,又进行了促膝畅谈,相知更深。张治中当即邀请陶峙岳一道入疆,并委任他为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欣然接受。

张治中此次入疆,正值抗战已胜利结束,内战也在广大人民群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众的反对声中暂停了,但是新疆的内乱并未停止,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都建立了各自的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武装时常发生冲突,人民没有宁日。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便派了人称“和平将军”的张治中赴疆进行调处。

当时肃北瀚海已是冰天雪地,陶峙岳把张治中将军迎入暖帐,边饮酒边谈了起来。他们的话题涉及甚广,包括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他们还探讨了新疆的地形地势、民族关系、历史渊源,最后谈到了解决新疆争端的办法。

陶峙岳给张治中斟酒,问道:“此次张将军身负重任,新疆解决争端有个怎样的准则?想必已是成竹在胸了吧?”

张治中笑着回答:“什么成竹在胸,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不过,也有个总的原则,我以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实现民族和解,搞好民族关系,实行和平民主的治理,才能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

“对的,对的!”陶峙岳频频点头,“用我们宁乡话讲,就是一碗水端平。过去,政府就是吃了抬一派压一派的亏哩!”

“陶公也这么看?”

“是的,是的,张将军能本着这样一条原则去新疆,新疆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希望!”

张治中说:“经过八年抗战,国家已经大伤元气,人民也迫切需要休养生息。”

对于张治中的这些见解,陶峙岳总是频频点头,因为句句都说到了他的心里。

张治中在酒泉军营只住了两日便启程入疆了。



新疆,历来多灾多难,上世纪30年代是被盛世才统治的,而他又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新疆的军政大权的。他自封为新疆督办,如同一方土皇帝,掌管着民众的生杀大权。大权在握的他,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酷镇压,杀人如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新疆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奋起反抗。面对人民的武装反抗,盛世才无法稳定新疆局势,走投无路之下,便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

1943年,蒋介石又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并调胡宗南所属的整编第四十二师、七十八师和马步芳的整编骑兵一师,以及联勤部系统、空军地勤总部系统的全体官兵,共10万余人,先后进驻了天山南北。

这些国民党部队进入新疆以后,包括新建立的新疆国民党政府,都未能缓和政府与民众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加剧了这些矛盾。由于政府的血腥统治,1944年11月,这里又爆发了武装反抗,即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武装革命,以反对新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统治。这次起义声势浩大,起义军击溃了伊犁、塔城、阿山的国民党驻军,乘胜追击到了玛纳斯河西岸,与国民党军队隔河对峙,首府迪化情况十分紧急。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外要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要镇压共产党、八路军,新疆问题鞭长莫及,也就无暇顾及了。

入疆以后,张治中便按照既定原则开始工作,他凭着他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不久就代表国民政府同伊、塔、阿三区人民政府达成了谅解,有了一个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初步协议。

陶峙岳随张治中入疆后,一直忠实地执行了张治中的和平统一政策,完全按照张的意图行使公务,为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顺利达成和平协议尽其所能,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张治中也更



张治中全权委派陶峙岳负责。

陶峙岳十分尊重政府方面的政令，坚决执行张治中的“统一、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推进新疆的和平进程尽职尽责，殚精竭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与当时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盛世才正式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在这里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应盛世才的邀请，大批共产党人入疆参加了政府或其他部门的工作。

盛世才是1933年骗得苏联的信任，依靠苏联人的支持上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野心家和政治投机分子。他表面上表示愿与共产党人合作，在骗得大量共产党人来帮助他工作的同时，暗地却严密监视这些人的行动。

1942年，由于蒋介石疯狂反共，在全国不断挑起事端，在新疆，他也唆使盛世才对共产党人横加迫害。

1942年7月，盛世才终于撕破了伪装，他以保护共产党员为名，将所有在疆工作的共产党人都集中起来，实行了软禁。

1943年，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盛世才彻底地投靠了蒋介石，为讨蒋的欢心，他将这里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家属一起投入了监狱，从此，这批共产党人受尽了刑讯逼供和残酷折磨，毛泽民等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分子都被他在监狱里暗杀了。

1944年，机关算尽的盛世才终于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下垮台了。蒋介石又委派了他的亲信吴忠信接任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秉承蒋介石旨意，入疆后，对这批共产党人又先后多次进行审讯迫害，在施以酷刑得不到供词的情况下，又以“执迷不悟”的罪名继续监禁。直到伊、塔、阿三区人民的武装起义爆发，吴忠信的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反动统治崩溃以后,这批共产党人才算幸免于难,接着便迎来了张治中人疆。

直到1946年,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严正提出,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迫于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和平压力,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了这一合理的要求。

当张治中离开重庆第二次人疆时,周恩来便趁机嘱托他去新疆后,尽快释放被盛世才囚禁了几年的中共党员,张治中欣然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

张治中到了迪化,便电请蒋介石准予释放这里的共产党人,起初蒋介石不予理睬。蒋介石有自己的打算,这批人放出来,等于是放虎归山,他做的亏心事,自然心里有些害怕。但经不住张治中反复电请,反复劝谏,说这事是盛世才干的,与蒋并无关系,并说,再不放人,便会招来缺乏和平诚意之嫌,蒋无奈,便答应了此事。

张治中不愧是个战略家,他做事心细,对蒋介石的底细一清二楚。他预料到重庆谈判迟早会破裂,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说不定出不了一年,内战就会全面爆发。

为防蒋变卦,张治中人疆后,便立即着手解决此事。

一天,张治中主持完几方代表的协商会议以后,陶峙岳刚要走出会议室,张治中便急忙跟了过来,在走廊里对陶峙岳说:“陶兄,你在门口等一下,我一会儿就来,我们去看个地方。”

陶峙岳并不知道要去看什么,他“嗯”了一声,便来到大院门口等候。

不一会儿,从院里开出一辆吉普车,在陶峙岳面前停住,张治



中开门招呼陶峙岳上车。

车子几经辗转来到了一座监狱，陶峙岳才知道张治中领他来看什么了。

监狱里的这批共产党人已不像先前那样整天关禁着，行动基本上还是自由的，看得出，经过长期折磨，这些人体质显得十分虚弱。

张治中告诉陶峙岳，这批人迟早是要送回去的，不要让他们回去的时候，一个个面黄肌瘦。陶峙岳听了默默点头。

有了张治中的这句话，陶峙岳便多次来监狱过问，使这批共产党人的住宿、饮食等各方面的处境得到了不少改善。

5月下旬的一天，张治中约陶峙岳去面商有关护送这批共产党员去延安的事，并郑重地把选拔护送人员的任务交给了陶峙岳，强调要选派能干、可靠的人去护送。

陶峙岳接受任务以后，深为张治中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果敢的行为所感动，觉得张治中确实不愧为一位政治家。

陶峙岳琢磨着该把这一任务交给谁。他想来想去，想起了警备司令部的交通处长刘亚哲。

他立即召来刘亚哲，说明情况后，交待他尽快拟出一个详细的护送计划送审。

一个星期以后，刘亚哲的护送计划呈了上来。

刘亚哲极其认真地到各有关部门把情况摸了个清清楚楚，各方面都考虑得比较周详，大到路线安排、沿途联络、安全问题，小到医务、生活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

陶峙岳仔细看过以后，又给张治中过目，都感到十分满意。

他们决定就让刘亚哲护送，这不仅因为护送计划是刘亚哲订



国人为国民党政府装备了45个师的兵力,还训练了陆、海、空军和特务交警等15万余人,运送了45万军队开赴了内战前线,提供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刘亚哲返回新疆时,一场全国性的内战爆发了。

张治中和陶峙岳暗自庆幸,如果不在6月把这些共产党人送走,到现在就很难说是一个什么结果了。

3. 远古荒原变绿洲、戈壁沙滩变城池

1950年春节刚过,陶峙岳受新疆省政府和新疆人民解放军、改编后的二十二兵团全体官兵的委托,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了。

坐在东去的专机上,这位年逾花甲、刚从旧营垒中走出来不足半年的将军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半年前他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酒泉见过共产党的彭大将军和王震将军。共产党领导人的平易近人、坦荡胸怀、肝胆相照的风范,至今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他也见过蒋介石。想当初——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车站接见他的时候,见了面连句话都没有,只是点了点头,鼻子哼了哼,就扬长而去。那不可一世的形象至今还历历在目。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会是什么样呢?他有什么样的风格呢?

对这位人民领袖他感到十分陌生,也有些紧张与不安。但不管怎样,此行见到毛主席,汇报新疆当前局势,请示今后新疆工作总是少不了的,尤其是眼下如何对部队进行改造,这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能有这次机会向毛主席讨教,这确实是一次天赐良机。陶峙岳的思绪渐渐清晰了许多。



初春的北京,风和日丽,和平带来的社会稳定和新中国的建立使古老的北京城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民族精神一下子又点燃了陶峙岳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陶峙岳大为振奋,这位典型的中华民族将领,此时似乎才真正看到了民族的前途与希望。

那天下午,陶峙岳在他下榻的宾馆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要在中南海与他见面。

陶峙岳随同办公厅工作人员走进毛主席会客室的时候,他见到主席已经等候在那里,没等陶峙岳开口,毛主席已经站起来向他伸出了一双大手:“是陶峙岳同志吧!知道你要来了,我在这里恭候,快快请坐!”毛主席爽朗地笑着。

满腔的湖南乡音,顿时使陶峙岳轻松了许多:“主席也是乡音未改!”

毛主席说:“你屋里是宁乡仙凤乡的吧!我晓得,过湘潭、过我们韶山都由你们那里过身,我去宁乡、益阳,到常德常由你屋门前过,不晓得过了好多次哩!”老乡见老乡,乡音乡情分外亲。陶峙岳说:“这次来一是看望您,二是专程向您讨教来了!”

毛主席说:“就说湖南话吧!湖南话还真顽固呢!新疆情况么子样呢?”

“全靠共产党,全靠解放军,工作才刚刚开始,不懂的事情很多,还得多向王震政委学习。”

毛主席又关切地说:“我刚刚到北京,对于新疆的情况虽有些了解,但那是间接的,最有发言权的是你们。新疆当前的工作我有三点想法,你回去和王震同志商量着办。一是要改造好起义军队,使他们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解放军;二是要做好民族工作,加



强民族团结,尽快消除历史造成的各种民族隔阂;三是要马上着手建设祖国的新新疆和保卫好边疆。”

陶峙岳激动地回答:“主席所言极是,王震同志已经组织部队开始忆苦思甜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这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好办法,能够帮助教育旧军队改造世界观!”

陶峙岳又补充道:“关键是我自己思想上的根本性转变,我们从旧中国来,从国民党那边过来,思想一时还很不适应呢!”

主席接着说:“思想改造十分重要,我们都有这个任务。目前最主要的是要过好三关:一是解放战争关,这一关你过得很好,也有功劳;二是土地改革关,还没有过,但很快就要过;三是社会主义关,还没开始,但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两位湖南老乡,一位是共产党领袖,一位曾是国民党元老,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如此兴致勃勃。他们从午后谈到晚饭,又从晚饭谈到深夜,从北伐战争一直谈到解放战争,谈国事,也谈家事。

陶峙岳激动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解放战争这一关对他是多么要紧的一关,这一关使他获得了新生!

他也有些困惑,我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苦斗了半个世纪,路子越走越窄……现在惟一令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就是社会主义“关”了。他对毛主席讲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着实还有点不解。

但是,无论社会主义是一个什么模样,最让他感到踏实的还是眼前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听他的话,跟着他走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陶峙岳从北京回到了新疆,他觉得新疆此时更美了,也觉得自已似乎比以前也年轻了许多。在北京,他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了人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民领袖,也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使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是毛主席对他的嘱咐。毛泽东希望他能过好三关的指示,成了他尔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指路明灯。

新疆和平解放了,起义部队改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摆在这支部队面前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部队的思想改造,一个是建设保卫新疆。这两大运动,不仅使这支旧军队在思想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改造成了新型的人民军队,陶峙岳也在这两场脱胎换骨的思想斗争和改天换地的生产斗争中,改造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十二兵团成立以后,党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方针政策。为此,从解放军一兵团二、六两个军抽调了1000多名干部和600多名学生参加到起义部队,主要任务是充当政治工作骨干,在各级建立起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同时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使兵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随后又建立了各级军政委员会和军政小组,在士兵中还建立了由士兵组成的革命军人委员会。

毛泽东在北京与陶峙岳见面时,就提醒陶峙岳在思想改造上要有充分的准备。果然,他一回到新疆,就面临了一场以诉苦运动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

诉苦运动实际上是对旧社会、旧军队的控诉,通过挖苦根、吐苦水及新旧社会和新旧军队的对比,极大地提高了官兵们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广大官兵自觉树立起了爱国主义和新社会主人翁的思想,部队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起义部队很快顺利实现了由旧军队向人民军队的转变。

转眼,冰消雪融,万物复苏,春天到了。

根据中央“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和1



月份新疆军区发布的大生产命令，一场令原古荒原变绿洲、戈壁沙滩变城池的开发大西北的伟业就要开始了！陶峙岳遵照毛主席的嘱托，凭着他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就此揭开了他后半生戎马生涯的又一崭新的一页。

按照中央和新疆军区的开发规划，二十二兵团年内的任务是垦荒 22 万亩。兵团所属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负责马纳斯垦区，二十九师负责焉耆垦区，骑八师负责莎车垦区。

这是一项战天斗地的千古伟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生产斗争。各部队到达宿营地后，眼前一片荒芜，周围杳无人烟，所带的宿营帐篷寥寥无几，官兵们只好就地砍伐芦苇搭起棚子，有的干脆挖个土窝子，用芦苇盖顶，形似窑洞。这样的棚子和土窝子虽说住下了，但四面透风，下雪时，被子上被吹进的白雪覆盖着，下雨时，棚外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下。

南疆的春天比北疆来得早，陶峙岳先到了南疆，走遍了喀什白城和焉耆垦区、玛纳斯垦区，他虽已年逾花甲，但每到一地，仍然和战士们一起劳动垦荒，一起吃战士伙食。

所到之处，最让陶峙岳揪心的要算粮食问题了。这里没有蔬菜，粮食十分紧缺，战士们常常是靠煮麦粒充饥，就是麦粒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 4 两，有的连队甚至连 4 两也分不到。

到了大拐，陶峙岳亲眼看到七十四团三营曾经断粮 40 多天，官兵们全靠挖芦根和野草充饥。

七十四团直属队和二营组织了 30 多人的送粮队前来支援三营，人们用裤子扎紧裤脚装满粮食挂在脖子上，连夜前来送粮，两个团的战士相见后相互拥抱，有的激动得哭了起来。

陶峙岳被眼前这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亲眼目睹了经过短短



几个月的整编改造,部队思想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在旧军队是绝对不可想像的,是他在旧军队几十年闻所未闻的。

这期间,陶峙岳和王震同志以及兵团的各级领导都亲自下地参加劳动,和官兵们一起开荒造田,挖掘引水。为了赶上春播,他们昼夜苦战,和战士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受尽了饥寒和无数不亚于战场上的险恶磨难。

南疆渐渐冰雪消融,转眼就要春暖花开了,二十二兵团在春播之前,硬是靠人力挖出了 3000 多个土窝子,在这块处女地上造出了 23 万亩良田,挖出了 100 多条河渠,初战告捷,只待种子下播了。

部队连口粮都还十分困难,大量的种子从何而来?眼下玛纳斯河正在涨水,水淹路烂,运输已基本中断。节气不饶人,迫不得已,陶峙岳和兵团领导商议,决定号召全体将士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就地和老乡换种子。

1950 年秋,这是陶峙岳刚刚走进新生活的第一年,也是此后和他结下不解之缘的屯垦戍边生涯的第一年,新疆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慢慢地揭开了她美丽的面纱,二十二兵团开垦的 23 万亩良田一片金黄,粮食获得大丰收。这一年,部队的蔬菜和肉食也实现了自给和部分自给。

陶峙岳豪情满怀,他要亲自参加入冬以后各垦区的总结表彰大会。迎着初冬尖厉的狂风,踏着厚厚的积雪,陶峙岳走遍了玛纳斯河畔的大片良田,参加了各师的总结表彰大会。有时乘车前往,迎着狂风一走就是一整天,沿途没有人烟,连顿饭都吃不上。有时步行,从喀什到焉耆有千里之远,那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

最让陶峙岳惦念的要数当初断粮 40 多天的驻大拐垦区的七

守疆儒将陶峙岳



十四团三营,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二十五师总结表彰大会会场,官兵们雀跃着欢迎这位老当益壮的将军的到来。

战士们围着陶峙岳,乐不可支,一个战士顺口念道:“小拐小拐真正好,人无粮食马无草。”

陶峙岳哈哈大笑,答道:“小拐小拐真正好,劳模赛过原上草,粮油瓜菜吃不了,明年更比今年妙!”

兴致正高的陶峙岳转过身来又对随行而来的陶晋初参谋长道:“将军塞上来寻春,乌兰乌苏且屯垦,十万健儿齐举镐,荒原戈壁变成金!”会场一片欢腾。

这年夏天,陶峙岳也曾到过七十四团小拐垦区,当时团长安崇文和政委史骥、副团长王云龙告诉他:今年我们卫生队勤杂班的战士试种了一小块棉花,现在已经开花结桃了。

当地农民说,花见花四十八,从开花到吐絮共48天,9月下旬采棉看来是有把握的。

陶峙岳听了这一喜讯,高兴极了,在北纬45度的准噶尔盆地能种出棉花,这简直是奇迹啊!

他顾不上吃饭,径直找到勤杂班的战士,一起到了棉田,他尽情地欣赏着那色彩缤纷的花朵和棉桃,兴致勃勃地询问着战士们植棉的全过程,当即指示团领导,马上总结战士们的植棉经验。陶峙岳此时又在想着更大规模的棉花生产计划。

陶峙岳如获至宝,他匆匆驱车赶回迪化,急着要和王震同志商议。

他们决定1951年、1952年两年,各地都试种棉花,待取得成功后,1953年由二十二兵团在玛纳斯河流域大量种植棉花。由王震同志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决心在玛纳斯河流域造出2万亩产棉良



田。

棉花种植技术要求高,为此,垦区还特聘了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春播前,陶峙岳和迪托夫一起组织了植棉培训班,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一支370多人的植棉技术队伍组成了。

这一年,从春播开始,陶峙岳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争夺大面积棉田丰产的战斗。他经常出现在田间,从春耕、选种、播种到施肥、间苗、定苗、整枝、防病,一直到灌溉都要一一过问。他虚心地向迪托夫同志和新疆农学院涂洽教授学习请教,以极其严肃的科学态度,紧紧依靠广大农垦官兵,终于创造出了整个玛纳斯河流域2万亩棉田每亩超过400斤的奇迹。这是当时新疆棉花的最高纪录,也是全国棉产的最高水平,陶峙岳年初设计的大胆计划实现了,把玛纳斯河流域建成全国重要的产棉基地的设想实现了!

10月,石河子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都参加了大会。会上,陶峙岳激动万分,他满怀深情地对中央派来的同志说:“新疆大面积种植棉花的成功,是一场严肃的生产斗争,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相信共产党,相信科学技术,相信人民群众,这才是这场生产斗争最为宝贵的收获。”

1950年是令陶峙岳最为难忘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他在抓生产的同时,又完成了另一个杰作——启动了新疆前所未有的、以致被后人誉为“戈壁明珠”的石河子市的城建工作。

石河子是迪化到伊犁的必经之地,是准噶尔盆地的一大片荒原,只有40多户人家。在仅有的一条百米长的泥土路两旁,有十多家作坊和小店铺。但经过勘察,这里四周泉水资源十分丰富,水质也好,这在戈壁滩上是极为罕见的,只要有了水就会有奇迹出



现。

8月,陶峙岳和张仲瀚随王震来到石河子。无边无际的芦苇湖,清彻四溢的泉水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就这样,一个果敢的决定诞生了,他们决定在石河子东南1公里处建立一座新城!

按照规划,新城占地为4平方公里,人口为2至4万,道路呈内、中、外三环加辐射式。

市中心为行政区,北区六个邻里村(12平方公里),南为商业区,西辟公园和工业区,东建学校和医院。

兴致勃勃的陶峙岳干脆把司令部迁到了石河子。他委派兵团副司令赵锡光兼任城建工程处处长,张仲瀚任政治委员。司令部就设在每间最多10平方米的三间土房子里,工程处则只能住简易草棚,其他人挖地窝子住下。陶峙岳从上海、长沙请来工程技术人员,又从长沙请来技术工人,到1951年春,从兵团各师调遣参加城建的官兵共5个营加3个连达2000余人。

部队担负城市建设施工,是历史上少有的。为了城建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必须首先策划施工的技术力量。陶峙岳挑选了最好的工程师到部队,首先对营、连、排干部进行技术培训,接着,派出部分战士到军队工程处对口学习了水、电、暖、结构等专业技术。为掌握施工技能,还专门从湖南、迪化招聘来技工师傅,手把手地教战士们施工要领。

伐运木料、割苇子,是施工中最为艰苦的任务,为此,组成了500多人的伐木大队,在达子庙,东沟、西沟、牛圈子等地安营扎寨,任务一直干到入冬才告完成。人们趁着冬雪,硬是以人拉、爬犁滑行,把木材拉运到石河子。战士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怀揣干馍,一路滚爬,饿了,把冻馍砸碎放进嘴里,慢慢溶化充饥。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为了争取时间,衣服被汗水浸湿了,也不愿停下来到食宿站烘烤。半年时间,这支队伍竟全靠人力拉回了8米以上的木料6000多根。

几乎是在同时,战斗在迪伊公路以北苇湖的官兵们,共割运苇子达30多万斤。

施工部队的物质生活极为艰苦,劳动条件异常恶劣,各级领导一律在第一线指挥战斗。

他们夜以继日,四季都是摸黑起床披星回来,喝雪水,吃煮麦。冬天他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伐运木料,割运苇子。夏天蚊虫和牛虻多如牛毛,人们为防止蚊虫叮咬,将身体暴露部分用泥浆涂抹起来,用纸糊个面罩罩在头上,只留出两只眼睛,晚上十几个人挤在一个蚊帐里,不得不彻夜扑打蚊虫,清早脸肿得像个面包。大片的沼泽荒原是蛇族的聚居地,它们经常光顾战士们地窝子,有的盘卧在床上和桌子上,有的甚至钻进被子里,有的缠绕在树上晒太阳。灭蛇也成了施工之外的另一场战斗,人们常常一个中午就能捉到两加仑半容量的油桶一满桶的蛇。

就这样,陶峙岳和他的战友们在无比艰难困苦中,一步一步地实现着他们的城建蓝图,到1954年,石河子这个原来小小的食宿站一下子变成了道路宽敞、工商贸综合发展的新型城市了。

从此,陶峙岳更加朝气蓬勃地投入到了屯垦戍边的伟大斗争中,而且一干又是20年,时年他已经80有余。



董 其 武

(1899 ~ 1989 年)

山西省河津县人。1919年入太原学兵团。1924年参加国民军第二军,任第八混成旅二团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副官。1927年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〇一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率部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气,为保家卫国同舟共济,与日寇、伪军作不懈斗争!”

傅作义为促成绥远抗战,他先后前往太原、洛阳,晋见阎锡山、蒋介石,当面慷慨陈词,请求御侮,以保卫国家的神圣领土。蒋、阎均主张应先集中兵力消灭共产党,不同意与日军作战,恐怕引起中日冲突,难以收拾。傅作义劝陈绥远安危关系整个国家前途、命运,至关重大。然而,蒋介石仍认为不宜轻启衅端,暂以忍辱负重为是,静观时局成熟后,再行抵抗亦不为迟。

太原、洛阳之行虽然没有拿到抗战命令,但傅作义认为仍不虚此行,一是向蒋、阎报告了绥远抗战意图,二是摸到了蒋、阎的实底。返回绥远后,傅作义在召集董其武、孙兰峰等将领开会时指出:蒋介石虽然没有批准我们的绥远抗战计划,但我感受到,他并不反对有限度的“攻势防御战”,对象仅以伪军为限,地域仅以绥境为牢。因此,只要我们抓住有利战机,一举获胜,是会获得蒋、阎二人支持的。看来,现在要想等拿到作战命令再行抗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时机还不成熟,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来把握。

董、孙二人听后都很激动,估计动手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便分别谈了自己对绥远抗战的设想。董其武说:“要打就要打大仗,打有影响的仗,而且必须首战获胜,这样我们的绥远抗战才能继续下去,否则也会因蒋、阎的干涉半途而废。”

恰于此时,中共中央派彭雪枫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秘密来到绥远,鼓励傅作义要顺乎民心,救亡图存,要以东北沦陷为殷鉴。傅作义当即表示决心,不计任何牺牲,坚决抗日,绝不做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

1936年8月14日,正当绥远局势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又派代表南汉宸携其亲笔信到绥远谒见傅作义,函请傅作义速定大计,



为抗日图存而努力,鼓励其抵抗到底,并表示红军决为后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使傅作义得以把驻守陕、绥边界的部队尽数东调,做好了随时进行绥远抗战的准备。

彭雪枫返回陕北后不久,绥远抗战便开始了。

红格尔图属绥远省陶林县,西距县城 80 公里,南距集宁 90 公里,东距日伪盘踞的商都仅 30 公里,是附近一个较大村镇。该地三面环山,只有西面为开阔地,地理位置极佳,且有大路与归绥、陶林、大庙、百灵庙相通,为察绥交界之要冲,由商都入绥必经之路,是绥远东北部的门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军深入绥远腹地最大的军事基地百灵庙,在红格尔图西北 250 余里处,由商都通往百灵庙,红格尔图是最为近便之路,也就成为日伪军必争之地。

攻其所必争之地,是傅作义绥远抗战的主导思想,因而红格尔图被确定为首战目标。

日本侵略者唆使蒙奸德王、李守信侵占察北六县后,便不断派遣日本特务,向绥远、宁夏等地渗透,窃取情报,造谣生事,绥东即为战争的乌云所笼罩。6月30日至8月4日,日军驱使伪边防自卫军司令于志谦、副司令马龙,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司令王道一,先后率 4000 余人,多次进犯红格尔图。乌合之众的伪军一路奸淫掳掠,蜂拥而至。

傅作义闻讯后,义愤填膺,亲临集宁,设立前线指挥所,与董其武一起指挥其第二一八旅之第四三五团及骑兵师一部,从左右两边夹击。董其武一声号令,南北两路部队闪电般地同时夹攻,只杀得伪军槽头转向,人仰马翻,顿时乱作一团。经半日激战,击毙伪军 350 余人,俘匪首马龙等 60 余人,残敌狼狈溃逃。损兵折将的王道一逃回商都后当即被日军枪决。



个骑兵连及自卫队百余人日夜加修工事，修筑了一个加强营的水备工事和一些临时工事，为防御作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11月5日，日军在化德召开侵绥军事会议，由田中隆吉主持，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傅作义获得准确情报后，于11月8日晚在集宁召开了营以上军官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商讨作战方略，进行紧急动员。会上，傅作义再次发出铿锵誓言：“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傅作义强调指出：这次战役，任务非常艰巨，战略上要以攻代守，战术上要先发制人，要出奇兵，必须行动迅速，严守秘密。会议决定：由董其武为红格尔图战役指挥官。最后，傅作义勉励大家说：“绥远为西北之门户，红格尔图为绥远之门户，歼灭进犯红格尔图之敌，就是保卫绥远、保卫中国的大西北。全体官兵，必须全力以赴，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11月13日，日本关东军下达作战命令，田中隆吉为战役最高指挥官，王英为前线总指挥。

率石玉山、杨守城两个骑兵旅及金甲三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由商都向红格尔图进犯。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设在红格尔图北的土城子村。

11月13日夜，当进犯红格尔图的日伪军先头营进至第二一八旅前哨阵地时，董其武令前哨连依托坚固工事予以痛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将其击溃，日伪军先头营退却数里后宿营。

次日早晨，日伪军又以两个加强营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二一八旅外围阵地发起凶猛进攻，二一八旅守军以逸待劳，英勇反击，下午5时许，将日伪军击退。董其武立即命令部队加修工事，输送弹药，医治伤员，以利再战。

两天后，田中隆吉亲自出马，指挥李守信的伪骑兵第二师尹宝



山部、王英的石玉山部及杨守城、金甲三部，共 5000 余人，在飞机、大炮、装甲车掩护下，向红格尔图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先后组织七次冲锋，疯狂至极。第二一八旅、骑兵第七师一部在蒙汉人民及民兵的配合下，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地给日伪军以极大的杀伤。战斗中，日军飞机轮番飞临战场上空盘旋轰炸、扫射，对守军威胁颇大。一次，当日军飞机进行低空扫射时，猎人出身的神枪手王五海，乘机举起步枪射击，正巧击中飞机的要害部位，敌机立即冒着浓浓的黑烟，向商都方向逃窜，后在距商都城十余里处坠毁。日军飞机被击落，极大鼓舞了广大守军官兵的士气。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傅作义来到董其武的前线指挥所，面授机宜，命董其武亲自率部采取秘密迂回、出敌不意、分路包抄的战术，围歼进攻之敌。董其武立即令汽车队分别开赴卓资山和集宁两地准备执行作战任务；同时令驻卓资山的李作栋之第四三六团，驻旗下营的第二一一旅王雷震的第四二二团、第六十八师的李钟颐团，炮兵第二十五团的杨茂林营，分别由卓资山、集宁两地星夜乘汽车隐蔽开往前线。为不使日伪军发觉，还令汽车队开进中车上全部蒙上白布作伪装，于 11 月 17 日晚 10 时，到达红格尔图以西的丹岱沟一带集结待命。

各部队按时到达后，董其武在红格尔图以南十二苏木召开了紧急部队长作战会议，检查部队作战准备情况，下达作战命令。董其武首先讲道：“各位兄长、兄弟：大家期盼已久的绥远抗战已经开始了，听说各位几日来未能参战，心中不悦，频频请战，欲展雄师风采；广大官兵亦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报家仇洗国耻。现在战机摆在我们面前了，谁英雄、谁好汉，抗日杀敌的战场上比比看！各位有没有夺取胜利的决心啊？”



“有！”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

“我率部出发来此之前，孙兰峰旅长明令交待：不成功，便成仁！出师作战不要丢第二一一旅的脸，与友军配合作战不要丢第三十五军的脸，与日伪军作战不要丢中国军队的脸！兄弟牢记在心，请董旅长把最艰巨、最困难的作战任务交给我们团吧！”王雷震慷慨激昂地表示决心。

“首战必胜，乃兵家之常识。我团愿不计牺牲，拼死相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作栋言简意赅。

李钟颐、杨茂林等团长、营长也分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董其武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王雷震、李作栋两步兵团配属炮兵一个连，于18日凌晨2时，向日伪军指挥所土城及日伪军聚集地域打拉村、二台子、七股地一带进行分割包围，分别予以聚歼；令骑兵团秘密迂回土城子、打拉村以东地区截击溃退或增援之敌，并担任追击任务；原红格尔图守军可择机出动，配合主力分割围歼日伪军；其余各部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前进。”

各部均按时到达各自攻击位置。凌晨2时整，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各部队一齐向敌发起猛攻。刹时枪炮轰鸣，杀声震天。日伪军因连日来进攻受挫，陆续增加兵力已达7000余人，准备于18日上午发动总攻，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夺取红格尔图主阵地。但傅作义部抢在日伪军之前，先敌三四小时以优势兵力将其分割包围，在敌人尚未察觉之际发起攻击，可谓棋高一筹。此时，飞雪已停，北风伴随着枪炮的怒吼呼啸着，惨白的大地上火光四射，冰雪夹杂着沙石腾空飞扬，强劲的白毛风席卷着红格尔图以西的开阔地。各路大军如猛虎下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日伪军侧后分路杀进其营地，手榴弹、机枪、刺刀各显神通。霎时，酣睡中



的敌人在黑暗中被惊醒,有的找不到衣服,有的摸不着武器,有的在纷乱中不知所措地胡窜乱闯,有的在朦胧中就稀里糊涂地命归西天,有的躲在角落里互相对射,有的钻进草垛或地窖里逃生。傅作义部愈战愈勇,愈杀愈凶,官兵们平时练就的一身硬功夫,这时全都派上了用场。

田中隆吉和王英在睡梦中突然遭此猛烈的袭击,猝不及防,只好在纷乱中带着几个残兵败将,乘汽车拼死向东逃去。日伪军指挥官逃窜后,伪兵无所适从,激战至拂晓,敌全线崩溃,残兵狼狈向东北方向溃逃而去。

当董其武指挥部队猛袭土城子、打拉村时,原红格尔图守军一部在张培勋团长指挥下,也乘势选择有利方向突然出击。战至18日上午时许,傅作义部大获全胜,骑兵部队也按预期作战计划,猛烈追击残敌至察哈尔省境附近,始返回红格尔图,战役遂告结束。

红格尔图战役,从11月13日起至11月18日结束,历经六昼夜激战,捣毁了日军田中隆吉顾问团和匪首王英的指挥部,毙伤日伪军1700余人,俘伪军300余人及日军电台台长八牟礼吉和松村利雄等数人,击落日军飞机一架,缴获日军汽车数辆、军马数百匹、大车数十辆及大批其他军用辎重和许多重要军事机密文件。

此役,傅作义部阵亡仅70余人,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较大的胜利。

日伪军惨败后,其大小头目极为惊恐,惧怕傅作义部乘胜进攻,直捣其老巢,急忙增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等地的防务。田中隆吉在商都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日军顾问、指导官举行紧急会议。会上,田中隆吉大骂伪军组织不严、作战不力,责令王英严惩不贷。王英亦大骂部下不争气,并将其团长赵大中枪毙。会议决定:进一



步加强日军顾问和指导官对王英部的整顿训练,对作战不力的军官予以撤换;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力量,严防傅军突袭;调集有力部队开往大庙,以加强百灵庙方面的防务;同时令王英部张万庆司令率主力一部移驻尚义、南壕堽一带整顿补充、严格训练,积极备战,以图再犯绥远。

此役,傅作义运筹帷幄,董其武指挥有方,大获全胜,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抗战热忱。战后,董其武遵照傅作义指示,令李钟颐率一个团驻防红格尔图,令两个骑兵连驻防土木尔台,互为犄角,严密监视日伪军行动,严防其报复性进攻,随时做好再次打击进犯之敌的准备。

2. 晋见毛泽东,董其武诚惶诚恐

绥远广大人民、起义部队在向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进程中,取得和平合作的初步成绩后,董其武和高克林奉中共中央、华北局电令,于1950年4月5日上午进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谒见毛泽东。董其武是起义后第一次以解放军将领的身份抵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华北局、华北军区的热情接待。

董其武和高克林被傅作义安排在北京西单小酱房胡同19号他原来的住宅里。住宅为一幢三层楼房,房间布置得朴素大方、宽敞明亮。院子里栽满藤萝和丁香、梨、桃等树木,嫩叶翠绿,一派香色。

4月7日,聂荣臻、薄一波设宴热情招待董其武。参加宴会的还有刘澜涛、傅作义、平杰三、程子华、安子文、潘继文等。聂荣臻说:“起义是背叛本阶级走向人民的道路,是受人民欢迎的大好事。”



“起义就是革命，是好事，是受人民欢迎的。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薄一波也说。

在京汇报工作期间，周恩来三次接见并招待董其武，对他组织领导绥远起义及绥远和平合作给予高度评价。董其武在向华北局、华北军区作了《关于绥远工作情况的报告》之后，即要他准备向政务院汇报。为此，他和高克林又对报告作了详细修改，誉清后先送周恩来审阅。

4月13日深夜，周恩来将修改稿送回。

4月14日8时，董其武、高克林到中南海政务院参加政务院第二十八次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并将董其武介绍给与会人员。董其武向会议汇报了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

最后，董其武十分激动地说了一段话：“绥远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农牧业、工矿业都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手里虽然抱个破碗，地下却埋藏着黄金。其次，和其他兄弟省份比较，绥远解放较晚，一切落后一步。但我们每个干部都抱着炽热的心情，向毛主席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兄弟省份学习，以迎接伟大的生产与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超过这个任务。其武个人在旧社会工作较久，缺点甚多，今天得光荣地为人民服务，看见全国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尤其感觉无限的感激与兴奋。请多赐批评，策励我们的进步。”

汇报一结束，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座位走到董其武面前握手，表示祝贺。周恩来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



地方,也是你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北京,你人生地不熟,不是你住的地方,也就没有多少好做的事情。”

片刻,毛泽东又继续说:“我们革命要过三关,打倒蒋介石是最难过的一关,这一关过去了,其他的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都好过。你要好好努力,争取当好地方领袖。你这个主席,是要安抚一方百姓,为他们谋利益的;我这个主席,就是要掌握政策,检查工作。”

接着,毛泽东指着傅作义,对董其武继续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过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不要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董其武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录,还不时地抬起头来,专注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不是。”董其武回答。

“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能听懂的。”董其武说。

“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毛泽



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泽东，心中充满幸福！

回到小酱房胡同的住处，已是深夜23时多了。董其武躺在床上，兴奋得辗转反侧，几乎彻夜未眠，深深地思索回味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并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对照检查。后来，他在回忆这次谒见感触时写道：

由于我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新制度、新作风，尤其是民主作风了解不足，在起义后总认为军队仍是我带，行政仍是我负责。而原指挥所与军区合并后，觉得军队的一切联系不上了，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绝大多数公文看不到了。不知道这是分工负责制，反认为军队是革命武装，我若经常过问，恐惹起对我的怀疑，自卑地把自己置于主人翁之外。故从1月份以后，军队的事过问不多，行政的事看到多少说多少，忘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责。毛主席和我谈过话之后，我觉得仍以旧思想、旧意识看待新事物。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殷切希望，不够开诚布公，不够心口如一，应该对本职工作积极大胆地负起责任来，该说就说，不容旁贷。尤其是在北京看到各方面秩序良好，处处显示新气象，与旧社会截然不同，使我异常激动，对新中国的未来寄予无限美好的希望。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一切工作。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董其武与高克林原定在北京参加完“五一”节庆祝活动后，再返回归绥。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再也坐不住了。尤其是听说部队有一个排哗变了，便急促地于4月30日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3. 六位元帅视察六十九军,董军长受宠若惊

人民解放军六位元帅同期到一个军视察工作,这不仅是第六十九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北京军区的光荣和骄傲,这是与董其武几年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六位元帅是: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

第六十九军政治委员裴周玉在他撰写的《绥远方式的胜利》一书中,详细地记述元帅们视察的经过。书中写道:

第六十九军是以“绥远方式”起义后,编组为解放军与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的。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整编为第六十九军。近几年来,由于工作上有了新的起色。特别是正规化军事训练不断取得好的成绩,多次受到北京军区与军委各总部的好评与表扬。而元帅们正是在第六十九军出现这种欣欣向荣的形势下,都想亲眼看一看这支以“绥远方式”组建、发展、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虽然在朝鲜战场上经过考验,证明不愧为人民军队,但在正规训练中又取得新的成绩与创举。于是,元帅们不约而同地,一个月中在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等同志陪同下,先后到六十九军视察工作,这是对第六十九军全体同志的鼓励与鞭策。

1958年9月中旬,叶剑英元帅与粟裕大将乘车前往保定市第六十九军视察工作。当时叶剑英兼管训练总监部,对军事训练非常关心,他同粟裕总参谋长到达军部后,认真听取了董其武与裴周



玉关于部队训练工作情况的汇报。当二人汇报到特种兵训练成果时,叶剑英称赞第六十九军取消坦克团、炮兵团的施工与农业生产任务以保证其全训,是步兵军应仿效的好办法。并指出该军特种兵开展一专多能也是可行的与应该重视的一种好方法。最后,他对该军训练成绩表示满意,给予极大的表扬与鼓励。

在视察期间,叶剑英应邀向正在召开的军师团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关于当前形势与搞好军事训练》的报告。报告中,他介绍了近年来全军部队的军事训练情况,对第六十九军的训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要求该军“要把部队训练搞得更加扎实巩固,以发挥特种兵的应有作用。为此,部队要加强合练全训,要搞连、营、团的战术演习,也要搞首长、司令部带通信工具的演习。

紧接着,陈毅元帅与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前往第六十九军视察工作。他们听取了董其武与裴周玉的工作汇报,参观了部队的军事训练表演,纷纷为他们优异的训练成绩和精湛的军事技术赞叹。陈毅在讲话中对该军的广大指战员进行了热情的表扬与鼓励,并希望他们今后把军事训练搞得更好、更出色。董其武请他给全军连以上干部作一次国际形势的报告,他当即答应,当天下午就向该军干部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他的报告非常生动、内容丰富、事例具体、材料详尽、论证充分,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大家听了非常高兴,许多同志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生动有力的形势报告。

在为陈毅送行时,董其武握着他的手,充满企盼地说:“我们真希望每年都能听到您的国际形势报告,这将对我们的军工作与训练的推动,只怕我们没有这份福气啊!”



“那我就每年来一次！”陈毅认真地说。

“一言为定！”董其武也认真起来。

“好，一言为定，驷马难追！”陈毅开怀大笑起来。

半个多月后，刚刚免兼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的杨成武，陪同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第六十九军驻地，受到董其武、裴周玉及军机关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四位元帅和杨成武首先听取了董其武与裴周玉的军事训练工作汇报，元帅们分别给予了高度评价与热情的赞誉。然后，杨成武提出，罗荣桓元帅准备在军里召开政治工作干部座谈会，专门研究训练中政治工作的经验问题；其他三位元帅拟到部队视察工作，具体了解一下干部、战士的生活情况，请军里安排一下。

于是，董其武与裴周玉简单商量后，建议座谈会就在军部召开，需要哪级政工干部，请他们到军部来，这样参加座谈会的干部范围可大些；视察部队就安排在保定近郊的第一〇七师三一九团。

第二天上午，在杨成武与董其武、裴周玉陪同下，三位元帅乘车来到第三一九团驻地，等候在营房门口的师长冯梓、政委张宗文、代团长靳万起与干部、战士马上沸腾起来，热烈欢呼。在靳万起向杨成武报告完准备情况后，元帅们下车含笑向干部战士们挥手致意，并同大家一一握手。

在欢迎的队列里，一排头戴船型帽、佩带列兵领章的老兵，引起元帅们的注意，他们是下连当兵的军、师、团三级干部。元帅们关切地问：“下连当兵好不好？”

“好！能锻炼自己，还能改进工作。”大家纷纷回答。

接着，贺龙走到“列兵”陈化香（营教导员）面前亲切地问：“你过去当过兵吗？”



“当过。”

“什么时候？”贺龙又问。

“1947年以前。”

“啊，十多年啦。”贺龙意味深长地说。

这时，“列兵”王立基走上前来，向贺龙敬礼，董其武介绍说：“这是最近下连当兵的三一九团政委。”

贺龙紧紧握住王立基的手，满意地说：“好！你们一定要把兵当好、放下架子，虚心向战士们学习。”

“是！我们一定按元帅的指示办。”

随后，元帅们走进团部会议室，由冯梓和张宗文简略汇报了该团的训练与工作情况，靳万起介绍了团史。当讲到在朝鲜战场曾荣获朝鲜政府的奖旗时，刘伯承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这是部队与每个人的最大光荣与崇高的荣誉，你们要好好尊重历史，保持与发扬这种光荣。”

“我们每年都进行团史教育。”靳万起说。

从会议室出来后，元帅们参观了宽敞明亮的战术教室。里面陈列着很多模型、实物和图表。贺龙指着乌黑发亮的武器，新奇地问：“你们展览这些崭新武器干什么？”

“这些冲锋枪、手枪原已脱光，是他们自己上的珐琅。”张宗文回答。

“过去部队的枪支上珐琅要进兵工厂，回来后还得矫正，很麻烦。现在他们自己能上珐琅，省事多了。”杨成武补充说。

贺龙拿起一支冲锋枪摸着，连连点头，并称赞他们这种敢想敢干的精神。

刘伯承看到展品中有一瓶豆油，标签上写着“本团油厂制，日



产25公斤,成本二角五分”,便拿起来仔细观察油的纯度,对董其武说:“纯度很好嘛,是用什么豆子榨的?”

“是黄豆和黑豆混合榨成的,油用来改善连队生活,剩下的豆饼还可以当马料或喂猪。”董其武回答道。

“榨出的油如何分配呢?”刘伯承又问。

“他们以比市场低一半的价格,价拨给连队,这样既节约了伙食费,又可以把省下的钱用于改善生活,还增加了饲料。”董其武很了解这个团的情况。

“看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嘛!”

元帅们还参观了战士们自己生产的红薯、萝卜、辣椒、大葱等农副产品,脸上都呈现出满意的笑容。贺龙拿起长得很大的南瓜和冬瓜,微笑着说:“长得好,长得好!”

聂荣臻说:“现在仍是生长期,再过个把月还能长得更大。”

杨成武看到元帅们很关心部队的农副业生产,马上补充说:“我们军区除粮食外,蔬菜和猪肉基本上自给或大部自给,部队的生活比建国初期好多啦。”

说到部队生活情况,元帅们关心地问:供应标准怎样?每天吃多少菜、多少油、多少肉?

战士们零花钱有多少?有没有节余?甚至连战士们吸什么牌子的香烟也问到了。

团参谋长一一作了回答,并说:“现在,战士对伙食比较满意。”

元帅们纷纷赞扬:“部队利用训练间隙进行农副业生产好处多呀!既为国家节省资金,又能改善生活,增强体质,搞好训练。”

董其武说:“这条兼顾农副业生产的道路,我们会继续走下去的,做到训练、生产两不误。”



参观后,元帅们坐下来和在场的干部们交谈起来,刘伯承问团参谋长,这个地方冬天下雪多,对训练有没有影响,能不能进行滑雪训练等等。参谋长一一作了回答,并说:“战士们都愿意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训练,我们的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刘伯承又说:“冬天,你们可以派人到东北部队去参观,这样对训练会有好处的。”

一个多月前,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对大、小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重点打击国民党军的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设施和停泊在料罗湾码头的军舰,并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公开发表了文告。元帅们也想听听部队对炮击金门的看法,贺龙问道:“对彭部长的文告,部队有什么看法?”

张宗文说:“部队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看到敌人疯狂活动,都非常气愤,认为应该教训一下敌人。”

“只要有敌人存在,就会有仗打的。要鼓励战士们好好学习,刻苦训练,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贺龙说。

“有备无患嘛!”聂荣臻补充说。

接着,话题又转到部队训练上,聂荣臻关切地问:“你们的全能全优活动搞得怎么样?”团政治处主任蒋健回答说:“最近经过考核,四种武器三种优秀,一种良好,总评优秀。”“这很好呀!”

杨成武插话说:“他们师的全能全优活动,炮兵团最好。”

“坦克团也很好。”裴周玉补充说。

“对!坦克团也好。”杨成武点头表示同意。

贺龙很关心战士学文化的情况。他问道:“新战士的文化程度如何?”

“百分之八十的新战士只读过两三年初小,一字不识的与读过



高小和初中的都比较少。”王立基回答道。

“服役三年后,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都要达到高小毕业程度。”

贺龙说:“达到高小还不行,今后要加强文化教育,还要学习科学技术,使他们复员回乡后,都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所以要重视培养,把部队办成一所大学校。”

杨成武接着说:“今后,军事训练的时间可适当缩短,增加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时间。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战士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多了,训练起来也会相对容易些。”

几位元帅点头表示同意,刘伯承还说:“请成武同志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经总参研究后,下达部队执行嘛!”

“好的。”杨成武答应道。

董其武听了这段议论很高兴,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加强文化学习,是部队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仅有利于战士和训练,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也有利农村的发展,是利军、利民、利国的好事。”

聂荣臻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对董其武说:“那就先在你们军搞个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上报军区、总部推广实行。”

这时,刘伯承又问:“你们团超期服役的战士有多少?他们现在怎么样?”

蒋健回答:“全团有 201 人,他们都要求继续服役。”

“在炮兵团、坦克团,超期服役的老战士还要多,一般说来,步兵超期服役的战士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特种兵可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杨成武插话说。

刘伯承高兴地说:“很好,他们是部队训练的骨干。”

贺龙吸完烟,磕了磕大烟斗,站起来说:“走,我们看看战士们



去!”

元帅们来到宽敞整洁的第六连宿舍。战士们的褥单洗得雪白,被子叠得整齐一致,各种物品的放置井然有序。元帅们一进屋,脸上呈现出满意的笑容。元帅们细心地摸摸床铺、试试被子,贺龙还很有风趣地爬上双层床,躺下试一试是否舒服,他一边晃动着魁伟的身躯一边连声说:“挺好! 挺好!”

刘伯承关心地问:“房间这么大,冬天怎么办哪?”

靳万起说:“冬天生两个大火炉,很暖和的。”

“从哪里出烟呢?”贺龙问道。

“每年入冬前安装上烟筒,有时还难免烟灰污染墙壁,每年春天都要粉刷一次。”靳万起说。

“搞暖气不好吗? 费不费钱?”刘伯承又问。

“当然费钱,安装一套设备,要花许多钱。”靳万起表示无能为力。

贺龙指着一张单人床,问:“这是干部的床吗?”

“是排长的床铺。”裴周玉回答。

“过去,排长都住在军官宿舍,后来我们改过来了。”董其武补充说。

刘伯承满意地说:“排长、连长都和战士住在一起,这样很好,体验战士生活,密切官兵关系嘛!”

杨成武触景生情,回忆说:“现在战士宿舍的条件,比我当师长时在延安住的条件好多了。”

“比延安红军大学还好哩!”聂荣臻也笑着说。

元帅们还参观了训练场、礼堂、俱乐部、食堂、养猪场等地方,在第二营食堂,元帅们与炊事员一一握手,询问他们的生活、工作



情况。随后,一起走进操作间,贺龙走到炒菜锅前风趣地说:“看看大师傅炒菜的技术。”

炊事员王二弟在炒锅里放了油和花椒,把切好的土豆丝一放,又倒了些醋,立即香味扑鼻。贺龙低头闻了闻,又尝了尝,连声说:“菜炒得香,味道很好。”

王二弟乐得合不上嘴,不知说什么好,就冒了一句:“请首长在我们连吃饭吧!”

贺龙笑着说:“要是我们几十个人都在你们连吃饭,你们可要饿肚子喽!”

元帅们又仔细参观食堂的主副食库,检查了卫生状况,对几个连整洁、干净的环境表示满意。杨成武和随行的医生打趣道:“比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伙食不差吧!”

两位医生连声说:“好!好!”

贺龙又问董其武:“其他团是否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我们全军都是这样。”董其武肯定地回答。

最后,元帅们观看完训练表演,第三一九团的干部提出与元帅合影留念,元帅们欣然同意。正在操练的战士们听说与元帅合影的消息,万分高兴,迅速集合到办公楼前,当董其武把三位元帅介绍给大家时,官兵们高兴得跳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顿时掌声四起,经久不息,许多战士兴奋地流下了热泪,都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合影后,元帅们站起来,挥手向大家告别,并同周围的战士一一握手,在战士们的簇拥下,元帅们走到营门外,登上汽车,边走边向大家挥手致意。

汽车走出很远了,官兵们还久久地站在营门前不愿离去。



4. 对手与战友,董其武与杨成武不打不成交

杨成武与董其武,这两位历史上作为友军并肩战斗、作为对手相互搏击的高级将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举行的春节招待会上,又同时步入舞池,翩翩起舞。人们都风趣地说:杨成武的舞姿仍带着八路军不太正规的队列动作,而董其武的舞姿却像国民党军将领在蒋介石面前一样拘谨。

那是1951年春节前夕,杨成武与董基武应邀参加春节招待会,会后在恭王府举行舞会。

刚刚开始学跳舞的杨成武,音乐一起,便与华北军区文工团的女演员一起步入舞池,挪动着不熟练的步伐,转来转去。几支舞曲放过之后,身上已微微发热的杨成武,突然看到董其武独自一人坐在舞池外喝茶,便对女演员说:“你去请董司令员跳个舞好吗?”

女演员微笑着点了点头,随着乐曲的节奏,两人踏着轻快的舞步移向董其武。女演员走上前,微倾上身,向外划动了一下手臂,说:“请董司令员跳个舞好吗?”

董其武有些不知所措,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不会跳舞。”

“我来教你跳!”

杨成武也走过来说:“其武啊,女士的邀请是不能够拒绝的,这可是舞场的规矩啊!”

“可是,我真的不会呀!”

“不会可以学嘛,难道跳舞比打仗还难吗?”杨成武说着,伸手拉起董其武。



国民党起义将军传奇

女演员拉着董其武的手臂步入舞池,挪动起极不协调、极不自然的舞步。

绥远起义之前,在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非常循规蹈矩,非常保守、正统,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位。他看到许多中、高级军官除了打仗外,经常沉迷在灯红酒绿、赌场妓院之中,十分反感。为此,他一直要求自己的部下必须做到“三不准”;一不准赌博,二不准嫖娼,三不准跳舞。自从这次步入舞池之后,他曾多次对别人戏言道:“是杨司令员拉我下水的!”但据说也仅此一次而已。

杨成武多次回顾说:“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懂政策、顾大局的,因此给董其武等起义将领和军官创造了一个融洽的工作环境。董其武也是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气氛中顺利工作,努力发挥才干,把一支起义部队治理得非常出色。但是,总还是有极少数的党员干部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起义人员,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董其武也遇到过这事。”

1958年,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董其武率所属第二十八师等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

5月24日上午,董其武突然接到通知:明天中央首长要到第二十八师工地参加劳动,请提前平整道路、准备劳动工具,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并做好劳动现场的警卫工作。于是他立即召开军指挥部会议进行布置,规定晚饭前进行检查验收。

结果下午检查时,发现一位负责安全检查和警卫工作的处长,什么工作也没有落实。

董其武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他说:“中央首长到我们军参加劳动,是对我们军的信任,是对全体指战员的鼓励和鞭策,也是我们军的光荣。所以各项工作,特别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万无一



失,出现任何一点问题,也是我们军的耻辱。你怎么能拿这样重大的事情当儿戏呢?竟然没有落实,你必须连夜抓好落实,并且做深刻的检讨。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的!”

只见一位处长鼓了鼓劲,不服气地嚷嚷道:“你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危险的因素是你们!主要的隐患都在内部,你叫我怎么落实安全保卫工作,我才不负这个责任呢!”说完竟一甩手走开了。

这位处长的几句话像万根钢针刺进董其武的心,但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片刻之后,说:“那么,明天的安全保卫工作就由我亲自抓吧,出任何问题都由我个人负责,请通知连、营、团主官,晚饭后在二号工棚开会,请这位处长也参加。等他的火气消了之后,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要由他抓的。”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在第二十八师的工地上,与广大官兵一起挥锹铲土,汗水洒在同一块土地上。第二十八师的工地沸腾了,整个十三陵水库工地沸腾了!几个小时之后,中央领导愉快地离开了水库工地。第二十八师官兵在劳动中焕发出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此后,经他提议,第二十八师评选出20名积极分子,到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泽东及党和国家领导的亲切接见,合影留念,使广大官兵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这位处长出言不逊,恶语顶撞董军长的事件,尽管董其武明令不要追究,不要上报。但此事还是不翼而飞,很快传到杨成武那里,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恶劣的事件怎能不追究呢?这样的人,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就不配做政工干部,不配在起义部队工作,必须马上撤职!”

杨成武的处理意见传达到第六十九军,董其武看到电话记录



稿后,十分惊讶,批示:“暂缓执行!”随后,又让机关追查是谁叫汇报给军区的。在查清没有经过组织系统正式汇报后,他直接打电话给杨成武,为这位处长求情:“请不要给这个处长任何处分,也不要调离第六十九军。起义已经八九年了,我们仍然未能改变一个共产党员的看法,只能说明我们做得还不够好,这位处长何错之有呢?我相信只要让他继续留在六十九军,我的行动最终有一天会感化他的,我希望能和他成为同志和朋友!”

“其武,这样做是不是太迁就部下啦,会不会影响你的威信和指挥?”杨成武有些担忧地说。

“如果我连一个顶撞过我的处长都容不下,都团结不了,还配当什么军长?还有什么威信可谈!”董其武口气坚决地说。

杨成武让步了,说:“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如果他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必须严肃处理。到时候,我可不听你求情啊!”

“不会了。这次也是因为我的态度比较急躁引起的。”董其武还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

“姑息迁就干部,可后患无穷啊!”杨成武仍没有忘记提醒他一句。

这就是第六十九军涉及派遣的政工干部与起义军官最后一起纠纷事件,也是惟一一起把矛头直接指向董其武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并没有使矛盾加剧,反而慢慢使人们淡忘了这两部分干部的界线,使之逐渐水乳交融般地融合为一体了。

1955年春,人民解放军将官授衔的征求意见方案下发后,杨成武与董其武同时被预定为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研究讨论时,军以上干部都表示同意,一致认为给董其武授上将军衔,既体现我党对起义将领一视同仁,又能体现对起义将领的关心和照顾,有利于



“我不这样看,也不应该这样看。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我。我认为,对于革命的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对于自己反革命的历史,也是不应该忘记的。忘记了,也是对革命的背叛!我只有不忘记自己的罪过,才能激励我更加全心全意、干劲倍增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成武点了点头,说:“你的想法是好的、善意的,但是仅仅这样想还是不够的。你应该加强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从根本上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这才是革命的原动力。”

“司令员啊,你对我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啦,我会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这可不是我对你的要求啊,是你提出要加入共产党的嘛!不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行呀?”杨成武微笑着说。

董其武仍然没有忘记来找杨成武的目的,话题又转回授衔的问题上:“司令员,在我还不具备做一个共产党员时,还是满足我做一个良知的革命者的愿望吧!”

杨成武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说:“你真是一个固执、倔强的人!好吧,我答应你,一定把你的信转送给毛主席,一定当面向毛主席反映你的意见。不过,我想毛主席是不会同意的。”

一丝宽慰的笑意挂在董其武憨厚的脸上。当晚,他打电话给傅作义,讲了这件事。傅作义也表示:“你还是授中将军衔比较合适。你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向毛主席反映。”

杨成武打电话给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很快就安排了这次会见。他在汇报完北京军区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对将官授衔的综合意见后,专门讲了讲董其武的要求。

毛泽东想了想说:“董其武是起义将领,根据他的功劳和贡献,



以及他的资历和起义前的军衔,是应该授上将军衔的。你回去告诉他,你是起义将领,应该授什么军衔,就授什么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就不同了,你是共产党员,你要有意见,是可以不授上将军衔的。”稍顷又说:“就是说,你杨成武是可以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是不可以不授上将军衔的。”

“主席,我会对他讲清楚的。”其实,杨成武早对董其武讲清楚了,只不过是没能说服他。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杨成武没有回北京军区,也没有回家,而是径直赶到董其武的驻地,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听了毛泽东的话,董其武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送走杨成武之后,他立即驱车赶到附近傅作义的住处,怀着激动的心情讲述了毛泽东的原话。

傅作义听后也非常高兴,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又说:“如果毛主席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会把他称为活菩萨的!”

“毛主席就是我们人间的观世音!”董其武说。

第二天上午,杨成武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傅作义,问道:“董其武授上将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了。”傅作义激动地说:“昨天晚上,他翻来覆去地只说两句话:毛主席真伟大!共产党真伟大!”

会后,傅作义又去见毛泽东,讲述了董其武听到主席指示后,激动和感激的心情,以及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这件事很快就在北京军区传开了,随后又很快传到其他大军区,传到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认为给自己军衔评低了的人,也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了,有的说:“谁让咱是共产党员呢,



低就低点吧！”有的说：“咱共产党员不能不如起义将领吧！”还有的半开玩笑地说：“毛主席说啦，共产党员要是嫌衔评高了，可以降下来；可没有说嫌衔评低了，可以升上去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授衔就这样平平稳稳地完成了。

9月29日，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自为董其武授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又亲手为他授了一枚一级解放勋章。当他接过军衔和勋章后，心情极不平静，连声说：“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1965年6月1日，军队取消军衔，实行定级减薪后，按照中央军委的规定，起义人员保持原薪不变。董其武收到当月薪金后，很快给第六十九军政委曹南和军党委写信，提出减薪要求。他在信中说：

取消军衔，定级减薪，是我军进一步革命化的具体措施，我坚决拥护。但日前发薪金时，我的薪金丝毫未减。骤听之下，一则万分感激，二则内心确实不安。我想，我在党十几年的培养教育下，觉悟虽然还很低，但也懂得怎样走革命化的道路，绝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

同时，我现在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党和毛主席的干部，应当和同志们待遇一样，不应再有特殊。因而，坚决把应减的薪金退还，请查收。

从绥远起义之后，直至董其武去世的40年中，杨成武和董其武是最要好的朋友，其间他们来往非常频繁，谈话推心置腹，这对战场上的对手、人民军队中的朋友的深厚交情，被后人传为佳话。



5. 比翼双飞 60 载，董其武与爱妻姚勤修情深意笃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国民二军洛阳一战失败后，董其武只身来到河南开封，住在友人姚尧仙家中。住房的房东是姚梅梁，出身于书香世家，在一所高级中学任英文教师。其祖父曾考取清朝进士，被选取进入翰林院，授为庶吉士，后晋为教职。因遭慈禧太后迫害，举家被逐出京城，迁居开封。他的二女儿姚勤修，当时已初中毕业，知书达理，天资聪慧。同住在一套院落里，经常见面，她也有意找些学习上的问题，向董其武请教，一来二去，便有些情投意合，只是隐藏在各自的心中并没有明说罢了。

女儿的心是逃不出母亲眼睛的。夫妻二人商量后认为董其武为人沉稳诚厚，对其印象不错。但姚梅梁认为他年已 28 岁，又当过校级军官，恐怕早在原籍成家了，因而犹豫不决。经过姚尧仙的再三证实，才相信董其武尚未娶妻，不过姚梅梁还是坚持要他写了一纸保证确未结婚的字据，才同意把他俩的婚事定下来。那份《保证书》是这样写的：

董其武，年 28 岁，与开封南门大街 204 号后院姚公梅梁之次女姚勤修订婚。姚公疑有前室，着立字为据。立据人董其武，立字如下：自结婚之日起，如若发现其武另有前室，任其女另行方便，其武决无干涉之权。

随后便开始做结婚的准备。董其武和姚勤修自然是喜上眉



梢,每天一起商谈如何举办婚礼,共同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五四”运动后,开封广大青年学生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纷纷起来反对封建道德礼仪,因此他们也准备按新式的“文明结婚”的方式进行,即不坐花轿,只举行简单的婚礼仪式,由证婚人证婚。然而,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旧势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他们的提议遭到姚勤修母亲和一些亲属的反对。董其武便对勤修说:“结婚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吧!”

“是啊!结婚是大喜事,还是让父母和亲友高高兴兴的为好,我们就迁让一步吧!”

商定后,由勤修的一位亲戚老太太当主婚人,全权导演操办婚礼大事。事前,先请人占卜掐算了黄道吉日,又派人帮助董其武租了一座小院,布置新房、婚堂,租定花轿,雇请锣鼓吹打班,筹备酒席,家中忙得不亦乐乎,只是两位新人什么也插不上手,在期盼和悠闲中度过了十几天。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宅院内树枝上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勤修的母亲对丈夫说:“今天这个日子选对了,你听,喜鹊都来贺喜啦!”

按照旧式婚俗,董其武身穿藏青色的长袍马褂,头戴红珠帽盔,脚登礼服呢布鞋,坐着八抬花轿,吹吹打打地走了三条街,好不热闹。拜喜堂,行的也是跪拜大礼,举行一整套繁文缛节的结婚仪式,应酬八方来客,和接力赛般的酒席。一天下来,两位新人累得精疲力尽,才入洞房休息。

“花烛之喜”过后,两位新人如胶似漆,恩爱倍加。每天,勤修除了做些家务,看些历史小说外,便是陪着董其武山南海北地谈天说地,或者去游览开封各处的名胜古迹。



开封是著名的历史古都。五代的梁、晋、汉、周和北宋，都在此建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里所说的东京汴梁城，指的就是这里。他们先后多次游览过大相国寺、龙亭、铁塔、禹王台、潘杨二湖和繁塔等地，俩人兴趣一致、爱好相同，每次访古探幽时，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勤修陪其武游铁塔寺。

勤修说：“这里原来有座寺庙，早年黄河泛滥，把庙宇冲塌了，只剩下这座孤塔和南面一座八角亭。”

董其武举目望去，塔身是黑褐色的，有十几丈高，十分雄伟壮观，他围着塔基转了一圈，说：“这么高大的铁塔，当年是怎么铸造的？”

这句话引起了勤修的大笑。

“嘿，你笑什么？”董其武不解地问。

“你看了一圈，怎么是不是铁塔，都没有看出来？”

“铁塔嘛，不是铁铸的，还能是什么？”其武仍觉得不可思议。

勤修认真地说：“它虽然叫铁塔，可不是铁铸的，而是琉璃的，只不过颜色像铁黑色的。”

董其武走近铁塔，仔细观察，又用手反复地抚摸，憨憨地笑了，说：“嘿嘿！还真是琉璃的。”然后，又自我解嘲地说：“常听人们说铁塔、铁塔的，我这是先人为主的印象在作怪吧！”

勤修又说：“虽说是琉璃的，但建造起来也不容易。古代能烧制出这样以假乱真的铁色琉璃，雕刻得这么精细，建成这么高大雄伟的塔，我真为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为我国建筑文化的悠深，感到骄傲和自豪。”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



呀！”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二十大几的汉子，你还怕被别人拐跑了？”

勤修噗哧一声笑了，瞥了他一眼，用玩笑的口气说：“真要是被别人拐跑了，那倒省得我挂念了。”

看到妻子想通了，董其武心中很是宽慰，又说：“丈夫出门，妻子牵肠挂肚的感情，我是理解的，也是感人的。但是常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当军人的，更不能老在家里。再说我可以经常写信给你，只要我的工作稍一安定，便接你出去。”

勤修文静地点了点头。

姚梅梁知道自己的妻子是比较明达开朗的，对她说：“古人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不可做孩子的绊脚石呀！只要其武能做通勤修的思想工作，就让他出去闯闯吧！”

几天后，母亲看到女儿有说有笑，也就想通了，不再说什么了。母女二人还高高兴兴地帮助董其武打点行装。临行前，勤修左叮嚀右叮嚀，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似的。送到大门口时，她眼里含着泪，深情地说：“不管你走到哪里，也不管你走多长时间，我的心总是跟着你的，你好好干吧！”

情深意切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轻的军人，既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又用一根无形的线牢牢地拴住了他的心。

董其武离开开封，离开新婚的妻子勤修后，找到老上级郑思成师长，一起去武汉，参加了北伐军第四军，组成北伐先遣纵队继续北进，直取开封。

久别如新婚。分别半年之后，勤修见到穿着北伐军军服的丈夫，绽开得像花朵一样的笑脸上，流着热泪。董其武抓住她的双



肩,一下子搂到怀里,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这半年多,可苦了你了!”

“我做梦,你这几天会回来的。”勤修嗔声嗔气地说。

“我梦里,早已回来过多次了!”

勤修虽然什么也没有问,但是她知道北伐军是不会在此常驻的。因此,她十分珍惜这久别重逢的日子,对丈夫照顾得比蜜月中更加无微不至,她竭尽全力为丈夫奉献自己所能奉献的一切。而董其武看到妻子已身怀六甲,实在不忍心让妻子为自己操劳,也尽量抢着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家务。姚老夫妇看到小夫妻恩爱倍加,宽慰的笑容也整天挂在脸上。

一个多月后,董其武随第四军返回武汉,东下九江又渡江北征,进入安徽境内,不久升任中校副团长,后因蒋介石排挤非嫡系部队,董其武所在的部队被编遣,他再次返回家中,与妻小团聚。勤修见他身体、精神都很好,很是高兴,急忙抱来儿子给他看,又胖又白的儿子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董其武告诉妻子,这次是路过,特意转道回家来看看,只能住上两三天便要去天津,勤修顿时有些黯然,脱口说出一句她自己都认为不该说的话:“我拴不住你的心,儿子也拴不住你的心吗?!”

董其武的心颤抖了一下,还是安慰她说:“我走出军校这几年,四处奔波,无所成就,不能就此停步。这次去天津投奔傅作义,可望能有个好前途。只要我的工作安定下来,我来接你和儿子,便可以长期在一起了。”

勤修认为丈夫说得在理,也就释然了。三天后,董其武乘车经郑州、北平前往天津。临行前,他又给妻子一个定心丸:“人生三十而立,如果我年逾三十仍无所作为,绝不在外继续奔波,即可回开



封谋一事由了此一生。”但是,他从妻子的眼神中知道,这并不是她所期望的。

此后几年中,董其武又回过几次家,有的十天半月,最长时也不过个把月。直到1932年春天,董其武担任团长,驻在绥远省丰镇时,工作才算安定下来。他立即向傅作义请了假,回到开封,把妻子和两个较大的女儿接到驻地,而把一个较小的儿子留在开封,暂由其外公、外婆照顾。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一是丰镇气候条件不好,生活条件较差;二是勤修一下子独自照顾三个孩子,难以适应;三是怕岳父母太孤单,留一个外孙增添家中的生气和活力。但是没想到,这个孩子却惨死在日本特务的手里。

那是在红格尔图 and 百灵庙战役之后,绥远抗战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地报纸都把董其武等抗日将领誉为民族英雄,还刊登了他的照片。这情况也被驻开封的日本特务机关所掌握,并多次企图对董其武留在开封的幼子下毒手,未能得逞。1938年5月徐州失陷后,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于6月6日进占商丘、开封等地。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令河南守军于郑州东北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岸,虽然使日军暂时退至黄泛区以东,但是也给黄泛区及其附近地区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灾区人民四散逃荒要饭,疾病肆虐流行,哀尸遍野。

那年8月,开封流行“霍痢拉”。当时日军正在进行武汉会战,为防止日军被传染,影响战斗力,凡是被传染此病的,统统被日军抬走火化,一时全城谈“病”色变。突然,有一天,几个日本特务带领着日军“共荣”医院的医护人员,到姚家为儿童进行体检,硬说这个孩子被感染“霍痢拉”,姚梅梁夫妇无论怎样争辩也没有用,最后虽然没有被拉走,仍强行注射了什么“预防针”。几个小时后,孩子



便上吐下泻,高烧不止,姚家夫妇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几个特务以复查为名,在枪口的逼迫下,强行抬走了这个刚刚进入学龄期的孩子。一个抗日民族英雄的后代,就这样被日本特务活活折磨致死。一年多后,当勤修得知这个消息后,气得昏死过去,得了一场大病,几个月身体都没有恢复。

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董其武升任第一〇一师中将师长,在转战晋西北时,结识了贺龙、南汉宸、程子华、肖克等八路军领导人,坚定了国共合作的信念。为了安心抗日,保障全师军官家眷的安全,董其武经与贺龙商议,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晋西北根据地内,建立了后方基地,又称第一〇一师留守处。从1938年秋,勤修带着三个子女,和其他眷属一起被送到后方基地,暂时停止了几年来随丈夫漂泊不定的生活,又开始了为丈夫牵肠挂肚的日子。1939年春节前,贺龙等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领导人还专程前往后方基地,看望、慰问了董其武部的眷属们,还为大家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这件事传到前线,对第一〇一师的将士们鼓舞极大。

董其武一向是重视教育的,现在北京仍保留着由他创办的曙光中学。即使在战争年代,部队走到哪里,董其武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在后方基地,董其武也划拨了专项经费,筹建了后方小学,还让勤修担任教员,为军官的子女们上课,有时她一个人要教两三个年級的国文和算术课,又要做饭,照顾孩子,忙得不亦乐乎,但从来没有怨言。其他军官家属对她都十分尊重,经常主动地帮助她拉炭、担水、买粮、买菜、简直像亲姐妹一样。在她的榜样作用下,整个后方基地团结得就像一个大家庭,很少有什么纠纷,负责后方基地的军官常说:“勤修替丈夫当好了半个师长!”

绥西战役后,傅作义部在后套地区扎稳了脚跟,把总部迁到陕



坝,董其武先后担任了暂三军、暂四军、骑四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也把晋西北的后方基地迁到陕坝,又与勤修及子女团聚了。从1940年夏至日本投降的五年中,绥西是相对稳定的,傅作义部主要是进行河套地区的生产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农闲时间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为抗日战争的总反攻创造条件。因此,这几年是他们结婚以来最安定、最幸福的时期,勤修把它叫做黄金时期。

在陕坝的子弟学校,他们的子女也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儿子董呈祥由小学升入中学,很像他的父亲,学习十分优秀。迁居归绥后考入重庆的一所大学。他在父亲的教育下,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坚强的性格,却始终未能报效祖国,永远地把青春留在了台湾。

改革开放后,董呈祥的长女董海薇多次托人捎信给爷爷董其武和奶奶姚勤修,开始时为了携带方便,只不过是空白名片上写几句问候的话,直到1984年10月,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姐夫杨通谊之子杨世绶、媳妇王金满回大陆探亲时,才带来一封较长的信,现摘录如下:

亲爱的爷爷、奶奶:

你们近来可好吗?……

妈妈现在很好,父亲于民国五十年过世后,她非常辛苦地将我们抚养长大,现在比以前轻松多了。父亲过世至今已23年,那时我才11岁,现在我已结婚,今年34岁。海蕙也已结婚,今年32岁。海龙现在尚未成家,今年30岁,自己经营房地产业,海芹现在尚未出阁,今年27岁。

我们都非常想念爷爷、奶奶,小时候常听爸爸谈起你们及

双料上将董其武



几位姑姑,后来六外婆来此,我们也常常向她问你们的近况,我们非常非常盼望得到爷爷、奶奶的只言片语或是照片,可是等了近30年了,每次通过香港和美国转寄的信件都没有回音,这次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请杨家夫妇带出,再从美国将信及照片转寄给我们。匆匆起笔,杂乱无章,请爷爷奶奶见谅。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孙女海薇 叩上

1984年10月17日

后来,董呈祥的长子董海龙旅行结婚,前往美国途中,专程到香港给大陆有关部门打来电话,说明身份后,表示了前往大陆探望爷爷董其武及观光的愿望。后在统战部、外交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及杨成武、荣毅仁多方活动下,通过荣漱仁的帮助,在美国旧金山领事馆办理了大陆签证。最终促成了董其武在台湾的孙子回大陆探亲。1986年初,董其武终于见到了孙子董海龙和孙媳妇。可惜的是,这时他们的奶奶姚勤修已经离开人世,未能见到她日夜思念的亲人。

董海龙回到台湾后,对姨父、台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郝柏村说:“真没有想到,爷爷在大陆离休快20年了,还坐的是部队配备的红旗车和奔驰车,住的还是部队分配给他的四合院。比我外祖父在台湾的待遇好多了,现在外祖父除了领退休金外,军界什么都不管了。没想到台湾的国防部长还不如大陆军长的待遇好。”郝柏村听后,震动很大,很快也给原“国防部长”郭寄娇配备了林肯车。此事在台湾军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董其武的长女董健民、次女董健申,也是在陕坝接受正规小学教育的。健民在归绥上的中学,举家迁入北京后,她于1951年1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习飞机驾驶,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字九〇四部队,是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之一。国防部长彭德怀得知此事后,考虑到她的安全,明确指示董健民不得继续担任飞行员,可安排其他工作。后于1957年转业,进入太原工学院学习深造。毕业后,分配到一机部机床研究所工作。现退休,在京安度晚年。董健申在解放后上的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一直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任教员,直至退休。两人都是共产党员。

三女董宁祥,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后在北京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做行政工作,1990年移居美国。

几个年龄较小的子女,基本上都是在北京上的中小学。四女董利祥(又名利翔)毕业于北京水力电力学院,分配到黑龙江省浑江水电局工作。1973年调回北京,在东风电视机厂工作,后办公公司,并在北京开办了分公司,现为山西省政协委员。

五女董蓝祥(又名澜翔),1968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毕业于北京军区石家庄军医学校,后在部队医院工作。转业后,于1990年移居美国办公司,从事中美贸易和中美间的国际旅游事业。

小儿子董都祥,1970年应征入伍,1973年考入山西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某部医院,后调入北京军区总医院,转业后到地方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姚勤修带着孩子们迁居归绥,在董其武全力筹划和平起义的时候,她也想助丈夫一臂之力,成立了归绥妇女和平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每天率领军官家属和社会进步女青年,大搞街头宣传,号召归绥市及全省人民积极支持走和平道路的行



的丈夫,把母亲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儿女,惟独没有一分留给自己。她是中国亿万妻子中非常平凡的一位,无数母亲中非常普通的一位,也是非常伟大、非常高尚的一位!

6.83 岁入党,“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

绥远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通过这次谈话,他确立了自己后半生立身行事的准则,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决心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爱护人民,尊重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处处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

1950年7月,杨成武任华北军区党委书记后,董其武在一次会议后,第一次向他讲出了自己入党的愿望:“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旁,特别是毛主席问我:‘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接着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我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做。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将领,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的大门是向一切愿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入敞开的,毛主席的谈话就是希望将来你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成武说。

“我会努力的。”董其武稍顿,说:“不过,你要多帮助我呀!”

1956年下半年,董其武向第六十九军党委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经过几十年深刻观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幸福,为国家统一,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我过去一直幻想着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但找不到路。参加革命队伍后,我逐渐认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统一中



国,振兴中华……”

后来,即使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没有因为党有过错而产生怀疑和动摇,觉得这些是前进中的失误,是对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探索过程中的失误。粉碎“四人帮”后,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再一次挽救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伟大、光荣、正确,还因为她能够进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光明磊落,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她一定能领导我们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董其武于1980年初第二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北京军区党委很快研究了董其武的入党申请,决定由政治部副主任戴丙孚、政治部老干部办公室主任王文勇作为董其武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在支部大会上全面介绍了董其武的历史和参加革命队伍后30多年的表现,全体党员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随后,北京军区党委将董其武入党的报告呈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不久,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专程来到他的家中,对他说:“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推迟你办理入党手续的缘由是:考虑到按你的社会地位说,认为你留在党外比到党内来对工作更为有利,更能发挥你各方面的积极作用。”

董其武当即表示:“我完全听从党中央对我的安排,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党的工作需要。”

从此,他更加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除了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工作,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的大业



外,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并特别关心家乡的生产和建设,关怀和指导家乡基层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力争发挥余热,自觉地多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工作。

1982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考虑到董其武多年来入党的迫切愿望,又一次提请中央考虑董其武的入党问题。12月22日上午,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

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通过之日算起。

年已83岁高龄的董其武听到这个喜讯时,高兴得热泪盈眶,他说:“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之后,他写了一对条幅和一首诗,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

那对条幅是:

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

《入党感怀》的诗是:

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

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他说:“入党后,我要更加尽己之所能,努力学习、工作和宣传,争取为台湾早日和平统一做更大的贡献,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在多年来极左路线影响下,个别起义人员受了委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统战部曾几次发文给起义人员落实政策,做到了既往不咎,量才录用。这说明共产党不失信于人,更不会失信于台湾。希望台湾当局变多疑为多信,走向国共第三次合作的道路。”



否则,台湾没有前途,国民党没有前途。”

这些辞恳意切的话语,反映了董其武虽在垂暮之年,还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和流落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在场的总政、军区领导同志及政治部的同志一起为他长时间热烈地鼓起掌来。

就在这一天,北京军区党委专门为董其武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鲜红的党旗映照着这位年逾八旬老人激动的面庞,他腰板挺直,右拳紧握,眼睛凝视着红旗上的镰刀斧头,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用洪亮的晋南口音倾吐着心中的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从此,董其武在党旗的照耀下,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光彩、最幸福的几年。在他的夫人姚勤修去世以后,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1985年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为了照顾董老,减轻其子女的负担,北京军区专门派了两名医护人员日夜守护在他的病榻前,几个子女也轮流值班照顾父亲的生活。

在董老病情转重之后,部分党、政、军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看望,邓颖超同志曾打电话慰问,鼓励董老战胜病魔,要求总医院不惜任何代价,尽最大努力医治好董老的病。

1989年3月3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杰出的军事家董其武离开了人世。

3月17日,设立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的遗体告别仪式会场庄严肃穆,董其武遗体在中国共产党党旗的覆盖下,安卧在散发着缕缕清香的鲜花丛中,四周陈放着松柏和花圈。董其武逝世后,聂荣臻给其子女写信表示哀悼,《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这封信。

